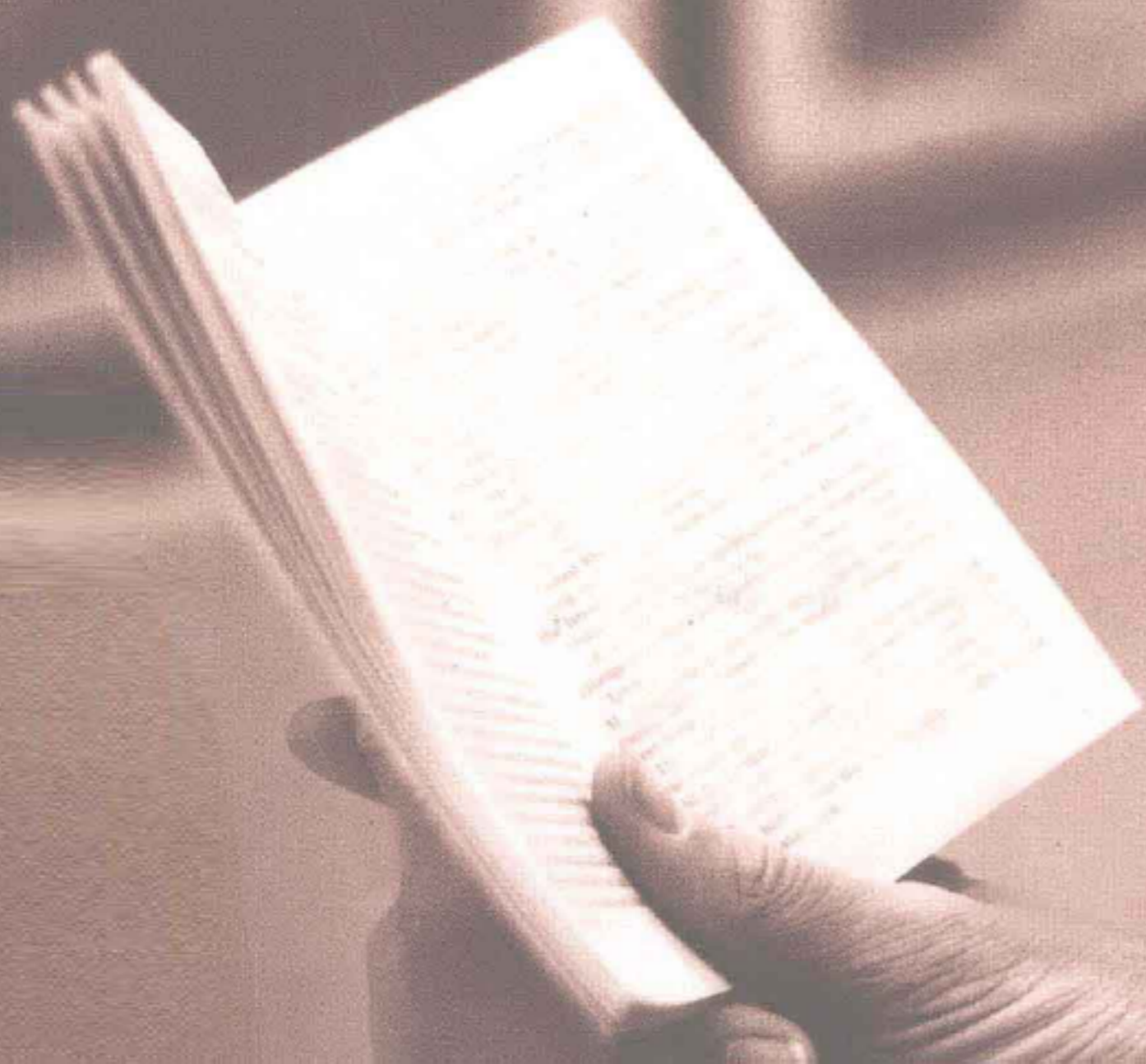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英] 雷蒙德·威廉斯 著
倪伟 译

漫长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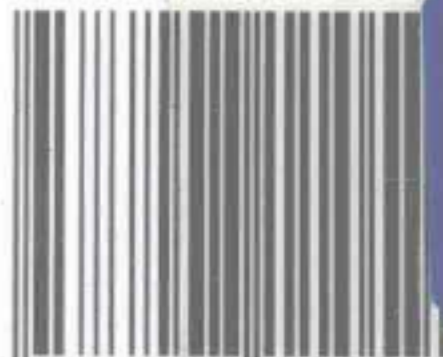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

我们就像是在经历一次漫长的革命，关于这场革命，我们最好的描述也只是局部性的解释。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改变了人，也改变了制度，在数百万人的推动下，它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也不断地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既有赤裸裸的反动，也有惯常的形式和观念所造成的压力。

——雷蒙德·威廉斯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208-11059-5



9 787208 110595

定价：52.00元

易文网：www.ewe.com

漫长的革命

[英] 雷蒙德·威廉斯 著
倪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革命/(英)威廉斯(Williams, R.)著;倪
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The Long Revolution

ISBN 978-7-208-11059-5

I. ①漫… II. ①威… ②倪… III. ①文化史-研究-
英国 IV. ①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3212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漫长的革命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倪伟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25 插页 4 字数 343,000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059-5/C·428

定价 52.00元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丛书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孙逊

编委

薛毅（执行）刘北成

成伯清 陈恒 林鹤

胡大平 倪伟 詹丹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前 言

在此书写作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谨在此略表谢忱。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不仅对整本书帮助良多，而且为第二部分第五章的写作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我的同事迈克尔·凯瑞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讨论了我们所谓的创造性的问题，这种讨论一度非常紧密，持续不断，以至我们的观点竟难分彼此，我相信此书中的许多论述无论如何也得归功于他，当然，其中的错误理应由我负责。我还得到了爱德华·汤普森的帮助，他对我关于大众报刊历史的那部分初稿提出了批评意见，我感谢他的批评以及在其他方面给予的许多帮助。其他一些朋友——特别是斯图亚特·霍尔和 H·P·史密斯——给予我的帮助恐怕比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多得多。我还要向下列出版机构表示感谢。

本书的某些部分此前已发表于《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 (纽约)、《新潮》(*Nuova Corrente*) (米兰)、《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纽约)、《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以及《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等刊物上。

雷蒙德·威廉斯

“鹈鹕版”前言

在这一版中，我做了一些修订，添加了一些注释，它们被用星号标示出来。这些修订主要是为了澄清或是更新某些观点。

我得感谢所有给我写信评述本书的人，也得感谢那些参与本书的公开论辩与讨论的人们，这些论辩与讨论比之于《文化与社会》一书要广泛得多，其程度早已达到我只能够倾听的地步，好在我至少是做到了。

本书当然还是有争议性的，也有一定难度，尤其是跟《文化与社会》相比，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上一本书笔墨较集中，试图重新叙述一个既有的传统，而本书则是探索新领域的一次尝试。其方法极难把握，因为方法在此意义上就是实质。倘若读者发现本书的某些部分如众人所言，尚不无裨补，那是因为它们本身比较受欢迎。但是，读者若是看不到或是不能接受我所构造并试图去描绘的那些联结，那么本书作为一个整体便注定难以聚纷繁于一端，其中局部性的困难也就会被夸大。本书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它们对于根本问题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也都附带着各自的问题。我不想一一辩明本书中的难点，在我看来，它们多半与我的著述意图相关，我特别要感谢那些知我意图并在此处与我相遇的人们。即使那往往就是引发论战的根源所在，我也仍然觉得这种承认是很鼓舞人心的。

雷蒙德·威廉斯

目录

前言/1

“鹈鹕版”前言/1

导言/1

第一部分

一 创造性的心灵/9

二 文化分析/50

三 个人与社会/83

四 社会的形象/111

第二部分

一 教育与英国社会/133

二 读者大众的发展/164

三 大众报刊的发展/183

四 “标准英语”的发展/226

五 英语作家的社会历史/244

六 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260

七 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291

第三部分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311

索引/372

译后记/383

导 言

9

本书是作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所开启的工作的一个延续来计划和写作的。我把那本书描述为“对我们在思想上、感觉上针对18世纪晚期以来的英国社会变迁所作出的各种回应的一种说明和一种解释”，这当然是其主要作用所在，即批判性地描述在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里各种观念和价值的历史。然而本书的方法——尤其是在结尾那一章里——却引向了一个更加深远的目的：即从分析和阐释各种观念和价值出发，进而根据仍然处于变化中的社会以及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验，试图重新阐释这些观念和价值并加以扩充。

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候，我没能预见到，等到它出版的时候，我们关于社会的整个思考当中的某个重要部分已经沿着一些路线——它们蕴含着我自己的一些主题——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的结果不仅表现在我那本书获得了广泛的讨论（我读了五万字以上的评论，还参加了许多口头讨论），而且也表现在那些论辩所开启的思路很多时候都远远超出了那本书本身。在《文化与社会》出版之前，我本来已经草拟了本书中的许多部分，如今已参考讨论的意见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但对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我还是恪守了自己的想法，并设法把本书限定在目前的范围内：探讨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对某些文化制度和形式进行历史分析，思考当前文化形势下的意义和行动的问题。在这些宽广的领域里，我的工作只限于我个人感兴趣的范围，而且也不认为它们就能完美地完成。本书所涉及的主题范围广、种类多，这实在是一种冒险，

10 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任何一种学术审慎的界限，但我似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无法在任何一门学科内部来穷尽的，我希望将来会有这么一门学科，因为从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问题的压力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很多人所普遍感受到的。

我的书名取自《文化与社会》中的一个句子，但作进一步的说明也许不无用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在经历一次漫长的革命，关于这场革命，我们最好的描述也只是局部性的解释。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改变了人，也改变了制度，在数百万人的推动下，它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也不断地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既有赤裸裸的反动，也有惯常的形式和观念所造成的压力。这是一场难以定义的革命，波澜起伏，经久不息，以至我们很难不迷失在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当中。

民主革命夺得了我们对政治的关注。在这里，各种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牵涉的权力问题使之变得极不平衡，令人困惑。然而，从任何一种全局性的视角出发，都不可能看不到几乎在所有地方正在崛起的一种决心，那就是人民应该当家作主，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不是把这种权利让渡给任何一个特定的群体、族群或阶级。在20世纪前60年里，世界政治已经变得无法再用老眼光来打量了。不管是大众革命、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还是议会选举权的扩大，其根本要求显然是一致的。可是这种要求在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来自其他传统的重压，而且也来自暴力和欺诈。如果我们把人民应该当家作主（跟这一核心事实相比，他们怎么当家作主并不那么重要）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这场民主革命显然还只是刚刚起步。

11 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进步是其后盾——则夺得了我们对经济的关注。它在全世界扩张的速度已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测，确实快到了难以解释的地步。然而，尽管其目标和手段已经被普遍接受，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距离发达国家已达到的阶段却仍然很遥远，而在发达国家里，那种认为人类能够改天换地的想法却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张。因

此，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工业革命也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它与民主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似乎可以看清楚的是，工业发展对于新型民主组织的产生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工业组织表面上的各种需要——包括从资本积累的过程到工人在一个范围极广、分工极细的技术体系中的地位等多层次的需要——有时也会延缓或阻止对于共同决策的渴望。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我们关于社会的艰难思考当中最核心的问题。

然而，还存在着第三种革命，它也许是最难解释的。我们常常提到文化的革命，我们不能低估那种把积极的学习过程（连同识字的技能以及其他的先进传播方式）推广到所有人身上而不只限于某些群体的渴望，必须把它看得和民主的发展以及科技工业的兴起同等重要。这种渴望过去曾被抵制，现在也仍然在遭到抵制，这些抵制有时候是公开的，有时候是含蓄的，尽管如此，它作为一个目标却已经得到正式的承认，而且是普遍的承认。这场革命当然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数千万人仍然目不识丁，但在发达国家里，人们开始意识到扩大教育、发展新的传播工具是有可能实现的，这种意识正在得到修补并扩展开来。在这里，就如同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中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我们所确定的努力目标相比，似乎差得太多了。

在这点上，尤其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画地为牢地认为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乃是三个彼此分离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卷入的这个变化过程。我们的整体生活方式——从我们的共同体形态到教育组织和教育内容，从家庭结构到艺术和娱乐的地位——都深受民主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深受传播扩展的影响。这场深刻的革命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生存经验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它正在被解释，而且的确以各种极为复杂的方式在艺术和思想的世界里引发了论战。只有当我们努力将这种变化与那些被政治、经济和传播等学科所掩盖的各种变化关联在一起，我们才会发现一些最艰难、

也与人们最息息相关的问题。

整个这一过程——追求民主的斗争，工业的发展，传播的扩展，以及社会的和个人的深刻变化——规模巨大，确实很难了解，甚至都难以想象。实际上它常常被简化为一系列断裂的或是局部的变化，尽管在通常意义上说，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我看来，这种缩简似乎只是掩盖了一些最深层的问题和张力，从而只能表现为一些散乱的症状，标示着动荡不定的状况。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漫长的革命处在一个相对高级的阶段，每一代人都会宣称革命已经完成，而当年轻的一代声称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时，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恼羞成怒，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很显然，我们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种境况中，此时很多代人奋斗的目标已经差不多实现了，然而社会却从未遭到更彻底的批判，某些作家和思想家不仅没有以清楚明了的方式来批判社会，而且即使有所批判，也通常是头脑不清、意思混乱，以至于愤世嫉俗、漠不关心、无关痛痒之类的老掉牙的说法，往往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对他们的最好品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缩简的做法严重地妨碍了我们。于是有些期望就被形塑和定义为普选权、一种特殊的生活标准、规定的离校年龄以及教育水平等等。这些已足够激励我们去努力，任何一个了解自身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根本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必须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去奋斗才能够获得的。但是我视之为漫长的革命的那段历史的特征却正在于：这些目标一旦被实现，就会被迅速地吞没，要么是频繁地定义新的期望，要么是因为没有新的期望而陷入到萎靡不振、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不停地听到各种统治集团在抱怨民众从不知足，也从不心存感激。实际上，这种强加于人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如此令人生畏，以至于我们在所有方面都能看到一种关于延迟的、分级的让步的统治哲学，因为如其所言，今天的让步就是明天的跳板。统治集团不承认革命所达到的真实规模，这有其自身的理由，但在别的地方，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意识危机了，任何人只要他关心处于这个普遍的变化过程中的自己的生活

以及他所在社会的生活，显然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去解决问题和澄清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理论上的危机，理解我们的真实历史或是我们目前的现实状况以及转变的条件，那么就必须始终努力把这个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以新的方式视其为一场漫长的革命。

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的知性生活（更不用说我们的社会实践了）却致力于批判这场漫长的革命，运用许多经过选择的强有力的手法，从各个侧面展开攻击。然而由于这场革命在不断地自我扩张，直至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其外，这股批判的激流似乎就变得越来越无关痛痒了。我把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命名为漫长的革命，是想学着去赞同它，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给予它足够的赞同。我愈益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价值和意义全都蕴含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倘若有人从传统的角度指出，民主、工业以及扩大的传播全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我会这么回答：这恰好就是它的革命特征，要认识并接受这一点，需要有新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以及对于各种关系的崭新构想，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去努力探讨的。本书即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记录。 14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首先考察创造性活动的性质，在我看来，要对我在《文化和社会》中试图建立的传播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然后我再回头来考察在定义和分析文化方面所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并举实例为证。从讨论传播入手，我将试图分析我们平常所使用的“个体”和“社会”的概念，描述这方面的某些典型的关系。然后我将扩大讨论的范围，探讨在我们社会中现存的一些观念，以及社会和文化转变的某些过程。

本书第二部分将解释和分析某些主要的文化制度——从教育到报刊——的发展，以论述某些艺术形式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系列短论收尾。我认为这个部分有很多东西都很有用，因为各种材料是由于一个共同的过程而被汇聚在一块的，尽管我不怀疑其中某些事实性的陈述尚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修正。那些批评性的短论是尝试性

的，也是可以争论的，它们试图进一步发展我在《文化和社会》中论“工业小说”那一章里所展现的那种探询。

本书的第三部分即结论部分，将回到在这篇序言中所勾勒的漫长的革命这一主题，试图从我所理解的模式转变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当代的文化和社会。我想简要地评估这一漫长的革命在英国的发展，并预想它的下一阶段。我把范围局限于英国社会，并不是因为我对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而是因为我感兴趣的那种证据，只有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才能真正地获得。而且我还想补充的是，英国的确是最早进入这一革命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可以为探讨这一革命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供非常丰富的材料。同样真实的是，英国社会目前所遭遇的危机本身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对于置身其中的我们来说，好好利用这种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本书与《文化和社会》以及我的小说《边境乡村》（*Border Country*）——尽管是以很不相同的方式，但我相信它和前两书有着本质上的联系——的相继问世，意味着我在十年前所开启的工作已告完成。尽管还会有新的工作接踵而来，但我似乎感到自己人生中的某个特殊阶段已经结束，虽然没必要以此引起别人的关注，但也许仍然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部分

创造性的心灵

在英语中，没有哪个词比“创造性”更带有一以贯之的积极涵义，当我们想到它所表达的各种价值以及它所描绘的那些活动时，显然会为此感到高兴。但这个词无疑有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含了意义上的一些难解之处，而且也涉及某种不经思考的重复，这种在习惯中养成的重复，有时会使这个词变得毫无用处。我提议要考察“创造性”这一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回顾其历史；其次是把它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术语的发展过程拿来跟最近在知觉和传播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作比较；再次是把它看作当前的文化讨论——这一讨论聚焦于艺术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我们全部活动的复杂综合体——中的一个也许是很关键的术语。

1

“创造性”这一观念其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难以追溯的。在我看来，它似乎基本上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但当我们审视这些源头时，发现其创始人都认为这一观念溯源于古典思想，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赋予了这一观念以新的侧重点。在以前的著述中，只有一部分原创的意义被发掘出来，因为意义已被当作一个整体通过许多心灵传递给我们，即使在我们已能辨别其影响的时候，也还是会发现这些原创的

意义，连同其语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了。然而，当我阅读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所仰赖的那些作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述时，却看到了区别所在，看到了一种修改过的意义，这一点似乎颇为重要。尽管描述的是同一种活动，但描述的方式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现在把艺术家的活动说成是“创造”，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词“摹仿”。“摹仿”在希腊语中的一般含义是“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或是“使某物逼肖另一物”。在实际的使用中，它包括了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演员、剧作家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再现了别的东西”：这就是“摹仿”。亚里士多德写道：

作为一个整体，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可资证明的是，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尽管后者领略此类感觉的能力差一些。因此，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①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观点，他认为艺术首先是对某种仍然存在的现实的再现。艺术家摹仿这种现实，而我们则通过他们的摹仿——它类似于我们最初的学习过程——获得了被摹仿事物的

^① 此处采用陈中梅先生的译文，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译者注

意义。〔1〕

柏拉图同样也把艺术家说成是一个“摹仿者”，他摹仿先在的实体。神是事物的创造者，工匠是事物的打造者，而艺术家则是事物的摹仿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了摹仿这一事实，但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尽管在《伊安篇》里柏拉图称诗人拥有神授的灵感，但他还是认为摹仿距离实体隔着两层（理念，然后是物体，最后才是摹仿），《理想国》中的著名讨论更是提出要对诗人进行监管，强调这些“纯粹的摹仿者”会对人们心智中软弱的部分产生危险的影响。

摹仿的技艺就好比是一个无价值的朋友的无价值的主妇，只能生育出无价值的子裔……摹仿的诗人……跟画家一样，其产品按真理的标准来衡量是没有价值的，其相似之处还在于，他所交接的都是心灵中与自身相仿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最好的那一部分……他刺激并满足心灵中无价值的部分，从而摧毁其中理性的部分。 21

亚里士多德则有所不同，他不仅强调摹仿乃是正常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普遍性”原则：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所谓“具体事件”指阿尔基比阿得斯做过或遭遇过的事。①

① 此处采用的是陈中梅先生的译文，出处同前所引书，第81页。——译者注

因此，虽然柏拉图强调的是虚构的危险性，摹仿根本不能触及终极的实体，而只是一些表象，但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了自己的摹仿观，把它看作一种学习的形式，既然摹仿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那么它就是表现了永恒和必然，这几乎是把摹仿定义为学习的最高形式了。

滥觞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庞大的思想传统不仅包括了这两种相对立的价值评判，而且还包括了对它们所作的众多的修正、重估、发扬和阐释。因此柏拉图主义包容了一种与《理想国》中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艺术理论，认为神授灵感的诗人能够传授最高的实体，因为他能够穿透表象，在作品中具体地表现神圣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关于诗表现“带普遍性的事”的观点，在这一语境中首先可以理解为关于人性的普遍真理的体现，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它被等同于这一教条：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就是神圣理念，诗人把它们具体表现出来。然而，即使在经历了这些发展之后，艺术过程仍然被认为是“摹仿”而不是“创造”。

在文艺复兴时期振奋人心而又混乱不堪的理论潮流中，涌现了四种艺术理论。第一种把艺术定义为对隐匿的实体的摹仿，艺术因此具有了一种启示的形式，这对那些基督教思想家们尤为有用，他们因而可以把艺术看作是上帝思想的寓言。这种想法进而发展成这样一种艺术观，它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深奥莫测的活动，并给予寓言性或象征性的作品最高的评价。第二种理论其来源相近但较少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它把艺术看作是对“美的理念”的永恒的摹仿和体现。在艺术实践中，它开始提倡摹仿——不是卑屈地而是严肃地——早期艺术作品，它们被认为是“美的理念”的化身（这便是日后渐为人知的古典主义的主要传统）。第三种理论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点，把艺术看作是“自然的理想化”，也就是说，不是按其本来面目来表现事物，而是按照它们应该有的样子来表现。这同样是出于对“美的理念”的虔诚，但是它并没有走向古典主义，而是走向了另一种重要的传统，其作品带有示范惩戒和道德教诲的色彩。第四种理论是强调“创造性”的思想的主要源泉，它把自然看作是上帝的作品（塔索），把艺术看作是堪与自

然相媲美的有活力的形式。正如卡斯特尔韦特罗^①所指出的：

艺术并非某种与自然相异之物，它也无法超越自然的限制；它所追求的目标与自然相同。

这个目标显然是一种创造的形式。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艺术则是人的创造。“存在着两种创造者”，塔索写道，“上帝和诗人”。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有可能看到我所区分的这四种理论，但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常常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术语的极端含混与模糊很容易导致出现这种状况。但在更重要的作家那里，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艺术理论转向人文主义的趋势。在此前的千百年里，认为艺术乃是一种与上帝争耀的创造，似乎是亵渎神明的。而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这种艺术观挟带着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亦真亦假的仰赖，又纠结了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传统，它的产生可视为文艺复兴新思潮的一部分，而且是那些传承至我们时代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的传统中，其经典表述来自锡德尼。锡德尼认为，其他的“艺术”和“科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哲学、法律、历史、文法学、修辞学、医学、形而上学）全都受到自然的束缚。

23

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他为自己的创造活力所鼓舞，实际上是创造了另一种自然，要么是比自然所化育的更好的事物，要么是自然中从未有过的崭新形象，如那些英雄、半神、

^① 卡斯特尔韦特罗(Ludovico Castelvetro, 1505—1571)，意大利文艺理论家。他对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和意大利语言都有深入的研究，撰写了评注和论著。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修辞学》、《诗学》所作的诠释，被认为是当时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著作；其中《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1570)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广泛探讨了文艺理论问题。他认为诗歌以使心灵欢悦为目的。他着重阐述诗歌同历史、哲学的区别，指出诗人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按照逼真的原则，借助想象、虚构来描述可能发生的有代表性的事件；历史学家则是记叙已经发生的个别的事件。——译者注

独眼巨人、怪兽、复仇女神等等，这样他就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局限于它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而是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

自然从未像诗人所做到的那样，以如此华丽的织锦来装点大地，不曾以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流、果实累累的树木、香气四溢的花朵，以及足以使这为人深爱的大地变得更可爱的别的东西。它的世界是铜的，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但是且不去管这些东西，来看看人吧——万物都是为他而创造的，在他身上自然似乎已极尽其巧，但它何曾产生过像忒阿革涅斯那样忠实的情人，像皮拉得斯那样有始有终的朋友，像奥兰多那样英勇的人物，像塞诺丰的居鲁士那样公正的君王，像维吉尔的埃尼阿斯那样各方面都如此卓越的人。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作品是实在的，另一个作品是模仿的、虚构的，就以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善解之人人都知道，技工的技能体现在作品的理念(Idea)或是事先的构想上，而不在于作品本身。很显然，诗人拥有那种观念，他能够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把它完美地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不完全凭借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那种构造空中楼阁的方式；它的工作是如此实在，以至于不但造出了一个居鲁士——这不过是一种个别的功绩，就像大自然已经做到的那样——而是赐予世界一个居鲁士以造出许多居鲁士，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那个创造者是为为什么又是怎样把他造出来的。

24

不要认为把人类才智的最高峰和自然的功力相衡就是太狂妄的对比：还是歌颂造出那种创造者的天上的造物主吧，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把他放在第二自然的一切造物之外和之上。这一点在诗里表现得最充分了，诗人以一种神圣的气息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自然之所为，这对那些不相信亚当该诅咒的第一次堕落的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论据，因为是我们的

善于思考的头脑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至善，然而我们的被染污的意志却使我们无法达到这种至善。^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传统的支脉，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新颖（这不是锡德尼个人的看法，而是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理论把人视为创造者，他“秉着神的气息的力量”创造了“远远超越”于自然之上的事物。锡德尼回顾了柏拉图的部分教诲，以表示这股力量是上帝赋予某一种人——即诗人——的。但这种主张却是在一个巨大的思想运动中出现的，在这个思想运动中，人被认为有权利打破自然的秩序：把除人之外的一切自然都看作是必须服从其创造的意志的。在锡德尼看来，诗可以超越自然，因为它是一股心灵的能量，发现了上帝可以超越自然的限制而任意创造。而提出相同主张的另一种方式，是要维护一种纯粹属于人类的创造力，维护自然产生的思维所具有的力量。当摹仿（对实体的学习）变为创造（人制造新的实体）时，艺术和思想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2

当我们追溯历史上发生的辩论时，便会发现，随着这一主张的隐含意义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马维尔^②的名诗《花园》中，我们仍然能听到锡德尼的声音，但其要义却以更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① 此处参照了钱学熙先生的译文，有改动。锡德尼：《为诗辩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11页。——译者注

^②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17世纪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与其他玄学派诗人不同的是，马维尔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他不但继承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爱情诗中的浪漫主义传统，而且开启了18世纪古典主义的“理性时代”。——译者注

头脑宛如一片浩淼的海洋，
万物都能从中找到自身的肖像；
但它能超越这些，创造出
一些另外的世界，另外的海洋，
它能将人工的制造统统涤荡，
化作绿荫中一个绿色的思想。

- 25 这首诗通篇都清楚地表明了，“创造”仍然是一股接近上帝的心灵的能量。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假定自然景观是有序的，“万物都能从中找到自身的肖像”。^[2]锡德尼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他声称只有诗人才能超越自然。而在马维尔看来，这同样也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当我们关注创造性的观念如何在如今被称为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如花怒放时，必须记住这一强调。把“创造性”和艺术家的工作联系起来，这种想法的线索是最易清理的。多恩^①说过诗是“一种仿制性的创造”。马利特^②在1728年曾说过诗是“缪斯、创造力和想象的友伴”。到了18世纪末，这一强调随着关键词“想象”的出现而变得极为重要。其主线在于强调“创造性想象”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而诗人则把这种才能发挥到了极致。这便是雪莱的《为诗辩护》的基础，它和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一样，包含了传统思想的许多支流，但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它发展出了一套关于知觉和想象的概念：

人是一个工具，一连串外来和内在的印象掠过他，有如一阵阵不断变化的风，掠过埃奥利亚的竖琴，吹动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然而，在人性中，甚或在一切有感觉的动物的本性中，却

①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歌最杰出的代表，其诗作富有独创性地将机智与严肃熔为一炉，代表了诗歌从古典主义模式向更具个人风格的样式的转变。——译者注

② 大卫·马利特(David Mallet, 1705—1765)，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出生于苏格兰。代表作品有《威廉和玛格丽特》(William and Margaret)。——译者注

另有一个原则，它的作用就不像风吹竖琴那样了，它不仅产生曲调，还产生和音，凭借一种内在的调谐，使得那被感发的声音或动作与感发它的印象相适应。这正如竖琴能使它的琴弦适应弹奏的动作，而发出一定长度的音响。^①

这当然还是“摹仿”，但增添了组织的原则——雪莱称之为“综合”——作为人类的创造行为。孩童和野蛮人也摹仿外在的对象，而

语言，姿势，乃至塑像的和绘画的摹拟，不外是事物以及野蛮人对事物的理解两者结合而成的表象罢了。

成为一个诗人，就是要把这种一般的活动提升到最高的形式：

26

要去领会这么一种善，它首先依存于存在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其次依存于感知与表现之间的关系。

诗人是通过使用某种语言来实现的，这种语言

主要是隐喻的；这就是说，它指明事物间之前未被人领会的关系，并且这领会永存不朽。

“具有革命主张的作家”也是如此，因为

他们的文字用具有真实生命的形象，来揭露宇宙万物间的永恒相似。

^① 此处采用的是缪灵珠先生的译文，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20页。

一首诗

依据人性中若干不变方式来创造情节,这些方式也存在于创造主的心中,因为创造主之心就是一切心灵的反映。

在这里,雪莱回到了锡德尼所强调的那个观点,而在其论辩的其他部分,他却多半已超越了那个观点。在他为诗所下的最著名的定义中,他再一次返回,却调整了侧重点:

一切事物存在于世间。都恰如人们所知觉的那个样子,至少对于知觉的人是如此。“心是自己的主宰,能凭自己把天堂化为地狱,把地狱化为天堂。”然而诗独能战胜那迫使我们屈服于周围印象中的偶然事件的诅咒。无论它展开它自己那张斑斓的帐幔,或是拉开那悬在万物景象面前的生命之黑幕,它都能在我们的人生中替我们创造另一种人生。它使我们成为另一世界的居民,同那世界比较起来,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显得是一团混乱。它再现我们参与其间耳闻目见的平凡的宙宇;它替我们扫除那层凡胎俗眼的薄膜,使我们窥见我们人生中的神奇。它强迫我们去感受我们所知觉的东西,去想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当习以为常的印象不断重现,破坏了我们对宇宙的观感之后,诗就从新创造一个宇宙。诗证实了塔索那句大胆而真实的话:**Non Merita nome di creatore, se non Iddio ed il Poeta**(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和诗人)。

- 27 这是一番雄辩有力的辩护,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它摇摆于知觉的摹仿观和创造观之间,似乎要把真实的创造有保留地说成是次一等的联想;它也倾向于否认人类普遍具有创造力,而认为这种创造力是诗人独有的才

具。最有代表性的是柯勒律治，在他那些闪耀着智慧火花的言论中，他扩展了创造的观念，认为一切知觉皆有创造性：

我主张，原初的想象是一切人类感知的活力和原动力，是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

这个令人吃惊的假设，其重大意义要到后面才能为我们所彻底了解，它标志着从“摹仿”论到“创造”论的转变走到了下一个重要阶段。

3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创造性”的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它在柯勒律治之前即已存在。宣称艺术再现了“更高的实在”，它在本质上比人类所能获得的其他才能更高级，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争议。反对意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新思想家们所称的创造，在柏拉图那里被称为谬误。艺术是虚构的，因此低于现实。毋需多言，对艺术的这种态度始终是顽固存在的。在现代思想中，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比如很多人都会说，相比于小说，自己更喜欢传记，“因为它们至少是真实的。”我想说的是，声称艺术“高于现实”和把它蔑称为“低劣的虚构”，这两种看法在现代思想中是相搭配的。如果你相信艺术摹仿论，那么必然是处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即使在深信存在着一种超越于“表象”之上的“实在”的文化中，人们能否承认艺术家可以凭借个人才能触及并表现这种“实在”，也决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某种宗教是信仰一个“更高的实体”的媒介，那么艺术家的独具才能当然就不会被承认，尽管人们会常常强调他的职责就在于用宗教所能接受的语汇来描绘这样一种“实在”。而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称之为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的。把艺术创造看作是某种更高的实在的媒介，

这种信念在从以宗教为本向以人文主义文化为本转变的时期，似乎更有可能被人接受，因为它同时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基本假设：即有一种实在是超越于人类平庸的幻想之上的，但人又有着极高的创造力。然而，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后一种主张只能是泛泛而论，因此又会对艺术家的独异性构成挑战。除此之外，在对人类力量的肯定中也会包含有某些倾向于贬低“想象”的因素，或者至少会使它变得模糊不明。怀疑论的发展——它后来成为从一种以宗教为主的文化发展而来的运动的一部分——将会延伸到这一领域，愈益强化这么一种认识，即“纯粹的罗曼司”可能只是一种幻觉或是毫无价值的建构。历史上的发展也大抵如此，从一开始起，那种认为艺术家是更高实在的创造者的主张，就与另一个观点形成了对照，那个观点强调想象可能只是幻觉，而小说和罗曼司也可能包含有误导性的因素。

从可能存在的数百个例子中，我们不妨撷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著名片段作为例证，因为它是模棱两可的：

忒修斯：奇怪得不像是真的。我从不相信
这些古老的传说以及神鬼的把戏。
恋人和疯子都有这种滚烫的头脑，
这种凭空捏造的幻想，总能抓住
冷静的理智所永不能理解的东西。
癫狂的疯子，热恋的情人和诗人
他们从头到脚，全都用想象捏成。
这一个看见的魔鬼连无边的地狱
都无法容纳，那是疯子；而情人
是同样地痴狂，能从埃及人脸上
看见海伦的美貌。而诗人的眼睛
只需要曼妙而狂热的一转，就能

从天上看见大地，从地上望见天堂。
想象孕育了形形色色的未知之物，
诗人的妙笔使它们成形，给那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一个家以及名字。
强大的想象力就有那么大的本事
只要它领略到一种什么样的欢喜
就能领悟到这欢喜来自谁的赐予。
或是在黑夜里，想到恐怖的事情，
那会多么容易把树丛错当成熊罴！

29

希波丽特：可是听完他们说了一夜的故事
他们的心灵都起了同样的变化，
足以证明那不是幻象中的景象，
而且越来越变得像是确凿无疑，
但不管怎样，总是稀奇而荒唐。

此处关于诗人的说法是经常被引用的，它们显然也属于那个“创造性”的传统，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上下文总的来说是在描写一种幻觉。评价似乎发生了转变，甚至于对作品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这或许是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信念：幻觉或幻想很普通，但有一种特殊的幻想类型，它是艺术家们所运用的，是有价值的。[3]

在这场混乱的论争中，实际上几乎每一种可能的立场变换都被采用过。在实践中，自从18世纪初以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在天真的现实主义（“按照事物本来有的样子来描绘”）和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从“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即其理想形态——来描绘”到只是表现“更高的实在”的主张）之间所作的调整（但只是主要重点上的调整），在下面所引的雪莱的诗里就含有上述表现“更高的实在”的主张：

他自从凌晨一直到黄昏，
观望湖面上反射的阳光
照亮花丛中黄色的蜜蜂，
它们是什么他并不在乎，
但他却能用它们创造出
比活人更加真实的形象——
精心培育的永恒的事物！^①

这两个鲜明的主张，与我们的时代靠得更近，它们都曾得到广泛的强调。对于朴素唯物主义日渐滋长的信仰——它通常伴有对一切超自然实体以及超出人们理解范围的实体的明确否认——给艺术创造了空间，可以把艺术说成是“对现实的反映”（摹仿），或者更巧妙地把它说成是“对现实的组织”——艺术家进行选择、组织（雪莱所说的“综合”），从而赋予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新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宣称有一种实在是人所不能触及的，这种实在就是“无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意识”超出了人们平常的接触范围，但它却可以为是一门新的科学或是一种新的艺术定义提供一个入口。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材料是“幻想”，他用“现实”与之相比。艺术家是这么一种人，他因某种心理倾向而

避开现实，将全部兴趣及里比多转移到创造其幻想生活中的种种愿望上面……艺术家因而找到了躲避现实的方式：他并不是唯一拥有幻想生活的人，这个居中的幻想世界是为人类所普遍认可的……但是对那些不是艺术家的人来说，从幻想之泉所获得的满足是极其有限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这方面则显得游刃

^① 出自《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一幕，此处采用的是吴笛先生的译文。见《雪莱抒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译者注

有余。首先,他懂得如何来精心编织自己的白日梦,以便消除那些在陌生人听来刺耳的个人性的音符。……他也知道该如何来好好地修饰它们,让别人无法轻易地探测到那隐秘不可告人的源头。此外,他具有一种神秘的才能,锻造自己的独特素材,使之忠实地表现自己幻想中的意念,他知道该如何依恋自己的幻想生活的这一映像,这股快感是如此汹涌,至少是能暂时地冲破和驱散压抑。当他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时,他就给别人开辟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返归自己的无意识的快乐源泉,获得放松和慰藉,艺术家就是这样赢得了人们的感激和钦佩……

需要指出的是,“感激和钦佩”正是艺术家所要寻路返回的“现实”的一部分。

赫伯特·里德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以弗洛伊德关于心智的论述为起点:

如果我们把心智领域描画成三个分层排列的地层(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描画肯定有其不足之处),那么继续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会出现一种类似于地质学上的“断层”现象,其起因是心智的某部分其各层之间发生断裂,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彼此暴露……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才能对那种以灵感著称的进入方式和抒情直觉作出解释,而灵感在一切时代里都只为少数人拥有,我们把这一小撮人称为天才的艺术家。

在另一方面,容格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一种是“心理上的”,取自强烈的意识材料,另一种是“幻想性的”,取自“无时间的深渊……人的心智的内陆”。他还进一步区别了艺术家的隐秘个性和

他从事的艺术活动的性质，把后者看作是“一个非个人性的创造过程”。创造活动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艺术家在其艺术中便是非个人性的化身，他带领我们

返回到经验层面，在这里人们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个人而活着的。

这样，“创造”的观念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平常难以接近的现实就在人自身之中，唯有艺术家独具天赋，能够进入这片区域。但它跟“幻想”的联系——尤其是在弗洛伊德那里——又连接到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立场，根据这一立场，艺术的素材被认为是不同于“现实”且低于“现实”的。这个观点已经遭到反驳，站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要么是重申艺术的材料就是平常的现实，但艺术家（通过对这种现实的摹仿）的所作所为——摹仿、记录和教导——却是有价值的；要么是声称艺术是探索和组织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家首先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探索者，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科学家则是一个“理性的”探索者。一方面是出现了一种极端化的立场，认为艺术的材料是某种特殊类型的反常经验，贬之则为“幻想”，褒之则为“灵感”；另一方面，艺术家所摹仿或组织的材料又是“普通的日常现实”。在这种常常充满了怒气的争论中，在语言方面令人称奇的是，所有学派尽管是从各自不同的假定出发，却都用“创造性”一词来指称艺术和艺术家。在回顾（即便是最简略的）了人们对艺术性质所作的长期探究之后，如果有谁胆敢说，只要习惯能得到核实，他就能确定“创造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他是需要有点勇气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32 我们可以求助于近来关于知觉的研究，它把人的知觉看作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运行过程。在我看来，这的确能帮助我们在对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4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确实都能创造出自己的世界。

这句令人感到吃惊的话出自 J·Z·扬^①教授的《科学中的悬疑与确定性——对大脑的生物学反思》一书，它无疑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讨论阶段。在传统的讨论中，“创造性”所强调的重点显然在于，它隐含着—个对立面，即自然之见(natural seeing)。柏拉图主义者可能会这样表述：

人——自然之见——表象

艺术家——超常之见(exceptional seeing)——现实

浪漫主义者可能会这样表述：

人——自然之见——现实

艺术家——超常之见——超现实

而典型的现代解释可能是：

人——自然之见——现实

^① J·Z·扬(John Zachary Young, 1907—1997)，英国动物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被《卫报》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生物学家。1950年，他在BBC作题为“科学中的悬疑与确定性”的系列演讲，向听众介绍大脑科学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为《科学中的悬疑与确定性》(*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 A Biologist's Reflections on the Brain*, 1951)一书。扬的其他著作有《大脑的模型》(*The Model of Brain*, 1964)等多种。——译者注

艺术家——超常之见——艺术

33 的确，对这种关系的表述有着几乎数不清的变化，因为“现实”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用法。但其核心是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存在着一种平凡而普通的知觉，而某些人或某种活动却能越出其外、超乎其上。此外，大多数的说法会把平常知觉的产物说成“现实”——事物本身即如其所是——这样，艺术家的知觉产物就必然在许多方面被看作是对其余所有人所共享的“现实”的改造（组织，理想化，超越）。这种思考方式已牢牢地扎根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传统之中，使得我们根据现在对于知觉的认识而做的必要的重估，变得格外困难。扬的那句话其挑战性在于，它不只是用“创造性”一词来描述艺术家的活动，而且也用它来描述每个人的心智活动。

这一关于我们大脑活动的崭新解释，其最重要的论据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看。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学习扬所谓的“看的规则”的缓慢过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无论在什么寻常意义上说，都无法看到身边的世界。世上并不存在我们所熟悉的形状、色彩和声音等实体，好像我们只需张开眼睛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感官从身边的物质世界所获取的信息必须根据某些人类规则来阐释，然后才能像往常那样以各种形式的“现实”来称呼它们。人的大脑必须进行这种“创造”活动，然后我们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看：

视觉接受系统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其能力极为有限。我们也许会为这样一种说法所骗，即眼睛就是一种照相机。跟我们所猜想的正相反，眼睛和大脑并不是以一种类似于照相的方式简单地记录下我们面前的图像。大脑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系统，就像一卷胶片那样……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基于一种假设，即我们的感觉器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准确的记录，它不依赖于我们自身。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这多半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必须通过

学习才能像平常那样看世界。

这就是扬的解释，他进而说：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创造了我们所说的世界……理解的要点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感官给我们传递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真实信息。当我们想说世界是什么样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所看到的和所说的，依据的都是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一过程。

或者，就像拉塞尔·布雷恩^①所说的：

色彩、声音、气味、触觉等正常知觉的感官性是由具备感知力的大脑所产生的，它们不同于那些构成客体——知觉因其而起——状态的外部事件。

这个观点有着既深远又深奥的哲学涵义，而从此以后，我们无疑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即**我们所经验的现实**在此意义上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我们的全部经验都是人类对于我们所栖居的这个世界的描述。这种描述有两个主要来源：已进化的人类大脑，以及由我们的文化所作出的解释。人对他所栖居的世界的描述有着一种重要的生物学作用：这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形式，它允许人维持其生命并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环境——这是必须做的。我们以某些方式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某些规则来解释感官信息——以此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但是这些方式——这些规则和解释——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能

^① 拉塞尔·布雷恩(Russell Brain, 1895—1966)，英国神经病学家，是《神经系统的大脑疾病》(*Brain's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一书的主要作者，他曾长期担任医学杂志《大脑》(*Brain*)的编辑。——译者注

学习新的规则和新的解释，因而就真的能以新的方式来看。所以，我们把这种活动说成是“创造性”的就有了两重意义。人类大脑的进化，以及特定的文化所作出的特定解释，给予我们一些“规则”或“模式”，没有它们，就没有人能在平常的意义上“看”。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遗传和文化学习这些规则，这是一种创造，因为只有在学会这些规则之后，才能形成各自有别的人类世界，形成其文化所界定的日常“现实”。特定的文化有着对现实的特定描述，拥有不同规则的文化（尽管都建立在进化了的人类大脑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世界，即其传承人平时所经验的那个世界，在此意义上说，对现实的描述也就是创造。然而，进一步说，不仅是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变异，而且负有这些特定文化规则的个人也能够改变、扩充规则，引入新的或是修改过的规则，这样就能体验到一种延伸的或是不同的现实。所以，新的现实领域是可以被“揭示”或是“创造”的，它们不必局限于某些个人，而是可以通过某些有趣的方式来传达的，从而为特定文化所携带的那些规则添砖加瓦。

- 35 在我看来，这种新知识的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根据我自己努力吸收这种知识的经验，我知道要领会它的实质性意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运用这种知识，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抗和混淆。知识（要详尽地解释它，就必须求助于原初的解释）的形成本身就是走向新的解释、新的规则的一种努力，很难学习，也很难传播。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前面所说的“创造性”的观念，那么也许就能占据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来理解并说清楚这种努力的性质。

5

最好是这么来看关于“模仿”和“创造”的种种理论，它们都试图定义被命名为“现实”与“艺术”的两个事实领域之间的关系。我们

看到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尽管如此，我们最终必须看到，全部艺术理论实际上包含了某种假设，而且也是从这种假设出发的，它认定在两类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如果说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那么它就可能被作为一种学习或记录的形式而受到重视，或是被贬低为纯粹的模仿——第二手的复制——或谎言。如果说艺术是创造，那么它就可能被褒扬为（对现实的）揭示或超越，或是被贬低为十足的空想或幻想。这两种观点显然都假定了本质上的二元存在。不管是高深的理论还是浅俗的成见，它们都同样持有这一立场。柏拉图和清教徒以及现代的实践论者，会贬低艺术。亚里士多德和启蒙理论家以及现代的浪漫主义者或唯美主义者，则会褒扬艺术。这两种不同立场之间的漫长而激烈的对话到了今天，并没有向哪一边倾斜，而是根本否认了这两种立场所共有的那些前提。最终可以这么认为，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没什么真正的意义。

在这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艺术风格极为繁复混乱，精密的现代艺术思想逐步发展出了一种立场，可以表述如下。有一种艺术——我们可以称之为再现的、写实的或是自然主义的——是以最普通、最客观的方式，平凡地描述或是再现了现实。另外一种艺术虽然不太容易贴上标签，但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浪漫的，它提供的不只是对现实的再现，这种再现还经过了艺术家主观情感反应的修饰——这样，通过艺术家的眼光，现实就是经过选择的，是被组织起来的，被理想化或是被漫画化了的。第三种通常被称为抽象艺术，它既不是对现实的再现，也不是对现实的主观修饰，而是直接表达了纯粹的“审美”经验，这种艺术所再现的，不是现实，而是艺术家的眼光。类似这样的分类显然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现代艺术手法的明显差异。但我们看到，这在根本上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仍然是以假定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即认为艺术和现实或是人与其所观察的世界之间是分离的。

我们现在所获得的关于知觉的知识，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终结这种二元论的道路，从而可以转变我们对于艺术的思考。关于

知觉的一些新的事实论据使我们不可能再假定会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它能够被人体验到，却横亘于人的观察和解释之外。因此，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假定——以其本来面目来看事物，彻底撇开我们对它们的反应——就不能成立了。同样，这些关于知觉的事实论据也决不会把我们引向另一条唯心主义的路，它们不会要求我们去假设一切现实都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坚持认为人的所有经验都是对非人类现实(non-human reality)的一种解释。这不再是一种主客二元论，而主客二元论却几乎是所有艺术理论的基础。我们应该把人类经验看作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这就像考德威尔所指出的：

37

身体和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决定性的关系。知觉不是对轻触皮肤这等动作的解码。它是神经系统和周围电子之间的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身体的每个部分不仅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决定身体与现实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决定并被决定，这种交替导致了发展——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不断发生变化……从这一堆关系……我们能辨别出一个确定的群体，它随着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与之不即不离，互相决定着跟世界的互动方式。这样一种选择，内涵丰富，是高度组织化的，在时间上也是在晚近才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意识，或是我们的自我。它不是由我们选择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自己分离出来的，就像生命从中分离出来，或是像恒星、行星和各种元素从宇宙形成的过程中分离出来一样。已分离出来，但仍处在变化之中，这就是意识，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有意识的自我的那个**我们**。然而在分离的时候，它却并没有彻底地分离出来，并不比任何元素的分离来得更彻底。它和宇宙万物的其余部分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就此而言，它跟它们仍然很相像，而对这一进化结构的组织状况、其内在诸关系以及它作为一个系统与宇宙其他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就是心理学。

无需再强调这种看法很深奥，要以实在的方式来把握它，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然而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已经接近这种想法，不仅是通过关于知觉的科学，而且也通过视艺术为“创造”的某些传统思想。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柯勒律治的看法就与此非常接近，他把“原初的想象”看作是

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和原动力……是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

然而，甚至包括柯勒律治的这个看法在内的早期思想，其努力都只限于将这一活动过程人格化（把它说成是一种“活力”和“动力”），并暗示它只限于“有限的心灵”，是一种人格化的“创造”。我们可以再来看扬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对时间和存在的短暂经验，根本就不能保证我们有理由去假定任何创造或开端。那样去假定，是我们粗率地谈论事物的方式，其模式是把生命的基本事实当作“我”来谈，有一个开端和结尾。生物学上的发现已经表明，为我们每个人假定一个突如其来的开端，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组织——它是与我们相关的最基本也是最持久的事物——并非始于虚无，而是持续传递下来的…… 38

或许，我们与其聚焦于作为创造行为的开端，倒不如反过来集中谈论连续性。我们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来理解创造的，它建构了贯穿每一个个体生命之始终的组织，就我们人类而言，这种建构是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的……宇宙的普遍法则似乎有两条：其一是联系、结合的法则，零乱分散的各种过程会趋向于互相联系起来，形成更大的单位；其二是这样的统一体不会永久不变，它迟早会解体，呈现新的无序性。这的确像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普遍法

则,我们已经看到它能多么有效地用来描述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这个物种的全部组织的进化过程,而这种进化正是通过集合和解体的相互交替实现的。每一个物种都通过发展和死灭的交替性周期,以新的组织形态取代旧的,从而与周遭环境保持平衡。正是通过这种途径,生命一如既往地维持着与非生命世界之间的交流……组织和无序之间的相互交替,形成了一种有节奏的建构活动,也构成了绵延不绝的“创造”过程。

因此,人和所有动物一样,都有着这种基本的过程,所不同的是,人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他“建构组织”的活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再学习的过程,而与之相比,动物的本能机制则是相对固定的。通过上述过程不断地学习,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其进化的历史。既然对于人来说,这种不间断的意识的组织和再组织,就是对现实的组织和再组织,而且这样的意识也是学习如何去控制环境的一种方式,那么显然可以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把人称为创造者。

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其沟通系统,但就人类而言,情况又有所不同,人只有通过社会组织 and 传统,才有可能进行学习和再学习,而这个学习和再学习的过程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其复杂、强有力的沟通系统。姿势、语言、音乐和数学都是这样的沟通系统。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各自分开的系统,但若深入地了解其性质,就必须把它们放在整个社会学习过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在某个层面上把艺术和科学或是感情和理智对立起来,但是用这些名称来描述的活动,实际上却与人类整体进程的各部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不能说科学是客观的,艺术是主观的,因为我们正努力去领会的那种关于人类活动的观点,是拒斥这种主客二元论的,它认为在我们的现存组织的整个活动过程当中,意识乃是现实的一部分,而现实也是意识的一部分。柯勒律治把“实在的知识”(substantial knowledge)说成是

对事物的直觉，因为我们是全体中的一员，所以才能有这种直觉。

这种认知——即获得“实在的知识”的能力，乃是人类组织的最高形式，尽管它所把握的那个过程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形式。在组织程度较低的层面上，我们转而求助于柯勒律治所说的“抽象的知识”，此时，我们

觉得自己是孤零零地存在着，并把自然与心灵、客体与主体、物质与思想、生与死对立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自然与心灵的对立——作为“客体与主体”的对立——是虚假的，然而我们的许多想法却仍然以此为根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思想革命，才能把握真实的统一体，领会整个过程的意义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种把“艺术家”和“现实”看作是彼此分离的范畴并以此为起点的艺术理论，从此以后是可以抛在一边了。我们必须重新回过头来，寻找新的定义方式。

6

通过学习如何来描述，我们才学会了如何看一事物，这就是一般的理解过程，只有当我们用某个已知的构型或规则，或是某个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当作新规则来学习的新构型，对获得的感官信息进行解释之后，这个过程才算完成。这个解释的过程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有着至关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作用，借此我们才能理解周遭的环境，才能更成功地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而说我们是通过学习如何描述来看事物的，这其实是从根本上把看(seeing)与沟通联系在一起。我们

有许多描述的方式，通过已习得的规则——已成为惯例的描述——以及某些特定的反应，用姿势、语言和图像来进行描述，当我们碰到某个不能用惯常的方式去描述的新信息并竭力加以描述时，我们常常会当真觉得自己是在创造。这种描述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它不只是亦步亦趋地去描述已知的事物，而且也确实是看待新的事物和新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描述的努力，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但它并不是艺术家所独有的活动。科学家和思想家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要做出同样的努力。在这方面，语言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语言演变的方式——修正陈旧的描述或是容纳新的描述——确实是社会性的，与日常生活大有关系。在这种活动上，并不能看出艺术的特殊功能或是艺术家的特殊性。在艺术家之外的许多人身上，都能看到一种有活力的想象生活，以及描述新经验的深入努力，而新的描述和新的意义的传播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进行，如艺术、思想、科学，以及平常的社会过程。我们所称的艺术，是众多的描述和沟通方式中的一种，而大多数艺术很显然也只是发展了某些常用的方式而已，比如舞蹈是从姿势发展而来，诗歌则来自演说。描述是沟通的一种功能，我们若是看到了这种重要的联系，就能更好地理解艺术，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联系，那些必须被描述的经验才得以实现（实际上，这种描述是把经验融入了可以沟通的形式之中），而且，因为描述有着这种生物学上的目的，所以它必须跟别的生物有机体共享。艺术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掌握了实现这种共享的非常有力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艺术中，这样的手段都是从一般的沟通中发展而来的。

节奏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例子，它在这些手段中是最显著的。我们可以只从科学的基础出发来研究节奏，但那样似乎就把我们已知的东西排除在外了，而我们知道节奏是传达所描述的经验的一种方式，它可以

41 在接受者身上重新创造出那种经验，这种经验不是一种“抽象”之物或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能够影响有机体的身体反应——影响到血液、呼吸以及大脑的生理模式。我们出于许多平常的目的来运用节

奏，但艺术(我想说的是包括所有艺术门类在内，尽管在视觉艺术中要更难证明些)却包含了一些高度发达且格外有力的节奏手段，借助这些手段就能实际完成经验的沟通。人创造并运用着这些节奏，就像他“创造”了色彩一样。身体的舞蹈，嗓音的变化，以及乐器的声响，它们就像色彩、形式和图案一样，是传达我们的经验的有力手段，从而使那些经验真的能够在别人身上复活。在实际的艺术经验中，我们一再感受到了节奏的力量，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它凭什么又是为什么不只是一个隐喻；它是一种身体经验，和其他的身体经验同样地真实。

因此，艺术是比一般的沟通更为强烈的形式，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因为说话的声音、舞动的身体、雕塑和绘画本身当然都是有待解释和接受的“对象”。我们从一幅画所得到的感官信息，并不比我们从一块石头或一棵树那儿得到的感官信息更多。绘画和其他视觉对象一样，在被看到之前，本身就必须在规范的意义得到解释和描述。由此我们认识到，任何艺术都必须具有社会的基础，因为如果观看者和艺术家不能共享某个习得的沟通系统的复杂细节和方法，那么就没有谁能够“看”到(不是懂，而是看)艺术家的实际工作。当然，可能存在着多种层次的沟通，从彻底的失败(在一种给定的文化中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到部分的失败，以及对某些看似已完全被接受的事物的错误解释。就像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我们也许看见了画作，却对它没有感觉。有某种东西被传达出来，却不是在有意义的层面上。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各方都有过错(艺术家和观看者一样，也常常会犯错)，但是一味地反唇相讥是毫无用处的，不如去设法认清它试图在做的事情——即把经验从一个有机体传递到另一个有机体那里的实质性的沟通——的性质及困难所在。只有当沟通得以实现时，艺术才能存在，而这种沟通是艺术家和观看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在艺术进行沟通的时候，某种人类经验就能被积极地呈献出来并被积极地接受。如果没有这种积极主动性，也就不可能有艺术了。[4]

42

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其性质也许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艺术家和其他人都有通常所谓的“创造性想象”，也就是说有能力去发现和组织各种新的经验描述。其他人跟艺术家一样，也有能力传达这些描述，而这些描述只有借助一种可沟通的形式，才能获得充分的意义。艺术家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使用了一种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技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传达经验。他对这种技艺的掌握即是其艺术（我们记得，“艺术”一词的传统含义正是“技艺”）。但这种技艺的目的近似于一般人所使用的沟通技能：即传达有价值的经验。因此，艺术家的冲动和每个人寻求沟通的冲动一样，都来自于这么一种感觉，即觉得自身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艺术家的活动就是实际的传达工作。从这个观点看，“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找到形式也就等于是找到了内容——我们所说的“描述”，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对每个人来说，“描述”自己的经验，这是一桩迫切的事情，对个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实际就是在再造自我，是在创造性地改变其人格组织，去包容并控制经验。这种再造自我的努力——改变我们的人格组织，使我们可以维持与环境之间的恰当关系——实际上常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现在有很多神经学者认为，在描述完成前的那个阶段，在新的感官经验还没有被理解的时候我们的实际组织状况，以及在新

43 新的经验仍然处于紊乱不安状态时我们试图做出适当回应的努力，在生物学上跟我们所谓的“肉体痛苦”是十分相似的。创造的苦恼，有时被认为是过于夸大了，但它的确是真实的。此外，沟通的冲动也是一种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人类反应，是对一切紊乱作出的回应。当然，对个人来说，通过恰当的描述来顺利地沟通是一件难事。我们常常在艺术家那里看到的现象——他也要克服困难去恰当地描述（实际上是对词语和颜料的调配），其重要意义似乎主要是对他个人而言的，而无需考虑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因为若是描述不恰当，也就不会有密切的沟通了。只想到跟别人接触，却想不到接触的其实正是这种经验，这样就偏离了主题，分散了注意力。真正的沟通依靠的是对准确的描述的全力关注，但它当然不会为了描述而

描述，确切地说，这种关注正是实现密切沟通的一个条件。

我们不仅通过再造我们自身来回应紊乱，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会通过改变环境来回应。实际上，这些都是意识和现实在其间互相渗透的那个过程的一部分。艺术家跟普通人一样，也是通过工作来再造自身，这同时也是在再造环境，学习如何工作，也就是在再造自身。在语言、声音和运动的艺术中，情况也是如此，艺术家传达经验是为了调整现有的现实关系。在像雕塑这样的艺术中，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把对象雕塑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塑造经验的完整过程，通过雕塑行为从而发现了经验。艺术家在塑材上工作直到它变得“合适”，而当塑材变合适时，他自己也就对了：艺术作品已经完成，而艺术家也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自己。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他在塑材上工作，直到它能够转达他的经验，或者是他可以通过对材料的加工发现一种新的经验，——实际上他已经从这种经验中学到了东西。尽管在头脑中可以这么想，但这听起来还是有点难懂，而实际的过程却两者都不是。它既不是主体作用于客体，也不是客体作用于主体，而是两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过程。人创造了形式，形式也重新塑造了人，可这只是对同一过程的另一种描述而已，这是艺术家所熟知的，实际上它对人自身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种努力伴随着兴奋和痛苦，在完成后会感到愉悦和放松，其实并不只有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是这样，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束了又开始。

44

7

我们对知觉和沟通有了新的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依据人类普遍具有的某种创造性，证实了艺术的创造活力。因为传统的缘故，“创造性”这个词转向了艺术，尽管形成这种传统的各种力量也曾引导

人们在其他领域里使用“创造性”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艺术定义所造成的一个后果。J·Z·扬写道：

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是一个观察者，他的大脑以新的方式运转，使他能够给别人传达那些以前不被传播的事物的信息。正是通过对传播方式的探索，我们的观察力变得更为敏锐了。在这方面，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发现是极其相像的。

此外，

画家有他自己的方式来传达其观察所得。富有独创性的画家能够找到新的传达方式和新的艺术形式。它们的确不仅扩大了艺术家自己的视野，而且也扩大了观看其作品的观众的视野。艺术家们发现了新的空间形态，它们有一套符号体系，就像物理学家们有着另外一套一样。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很有用而且也是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一旦我们不再从整体上来思考艺术，而是转向实际的作品，那么把有价值的艺术描述成是“新”的，就会碰到问题了。在谈论艺术的时候，只限于谈那些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作品(或许是出于下意识)，这在哲学家和科学家当中是相当普遍的，但在批评家那里却看不到这种限制，他们必须跟各种各样的艺术打交道。当我们转向最新的小说、新诗集、最近的戏剧和电影以及普通的展览时，那些最好的审美的定义似乎就显得很不真实了。如果说这真的就是艺术平常的状况，那么这更像是在说真正糟糕的艺术，而坏艺术的例子我们都看得太多了。各种艺术的生产者都声称自己的描述富有“创造性”，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当中显然只有少数人是“传达了那些以前不被传播的事物的信息”。人们总是习惯于避难就易地说那些不符合艺术审美定义的作品不是“艺

术”，“不是真正的艺术”，或是“冒牌诗人的劣作”。但这管用吗？几乎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同一种普遍活动的结果，所使用的技艺跟创作《李尔王》、布莱克的《向日葵》或凡·德·维登^①的《圣母怜子图》时所使用的没什么差别。评价的高下之分不能用来证明构思及创作上的根本差异，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伟大的艺术和蹩脚的艺术，还有居于它们之间的一系列无限渐变的等级，其间不存在可以划分差别的明显界线。我认为事实上尽管审美理论由于充实了关于知觉和沟通的新知识而变得非常丰富了，但它仍然循规蹈矩地保留了关于“创造性”的两个传统观念。首先，它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保留了这么一种看法，即认为艺术家特别有灵感，这种说法给关于艺术质量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容易却是错误的答案：“我们所说的艺术，指的是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特别有灵感，那些并非艺术家却认为自己在写作、画画或是作曲的人，其作品不能被当作艺术，因为他们没有灵感。”这听起来很愚蠢，有点邪魔，但事实上我们都曾学过这种理论。其次，那种关于“揭示”的看法也同样被保留下来，它认为艺术就是发现一种“更高的真实”，这种说法自然会引导我们相信艺术家的作品能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新发现（“创造性”被等同于“新”）。实际上这是一种无能的论调，因为它把许多艺术强制性地排除在外，而这些被排除在外的艺术却显然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把这些看法放回到它们在传统中的位置，我们就能充分地认识它们并予以拒绝，这样我们就能发现，作为我们平常对知觉和沟通所作解释的一部分，描述所有艺术而不是只描述挑选出来的例子，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46

美学理论的特征在于，它悄无声息地把沟通当作一个社会事实排除在外。但是沟通却是艺术的关键所在，因为对经验的恰当描述决不只是简单的传达，它必然也包括接受和回应在内。不管艺术家多么成功

^① 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 约1399年或1400—1464年), 15世纪下半叶尼德兰画家。《圣母怜子图》(Pietà)描画的是圣母玛丽亚将基督的尸体抱于膝上的情景。——译者注

地把他的经验通过一种可以传达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如果别人没有调动所有知觉进行进一步的“创造活动”，那么这样的作品仍然是无法接受的，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必须得到解释和描述，并纳入到观看者的组织当中。这不是在向被动的观众传达信息时有没有“灵感”的问题，而是说艺术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提供了一种经验，这些经验可能会被接受，也可能会遭到拒绝或忽视。那些我们还能想起来曾经看过的艺术作品，我们觉得是很简单地就接受了，但在每个观看者的头脑中却有着一个更进一步也更重要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是传到了观看者那里，但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艺术家的经验——它们在艺术家以某种特定媒介创作的作品中得到了描述——将在感官的层面上被观看者接受，观看者会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段，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经验就真的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而获得的这种经验，正是扬所提到的，他称之为眼界的“实实在在的扩大”，但“扩大”也许还不是最好的表述。有时候，它的确是一种扩展，是一种崭新的看的方式。但是某些艺术经验（包括伟大艺术在内）在这种意义上却并不“新”。我们的经验包括了品质明显不同的“认知”：这其实是我们一直都知道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艺术史，就不会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了。在很多社会里，艺术的功能就是具体表现那些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共同意义的东西。艺术家不是描述新的经验，而是表现已知的经验。假定艺术只有处于知识的边缘才能发挥作用，这是很危险的。它常常处于边缘，尤其是在动荡不安和急剧变化的社会里。但它也会处于社会的核心。社会经常会通过艺术来表现其自身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而是他所在共同体的喉舌。即使在我们这种较为复杂的社会中，也总是有一些艺术家似乎更靠近共同经验的核心，另外一些则散落在边缘，若是因此认为这就是“平庸的艺术”和“伟大的艺术”之间的差别，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不是所有“陌生化”的艺术——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都是有价值的，

而“熟悉”的艺术也不都是没有价值的。

从经验组织的角度，特别是从艺术对一个或一群观众所产生影响的角度，来谈艺术，似乎要更好些。如果人们生活在一起，共享着某种借以训练其头脑活动的组织方式，那么我们就发现进行组织的各种程序实际上就是一些制度，艺术通常只是其中之一。扬指出一个社会共同体最重要的建筑物——从土墩到大教堂——实际上是一种沟通和传播的手段，它组织并不断表达了人们赖以活下去的共同意义。发现一种沟通和传播的手段也就是发现一种共同的意义，在许多社会里，艺术家的作用就在于熟习这些手段，从而使社会的共同意义得以不断地被人们体验到，并保持活力。带有这些意义的人类的身体会死去，但永久的纪念碑，或是继承下来的传统的艺术技艺——它们在某些形象、图案和节奏的创造中具体表现出来——将会幸存下来，延续组织的程序。全社会和其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永不间断地重新创造意义。这些技艺本身并不是被动地继承下来的日用品，而是一些必须学习的程序，是艺术家个人成长的一部分：在一个完整的程序中，这些手段以及意义都必须获得这种个人性的确认。而这些意义所解释的共同经验本身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缓慢得令人难以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速度变化对个人来说实在是太快了，以至这种变化只给他留下了一个笼统的意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但只有通过那些可以传播的描述，这些关系才能被意识到。已被接受的意义，其组织必须和正在出现的有可能是新的意义相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只与“社会”变化相关，而且也跟社会全体成员在个人组织方面的实际变化有关。此外，虽然社会成员共享着一块共同意义的区域，但实际的组织过程在每个人那里都必然是个人的。根据他在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他所继承的个性（这是从人类遗产复杂多变的因素中作出特定选择的结果）的重要程度，个人将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与变化中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来学习。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置身于现实关系中的独异个人在学习一种变化中的模式，同时也促进了这种模式的变化。

48

我们必须在这种语境中来理解艺术上的变化和失败。

艺术家个人或是可以改造共同意义，——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他是依据那些共同意义建造了他个人的组织；或者他可以创造新的意义，这意味着为了组织他的实际经验，他必须寻找到新的描述方式。对艺术家个人来说，在他的实际工作中，这些过程是很相似的，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要付出大量努力来创造一种特殊的经验形式，这种经验在他那里是如此鲜活，使得他可以将它传播给别人。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他个人的意义和共同意义之间的联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两者联系很紧，那他就能直接利用常用的传播手段，他的观众对这些手段也比较熟悉。不能说这样只能产出“墨守成规”的艺术（其隐含意思是：它不大可能有什么价值），最伟大的艺术也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不是在简单地“复制”共同意义，这些意义是他自己的，表现为一种深邃的认识，而它们的传播条件却很容易获得。与此相反的情况是个人意义和共同意义之间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传播的手段，显然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实际上，艺术变化的过程通常是一个意义扩展或是意义修改的过程。超过了某种限度，一种新的意义根本就无法传播，甚至有可能无法描述，压力就会打乱艺术家的组织。艺术家的“创造性”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么一个过程，他把组织好的经验传达给别人，从而使某种意义活跃起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借助特定的手段提供了多种意义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些意义当中只有一部分能被接受。一个社会的艺术往往是在没有意识到断裂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变化：由个人提供的数量惊人的意义被吸纳并组织进新的共同意义当中，而那些遭到拒斥的意义则所剩无几，不足以构成挑战和压力。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显然遭遇了这种极为复杂的变化，这不仅要归因于共同经验的快速变化，而且也因为社会共同体已经极度地扩张和分化，从而使断裂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是更主要的，我们还多半以为艺术就是一系列的个人贡献，几乎

忘掉了艺术也是由共同意义构成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发展出了这么一种艺术理论，它在强调个人贡献的同时却忽视了传播的事实存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紧张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描述的，即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在于描述“新”的经验。但事实上即使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也还是有大量个人提供的意义被整合进了共同意义之中，尽管在一开始会有点缭乱，而且要在过一段时间后才让我们意识到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普通的发展过程，当然，不管这意义是不是新的（就其在以前从未被描述过而言），它都可以被感受为新的（就其能被个人鲜活地体验到而言）。为了维护这种发展，就必须维护一个容纳共同的描述和反应的有效区域，和其他传播系统一样，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力来充实这个区域。不少新艺术是这么做的，早些时期的艺术以及其他地方的艺术也都如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收藏它们，并把它们当作一种工具，来重新创造对共同经验的一种感觉（在后面谈到传统的性质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较为古旧的艺术是怎样为我所用的）。而其他新艺术则成功地描述并传播了新的经验，从而把我们引向了各种新的反应和活动。在这点上，早些时期的艺术和其他地方的艺术也可能成功地传播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描述和反应。但不管它是在传播已知的组织形式，还是在推动我们走向新的组织形式，艺术都是作为我们实际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来到我们面前的，它不是进入了心灵的某个“特殊区域”，而是作用于我们全部的个人组织和社会组织，并与之互动。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价值的高下总是首先由其实际的传播力量来决定的。既然意义和手段是不可分的，那么要让经验鲜活起来——这是成功的传播所需要的——就要靠艺术家实际的能力了。使经验——不管它此前有没有被记录过——鲜活起来，即意味着艺术家的确已经把它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其沉潜之深使得他的全部能量都能被用来描述它，并把它传达给别人。糟糕的艺术在这种个人的组织上总是很失败，或是显得相对地失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个人的组织远不只是一种

修辞手段，而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个实际程序。我们实际存在的人类组织是为了沟通而存在的，在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的沟通中（最明显的就是性关系，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沟通程序，在其中生命被赋予和接受），沟通的能力可不像感觉、智力或意志那样，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就植

51 根于某些完整的组织模式之中：成功或失败与整个自我休戚相关。人类已发展出来的各种传播系统使个人的组织变得更加多样而复杂。有些人特别眷恋某些形式的沟通，并选择了某些种类的手段（他们给予这些手段很高的评价，并且正是凭借这些手段，他们才能变得技艺娴熟），这都是发展的形式，并没有越出遗传种类以及社会继承和经验的广阔范围。我们不能因为艺术最终能够成功地传播那些显然不能用其他方式传播的经验，就认为它可以替代其他种类的沟通。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的组织能力的一种延伸：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它能使某些特殊的现实领域得到描述和沟通。

艺术要取得成功，就要以这样一种形式把经验传递给其他人：经验是被那些接受者积极地重新创造出来的，不是“沉思冥想”，不是“查核验证”，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对手段的反应，居然又活过来。眼下是有很多艺术作品都失败了，这根本上是因为艺术家的经验没能得到充分的组织，所以他发现不了可用来分享经验的手段。在这方面，有些是彻底失败了，但也有很多是部分地失败了，或是部分地成功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经验得到了传达，可以作为一种生动的现实被人们分享，而另一部分经验对我们只有微弱的影响，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失败的情形下，组织的过程——它也是描述的过程——是怎么崩溃的。我们看到老毛病又复发了，一味地去模仿别的作品（在总体模式上或是在模式的某些细节上），其失败不是因为被模仿的作品本身在方法上有什么不足，而是因为那些方法和当下的特殊经验不协调，积极的描述便变成了机械性的重复。这种失败是很常见的，但有一种失败同样很常见，却经常在理论上不被注意，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到走向新描述的努力，而沟通却被忽视了。人们常常说，观众如果

想要学会艺术家的“新语言”，就必须耐心一点，这话虽然没错，但它不应该暗示说：只要给出时间，每一种新语言都能学会。这样假设，就是忘掉了沟通之于观众，就如同之于艺术家一样，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接受并亲历艺术家的经验，决不是什么偶然随便的活动，而是一种实际的、活生生的改变。我们的成长依赖于那些提供给我们新描述，但我们是否接受它们却取决于我们以这些方式成长的能力，而在这些方式中，有些对于我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一些则会被积极地抵制。成功的沟通有赖于艺术家的组织，也有赖于观众的组织，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去学习，但同时也必须记住任何一种反应都是生存方式的一部分，而对各种反应的选择则是任何组织的一个前提。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确不能接受提供给我们的方式，我们完全不能按那种方式来看世界，来对经验作出反应。常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作品的力量打动了我们，但之后我们还是会拒绝它。因为经验必须适合我们的整个组织，而在某些情况下，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也可能会持续多年）的比较之后，却还是不能接受。此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来是失败了，最终却可能获得了成功，或者虽然被有些人拒绝了，但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珍惜。如果我们想到真实的传播过程，就能发现一个比流行的（情绪化的）表述更好的说法：艺术家的新语言，一开始被拒绝，最终又被接受下来。艺术史所显示的不只是这一种次序，还有另外三种次序：艺术家的新语言，一开始被接受，以后仍然被接受；艺术家的新语言，一开始被接受，最终被拒绝；艺术家的新语言，一开始被拒绝，最终还是被拒绝。这一变动范围的确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因为沟通是在真实的个人（他们都还在学习）之间进行的过程。由于这些个人各不相同，沟通总是不平衡的，当与新的描述相关时，这种不平衡就非常显著了。新的描述能否成为一种新的一般观看方式，这取决于共同经验的方向。在有利的情形下，一件实际上是失败的作品，也许会因为共同经验的运动发现了它的可贵之处而在一开始大获成功。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一件作品不管它对当时的某些人来说显得如

52

53

何新、如何宝贵，它都将被彻底遗忘。表现共同意义的艺术也同样如此，当意义还能令人满意的时候，艺术将被保存下来，以便给意义重新注入力量，但当意义真的令人失望时，艺术也就丧失了感动我们的力量，除非是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根据自己的意义来理解它，重新解释它。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由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我们已被引入了一个记录和保存的复杂过程，这实际上也改变了艺术的地位。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来记录和保存，我们得以控制传播本身所固有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不平衡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传达被记录或是保存下来，我们重视某些传播系统，就因为它们能够实现这种永恒。提供的经验被保存下来，经得起长久的思考，而沟通也可以跨越千百年的时间间距。由于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明智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使更多的经验保持鲜活的状态，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事先确定哪一种经验最终会被采纳，这种储存经验的习惯对于人的完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前面说过的积极过程，来使用这些储存品，就像我们使用新的艺术一样。我们必须跟学习新的观看方式一样，去积极地学习旧的观看方式。

8

把艺术看作是人类创造性地发现和传播的普遍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程序，这就立刻重新定义了艺术的地位，并找到了把艺术跟我们平常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手段。把艺术视为“创造性”活动的传统定义是很重要的，但作为一种强调，当它发展到将艺术和平常经验截然对立起来的时候，就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后果。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开始觉得应该给予艺术这么一种特殊的地位，否则艺术就是迷失了，但与这种高调相伴随的，却是在实际层面上对于艺术的普遍的抵抗和排

斥。把艺术从严肃的、实际的事务中排除出去，这种倾向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以至那种认为艺术是特殊的、非凡的主张（自然怀着为艺术辩护的情绪）已经变得很峻急，甚至达到了恶劣的地步：只要对此有所质疑，就会招来极其粗暴的回应，那些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独自捍卫着艺术。说艺术和文化都是普通的，这会激起歇斯底里的反驳，然而尽管口口声声说它们在本质上是非凡的，但常常被抱怨的对艺术的排斥和敌意，实际上却还是被强化了。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应该把艺术降低到跟别的社会活动相齐的层次，但这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如果说“平常”就是不需要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和努力，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动是“平常”的。艺术在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正是凭借这一事实，它才最终得到认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整个关系结构以及各种制度，最终都要靠我们在学习、描述和传播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们知道艺术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人类世界。艺术就是这种创造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把艺术跟平常的生活区分开来，或是贬低艺术，认为它是不实用的、次要的（一种“休闲活动”），这两种看法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一切现实都必须经过努力获得成功描述后才能被认识，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现实”孤立开来，放在与艺术相对立的位置上，不管是出于尊崇还是贬抑。倘若所有活动都有赖于通过分享描述而学到的各种反应，我们就不能把“艺术”和“工作”截然分开，也不能屈从于“审美人”和“经济人”的划分。

艺术跟别的描述方式和传播方式一样，都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人类技能，在其传输经验的巨大力量得到运用和发展之前，它们必须在一个共同体内为人所知并得到实践。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是通过发现共同意义以及共同的沟通手段而实现的。在某个活动范围之上，大脑所创造的那些模式和那些被共同体所具体化了的模式在持续不断地互动。个人的创造性描述是创造了惯例和制度的总体过程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共同体所珍视的意义才能被分享并发挥作用。这就是文化的现代

定义的真实意义所在，它强调的是这种共享的过程。

传播就是使独特经验变成为共同经验的过程，它首先要求的就是要活着。因为在任何一种传播中，我们基本上都这么说：“我这样活着，因为这就是我的经验”。能不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活着，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别人能不能通过成功的沟通接受这种经验。于是我们对自身经验的描述便组成了一个关系网络，我们所有的传播系统，包括艺术在内，实际上都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们在描述中作出的选择和解释体现了我们的态度、需要和兴趣，我们试图通过向别人表明这些态度、需要和兴趣，使它们得到确认。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别人那里接受种种描述，这些描述同样体现了他们的态度、需要和兴趣，这个进行比较和互动的漫长过程，就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彼此联结的生活。既然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传播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社会参与的过程：分享共同的意义，进而分享共同的活动和目标；提供、接受和比较各种新的意义，发展和变化的张力以及成就便是其结果。

能不能认识到传播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过程所具有的这种意义，这极为重要。如果我们能有这种认识，就能有效地审视某些特殊种类的传播及其手段，它们可以说是彼此分开的，但并没有被完全分隔开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最致命的错误是假定各种秩序都是彼此分离的，就像我们通常会假定政治上的制度和惯例有着与艺术上的制度和惯例完全不同的一种秩序。政治和艺术，还有科学、宗教、家庭生活，以及我们把它们当作独立的领域来谈论的其他范畴，都应该纳入到一个由各种活跃的且不断互动的关系所构成的完整世界中去，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彼此相连的共同生活。如果我们从完整的结构出发，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一些特殊的活动，以及它们跟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通常却只是从这些范畴自身出发，从而屡屡铸下大错，隐瞒了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活动，倘若被完全抽离、孤立开来，就必定会受到损害。比如说，政治就因为孤离于各种平常的关系之外而备受

损害，在经济、科学、宗教和教育等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过程。艺术的抽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即把它提升到或是驱逐到一个特殊的经验领域里（情感、美、幻想、想象、无意识），但实际上艺术从来就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领域里，事实上艺术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普通的日常活动到出乎意料的危机和剧烈变动，无不囊括其中，而它所使用的表现手段也非常丰富，从街头俚语、通俗故事到陌生的系统和图像，都能为其所用，变成共同的财富。我们对创造性活动所作的这种回顾，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这其实也是艺术的真实历史，但我们却为一些定义和公式（它们都只是某个解释阶段的产物，是我们必须超越的）所蒙蔽，看不到这一真实历史。创造性活动的这种意义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凭借它在传播和共同体中所展现的那些东西，我们得以反省我们的整个共同生活的性质：怎么来反省，也就是怎么来定义文化。一旦我们掌握了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和描述而获得的意义与通过惯例和制度具体表现出来的意义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就可以使既作为“创造性活动”又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各种意义达成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意味着我们用以了解自身以及身边社会的力量有了真正的扩展。

注释：

[1] 可以比较一下布莱希特在《快乐戏剧还是教育戏剧》（*Theatre for Pleasure or Theatre for Instruction*）中对学习带来快乐的强调。快乐和学习在现代分离了，被合理化为娱乐和教育这两个孤立的范畴（然后获得了与之相应的方法），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的艺术观念，甚至可以说包括教育观念在内。

[2] 这个隐喻依靠的是这么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相信陆地上的动物在海洋里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动物（加德纳）。它暗中所指的是“自然的”或是“给定的”观看，尽管这与后来的“自然”知觉理论也许有所不同。

[3] “心灵全都起了同样的变化”这种说法可能也可以延伸到习俗这一重要观念上，尽管在那个语境中意义显然是由共同的经验和传闻来证实的。

[4] 布莱希特对戏剧中的“共鸣”的抨击和我的解释并不矛盾。他所反对的是一种虚假的投入和不加批判的接受，并因而推荐那种不投入的、批判性的旁观。他对观众能动性的强调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能动性不必总是以他所说的那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既投入又不失去自我。

文化分析

1

文化的定义有三种一般的分类。第一种是“理想的”，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人类根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接受这一定义，那么文化分析基本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的某些价值的发现和描述，这些价值被认为构成了永恒的秩序，或是与人类的普遍状况有着永久的联系。第二种是“文献的”，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就是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的实体，其中，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以各种方式被详细地记载下来。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批评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思想和经验的性质、语言的各种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到了描述和评价。这种批评所涉范围甚广，从与“理想的”分析非常相似的过程——即发现“世上已有的最好的思想和著述”，经由这么一个过程——即在关注传统的同时，把对个别作品的钻研置于首要地位（阐明和评价作品被视为首要目标），直至一种历史批评，这种批评在对特定作品进行分析之后，又试图把作品跟产生它们的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最后，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的”定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

价值。根据这一定义，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分析将包括历史批评——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批评把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将包括对生活方式中那些根本不被信奉其他文化定义的人们视为“文化”的各种因素所作的分析，这些因素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了或支配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制度结构，以及社会成员赖以相互沟通的各种特有的形式。这种分析所涉范围同样极为广泛，从“理想的”定义所强调的发现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至少是有高下之别的意义和价值——经由“文献的”定义所强调的将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视为首要目标，直到强调研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要对它们进行比较进而确立一种标准，而是要研究它们的变化模式，去发现某些普遍的“规律”或“趋势”，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发展。

58

在我看来，上述三种定义似乎各有千秋。要寻找各种意义和价值以及关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记录，当然不能只局限于艺术作品和思想性作品，各种制度和行为方式也应该纳入视野。同时，我们对过去的很多社会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以往各阶段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至今仍有着强大感染力的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根据这些作品来描述文化，虽然不够完整，但至少也有一定道理。人们的确可以争辩道，既然我们已有“社会”这个概念可用于宽泛的描述，就完全可以把“文化”限定在这个更狭窄的所指上。但是“理想的”定义中的某些在我看来也是有用的因素，也在鼓励文化保留宽泛的所指范围。根据目前记载的许多比较性研究，我发现很难把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等同于对通常所定义的“绝对”价值的发现。我接受这么一种批评，它认为所谓“绝对”价值通常只是某个特定的传统或社会的价值的扩展。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过程称为人类的自我完善（它暗示了有一种可以

59

在外的事实领域。因为在我看来，某些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里所发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社会遗产以及在某些类型作品中的具象化，它们得以保存下来——确实已被证明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一旦它们被习得（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就能极大地促进人的能力的发展，使他能充实自己的生命，管理社会并控制环境。在医学、生产和传播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表现为一些特殊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是这些因素依赖于更为纯粹的知识学科（它们是从对经验的创造性处理中提炼出来的），而且这些学科本身——连同一些基本的伦理前提和主要的艺术形式——已经证明它们同样能够被融入某个一般性传统，这个一般性传统似乎通过许多变化和冲突，代表了一条共同发展的路线。把这个传统称为人类的一般文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尽管必须补充的是，它只能在特定的社会里起作用，而且总是更多地受到一些局部的、暂时性的系统的塑造。

我想说的是，在把文化当作一个术语来使用时，不能只看到其意义和指涉之多变所造成的弊端（它阻止了想给文化下一个精确的专有定义的任何努力），还必须视其为一个真正复杂的综合体，它是与经验中的真实因素相对应的。上述三种文化定义，每一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若是这样，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注意了。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充分的文化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反过来，一种定义——不管它属于哪一类——若是排除了它跟其他定义的联系，就必然是不充分的。因此，在我看来，“理想的”定义试图把它所描述的过程从它在特定社会里的具体的表现形态中抽离出来——认为人的合乎理想的发展就是要脱离甚至反抗其“动物性”或物质性需要的满足——似乎是不能接受的。“文献的”定义只看到文字记录和绘画记录的价值，把这个领域跟社会中的其他人类生活区分开来，这同样是不能接受的。而“社会的”定义把艺术和学习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部分只当作一种副产品，是对社会现实利益的消极反应，这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错误的。不管做起来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整体，

并把我们的具体研究与现实中的复杂组织联系起来——即便不那么明确，但至少应该作为最终的指向。

我们可以从分析方法入手，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如果挑一部艺术作品，比如说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们可以从“理想的”定义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发现某些绝对价值，或是从“文献的”定义的角度来分析——借助某些艺术手段传播了某些价值。从这两种分析中都能获得很多东西，第一种分析指向的是敬畏死者的绝对价值，第二种分析指向的是对某些基本的人类紧张关系的表达——通过合唱和双人对唱等特定的戏剧形式以及诗歌所特有的强大力量。但这两种分析显然都是不完整的。敬畏作为一种绝对价值，它在剧中受到一种特定的亲属制度及其契约义务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安提戈涅是为兄弟而不是为丈夫奉献自己的敬畏之心。同样，戏剧形式和诗歌韵律的背后不仅有着某种由许多人共同创造的艺术传统，而且还可以看到，塑造它们的不只是对于经验的需要，还有戏剧传统得以发展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接受这些基于我们的原初分析的引申，但我们不能进而接受这种观点：因为有了这些引申，敬畏的价值观，或是戏剧形式和特定的诗歌，就只有在它们指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通过这些强烈的例子，学会去敬畏就已经超越其语境，汇入了人类意识的一般发展过程。戏剧形式也超越其语境，在许多迥然相异的社会中，成为重要的一般戏剧传统的一个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剧作本身比促使其形成的社会和宗教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它可以被再造出来，直接对它不曾想到的观众说话。因此，我们既不能把理想的价值或特定的文献抽象化，也不能把它们还原为一种解释，受到某种特定文化的各种在地条件的限制。只要我们在实际分析中对各种现实关系进行研究，就终究会明白，我们是在某个特殊的范例中研究一种一般组织（general organization），在这种一般组织中，任何因素都不能被抽象化，也不能把它跟其他因素剥离开来。认为各种价值或艺术作品即使不以它们所在的特定社会为参照也能获得充分的研究，这个看法当然是

错误的，但认为社会解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或是各种价值和艺术作品只是一些副产品而已，这种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由于认识到艺术作品或价值是被生产它们的整个环境所深刻决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标准的形式就这些关系来提问：“这种艺术与这个社会有何关系？”然而在这个问题中，“社会”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整体。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个部分，那么根据我们的问题形式，在社会之外就没有什么能被我们承认为优先于社会而存在的实在整体了。艺术作为一种活动，是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起存在的。要想充分地研究这些关系，我们就必须以能动的方式研究它们，把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是特殊的且同时存在着的人类能量形式。如果我们从这些活动中任意选一种，就能看到很多其他活动通过与整个组织的性质相符合的各种方式被反映出来。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我们也可以将任何一种特定的活动区别开来，这一事实似乎也有可能让人觉得如果没有这种活动，就不能了解彼时彼地的整个人类组织状况。因此，艺术虽然与其他活动明显相关，却可以被认为是表现了组织中的某些因素，而且在那个组织的规定范围内，这些因素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的。所以，问题不是要把艺术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要研究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中抽取任何一种活动，但绝不能承认它具有任何优先性。即使如时常所见，我们发现某种特定的活动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组织，也仍然不能说所有其他活动都必定与这一活动相关；我们只能去研究特定的活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变化着的组织内部受到影响的各种方式。此外，由于特定的活动会为各种各样的、且时而冲突的目的所用，我们必须寻找的那种变化就不会是简单的那种：延续性的因素、调整适应、无意识的同化过程、积极的抵抗以及可以选择的其他努力，所有这些通常都会呈现在各种特定的活动以及整个组织之中。

文献意义上的文化分析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能提供自己在其中得以表达的整个组织的详尽证据。我们不能说自己知道社会的某种特殊

形式或某个特定时期，也不能说我们明白艺术和理论是怎么跟社会相联系的，因为在知道这一切之前，我们实在不能说已经了解社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有许多历史实际上都是依据某种假设前提而书写的，它认为社会的基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安排——构成了现实的核心部分，艺术和理论随后可以当作边缘性的例证或是“关联”来引证。而当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都被认为是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并且还勾勒出了所谓的“背景”（在通史中它是核心部分）的时候，这个次序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历史中就被干净利落地倒转过来了。在讲解的时候，选择某种活动作为重点，这显然是必要的，而暂时孤立地追踪某些特殊活动的发展线索，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只有等到能动的关系得以重建而且对所有活动都真的能做到一视同仁的时候，某种文化的历史——它是在这种个别工作的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的——才能得到书写。文化史必定大于个别历史的总和，因为这些个别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组织的特殊形式，才是文化史尤为关注的对象。所以，我更乐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对文化进行分析，是试图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的综合体的组织的性质。在这个语境中分析某些特定的作品或制度，也就是要分析它们基本的组织类型，分析构成整体组织各个部分的这些作品或制度所体现的各种关系。在这种分析中，一个关键词是“模式”：任何一种有效的文化分析都以发现一些独具特征的模式为起点，而一般文化分析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些模式有时揭示了迄今仍被割裂开来思考的各种活动之间所存在着的意想不到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有时也暴露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断裂。

63

只有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方，我们才能期望对一般性组织获得实质性的认识。对其他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我们也能知道很多，但在我看来，某些因素却永远都无法重新获得。即便是那些可以恢复的因素，也是通过抽象而重新获得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把每一种

因素都当作一种沉淀物来认识，但在它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种要素都是溶解的，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某种特定的生活组织的轮廓，甚至还可以找回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或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受到尊重的行为和态度系统，社会性格是正式或非正式地传授的，它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模式。“文化模式”是对各种利益和活动所做的一种选择和构型，也是对它们的一种特殊评价，它在生产一种不同的组织和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即使是这些东西，在我们找回它们的时候，也通常是抽象的。我们也有可能获得对某种更内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觉，它既不是社会性格也不是文化模式，而是这些品质或模式赖以存续的实际经验。这个说法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我认为，事实上我们往往能在某一时期的艺术中最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和同一时期的外部特征作比较并且允许存在个别的变异时，还是会发现仍然存在着某种我们无法轻易处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联想到对我们共享的生活方式所做的任何一种类似的分析，就能透彻地理解这一点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需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正是通过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它们可以通过外部分析来描述），才能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当我们注意到从来不会用“同一种语言”交谈的各代人之间的鲜明差异时，或是当我们从一个外来者那里读到对我们生活的描述时，或是当我们从一个虽然学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不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被养育长大的人身上看到了言语和行为风格上的细微差异时，我们常常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描述都显得过于粗糙，难以表达这种明显有区别的对于一种独特的本土生活方式的感觉。如果对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尚且如此，那么

当我们处在来访者、学习者或是来自不同时代的宾客的位置上时，就更是如此了：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都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尽管它可能会变成琐碎的说明，但有着这样一种特征的事实却既不是琐碎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让人觉得非常重要。

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它容纳了这些因素，包括独特的论辩方法和调门——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这种独特性有可能得到表现——通常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基于这一事实：在艺术（它是我们仅有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记录下来的沟通信息总是比它的发送者活得更长久）这里，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我不是说和社会性格相比，感觉结构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共同体中的很多人所拥有的。但我认为在所有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中，感觉结构的拥有的确到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似乎不是通过（任何正规意义上的）学习来获得的。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是一般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在这里，最明显不过的是，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往前追溯），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这可以分开来描述），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一旦这种感觉结构的载体消亡了，文献性文化（从诗歌到建筑物和时装）就是了解这种充满活力的因素的捷径，正是这种联系使得从文献

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有了重要的意义。这决不意味着文献是自足的。正如前面所述，这只是说要寻找某种活动的意义，就必须从整个组织（它大于各部分的总和）的角度出发。我们所寻找的永远是实际的生活，而它也是整个组织所要表现的。文献性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活的见证人归于沉默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清晰地将那种生活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不过，如果我们要反思感觉结构的性质，看看为什么连和它密切相关、而且拥有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大量材料可供支配的大活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它，那么就不能以为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一些途径来接近它，无限地接近它。

我们需要区分出文化的三个层面，即使是最一般的文化定义也要如此区分。首先是某个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活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其次是被记录下来的文化，从艺术到日常事务在内的一切都包罗其中：它是某一个时期的文化。第三是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它是联结活文化和某时期文化的因子。

某一时期的文化，当它不再有生命力而只是局促地残存于记录中时，它可以得到极其细致的研究，直到我们觉得对它的文化产品、社会性格、活动和价值的一般模式以及感觉结构的组成部分都有了相当清晰的了解为止。但是这种残余物不受它所在的那个时期支配，而是受新的时期支配，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传统。对于某个时期的文化，即使是专家，大多数也只熟悉其文献记录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真的懂19世纪小说，因为没有人读完了或是能够读完从单行本到报纸连载小说在内的全部作品。真正的专家也许知道其中的数百种，普通专家知道的要少一些，受过教育的读者知道的就更少了，尽管他们对这个话题都会有明确的想法。在这里，一个选择的过程——是很严格的那种——便立即显现出来，事实上在每一个活动领域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当然，19世纪的读者同样也不可能读完所有的小说，社会中的每个人所知道的东西都是经过选择的社会事实。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却都有着某种我认为是任何一个后来者都

无法完全重新获得的东西，即对写小说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感受，它也是我们如今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去把握的。从理论上说，一个时代是被记录下来的，但实际上，这种记录是被吸收进一个选择性传统了，这两种文化都不同于活文化。

67

努力去了解选择性传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开始于一个时期的内部，有些东西被从全部活动中挑选出来，被赋予了价值，得到了强调。一般来说，这种选择会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整个组织状况，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和强调在以后会被确认。如果面对的是过往的时期，对这一点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但轮到面对自己的时代，我们却从来没有真的相信过。我们不妨以最近十年的小说为例。没有人能读遍 1950 年代的所有英文小说，即使是速度最快的读者，每天花二十个小时来读，也不可能读完。但是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关于这一时期小说的一般特征却已有定论，并且已拟出一份为许多人所认可的简要书目，包括了那些看来似乎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作品。如果我们拟定一份包括大约 30 种作品的书目（这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选择），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在 50 年以后，研究 1950 年代小说的专家会熟悉这 30 部作品，而一个普通读者大概只知道其中 5 到 6 种。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只要一过 1950 年代，便会开启另一个选择过程。这个新的选择过程在削减作品数量的同时，还将改变已作出的评价——有时是彻底的改变。50 年以后，确实有可能对这些作品作出合理的永久性评价，尽管这些评价可能还会出现波动。我们中有谁若是能活着度过这个漫长的过程，就一定会看到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因素被忽略了。我们会以老年人的孱弱口吻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再读这些作品了。”还会更加坚定地说：“不，真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你的看法。”^[1]既然任何一个时代都至少包括了三代人，我们便总能看到这种例子，而更复杂的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在我们最重要的时期里：有许多调整是我们不应该抗拒的，有许多忽略、曲解和再解释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或者不该一点

68

都没注意到，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带来这一切的那种变化的一部分。而在活的见证人逝去后，又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曾经的活文化不仅会被提炼为一些经过选择的文献，而且还会以简化的形式被人使用，一部分被当作是对人类发展总路线作出的贡献(必定是很小一部分)，一部分被用于重建历史，还有一部分与我们的关系仅在于它被用来命名和定位过去的某个特定阶段。选择性传统因而在第一个层面上创造了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在第二个层面上留下了某个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在第三个层面上——这是最难接受和评价的——是废弃了以往的活文化的大片领地。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选择会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许多特殊利益的制约。正如实际社会状况会极大地制约当前的选择，社会的发展、历史变迁的过程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择性传统。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会倾向于顺应当代的利益体系和价值体系，因为它不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绝对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 and 阐释的过程。在理论上，以及在有限的实践程度上，那些正儿八经地关心如何存续传统的机构(尤其是教育和学术机构)所承诺保存的是整个传统，而不是根据当前的利益而选择的部分传统。这种承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屡屡看到，由于选择性传统的作用，一些显然被当作死东西抛弃的作品却咸鱼翻身，重见天日，很显然，只有存在着以大面积保护以往文化——它们即使缺乏活力，至少还可资利用——为己任的各种机构，这才有可能实现。选择性传统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路线，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由于这种发展很复杂而且持续不断，所以过去的作品在将来是否还有意义，这是无法预见的。学术机构自然也会被迫顺应社会发展的路线，但一个明智的社会在确保古今相续的同时，也会鼓励学术机构拿出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平常的保存工作中，并抵制那种认为这些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批评(在任何时期都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有这么多学术机构花这么大的力气以谋求自我延续并抵制变化，这往往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出一些改变，有必要的話

就建立一些新的机构，但我们若是能正确理解选择性传统的过程，把眼光放长远些以获得对历史变化和波动的某种真实感知，那么也会认识到这种延续所具有的相应价值。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的所有活动中，文化传统可以被看作是对前人所作的一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和再选择。有一些路线会被勾画出来，往往延续长达一个世纪，然后随着新的发展阶段的突现，这些路线又会被取消或是被削弱。在当代文化分析中，选择性传统的现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事实上这一传统的某些变化——建立与以往的路线并存的新路线，破坏或是重新勾画现有的路线——常常就是一种激进的当代变革。我们往往会低估文化传统，认识不到它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也是一种解释。我们凭借自己的经验来看过去的大多数作品，却没有努力去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作品原有的角度来看。分析所能做到的，与其说是反过来将作品放回它的时代，倒不如说是通过展现历史上的其他选择来有意识地进行解释，或者是将这种解释与它所依赖的某些当代价值联系起来，或者是通过探索作品的各种真实模式，来直面我们现在所作选择的真实性质。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让作品活下去，是因为它真的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而在其他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使用作品，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原因，而知道这一点，总比拜倒在迷信“时间是伟大的评价者”的神秘主义脚下好。若是甘心听命于“时间”，甘心被抽象化，那我们在主动选择的时候，就要抑制我们经验中核心的一部分。一切文化产品或是可以跟它在其中得以表达的整个组织联系起来，或是可以跟它在其中得到使用的当代组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越是活跃，我们就越能看清它的真正价值。因此，“文献的”分析会走向“社会的”分析，不管它分析的是过去的某种活文化，还是过去的某个时期，抑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传统。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层面上的过程当作人类的自我完善（这是一场迈向已决定的价值的运动）来接受，而是把它作为人的普遍进化（许多个人和群体为此作出了贡献）的一部分来接受，那么对某

些永久性贡献的发现也会引出同样的总体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是能动的，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我们都能在某些真实关系中看到它的存在。通过描述这些关系，真实的文化过程就将呈现出来。

2

关于文化分析的任何理论解释都必须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接受检验。我打算以 1840 年代的英国为例，在其文化背景中来检验前面所论述的理论方法和概念。

当我们开始直接研究 19 世纪 40 年代时，首先碰到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选择性传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报界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通常认为《泰晤士报》是那时候最有代表性的报纸，从而根据《泰晤士报》的实践来得出我们对早期维多利亚时期新闻业的看法。《泰晤士报》确实是一份很重要的日报，可是在当时阅读最广的报纸却是一些在星期天发行的报纸，如《快讯报》(*Dispatch*)、《纪事报》(*Chronicle*)、《劳埃德周报》(*Lloyd's Weekly*)和《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这些报纸在今天可以明确归入“周日报纸”的类别，它们有选择性地登载新闻，《贝尔便士快讯报》(*Bell's Penny Dispatch*)的副标题是“体育和警方公报，及罗曼司报”，一条典型的大字标题是“大胆的阴谋和蓄意的冒犯”，配有大幅木刻画和详细的背景报道。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这类报纸的发行总量大约有 27.5 万份，而日报的发行总量却只有 6 万份。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时期的真实的文化，那么就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而不是只从《泰晤士报》出发，虽然它在传统的高层政治活动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文学而言，选择性传统的作用也同样明显。我们常认为那是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时代，他们的小说

处于较高的层次，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①、金斯利^②、迪斯累利^③的小说则附随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时期”的作家还有利顿^④、马雷耶特^⑤、里德^⑥等人。狄更斯在当时自然有很多读者。举例来说，《匹克威克外传》在一个出版周期里就售出了4万册，后来更是上升到7万册甚至更多。但如果我们要看一下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其他作家，就能发现下面这份按照受欢迎程度排序的名单，它是由创办于1848年的W.H.史密斯连锁书店提供的：利顿、马雷耶特、G.P.R.詹姆斯、詹姆斯·格兰特、辛克莱尔小姐、哈里伯顿、特罗洛普夫人、利弗、盖斯凯尔夫人、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两套廉价小说丛书 Parlour 文丛和 Railway 文丛（1847年和1849年），囊括了它们最主要的一批作者：G.P.R.詹姆斯（47本），利顿（19本），马什夫人（16本），马雷耶特（15本），安斯沃思（14本），戈尔夫人（10本），格兰特（8本），格拉顿（8本），马克斯韦尔（7本），特罗洛普夫人（7本），爱玛·鲁滨逊（6本），梅恩·里德（6本），W.卡尔斯顿（6本），简·奥斯丁（6本），格雷夫人（6本）。从这些作者的一连串书名可以想见其范围：《阿金库

①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1810—1865)，也称盖斯凯尔夫人。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 1854)、《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 An Everyday Story, 1865)等。——译者注

②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牧师、小说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倡者，他也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其小说代表作有《酵母》(Yeast, 1848)、《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 1850)、《两年前》(Two Years Ago, 1857)等。——译者注

③ 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保守党领袖，1868年、1874年至1880年曾两度出任首相。迪斯累利也是一位小说家，代表作有《西比尔》(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科宁斯比》(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1844)等。——译者注

④ 布尔沃-利顿(Sir Edward G. D. Bulwer-Lytton, 1803—1873)，维多利亚时期的通俗小说家、政治家，代表作有《佩勒姆或绅士冒险记》(Pelham or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1828)、《庞培城的末日》(Last Days of Pompeii, 1834)等。——译者注

⑤ 马雷耶特(Frederick Marryat, 1792—1848)，19世纪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幽灵船》(The Phantom Ship, 1839)、《新森林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New Forest, 1847)等。——译者注

⑥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剧作家和小说家，其小说多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现金》(Hard Cash, 1863)，他的历史小说《回廊与壁炉》(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1861)也有很大影响，诗人斯温朋誉之为“杰作”。——译者注

尔》(Agincourt), 《庞培城的末日》(Last Days of Pompeii), 《海军候补生易随先生》(Midshipman Easy),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战争罗曼司》(Romance of War), 《女继承人布鲁格斯》(Heiress of Bruges), 《滑铁卢故事》(Stories from Waterloo), 《美洲难民》(Refugee in America), 《剥头皮的猎人》(Scalp Hunters), 《流浪汉罗迪》(Rody the Rover), 《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小妇人》(The Little Wife)。1851年的《泰晤士报》评论道:

每次断然增加书籍库存量,都是基于这种假设,即在火车上阅读的大多数读者,尽管出身良好,但当他们一走进火车站,平时的品味就被丢到一边去了。

- 72 不管是不是这样,但显然那些小说的读者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如果我们把所有读者都考虑在内,那我们必须增添一位还没有被提到的作家:G. W. M. 雷诺兹^①,在他逝世后,《书商周刊》(The Bookseller)称他是“我们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而在此之前则曾经称其作品的数量和销量都远远超过了狄更斯。在1840年代大受欢迎的两份新期刊《伦敦杂志》^②和雷诺兹自己创办的《雷诺兹杂录》(Reynolds' Miscellany)——在这份期刊上他发表了诸如《宗教裁判所秘事》(Mysteries of the Inquisition)和《伦敦法庭秘事》(Mysteries of the Court of London)等代表作——使雷诺兹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我们还必须给那个时期的阅读书单添上据

^① 雷诺兹(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Reynolds, 1814—1879),英国作家和新闻记者,1845年创办《伦敦杂志》,1846年创办《雷诺兹杂录》,他最畅销的小说是《伦敦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London, 1844)。——译者注

^② 在英国期刊史上冠名《伦敦杂志》(London Journal)的刊物有多种,这里所说的是乔治·史蒂夫(George Stiff, 1807—1873)于1845年创刊的一份周刊,其全名是《伦敦杂志,文学、科学和艺术周刊》(The London Journal; Weekly Record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由雷诺兹担任主笔和主编,1846年雷诺兹离开《伦敦杂志》,创办了自己的刊物《雷诺兹杂录》。——译者注

说是有着“巨额交易”的色情书籍，它们是在“Holywell街肮脏的地下室”里非法印刷并流传出去的。我们还必须添上卡莱尔^①、罗斯金^②、麦考利^③、密尔^④、托马斯·阿诺德^⑤、普金^⑥的作品，以及丁尼生^⑦、勃朗宁^⑧、克拉夫^⑨、马修·阿诺德^⑩和罗塞蒂^⑪的作品，这些都是从浩如烟海的哲学、历史学、宗教和诗歌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正是通过选择性传统的运作，才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个时期作品的特征，这已无需再强调了。

从考察这些文献出发，我们必然要走向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我

①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法国大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1837)、《论英雄与英雄崇拜及历史中的英雄》(*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1841)、《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等。——译者注

②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英国艺术评论家和诗人, 他关于艺术和建筑的评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有较大影响。代表著作有《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 1843)、《建筑的七盏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1849)。——译者注

③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英国诗人、历史学家和辉格党政治家, 写有大量随笔和评论, 主要著作有5卷本的《詹姆士二世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1848)等。——译者注

④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19世纪极具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功利主义》(1863)等数十种。——译者注

⑤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 英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执掌著名的拉格比公学时大胆实行教育改革, 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⑥ 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1812—1852), 英国建筑家和设计家, 其作品带有浓厚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英国国会大厦的内外装饰设计均出自其手。——译者注

⑦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 1850年获桂冠诗人称号。代表诗作有《食莲人》(*The Lotos-Eaters*, 1833)、《夏洛特女士》(*The Lady of Shalott*, 1832, 1842)、《尤利西斯》(*Ulysses*, 1833)等。——译者注

⑧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英国诗人和剧作家, 他的诗作善于运用戏剧性独白, 代表作有《铃铛与石榴》(*Bells and Pomegranates*, 1841—1846)、《剧中人》(*Dramatis Personae*, 1864)、《戒指与古书》(*The Ring and the Book*, 1868—1869)等。——译者注

⑨ 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 英国诗人, 代表作有《托布纳利奇的茅屋》(*The Bothie of Toper-na-fuosich*, 1848)。——译者注

⑩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英国诗人和文化批评家, 托马斯·阿诺德之子, 代表著作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译者注

⑪ 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 英国诗人和画家, 前拉斐尔派的重要人物。诗集有《生命之宅》(*The House of Life*, 1870—1881)、《叙事诗和十四行诗》(*Ballads and Sonnets*, 1881)等。——译者注

们看到了文化制度方面的某种重大变化：星期日发行的大众报纸实际上成为了新闻业中最成功的因素；新型期刊成长起来，它将引人入胜的浪漫小说与医疗处方、家务料理方面的建议以及读者来信结合在一起，与前十年里更为严肃的“民众教育”杂志形成对立（《便士杂志》于1845年停刊，新型的《伦敦杂志》在同一年创刊）；廉价小说开始出现，一类是1841年面世的“廉价恐怖小说”（penny dreadful），另一类是售价为两先令六便士的“Parlour 文丛”和“Railway 文丛”；剧院有了重大的变化，“特许剧院”（the Patent Theatres）的垄断在1843年宣告结束，小剧院得到发展，1849年后又出现了音乐厅。在文化制度的层面以及发行方面的这些变化有很多起因，它们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之中。因此，技术的变革（在报纸方面，发展出了蒸汽印刷机和滚筒印刷术；在书籍出版方面，有布面烫印技术）为印刷业的扩展打下了部分基础。铁路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新的阅读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它促生了新的发行地点。但我们同样必须关注是哪些人在利用这些技术进步的良机。在这十年里，有很多十足的投机商进入到这些有利可图的行业，其数量有了大幅的增长：在报刊业有劳埃德和贝尔，他们把泛滥的激进思想和敏锐的商业本能结合起来（在这方面雷诺兹要更认真一些）；在戏剧业则出现了一种本质性的变化，拥有剧院的业主不再与戏剧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发现建造剧院然后把它出租给那些兼任剧院总监的演员（actor-managers）以及公司是一个赚钱的机会，这种方式对英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廉价杂志的出版，其背后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是想控制工人阶级言论的发展，从民众教育杂志到家庭杂志（后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妇女杂志的前身）的这种值得注意的转变有着重大的意义。体面的道德规划和家庭的改善，与教诲以及某些特殊社会价值的含义深深地缠绕在一起，以迎合现有的阶级社会的利益。在广阔的领域里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正是我们必须考察的真实文化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进入这个广阔的领域，我们当然会看到选择性传统在这里是

在文献层面上运作的。刚才所提到的制度的发展代表了大众文化在商业化组织方面的一个关键阶段，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发展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其后的大趋势有着联系。在同一个领域里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公共博物馆(1845年限制法案)、公共图书馆(1850年限制条款)以及公园(1847年被允许免税)开始出现——也是如此。在我们的记忆中，根据后来的各种解释，围绕着这些改革(从征收奢侈税到急切地呼吁工人阶级必须“受教养”)而出现的激烈论争渐渐平息了。我们必须领会到文化制度领域的复杂性即在于：这十年带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发展，比如文化的商业化开发，有意义的大众化扩张，以及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开明政策等。选择性传统的各种支流总是想简化这一事实，理出一条单一的发展线索。

74

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总体上也发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我看来，主要有下面七个支配性的特征。首先，1846年“谷物法”^①的废除使自由贸易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其次，在迪斯累利领导下，一种新型的托利党实际上获得了重建，它在思想观念上受到“青年英格兰派”^②的一些影响。第三是宪章运动，在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第四是工厂法的制定，最终于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法案”。第五，围绕着惩罚性的“济贫法”^③以及1844年和1847年试图对“济贫法”提出再修正的努力，有

① “谷物法”(Corn Laws)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大地主阶级为了提高地租收入、防止进口谷物竞争、实行农业保护政策而由议会通过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案。1846年英国议会宣布废除谷物法。谷物法的废除和19世纪上半叶其他一些消除保护政策残余的措施，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译者注

② “青年英格兰派”(Young England)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来自有着公立学校教育背景的托利党贵族群体，其名义上的领袖是迪斯累利。“青年英格兰派”宣扬一种既保守又浪漫的“社会托利党主义”，其政治主张可以概括为一种理想化的封建主义：将君主专制、强大的教会和贵族阶级的慈善事业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译者注

③ “济贫法”(Poor Law)是自16世纪起首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实行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直到福利国家制度在20世纪中叶建立后方才废止。“济贫法”历经多次改革和修正，其中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的救济，而改为受救济者必须被收容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习艺所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劳动极其繁重，贫民望而却步，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此处所谓“惩罚性”的济贫法即指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译者注

很多故事可讲，与此相关的还有查德威克^①为 1848 年的“公共卫生法”的建立而进行的斗争。第六，教会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卷入到社会冲突中，这也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事件。第七，重工业和资本投资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铁路业方面。我们也许还能轻而易举地加入其他一些因素，但从上述因素我们已能看到两个分析要点。首先，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尽管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有着巨大矛盾的故事：其中有些是明显相关的，而在那个时期的实际生活中，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孤立开来考虑。其次，根据这些因素其后的走向和贡献来看，它们都受制于有着高度选择性的解释。宪章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年它被普遍认为是危险的、恶劣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这么看了，因为公开赞同麦考利的诸如普选权“与文明的存在完全无法共存”之类的观点是不那么容易的，宪章运动的许多原则在后来已被融入“英国生活方式”。但是这场运动的另一些选择性形象仍然很强大：比如认为它和 1926 年的大罢工一样，是一个“以错误的方式来谋求变革”的悲剧性例子，而后来实际采取的步骤才是正确的方式；又比如认为它是乱七八糟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它的支持者是一些乌合之众，而那些被置之不理的请愿书也都是些怪物。但事实是我们对宪章运动的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对这样一段历史，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选择性传统所突显的那么一两种片面的叙述。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对选择性传统运作的某个方面所作的理论评述有多么重要：它不仅受到后来的发展主线的影响甚至制约，而且当它站在后来发生变化的角度来回顾以往时，也会有所改变。19 世纪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如今已引起关注，可要是放在 19 世纪 80 年代，这似乎是很荒谬的，今天人们对这些运动的看法不是受制于材料本身，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其所

^① 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是 19 世纪英国卫生改革运动的主要提倡者。1842 年，他发表《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为了保护公共卫生，需要采用统一的标准。在他的报告推动下，国会建立了一个城镇卫生委员会，并于 1848 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译者注

取得的成果或是所作出的贡献的认识。对经济史的强调同样也是基于这种回溯性的改变。就文学而言，需要对选择性传统的运作另作考察。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19世纪40年代的文学作品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作品：在各种情况下的反复阅读已经把好作品从不那么好的作品和坏作品当中筛选出来。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盖斯凯尔夫人——也许还有迪斯累利——却不受制于这个标准，就他们两人的情况而言，还有着别的影响因素：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其价值首先在于它们为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有用的文献，而迪斯累利则是得益于他享有的政治声誉。在我看来，金斯利的小说就其文学价值而言是根本不足以传世的，但它们也有着某种文献价值，而且金斯利对思想史的贡献——在基督教社会主义方面——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萨克雷、狄更斯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是因为在文学价值上他们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留传下来的作品也不是篇篇都是佳作，他们的那些不怎么好的作品如果是出自其他作家之手，大概早就被遗忘了。艾米莉·勃朗特现在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那十年里最出色的小说家，但《呼啸山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靠着夏洛蒂的名声才得以流传，它在今天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和20世纪文学所发生的变化有关系，20世纪文学在主题和语言上更接近于《呼啸山庄》，而远离了它写作的那个时代的主流小说传统。在诗歌方面，我们读丁尼生和勃朗宁，是因为他们的诗有着内在的价值，尽管他们的声誉曾经有过剧烈的波动，但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马修·阿诺德在后来获得了另一种声誉，那么他的1849首诗中有很多是不值得我们去读的。我们读卡莱尔、罗斯金和密尔，是因为尽管他们的作品有明显的缺陷，但他们毕竟是大作家而且也是现有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们读托马斯·阿诺德，是因为他在教育上有重要贡献；在读普金时，我们需要基于我们对艺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强调来赋予其重要性；而当我们读麦考利时，我们也许会感到索然无味，这不仅因为他的才能似乎要稍逊一筹，更因为他的思考方式跟我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所以选择性传统——我

76

们可以肯定它还会继续发生变化——一部分是对具有普遍价值的作品的强调，另一部分是从我们自身发展的角度来使用过去的作品。和这个时期相关的选择性传统不同于这个时期本身，这就好比我们有意识地去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必然不同于过去的那个活文化。

有意识的重建以及选择性传统的运作总是趋向于将不同阶级的活动予以特殊化，我们现在必须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范围，看看我们对这些关系的理论描述是否有效。我们已经在文化制度的领域看到了一种重要的阶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诸如阶级状况（尤其是中产阶级对有着不同政见的工人阶级的态度变化）、伴随工业经济发展而来的技术扩张，以及与这种经济有着天然联系的产权和分配的类型，都对印刷、书籍出版、剧院这样的文化制度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制度的形式以及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目的，也对某些文化产品产生了看得见的影响，如出现了新的新闻样式，连续性出版物给小说带来了一些变化，为迎合形成中的新的读者群而对材料作某些改编等。对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这一时期的第二种相互关系是相当清晰的，在了解社会的时候，我们总想在文化产品中找到这种相互关系的直接反映。上面所列出的七个特征都出自 19 世纪 40 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它们在同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如果我们只读《玛丽·巴顿》、《西比尔》^①、《科宁斯比》^②、《董贝父子》、《酵母》、《奥尔顿·洛克》^③、《过去和现在》^④，我们就会直接走进这么一个世

① 《西比尔或两国记》(*Sybil, or The Two Nations*)，本杰明·迪斯累利于 1845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它描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译者注

② 《科宁斯比》(*Coningsby*)，迪斯累利的另一部小说，出版于 1844 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出身贵族的孤儿科宁斯比的生活历程，通过这个人物，小说反映了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译者注

③ 《酵母》(*Yeast*, 1848)和《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 1850)都是金斯利所著小说，它们揭露英国小工场中残酷的剥削制度，呼吁社会良知纠正非正义现象。——译者注

④ 《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托马斯·卡莱尔的一部随笔集。——译者注

界，它是和宪章运动、工厂立法、“济贫法”、铁路、教会的介入（那十年里有好几部小说描写了宗教信仰和归属的危机）、自由贸易政治和“青年英格兰派”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相互关系很重要，但它同样也不是唯一的一种，事实上，如果我们只限于这样来直接地描述和讨论这些关系，那就会发现即使对这些关系也很难作出评价。

现在我们需要考察更远一些的关系区域，这个区域可以用社会性格和感觉结构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和阐释。我们可以简要地勾勒这个时期的支配性的社会性格。人们相信工作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念是与个人奋斗以及在此意义上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阶级社会只是一种假设，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日益趋向于由其实际地位而不是由其出身所决定。穷人之所以陷入贫困，是因为他们自身有缺点，很多人都坚定地相信，穷人当中最出色的那些人是会爬出泥淖的。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奋斗，就必须实行一种惩罚性的“济贫法”，如果一个人有退路可走，相信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庭去承受艰苦的劳作——比如砸石头或是理麻絮之类的苦活——就能够果腹，那他就不会作出必要的努力来养活自己。在这个区域以及比它更广的区域里，受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高贵的，因为它教导人们要谦逊，要勇敢，并引导人们努力尽职。俭朴、节制和虔诚是首要的美德，而家庭则是其核心制度。婚姻的神圣性不容置疑，通奸和乱伦是不可饶恕的。帮助弱者也是职责之一，但前提是这种帮助不能去助长人的弱点，所以，宽恕在性方面所犯下的过错，安慰穷人，都是不可取的。必须严格地训练人们遵守普遍的美德，强化为这种训练而服务的各种制度，是社会必须履行的职责。

78

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立法，人们在辩论这些立法时所使用的措辞，公开的著述和言论的主要内容，以及最受仰慕的那些人的品性，就完全可以说上面所说的，正是那个时期的支配性的社会性格。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性格，它在成功的传播过程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并受制于许多个人的变异因素。当我们观察这个时期并认识到事实上还有别的社会性格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性格又以各种重要的方式

影响到那时候的整个生活时，我们观察得越是仔细，碰到的困难也就越是严重。一种社会性格是对某个支配性群体的抽象概括，而这种得以描述的性格——它是工商业中产阶级道德的一种成熟的形式——在当时无疑是最强势的。在同一时期，还有着其他社会性格，它们也都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贵族阶级的性格在明显弱化，但它的各种变体在这个时期仍然活跃着，比如认为出身比金钱更要紧；工作并不是唯一的社会价值，文明也包括游戏；节制和纯洁——至少在年轻人那里——不是什么至善，反倒可能是鄙吝和愚钝的标志。所有这些变体都在起作用，有的还上升为了理论。这种性格对待穷人的态度是暧昧的：它强调慈善救济的重要性，这一立场跟那种相信通过惩罚可以改造穷人的论调是大不一样的；但它又有残忍的一面，鼓吹要消灭捣乱者，天生就习惯于使用镇压的手段，这又使它与中产阶级的态度区别开来。在这方面，19世纪40年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展现了不同社会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托利党人的救济论相对立的，是辉格党人的改造论；与残忍和镇压相对立的，是通过制度推进的积极的文明化进程。针对辉格党人制定的“济贫法”所作出的最出色的批评，有些是出于自觉地怀有贵族理想的托利党人之手，特别是“青年英格兰派”。残忍和镇压是用来应付危机的备用手段，但与20年代和30年代相比，它们正在稳定地被积极的立法所抛弃。游嬉也许不能得到社会性格的首肯，但这十年也见证了包括从廉价小说到音乐厅在内的轻松的娱乐业的巨大发展。不仅支配性的社会性格与其笼罩下的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歧异，而且其他的社会性格也引发了那一时代的各种现实冲突。这是社会性格这个概念最令人棘手的地方，因为强调某种支配性的抽象概括，就会严重地低估变化和冲突的历史过程，而即使是在支配性的社会性格极其强大的19世纪40年代，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变化和冲突的历史过程。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增加另外一种选择：即发展中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性格，它和那些与其相竞争的社会性格相比，有着重大的不同。工人阶级是镇压和惩罚性改造的牺牲品，也是关于成功的福音以及傲慢

的出身论的受害者，他们承受了劳作的真实性质，受苦受难，并开始形成另外一种理想。他们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中寻找重要的同盟军，当废除“谷物法”和制定工厂法得到统治阶级内部某一群人支持时，他们便能一跃成为这两场运动的主力军。但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独立的目标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尽管这些目标基本上还是需要通过与其他群体结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宪章运动是一种理想，它超越了任何社会统治集团的藩篱，不只是表达对民主的渴望，而且还主张一种超越阶级的个人尊严。在工人阶级看来，“十小时工作法案”决不只是一项关于工作的权威立法，它还对休闲——因而也对一种更广阔的生活——提出了正当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在发展自身组织的过程中，作出了最激进的批判：拒绝以出身或个人成功为基础的社会，而提出社会应该以互助和合作为基础。

80

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出运作于那一时期的三种社会性格，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到整个生活现实之中。贵族的理想减弱了中产阶级理想中最刺耳的声音，工人阶级的理想和中产阶级理想中最好的东西坚定地结合起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贵族的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性格在许多方面与之达成妥协。但到了40年代末，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与它刚进入40年代时相比，也在许多方面被修正了。尊重工作和自我救助，社会身份取决于地位而不取决于出身，婚姻神圣不可亵渎，强调俭朴、节制和虔诚，这些价值都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惩罚性改造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对软弱和苦难的态度，虽然没有被彻底抛弃，却已经被掺入公共服务的重要理念，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以及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制度的创立，积极地推进了走向文明化的努力。

这是变化的一个层面，倘若我们要探讨社会性格的真实性，就必须进行这种分析。在某些方面，感觉结构是与支配性的社会性格相对应的，但它也是对前面所描述的互动关系的一种表达。此外，虽然感觉

结构在整个社会中并非铁板一块，但它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性群体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个层面上，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可识别的社会性格，因为它不仅要处理共同理想，而且也要处理被共同理想所忽略的东西，以及共同理想所带来的活生生的后果。我们只要看一下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就能对此一目了然。

81 把发表在杂志上的通俗小说——达尔齐尔对此已有细致的研究——放在这个背景中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第一眼就能发现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对阶级社会的不可动摇的假定，但重视财富甚于出身（贵族们在个人品行上的确是有污点的）；深信穷人陷入贫困乃是咎由自取——不断强调他们是愚蠢的、堕落的，对他们的互助却视而不见；婚姻绝对是神圣的，想方设法要让那些在性方面出轨的人吃苦头；向软弱开战，不管这场战斗有多可怕，都把它看作是培养谦逊美德的主要途径之一。所有这些——常常是有意识的教诲——都是支配性的社会性格的直接表达，也是虔诚的“改良”小说（如唐娜夫人的《海伦·弗利特伍德》^①）以及改良主义者所谴责的感伤小说所共享的前提。这就提醒我们，通俗小说往往是通过刻板的人物形象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陈旧的价值体系。描写上流社会生活的“时尚小说”要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变得不再那么时尚。典型的男主人公有时是那种自我救助的成功典范，但他常常是比较旧的那种类型，是有教养的绅士，是被荣誉感控制的士兵，甚至是这么一个人，他把享乐当成祝福，把工作当成诅咒。对早期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来说，失去收入而被迫去工作，是需要忍受的不幸；毫无疑问，最好是能拥有一笔可靠的财富。对待工作的新态度是慢慢才出现的，其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对一部真正有趣的小说而言，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仍然被认为太寒碜、太枯燥了）。此外，这两类小说里的男主人公都很会公开表露情感，他们可以当头号大哭，甚至昏

^① 《海伦·弗利特伍德》（*Helen Fleetwood: A Tale of the Factories*）是唐娜夫人（Charlotte Elizabeth Tonna, 1790—1846）在1841年出版的一部工业小说，它揭露了英国工厂中工人尤其是女工的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译者注

晕过去，即使是坚强的男人也常常如此，但很快他们就不能再这样做了。女主人公的形象连续性更强一些：她们是软弱的，有依赖性，而且很乐意表现出这种依赖性，当然，她们是美丽而贞洁的。一个有趣的因素——它显然与这一时期某种持续不变的一般看法有关——是学校无一例外地被描绘得极为可怕，它们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地方，既鄙陋又残暴，教育也荒谬可笑，作为一种培养孩子的方式，它们也比不上家庭。这也许是大多数英国舆论相信家庭教育是一种理想教育方式的最后一个时期了。从16世纪起，这种信念普及开来，随着在阿诺德之后公立学校的风气焕然一新，这一信念被彻底扭转过来，这种转变有着相当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在《汤姆求学记》^①于1857年出版之前，对学校的新看法还没有出现。

82

在19世纪40年代的通俗小说中，我们发现了旧的感觉方式的许多痕迹，以及对被认可的社会性格的某些标准化感觉的忠实复制。我们还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发现了它们与实际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时期决定性的要点在于成功和金钱方面。社会性格武断地认为成功来自于努力，财富是体面的标志，但这种断言必须和现实世界进行辩驳——哪怕是在无意之中进行，而在现实世界中，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这种小说所表露的信心往往只是徒有其表。以一股巨大的力量破壳而出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带有不稳定感和欠债感的气氛。在这些小说里，最常见的一个因素是财富的丧失，这完全无法用跟社会性格相一致的说法——即成功或失败是与个人品质相对应的——来表达。债务和破产像鬼魂一样游荡于这个表面上很自信的世界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就像是某个外在过程的结果，偶然地降临到人物头上。在某个层面上，社会性格的假设前提得到了维护：如果失去了财富，那你也就出局了——你不能死撑着让自己或是你的朋友们觉得窘迫不安。但这条

^① 《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是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 1822—1896)根据自己在拉格比公学上学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小说，小学中的校长阿诺德博士即托马斯·阿诺德。——译者注

冷酷无情的规则通常只被用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即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的父母。对于重要人物，则必须另备计策。在所有这些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计策有两个方案：一是意想不到的遗赠，一是帝国。这两个方案都非常有趣，它们既可以说是一种魔法，又可以说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所需要的态度。

魔法的确是必需的，它可以用来延搁伦理与经验之间的冲突。它被广泛地运用于性爱的困境中，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被迫和他/她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而真爱却在一旁苦苦等待。不贞或是离婚之类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就设计了一个标准的模式来派用场：配偶中不般配的那一方不只是不被喜爱，而且他/她还是一个酒鬼或是疯子；在某个给定的点上，也就是当必须顺从地承受的苦难达到必要的总量时，机会便降临了，通常是一次壮观的死亡，这时候配偶中没有爱的那一方会表现出关心、责任、虔诚等品质；当然，等到那时，真正的爱情就能圆满实现了。在金钱方面，过程是相似的：在重要关头，遗产突然从天而降，主人公重新获得财富。要获得成功，金钱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一定要反对这条原则，同样，也没有人命该受到那种灌输给穷人的伦理——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兴旺发达——的束缚。这种欺骗性的因素暴露了社会性格和实际的感觉结构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异点。

帝国有着相似的用处，但要更复杂一些。有那么一笔实实在在的遗产——它们最终改变了自我救助的伦理，这当然是最简便的形式；在这个时候，魔法就蕴含在时机当中。帝国则是一条用途更广的迂回路线：败家子会迷失在里面；已经破产的、或是被误会的男主人公浪迹天涯，最后带着财富荣归故里；任何类型的弱者都可以被转到这条道路上，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际上，帝国也常常是意想不到的遗产的来源，在这个时候，两种方案就合二为一了。很显然，帝国的用处是和社会中的一些现实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简单的意义上说，去国离乡前往新的国土，可以被看作是出于自我救助的需要以及纯粹的进

取心。而在新的国土上，也迫切地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移民作为解决工人阶级问题的一个方案被广泛地呼吁，抨击现存体制的最仁慈的批评家们也常常大力鼓吹。在19世纪40年代，每年有9万人移民海外，而到19世纪50年代，移民人数更是增加到原来的3倍。从另一个角度看，就资本和贸易而言，帝国已经成为工业化的杠杆之一，而且将证明它是维持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主要方式。这些因素在小说中有所反映，尽管还不能达到与19世纪后期——那时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自觉采用的方针——相当的程度。同时，与对现实因素的这种反映相伴随的，还有如同魔法一般的用处：那些不能在既定体制内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物被简简单单地放在了船上，和对于伦理的任何一种激烈的质问相比，这是一种更简单的解决伦理与经验之间冲突的方式。这种方法还有着别的优点，它与感觉结构的另一种主要因素是相一致的，那就是：没有什么总体方案可以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有的只是个人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获得遗产或是移民来得到拯救，通过某种及时的洗心革面来解决问题。

84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描述的感觉结构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小说中，也存在于如今已被忽略的通俗小说中。各种各样的反映都是真实的，也的确有着魔法般的力量。迪斯累利通过写一个贵族和一个投身宪章运动的姑娘之间的爱情，来戏剧化地揭示“两个国家”的问题，他似乎很大胆，可西比尔最终却被发现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货真价实”的贵族，这就落入了当时杂志小说的一个俗套：在这种处境中的贫穷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贵族的来历。（在迪斯累利那里，“两个国家”的联合实际上就是农业财产和工业财产的结合，这是一个极其乐观的政治预言，在《科宁斯比》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年轻的贵族和兰开夏郡的工厂主的女儿结婚，并当选为工业选区的议员。）盖斯凯尔夫人尽管拒绝了那种认为穷人受苦是咎由自取的流行谰言，但她在《玛丽·巴顿》中还是把工人阶级组织和谋杀联系在一起，并把她喜爱的人物都送上了开往加拿大的轮

船。金斯利在《奥尔顿·洛克》中也把他的投身宪章运动的男主人公送往美洲。他们都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批评家，在许多方面都与社会性格不合，但仍然受到感觉结构的束缚。

在那些与社会问题没多大关系的小说里，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对应现象。夏洛蒂·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的小说就情节和感觉结构而言，实际上是和杂志上的许多小说一样的：身为家庭女教师的女主人公，发疯的妻子和酗酒的丈夫，经历了辞职、尽责和魔法时刻后，一切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与此相似，狄更斯也一再地把杂志小说中的情境、感觉和魔法拿来以为己用。

85 在流行的感觉结构和同时代的文学对它的运用之间存在着连结，这种连结对文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作为整体的文化其内部的各种真实关系——其意义甚至比各种制度还来得重要——变得清晰了，而当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流传后世，或是对作品的研究脱离了其所在的社会语境时，这些关系就会被轻易地忽略掉。然而这种连结必须小心地加以界定。在好的小说里，很普通的情境和感觉常常会被发挥到极致。而在其他情况下，虽然构架没有变，但某种经验因素却在作品中四处泛滥，通过这种方式，它把自身的权利勾连进来，并逾越了习俗惯例的条条框框。在《玛丽·巴顿》的前半部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正是这么做的；在夏洛蒂·勃朗特那里，她把孤独的个人的欲望表现得尤为强烈，从而使那些与之相对立的习俗惯例真成了问题；狄更斯当然也是这样，通过塑造常见的孤儿形象，或是那种因失去财产而无所依靠的孩子，来试图超越他所指向的体制，具体地表达那个时代的真实经验中的某些最深层的感觉。这些都是创造性的因素，尽管它们明显地连结着普通的感觉结构。孤儿，无依无靠的孩子，孤独的家庭女教师，来自穷人家庭的女孩，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对现实生活方式的最深刻的回应。在普通小说里，他们都是常见的人物；可在文学作品中，他们是挟带着不可抗拒的真实性而出现的，不仅可以作为表现社会体制之各种偶然性的范本，而且也可以表达对于整体生活方式之人类品

性的一般判断。正是19世纪40年代的这些小说第一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根本性的意见分歧(此前偶尔出现的个例除外,比如戈德温^①——或许还有理查森^②),尽管是通过惯常的形式。在社会性格的层面上,社会也许对其假设前提及其未来抱有信心,但是这些孤独的、无所荫蔽的人物形象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就是体制——社会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将它合理化了——的个人现实和社会现实。孤独,害怕,上当受骗,这些都是需要忍受的痛苦经验。在很多小说中,人们最终都会找到魔法般的解决办法,那些强烈的核心经验已被记录下来,它们使这些作品得以流传后世。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找到了与《呼啸山庄》这样的小说之间的关联,这部小说对常规结构的许多方面都拒不接受。在《呼啸山庄》里,在最强烈的巅峰,一整套关系所构成的复杂屏障最终都被一种绝对的人类承诺打破了。这种承诺是通过死亡来实现的,而体现在个别人物——凭借魔法之力,他们也许可以得到拯救——身上的本质性悲剧成了整部作品的形式。其他小说中的创造性因素在这儿被凸现为一个整体,这就使这部作品越出了普通的感觉结构,向人们传授了一种新的感觉。

86

艺术反映社会,并将某种社会性格融入真实的经验。通过新的知觉和反应,艺术也创造了在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艺术拿来跟社会相比,就会发现一系列真实的关系,它们展现了艺术和整个生活的其余部分之间的深刻而又重要的连结。我们可以发现对社会性格的描述、讨论和体验,以及通过情节所作的阐述。我们也在某些有特色的形式和手法中发现了某些迹象,显示社会已陷入僵局,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是通过这种方式才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些迹象中有些部分会表现出一种虚假意识,以避免任何实质

①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记者、政治哲学家和小说家,小说代表作有《曼德维尔》(*Mandeville*, 1817)。——译者注

② 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英国18世纪小说家,代表作有《帕梅拉》(*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1740)和《克拉丽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1748)。——译者注

性的指认，有些则表现了一种向前超越现状的深层愿望，尽管这种愿望仍然是不确定的。1848年，乔治·艾略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记录了上述的后一种感觉：

总有一天，会建起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神殿，在那里，甜美的熏香和赞美诗会从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的记忆中冉冉升起，他们早有一种深沉的**预感**，这是对未来时代的预感、渴望和明确的幻想。到那时，玛蒙^①的悲惨统治将宣告结束，人们将不再“像海中的鱼”，社会也不再像一张分成两半的脸——其中信仰的那一半，信守诺言的那一半，是公正的，宛如上帝；而行为和制度的那一半却刻满了苍老的皱纹，它们皱缩成了魔鬼的冷笑。

19世纪40年代的很多艺术以及“魔法”都表达了这种愿望。在这点上，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这么一个过程，它不能对艺术和社会进行简单的比较，而是必须以下述认识为出发点，即人的全部行动构成了整个现实，艺术和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都包含于其中。我们现在不把艺术拿来跟社会作比较，而是把艺术和社会都拿来跟人类行为和感觉的整个综合体作比较。我们发现有些艺术所表达的感觉是社会无法在其一般性格中表达出来的。可能有一些创造性的回应可以照亮新的感觉。它们或许也是对被删削忽略之物的简单记录，是滋养或是试图滋养人类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的养料。19世纪40年代的另一个我们尚未提及的因素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个迹象。丁尼生和阿诺德这十年里的代表诗作，从《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和《尤利西斯》（*Ulysses*）到《被遗弃的人鱼》（*The Forsaken Mermaid*），构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后期阶段，浪漫主义运动试图通过刻画别的地方和别的时代来表现一种丰富

^① 玛蒙(Mammon)，贪欲之神，在新约圣经中它是将财富、贪欲和世俗追求人格化的一个凶神。——译者注

性，而这种丰富性却未曾显露在平凡的当代生活中。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逼肖柯勒律治和济慈，但它们是虚弱的，这似乎标志着更进一步地——也许是灾难性地——离开了现实生活的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推动力是独特的，它的强和弱所揭示的经验是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社会而举证的。我们可以再把它和那种将过去浪漫化的一般做法联系起来，将过去浪漫化在卡莱尔那里是在严肃的层面上进行的，而在历史小说这种形式中，它却是在通俗的层面上进行的，在19世纪40年代初，它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创造，可谓成果累累、大受欢迎，但后来却开始黯然失色。浪漫主义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虚弱的浪漫主义，它陶醉于异域的色彩和丰美，另一种是强健的浪漫主义，它幻想着一种更健全的人类生活，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把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从那个时期阴冷的现实和支配性的理想中删除了。富有魔力的、华靡的非法剧院和音乐厅，装饰华丽的家具，哥特式建筑，都属于同一个范畴。1848年是宪章运动的最后一年，也是前拉斐尔派兄弟会^①成立的一年。我们不是不可以把这种艺术和整个生活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而是鉴于它与社会的主要特征有着鲜明的反差，我们把它看作是一般人类组织的一种因素，它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而如果我们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那还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因素相对等的位置上。

88

最后，当我们回头看整个这一时期时，便会看到这一时期的创造性活动不仅可以在艺术中找到，而且也可以顺着社会的主线，在工业和工程中找到，而当我们质问这个社会时，也可以在一些新的社会制度类型中找到。如果我们认识不到靠着人类的才技和努力而不断实现的真正奇迹，那也就无法理解工业革命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类力量的这种

^① 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由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约翰·艾弗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和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等人组织的一个艺术团体，他们主张回归到拉斐尔时代之前的更为自然的画风，其绘画作品及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唯美主义色彩。——译者注

非同寻常的释放所带来的激动，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公认、分享，即使是社会批评家们，也概莫能外。没有这种公认和分享，社会就得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认可。1842年，卡莱尔在看到一挂新的火车头时说：“这是我们的诗篇”，这一因素如今很容易被忽视，但它对整个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创造了不同的共同体形象和不同的关系形式，这种创造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在新的制度中缓慢推进，它标志着思想的极大拓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与较重要的艺术和思想一样，在工业和制度领域进行的这类活动同样强烈地表达了人类的真切感觉，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如果不参照这种类型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文化的创造性部分。

对19世纪40年代的文化展开全面的分析，将远远超出本章的范围和计划。我只是简略地回顾了那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把它当作一条路径来思考这种分析会把哪些东西卷带进来。我仅仅指明了它可以起步的各条道路，但我认为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分析显然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对生活方式的表面上分离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也能够带来启发。总之，只要我们能彻底理解这种分析，并看清其后续之路，我们就可以断定主导性的理论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区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注释：

[1] 佩里·安德森的妙文《50年代的左派》（《新左派评论》第29期）给我些许这种感觉，而且比我想象的要早。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是公正而又必要的。

个人与社会

我们在试图定义并思考的是这么一种至关重要的原则，即关于心智所习得、所创造的诸模式与那些被传播开来并在各种关系、习俗和制度中发挥作用的诸模式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真实的交互作用的那个原则。我们将此过程及其结果命名为文化，并发现了这一过程内部的一些问题，它们一直是人们争辩不休的传统话题，如今我们可以以这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在这些问题当中，个人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最显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贯穿于那些构成我们的传统的所有思想体系，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仍然在依据当下的经验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似乎承认它正是构成我们时代的各种冲突的核心问题。当然，我们是通过已习得的描述接触到这种经验的，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堆积成山的相关理论，则多多少少会对此有所意识，但事实上即使我们对那些理论一无所知，也仍然会发现它深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和关系模式之中。我们是从已习得的各种描述出发来考察各种现实关系的。当我们说到“个人”和“社会”时，我们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些既有的描述，它们包含了对其所指经验的特定阐释，这些阐释曾流行于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如今已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起不容置疑的地位。通过某种特殊的努力，我们也许可以把“个人”和“社会”看作“不过是一些描述”，但是仍然有许多实际的经验和行为是与它们相联系的，这似乎可以在纯理论的层面上认识。然而很多时候，当经验和描述之间出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以至逼迫我们去审视

那些描述并试图越过它们去寻找新的描述的时候，这就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而的确成了一个关乎行为的问题。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我们关于“个人与社会”的思考是不充分的、混乱的，有时候甚至是贫瘠的。在对文化而不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这种经验的描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想看一看是否有此可能，即从我关于创造性的心灵以及文化的论述出发，来重新思考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论题。我将对一些主要的描述作出历史化的评述，考察近来某些学科的研究对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某些修正意见以及有可能是全新的一些描述。

1

我们现有的关于“个体”的描述是何时出现的？从这个问题入手，我们可以就便来展开历史的考察。通过考证概念出现的时间来给经验系年，这从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当一个词出现——或者这是一个新词，或者是给一个词赋予新的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真切地意识到发生变化的那个特定阶段已经来临。在中世纪思想中，“个体”意味着“不可再分”，它主要用在关于“神圣的三位一体”性的神学论证的语境中，旨在说明个体的存在可以认为既有着自身的性质，也有着作为一个看不见的整体之一部分的性质。这个逻辑问题被扩展到其他经验领域，“个体”遂被用以指称某个群体、种类或物种的一员。放在这一历史中看，这一术语的复杂性便顿时昭然若揭，因为它被界定为一个单元，但又是从某一种类的成员的角度来界定的。“同一性”（identity）——这是一个特殊的名称——是通过对一致性的认识而获得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身份，而正是“同一性”这个带有“不可分”意味的词把“个体”界定为单独的实体。现代描述的决定性的历史变化在于重心转移了，它使我们能够把“个体”看作一种独立的存

在，就此术语的结构而言，它与其所从属的群体没有什么直接关联。91
这个词本身记录在案的历史并不完整，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是，上述重心的转移似乎发生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英格兰。从那时起，我们慢慢地——也带有许多含糊不明的疑问——学会了把个体看作是“有着自身权利的个人”，而在以前，描述一个个体，就是用它来列举其所属的群体，提供关于这个群体及其内部关系的某种特殊的描述。^[1]

这一语义上的变化本身很难追溯，但若是把它和中世纪以来漫长而崎岖的发展过程中种种关系所发生的实际变化联系起来看，则似乎要清楚一些。在描述这种变化时，我们当然会把复杂经验的整个领域简化为一些简略的模式，但尽管有此限制，我们对总体变化的感觉却仍可能是准确的。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关于个体灵魂的观念史中探寻这种新的“个体”意识的基础，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辩论中，我们正可以看到基督教传统所固有的观念扩展方式，凭借这种观念扩展方式，才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即从认为灵魂在上帝或是教会所规定的结构内自有定命，转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性的命运：每个人都直接和上帝发生个人性的联系。这两种想法都认为个人的命运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但前者认为这可以看作一个关于共同命运的问题，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指出了人的共同命运；而后者则认为个人——有其自身的权利——的命运才是首先值得关注的。前一种命运要通过复杂的总体关系结构来把握，后一种命运则是通过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来把握。当我们谈到新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时，并不是说个人命运的事实比之于以前的思想体系来得更加真实，而是说借以认识到这种命运的那些关系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的。从“人—教会—上帝”到“人—上帝”，这种关系模式的转变所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个体”意识。92

对于人在生命中的个人“地位”的认识也发生了相似且相关的变化。地位即暗示着关系，对此我们至今仍有充分的意识。但是对“社会中的人”这个难解的概念的认识，中世纪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还是有

很大的变化。关于中世纪社会的大多数说法都强调个人是由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旧的意义上的“个人”是由其作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身份决定的。这就像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所指出的：“个人被等同于他的社会角色，他是一个农民，一个艺术家，一个骑士，却不是一个偶然地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体。”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一个僵化的社会里，想“成为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相对小得多。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大，至少有些人可以改变他们的地位，成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其社会角色相分离的个人，这种观念明显得到了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鼓励某些人把“个人”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发起者，因为这样的“个人”有着“自由进取”的精神。与其说他是在一个固定的秩序内履行其职责，不如说是选择了特定的方向来发起某些类型的活动。社会和地域流动性的变化导致对个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我是谁”扩展为“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仍然只是依据其社会角色或经济角色来界定个人，我们注意到这种定义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许多例子当中，我想到了在1885年地方法官对被告席上的威廉·莫里斯的问话：

桑德斯先生：你是啥玩意？

犯人：我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文人，很有名，我想，名闻全欧洲吧。

让我耿耿于怀的是，那样问话很唐突，但莫里斯却马上就明白了。我知道自己的反应，换了我，对“你是啥玩意？”这样的问话，回答只能是“人”，当然这样的回答肯定会被认为是傲慢无礼，就像我认为那样问话傲慢无礼一样。撇开“你是啥玩意？”这样的问话，我想到了更能接受的问话——“你是谁？”和“你是干什么的？”就好像是亲身经历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生

存是可以和职业、社会作用、社会等级分开的，而且比它们更重要。我还想到有些人在回答法官的这个提问时也许会自豪地说“我是一个英国人”，那样一种意识确实也是那个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方式可用来界定我们的存在，如国籍、阶级、职业等等，当我们用它们来界定自身的存在时，实际上也就是用一种群体身份来描述个人。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使用所有这些范畴的时候，仍然有某个意识领域和有价值的存在是根本无法用那些范畴来描述的。正是在和这个存在领域的关系中，“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才凸现出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个人”概念追溯到发生变化的那个复杂时期，我们可以分析它的一些可以被区分开来的方面，如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从本质上说这是把个人抽象化了，使之脱离了复杂的关系结构，迄今为止个人通常都是这么来定义的。与此相对应，“社会”也同样被抽象化了，在此之前，“社会”指的是一种实际的关系——是由“伙伴结成的集团”——但到16世纪晚期开始出现了那种更普遍的现代含义，即“共同生活的系统”——社会成了自在之物。在17世纪“共同体”也达到了相同的发展阶段，而“国家”则更早达到了这个阶段，它增添了两个更早出现的含义，一是共同生活的状况，“民族的国家”（state of the nation）即含有此意；二是某种资格或地位的标志，“国王的国家”（the King's state）即含有此意。这样一来，“国家”就有了作为共同生活的“机器”的含义，它有着自身的结构框架和固定的秩序。所以，我们看到关系范畴被分割开来，一边是“个人”，另一边是“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抽象而绝对的存在。

94

此后的社会思想其主要传统即建立在这些描述之上。在英国，从霍布斯到功利主义，众多的思想体系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人作为一个赤裸的人（bare human being），是一个“个人”，这是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在这个传统当中，极少有人从这样

一个事实出发，即人是生在关系之中的。把赤裸的人抽象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其他思想体系中，共同体被看作是公理，而个人则是导数。但在这里，个人却成了公理，社会反倒成了导数。霍布斯实际上是抛弃了介于单独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切中间范畴，认为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社会是理性建构起来的，目的是制约个人身上的破坏性因子，强迫他们互相合作。洛克虽然认为人本性中有理性和合作的因子，但同样假定单独的个人通过公意和契约组成社会乃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由此以降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都是以个人及其权利为起点，认为社会只是用来确保这些抽象权利的，并常常争辩说只需要一个最小化的政府。这种强调显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好处，把人们从独裁和压迫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然而，它所依据的描述虽然响应了人们打破陈旧社会形式的经验，但却是与艰难探索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经验相冲突的。

当抽象的个人在这一传统中被理想化的时候，分享了其部分范畴（并非全部）的另一个传统则在朝着将社会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卢梭认为“只有在成为公民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他把共同体视为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源泉。黑格尔的出发点与此相似，他强调人只有经由社会和文明才能成为一个个人，他把国家看作是人类最高价值的载体——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我们的最好的自我”的化身。卢梭和黑格尔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看到了实际存在的各种共同体以及各种协作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居于个人与更大的社会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因素。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才出现了对于这些描述的意义重大的修正。我们从早期自由主义那里保留了“个人”和“社会”的分离，但是又增添了“共同体”和“联盟”作为中介性的范畴，来描述局部性的和面对面的关系，正是通过这些关系，对个人和社会的更大程度上的抽象才能得以具体运作。在增添进来的概念中，“阶级”是非常特殊而又至关重要的一个，它和“秩序”、“等级”之类静态的概念很不一样，因为它包含了居于“个人”和“社

会”之间的中间范畴——一个人通过其阶级与社会发生联系。但是“阶级”强调的重点与“共同体”和“联盟”不同，它不是一个面对面的群体，而是和“社会”一样，是一种抽象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同属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会按照某些共同的方式思想和行动，尽管他们并不属于相同的现实共同体，因此理解“社会”进程的最好方式就是考察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到了19世纪，尽管对“个人”和“社会”的抽象描述仍然很强势，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描述，并获得了强调，它们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某些特殊的关系类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变动是由复杂的历史变化以及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对立竞争所引起的，而正是在这个广阔背景下，20世纪的某些学科才能发挥其作用。

2

作为一位人格和社会行为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而强化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个传统。弗洛伊德的理论假定个人与社会之间有着根本的分野，因此个人与“共同体”、“阶级”这些中介形式之间也有着根本的分野，这些中介形式被简单地认为是代表社会来作用于个人的。人——赤裸的人——具有某些基本的驱力，这些驱力在根本上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压抑某些驱力，另外一些驱力则必须被净化，转入能被社会接受的或是被赋予价值的渠道。社会是一套压抑和转化的机制，文明则是（通过“升华”）压抑自然冲动的产物。人作为一个赤裸的人根本上是与社会相疏离的，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是合理地调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冲突使之达成平衡，升华就是实现这种平衡的机制，而崩溃则要归咎于调整的失败。

就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基本术语看，他对个人与社会的解释并没有越出旧传统的藩篱，但是他的探讨实际上却趋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他确实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引入了一个新

的中介项，即家庭，从而明显地拓展了关于实际社会成长的研究。家庭作为首要的社会联系形式，一直没有很好地被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但在弗洛伊德那里，并不是家庭本身而是他对于在幼年期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模式的强调——在所有人类行为中它们是最重要的——使得家庭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理论上把“个人”与“社会”分割开来，这使他的描述受到了限制，但是它们在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发展。教条化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几乎没有兴趣来研究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次要的。而在其他人那里，个人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存在的深层联系则获得了饶有兴趣的探讨。弗洛姆的研究似乎尤具价值，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中介性描述，即“社会性格”。它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行为变成为个人人格一部分的过程：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通过有规律的压抑和转移的过程，而是通过一个能将许多关系纳入其中的塑造的过程。“社会性格”是对经验作出的有选择的回应，是一个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感觉系统和行为系统，在孩子出生期间的共同体中，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性格。家庭则代为共同体在个人身上培养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性格。如果培养成功，个人的社会行为就能与其个人欲望协调一致，因为社会性格“内化了外部社会的需要，从而控制了人的能量使之服从于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学会了“从某个实际的立场出发按照社会对他的要求来行动，为此他也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个体心理不再是需要社会去压抑或修剪的永恒的人类本性了，它大概可以说是“个人对待世界的特殊的关联方式”。这种关联方式既可以和当下的社会性格协调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偏离。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霍布斯，而弗洛姆则类似于洛克，他们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实际运作过程都有非常精细的描绘。弗洛姆在揭示“社会”是怎样得以真实地嵌入个人这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至我们不再需要把它们看作是分离的、绝对独立的，而是从此可以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它们。可是这也引出了一个真实的问

题：可以偏离社会性格的个人性格源自何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哪种关系影响了那些不体现社会关系的个人性格？如果把“社会性格”看作一种特殊的建构——它也许能、也可能不能充分解释由个人所组成的真实关系，那么其作用就更明显了，可能存在的五花八门的个人反应也就有了显而易见的理论基础。但“社会性格”是不是一个最终有用的术语，这仍然是个问题，因为它似乎只能部分地解释关系(社会)是怎样塑造心理(个体)的。

“社会性格”这个概念与人类学上的“文化模式”概念较为相似。98
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证据，证明为众多人类团体所采用的习得的行为系统和态度系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延续至今的系统构成了社会的形式以及将每个个体成员培养长大的文化模式。对这些系统所作的比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传统观点，因为它表明能给个人和团体带来满足的感觉以及行为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使我们有可能去审视各种真实的、处于变动中的关系，探究打破了标准规则的多种细节，而不是去问这么一个问题：在被理想化认同的个人(配备有标准的欲望和态度)与被理想化认同的社会(有着标准的意图目的)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它在提供证据的同时也给理论探询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其主要结果也许在于因其强调个体人格即使是最深层的层面上也是由社会过程所塑造的，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传统的力量。总的来说，它是有价值的，纠正了那种强调抽象“个人”的错误论调，这种错误论调我们现在已可视之为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对普遍的人类状况的正确解读。但如果正确地去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个人的重要性。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

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消除其个体成员在性情气质上的差异。个人与社会之间从来都是一种妥协的关系。关于个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强调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对立而是通过强调两者之间的彼此支援而得以阐明的。这种友善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至若是

对文化模式与个体心理的关系不加思考,就根本无从探讨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和“社会性格”一样,是对经验的有选择的回应,是在特定的社会中习得的感觉系统和行为系统。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模式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融洽”的,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训练与之相适应,以至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通过成为社会的一员,他们将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个性。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个模式却未必是“融洽”的,他们或者是拒不服从,或者是付出沉重的代价来顺遂其个人欲望。很难确知装出一副“融洽”的模样要承受多大的重负,本尼迪克特实际所描绘的各种不同变化——对待挫折和不幸的不同反应——看上去很像别人所说的“学来的反应”,这又会引出一个问题,即这些“学来的反应”与特定社会所教导和赞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果它们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就又回到了“人之本性”,对这种本性应如是理解,它不是某种单一之物,而是由众多与生俱来的性情气质组成,这样一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抓阄游戏,具有某种性情气质的某个人在他碰巧生于其中的社会里抓取一张赢牌或是输牌。我们还无法充分地证实或是否证这种假设,但是它代表了与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趋势不同的另一种解答方案。另一位人类学家林顿(Linton)发现,

可以保险地断定,与生俱来的、生物学上所决定的因素无法用来解释全部的人格结构,也不能解释包含在这些人格结构内部的众多不同的反应模式。它们仅仅是形成人格结构的几组因素中的一种而已。

林顿接着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方式描述了个人是怎么通过学习文化模式而达到成熟的,他强调

大多数人类行为事实上都是以有组织结构这样一种形式来传授的，而不是由个人在经验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

在这种传授当中，有些因素是用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的，另外一些因素则是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的，它们都是一个完整的模式的组成部分。这些模式的携带者只是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单元”而活动着的，他还有其他一些资源来构成其人格。在社会活跃其间的变动世界中，这种个人的社会作用在于他通过运用自身的资源可以推动模式的改变，以便去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100

那么这种个人发展的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社会心理学通常所强调的重点表明我们在思考的某个层面上已经远远抛开了那种将个人视为先于其社会而存在的观念——即认为社会是通过限制或契约而形成的第二等级的存在。现在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强调作为单独的个人而存在的自我意识方式是婴儿必须学习的，“婴儿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就像米德(G. H. Mead)所指出的：

自我作为一种可与自身相对之物，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结构，是在社会经验中产生的。

这一定义暗示着个性有着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把个人的原初生物存在与在社会中形成的“自我”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很有用处，但我们必须使用一些有着很大问题的术语才能区分清楚，因为“个人”这个词通常自然而然地就包括了这些在理论上可分的因素。最有用的一种强调方式也许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描述塑造“自我”的社会过程，即描述在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体之间的意识差异。首先，个人有着可以变化的内在潜能，因此才能接受变化多端的社会影响。其次，即使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性格”或“文化模式”，每一个人的社会历史，他实际的关系网络，实际上也还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都是个性化过程

的基本因素，但是独具的潜能和独特的历史又会互相影响，自我意识的生长过程便会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组织方式，既能自我审查又能自我导向。这种“自治的”自我是在对它有着根本性影响的社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它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治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可以帮着去改变或是修正已对他产生影响或是正在影响他的社会过程。

还必须给这种意义重大的描述增加另一种最近在社会学中很受强调的区别特征。“社会”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抽象性使我们很难从理论上认识那些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得一清二楚的现象：即使在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里，个人也不会只能碰到一种“社会性格”或是“文化模式”。在诸如我们这样的复杂社会里，显然存在着多种变数，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可供选择的诸系统。这显然非常重要。如果对“个人”的分析已从抽象回到其实际成长过程，那么对“社会”的分析也已经回到实际存在的真实关系的综合体。我们不再把“社会”看作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对象，而是去考察实际存在的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不仅是合作性的而且也包含有紧张冲突，对某些特定导向有所感觉的个人就能在社会所提供的不同导向中寻找原料，使其可以用社会的措辞来表达不同的成长。

在一个社会内部辨认出“各种群体”因而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下一步。但是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只变易抽象化的基础，使群体取代个人成为一种相同的绝对存在。即使在最简单的群体内部，也与在社会内部一样，既存在着合作的关系，也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在诸如家庭或村庄这样的面对面群体中，以及在诸如工会或社会阶级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中，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性格”或“文化模式”，它将据此训导其成员。围绕着这种训导活动而进行的是特定个体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在这样的群体里，如同在“社会”中一样，将会出现新的导向。此外，由于群体与群体之间有着现实的关系，群体内部的训导和修正过程将会成为更大的

“社会”的训导和修正过程的一部分。一个群体可以是一个方便的等级标记，但也仅仅是一个标记而已，在全部等级之上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这一事实才是最重要的。 102

3

我们已经简要地回顾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传统讨论，也粗略地描画了当代某些学科的主要趋向。现在我们必须再次转向经验，转向这一事实——即当我们思考“个人与社会”时通常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受制于某个非常简单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牵涉个人的遵从或是不遵从，也牵涉社会对这两种行为取向的态度。我们给“遵从”冠以许多名号，若是赞许则冠之以“有责任心”和“守法”，若是谴责则冠之以“胆怯守旧”或“奴颜卑膝”。对“不遵从”我们也有很多说法，其中有些是赞许性的，比如“独立自主”、“精神自由”，也有一些是咒骂性的，如“无法无天”、“性情乖张”。我们之中有些人或是站在这一边，或是站在那一边，而且试图保持稳定的立场。我们还常常把其中之一视为一种美德，目前对我们来说它们似乎就都是美德。这些评价也许是真实的，但由于它们最终依靠的只是那种简单的模式——遵从或是不遵从——所以相对而言是很不牢固的。我想试着超越这一模式，通过考察个人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实际关系来扩充我们用以讨论这个问题的实用语汇。

我们可以先来看**成员**这个描述性术语。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它可以用来有效地描述个人对其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积极认同。某个社会的成员会感到自己归根到底是属于这个社会：社会的价值就是他的价值，社会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以至他会自豪地用社会性的术语来描述自己。他当然会意识到自己是**社会成员之一**——是其所属的社会中的一个个体——而正是因为成员的身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个人——他一

103 点都没觉得社会是与他相敌对的——才把它看作是能够促成其自身目的得以实现的天然手段。如果必须作出改变，他将会促进这方面的讨论并使其产生实效，因为他对社会的价值、态度和制度坚信不疑，他接受给他指引的生活道路，甚至认为社会内部的紧张冲突也是可以参照这些基本的方式和价值而获得消解的，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根本上的统一性就能被保存下来。

这种作为社会成员的经验可能比理论上通常承认的更为普通。在许多现代社会里，这种经验确实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而正是在这种经验轰然倒塌之际，“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才充分暴露出来。成员身份可以是实际存在的，这似乎是确切无疑的，而忽略其重要性也就等于宣布继之而起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已确认成员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还必须继续辨别那些显然与之相似的其他关系，这些关系通过置换已经引出了对于成员身份的批评。存在主义思想家在“本真的自我”和“非本真的自我”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他们在描述人的“非本真的自我”时，通常会把他说成是遗传、环境和社会的“造物”。克尔凯郭尔因此认为社会在逼迫我们变成“客体性的”和“类型性的”，而我们必须冲破这些蔽障抵达自身的存在。雅斯贝尔斯认为现代社会把“非本真的自我”当作人的全部，在某些基本经验（痛苦、罪感和死亡）使我们得以冲破这些迷障从而对我们的真实存在获得一种本真性认识之前，我们只不过是遗传、环境和社会的造物而已。与此相似，尼采把接受社会的类型化塑造看作是一种市侩行径，萨特强调像“作用”或“职责”这些社会概念是有危险性的，它们只适用于那些“非本真”的人。整个这一传统的核心观点有其重大价值，但是把“社会的人”等同于“非本真的人”，这种倾向也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被作为一个社会过程而描述的，并不是成员的经验，而是臣民或是仆役的经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给生于其
104 中的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去思考如何生活，但这不必要要求个人只能改而服从社会目标，在很多时候，社会也会表达这么一种愿望，希望看到

个人可以依照社会所拥有的最好的经验而活下来并得到成长。

我们必须以这种认识为起点，即个人只能处在某种社会过程中才能活下来并得到成长。有鉴于此，“本真”与“非本真”的真实危机就既是个人的，也与某种社会过程相关。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东西，其宝贵因素在于坚持要作出选择和承担。的确，若非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身份认同，那他就没有完成，也就会被贬斥为“非本真的”。他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正当性，这样他才不只是一个社会“动物”，才算是一个个人，一个有着自身权利的人。但是这一过程在具体的个人那里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里，是很不一样的。它几乎不受有意识的评价的限制，其平常的过程虽说有时也包含着有意识的评价，但关系到的是个人的整个组织状况：他的神经系统，他的身体，以及他的大脑的有意识活动。在实际成长中，构成其个人特征的感觉和行为的完整综合，将会与他所在社会的感觉和行为的综合产生某种联系。其成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将他整合为一个独特的个人，这些阶段必然是由与其所在社会的整个组织状况的关系所构成的。但这些关系形态可以包含有所称的成员经验。在特定的社会里，某些特定的个人可以成为“本真的”，就其整个组织状况而言，他们可以将自己彻底交付给所属社会的活组织：“社会的”不一定是“非本真的”，它也可以是“本真的”和“个人的”。但这就必须区分那些赋予存在主义的观点以实质内容的各种关系类型。某个个人显然有可能会默许某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与他自己的个人组织状况并不一致，也不能达到其要求。他会服从那些他个人并不认可的权威，履行那些对他个人来说毫无意义的社会职能，甚至会以与他的实际愿望无关的种种方式去感觉和思考，那样就会给他自己的生存带来损害——通常会造成严重的情感紊乱失序，他自己的身体官能也会遭到生理性的损伤。这种虚假遵从的种种印记在我们的社会经验中已清晰可见，但用陈旧的“个人”与“社会”的两分法来诠释它们却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描述为**臣民**和**仆役**的角色，以与**成员**区别对照。

不管加诸其身的是什么样的暴力，臣民都必须接受其社会的生活方式，接受他在社会中被指定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生存，除此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这种服从，他才能吃喝睡卧，避开来自别人的摧毁力量。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他必须遵守才能活下去。仆役的压力就没那么严峻了，尽管这种压力对他来说仍然是无法抵抗的。臣民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仆役则被给予了选择的幻想，他受到怂恿，去认同与其规定的位置相符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选择的幻象，因为他和臣民一样，如果拒绝认同就显然无从谋生。然而这种幻象却很重要，它允许他装作认同于社会，就好像这种选择是真实存在的。臣民对制约着他的关系不抱什么幻想，他知道那种生活方式不是他所要的，但却是必须遵守的。仆役则可能会让自己认同于制约着他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甚至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成员（“成员”这个概念的旧含义的确允许仆役作如是想，因为如果个人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器官，那么特定的个人就是高级的或是低级的器官，这些个人仍然会觉得自己是社会有机体的真实的组成部分）。而在他生活的许多层面，尤其是在诸如孤独和衰老这样的特定境况下，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实际的自我感受之间的差异会凸显出来，或者是被个体所意识到，或者是表现为身体上或是情感上的扰乱。在正常情形下，他可以扮演好角色，就好像这真的是他自己，但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在他内心最深沉的个人情感被唤起的情形下，认同就会中止。就已被广泛记载下来的经验看，这种仆役的境况在我们这种社会中似乎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说，臣民是一种更加极端的个例，尽管在历史上以及在现代的不发达国家里，它是一种很普通的经验。在现代欧洲和美国，也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臣民，尽管记录在案的仆役的经验要多得多。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是我们自己在塑造我们共同的命运，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凭借各种不同的力量拨开迷雾，确信公共活动的模式在根本上与我们个人的欲望并无关系。实际上，那股将“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的现代力量主要即来自于这种感觉。只是出于仆役的情

结，我们才能既保持这种确信，同时又一再假装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社会的目标。

存在主义者拒绝这种情结，声称应将个人选择放在中心位置。从这一立场出发，成员身份这一实际存在事实上却被当作一种可能性排除在外，现代个人主义的全部思想宝库即建基于此。但当我们探测其范围时，显然会发现不遵从的模式同样变化多端，丝毫不亚于那些遵从的模式。在有成员以及臣民和仆役的地方，也会有反叛、流放和漂泊。反叛这个概念仍然带有一种强烈的正面评价的意味，尽管事实上反叛是较为罕见的。反叛者和成员颇为相似，因为他对某个社会目标也会有强烈的个人承诺，他会将其个人存在积极认同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努力模式。社会的方式并不是他自己的方式，而通过反叛某种社会模式，他试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模式。在这里显然需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区别，即革命者和改革者或是批判者是不一样的。在我所界定的意义上，改革者和批判者都是成员。他们真诚地想改变总体生活方式的这一面或那一面，但这种愿望与对这一总体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一般价值的坚持并不相悖，也与其对社会的根本连续性和统一性——这是改革者和批判者们通常坚持不放的——的坚定主张协调一致。与此相反，革命者却缺少这种作为某个特定社会成员的意识，而正是这种成员意识使改革者和批判者得以认为他们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在社会既有的模式内实现的。革命者与其社会的关系是公然敌对和斗争的关系，他以斗争的方式反抗社会是为了建立一个别样的社会，这是他区别于改革者和批判者的特征所在。政治革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在其他类型的反叛——如艺术、道德和宗教方面——中也可以明显看到相同的模式。反叛者与其社会的生活方式展开斗争，因为对他个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在艺术、道德和宗教方面，尤其明显的是在政治方面，他所设想的新现实却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他把它当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供奉于世人面前。

这就是革命者与流亡者和漂泊者的区别所在，流亡和漂泊是更加真

实的个人形式。流亡者和反叛者一样拒绝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这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流亡者没有采取斗争的方式，而是逃跑了。他通常与臣民也很相似，因为他要是不遵从，就会遭到毁灭或是无法维持其生命。他与臣民的不同在于他设法逃脱了，或是被允许离开。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他会逃到另一个社会并成为其成员，在那个社会里，他发现其个人实在以及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态度系统都能得到承认。更常见的可能是他会延续这种流亡的状态，既不能返回那个拒绝他或是被他拒绝的社会，也不能与他所滞留的社会建立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反复出现的典型的悲剧状况。反叛者则要冒更大的现实危险，因为他是在对社会的命门发起攻击，反叛者是在积极地活出其个人价值，就此而言，他与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积极关系。而真正的流亡者则只是等待，等到社会改变了，他就可以返回故土，然而他却并没有投身于这一现实的变革过程。

我们已习惯于把流亡者想象成是被他所在的社会驱逐出去的人，但自我流亡者也同样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形象。如果他愿意的话，自我流亡者可以轻松自在地生活在其社会中，但这样就会否定其个人的真实性。有时候他会有原则地离去，但他也常常会留下来，原则上感到自己是疏离在外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可用来说明这种“内部的流放”，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不只是限制在政治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描述一种非常重要的现代关系。这种类型的自我流亡者生活在他出生的社会中，飘来荡去，他拒绝这个社会的目标，轻视其价值，而信奉另一种原则，并将其全部个人真实供奉于这一原则。和反叛者不同，他不会为这些原则而战斗，而只是观望、等待。他知道自己应该与众不同，其行动迫切要求保持这种不同，维护以其独立姿态表现出来的个人性。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因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自我流亡者是希望社会发生改变的，这样他就可以开始归属于社会，让自己至少可以想象性地卷入到种种关系之中。然而与反叛者不同的是，由于其个人异见始终只是停留在个人性的阶段，因此他很难

形成足够多的关系，即使跟其他异见分子也难以建立起关系。他也许会支持异见分子所秉持的原则，但他不会加入到他们之中，他非常警觉，不会让自己被抓起来，也不会让自己受到连累。他首先捍卫的是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自己的思想，而任何一种关系几乎都会给他带来潜在的威胁。他实现了或是说保持了其“本真的自我”，但这种本真性却不能与他人分享或交流，如果作出了交流的努力，所涉及的承担也将被显著地降到最低限度。不管他会怎么说或怎么做，在根本上他只一如既往地独自行走在社会中，捍卫他自己的原则。

最后，我们还必须把这种情形与**漂泊者**的情形区分开来，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漂泊者也留在他自己的社会里，尽管他觉得这个社会的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它的价值也与己无关。但是他缺少流亡者的骄傲，也没有流亡者那种对于原则的执著。漂泊者并不希望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他最大的愿望只是他可以独自离开。流亡者通常会清楚地表明其个人立场，而漂泊者却常常找不到他自己的意义，就如同他在社会中也找不到意义一样。他的确不是要反对**他所在的社会**，而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存在的条件。对别人来说，社会是作为一套可以接受或拒绝的特定关系来经历的，而对漂泊者来说，社会却只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和强制，是他竭尽全力想要逃脱的。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来而必须做的事，他都会去做，但是这既没有个人的意义也没有社会的意义，而只是一种聊以谋生或是“混日子”的暂时手段。漂泊者已经走得太远，他甚至都不承认社会，更遑论去反抗社会。别人当作“社会”来解释的事件对于他就像是风暴或者太阳这样的自然事件，他能够看到的最远的原则是关乎厄运或是幸运的原则，借此他得以意外地找到钱或是温暖，在他可以摆脱拮据和寒冷之前，他可以一直忍耐下去。这些都不是在旅途中发生的事件，旅行总是有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哪儿都不会去，他的生活不过是顺其自然混混日子而已。当我们说起漂泊者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浪汉和社会边缘人这些滋生罪犯的人群，但是漂泊者的限定条件——从根本上

109

否定他所体现的种种关系——却不适用于这些明显的例子。在某些社会中，即使物质上相当成功，也可能过着一种漂泊者的生活，而在某些现代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迹象表明漂泊者的状况是社会中人所能拥有的唯一一种状况：不管他做什么，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泊者，在某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中，甚至都不需要另作伪装。遵从和反叛，服役和流亡，与此相似的一切都与其毫不相干。这样一个人随其喜好行事，但不会为谋求改变而战斗；他可以伺候任何一个主子，以求得眼前的便利，或者是逃脱一切役使，同样也是为了求得便利而不是听命于原则。漂泊者确信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都是傻瓜，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意义而徒然耗费生命，还自以为有意义，唯一要紧的其实只有自己：这个自己甚至都不是有意义的自我，而只不过是一具活着的有机体而已。

如果我们要走出简单的遵从或不遵从的困境，那就需要诸如成员、臣民和仆役或是反叛者、流亡者和漂泊者这样的描述。但和其他描述一样，它们都不是绝对的，而只是对某些特定的关系模式的分析而已。这些不同的调整形式所对应的“社会”并不是单一的，根据所体现的特定关系，“社会”本身也会呈现相应的变化。对成员来说，社会是他自己的共同体，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也许不会得到他的承认或同情。对仆役来说，社会是一种机构，在其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臣民来说，社会是一个强加于他的系统，在其中他的位置是被给定的。对反叛者来说，某个特定的社会就是一种暴政，他为之战斗的另一种社会是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对流亡者来说，社会在远方，但也许会改变。对漂泊者来说，社会是为别人而起的一个名字，这些人挡着他的路，或者是可以被利用的。这些都不是什么纯“主观”的评价，真实的社会必然会根据构成它们的个体组织类型而有所变化。成员与共同体，仆役与机构，臣民与强加的系统，反叛者与暴政，流亡者与失去的社会，漂泊者与没有意义的社会，这些都是起作用的组织的形式，是行动和互动的形式。此外，在现实社会中，上面所描述的这些关系几乎总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群体和等级而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共同体与

某个更大社会的关系，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有可能会在社会经验的某些领域，落到仆役或臣民甚至反叛者和流亡者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反叛者和流亡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另一个群体中找到社会成员的身份。事实上，由于其群体与别的群体是互相关联着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构成的总体现实通常是一种混合物，是由上面所描述的几种特殊的组织类型混合而成的。此外，在其成长的某些特定阶段，个人可以穿越不同的组织类型，实际上在某些社会里，青少年在成为一个成员或仆役之前通常要经历反叛、流亡或漂泊的阶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组织形式，而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正由于此，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体现了现实关系的宽广领域，尽管如前所述的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可能需要在此领域内予以确定。 111

4

从关于“个人”与“社会”的早期描述到当代辩论中那些更为精致的描述，我们可以顺应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倾向，用一些术语来描述那些活生生的过程，这些术语赋予那些过程一种作为固定的和独立的客体对象的外在地位。为了充分地描述经验，我们所需要的术语必须在根本上是起作用的，然而我们创造的每一种新的描述似乎都迅速转变成了对象，因而既很难去阐明经验，也很难忠实地保持其原貌。最关键的是，每一种描述以及提供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项。因此“个人”的观念不仅是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宗教变化的反应，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也是对这些变化的积极阐释。要摆脱那些限制性的、被废弃了的“身份”定义，把人从“他们生于其中”的社会职能中分离开来，并重新塑造法律、教会、经济和行政管理，人们只得提出“赤裸的人”作为共同要素，据此便可以挑战每一种限制和永久保管权。如果要建立一个不是以出身而是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个人甚至

还必须从其家庭中分离出来。与此相似，如果人类组织的问题需要用一些更加宽泛的术语来思考，而不是局限于用那些特定的社会系统所规定的术语，那么“社会”的观念也必须被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描述而生产出来。其后对共同体的强调，以及对个人性的社会基础的强调，也是对现实难题的一种创造性回应，而如果那种将个人看作是赤裸的人的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现实难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现实历史的漫长过程中，这些描述当中的某一些似乎已经显现出不足，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一种重要的经验注入了新的能量，这种经验显然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解释。举例来说，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你很难不感受到“个人与社会”的区分所具有的力量。我们大多数人能深刻感受到，在我们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和在“外部”社会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它们受到了某些显然是不无神秘的进程的推动——之间存在着断裂。和最初作出鲜明区分的时候相比，这种感觉在今天可能要更为强烈。当个人的生命被某些他们无法轻易看清或说出来的力量所改变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改变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内部现实关系的力量已经激增的情况下，这种不安全感当然也就会增强。这种不安全感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个人主义的永恒源泉，就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

个人主义是一种新奇的表达，它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观念，一种成熟而平静的感觉，它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想要切断自身与其大多数同伴之间的联系，把他的家庭和朋友从中分离出来。

虽然不可能总是成熟而平静的，但它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运动，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不能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所说的一切，但确实明显存在着一种核心的悖论：

他们说世界正愈来愈趋于一致，因为距离缩短了，可以从空中传达思想，所以友善相处的局面正在形成。唉，别去相信这种所谓的一致。人应该侍奉上帝，应该像兄弟般友爱，团结起来，这种思想在世界上越来越没落了，的确，这种思想不时遭到了嘲笑。

113

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理，而是真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每个人都努力要维护其个性，尽可能与众不同，希望为自己获得最大可能的生命满足，然而他的全部努力所带来的却不是什么生命的满足，而是自我毁灭，他并没能实现自我，最终只是陷入到彻底的孤独之中。在这些年里，在所有地方，人们都在讥嘲过去那种思想，却不明白真正的安全不能通过孤立的个人奋斗来获得，而只有在社会团结中才能找得到。

的确是这样，这种趋势很容易理解，在某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它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这不仅是个人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在一所独立的与世隔绝的温暖住房里，某个个人可以按照其意愿生活，和他的家人和朋友呆在一起，获得某种满足，在一个本质上是冷漠的和非个人的社会里，它被一再赋予了意义。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努力将会以失败告终，与世隔绝的状态会被打破，但对许多人来说，与严酷的、无意义的社会那种表面上的确定性相比，这似乎仍然是值得为之冒险的。

个人主义是一个与成长相关的词语，它脱胎于刻板僵化的社会，这种社会虽然安全，但也限制了、规定了人们的实际生活。超越个人主义之上的任何一种成长并不是要回到那些陈旧而不足信的解释，而是肯定包含有更多的内容。我们现在必须解释的经验既包含有个人主义的好处，也包含了它的局限性。互相依赖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就是凭着这一事实，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能得到住房提供。这种意义已经随着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定义而以新的方式获得了发展。但是在这些

意义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那些旧的意义仍然在被不断激活，个人与社会的分离显然并没有中断。在这种持续的张力中，那些作为与成长相关的词语而出现的意义，转而变为拒绝成长的意义。民主和共同体已经屡屡被篡改成陈旧的限制和监管。事实上个人主义自身也并不完善，而蜕变成为自私自利和漠不关心。因为事实上它所拒斥的不仅是“非个人的”社会，而且还是其他个人。如果坚持我们作为赤裸的人的权利，我们要么就只能承认每个人都置身于这种境况中并享有这些权利，要么就是予以否认或是对别人漠不关心，但这又会削弱我们自己所要求的权利的品质。我们可以把其他个人划归“大众”，而我们自己则必须和它脱离开来。我们也可以把其他个人群分为阶级、国家或种族，借此拒绝承认他们的个人身份。有些人会因此而感到满足，觉得自己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而其他人则是大众，是被排斥的群体。但若将此过程扩展开来，我们全都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大众，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使我们自己的个性得到别人的完全承认，每个人都要拒斥别人以建立他自己的个性。这就是现在我们试图在所知道的意义范围内去面对和解释的经验。

5

要突破障碍抵达新的意义，我们需要有一种原则，即有机体与组织之间的基本关系原则。在解释和描述我们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发展出一种自身赖以生活的特殊系统。每个有机体都体现并延续了这么一种组织。其目的在于接收和交流经验，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整及作用，组织自身以及个别的有机体生命就能得到延续。在看似不同的个性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观察、选择、比较、调整的系统，它和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社会系统一样的精密复杂。这种特殊的组织，我们可称之为个人，其存在是以某个更大的组织为条件的，如此它才能在根本上得以延

续。人类的生物进化就是这种更大组织的最清晰的形式。人的基因遗传史是这种组织的结构，这样就为组织自身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提供了路径。关于遗传的经验，以及关于变动中的组织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经验，仍然是最重要的人类感觉。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一个人可以在他的父母或孩子身上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或者换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自己父母或孩子的存在。但遗传也把他交付给了一个更大的群体，由此他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感受到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有机体的遗传制造了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个人，但这样的个人还需要另外一种遗传条件，即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有着特殊的命名与交流、行动与互动的系统，个人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中活下来，长大成人，就必须学习这种系统。个人自己进而会要求组织作出更大的努力，就此而言，人类组织本身以及以某些特定方式将其发扬壮大的社会组织也导致了个人的成长。这种个人既是一个人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但他只有先成为他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社会成员。这真的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人类遗传可以说成是一种特殊的变异。社会遗传变化万端，不同的社会鼓励个人成长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倾向于直接的复制，有的则倾向于多样的可能性。从其实际传承出发，个人将会努力完成其自身的组织。他必然要分离出来，但分离的程度却不等。他不可能彻底地分离出来，因为他正在组织的东西在将来是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别人分享的，而别人为了自己的成长也必须同样这么做。

115

在我们平常的思考中，我们总是专注于两种状态，或者用“个体”与“社会”来表达，或者更加积极地用“个人”与“世界”来表达。为了某些目的，区分这些状态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部分经验相匹配的，但是在其他部分的经验那里，它们同样也会不断地碎裂。我们习惯于用“一般化他者”来思考问题，这个“一般化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或社会，但是在很多种经验中它都会碎裂为个别的。我们可能也会想到“一般化自我”，这种“一般化自我”的个性特

116 征，我们都能意识到，但是在经验中，它还是会碎裂为个别的，并且不断地变化，各自关联着各种能量和形式。我们已经学会考虑某些特定的关系，尤其是我们和家人和亲密朋友的关系。但是有许多别的关系我们是把它们当作介于“一般化自我”和“一般化他者”之间的关系来考虑的，“一般化自我”和“一般化他者”被当作两种固定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过程。而在生活过程中，我们为了了解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却必须不断突破这些固定的状态，进入到在改造着我们而且也是我们希望去改造的实际过程当中。我们与很多特定的组织有着实际的联系，而要了解这些组织，我们就必须确认它们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我们必须先辨别出某个组织，然后才能了解它，但是我们在辨别的时候所划出的界线总是潜在地就是关系的界线。如果我们把个体孤立开来，就会进而把他分成身体、思想和灵魂，感觉、意愿和思维，意识和无意识，自我、超我和本我，而要研究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要研究它与别的范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社会孤立开来，就会进而把它分成群体、阶级、联盟，而研究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就要研究它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物质世界孤立开来，就会进而把它分成物质与能量，以及它们的各种特殊形式，我们会同样发现，研究这些范畴就是研究关系形式。然而有时候我们却会罔顾这种经验，自以为可以指出个人、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实质，就好像它们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关系似的，就好像只有给出了某些信号，只有定义了它们那些似乎本就具有的实质之后，我们才能进而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些实质却是我们永远都不能把它们孤立开来的种种关系的形式，因为组织始终是一些互相关联的项。从经验出发，我们开始认识到关系是内在固有的，每一个组织都恰恰是这些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与其他组织往复应答的以往

117 与现在的历史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组织是一个有机的构造，对任何一个组织要有充分的了解，都必须了解其他的组织。

就个人与社会而言，我们需要学会一些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从其中一方的角度来真正认识另一方，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平常的方

式说我们是在一个连续的过程——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家庭、群体、社会、人——中研究组织的种种形式。并不存在一个现实的点可以使我们打断这个过程，分离出一种独立的实质。我们同样也不能从中选择出任何一点并使其他各点依赖于它。如果说旧的个人主义是人为地分离出了“赤裸的人”，那么新社会学的某些趋向将群体、社会或文化分离开来作为一个绝对的参照点，也同样是很危险的。我们人类组织的连续过程本身是一个与所有非人类相关的连续的行动和调整过程，这种行动和调整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过程，它通过持续不断的变化以及传递变化的努力而得以发展起来。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社会或群体对独一无二的个人的作用，也要考虑许多独一无二的个人通过交流过程创造了组织并在必要的时候扩展了组织，而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个人才能持续地被塑造出来。从社会过程的角度承认我们是人类个体，这固然没错，但也还是要承认这样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某一具体历史中的某种特殊遗传特质。这种独一无二性其关键在于它既是创造性的又是被创造的：从这种特殊的形式中会产生出新的形式，在整个组织中扩展开来，由于独特的个体继承并延续了这种形式，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断地获得更新和改造。这种对个体独特性以及对于其创造力与一般人类模式之间关系的承认，当然是给作为一种统治系统的民主制度提供了永恒的论据基础。任何一种独特性其价值和效果实际上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它只能产生于现实关系系统中，这就为其可传播的程度以及关联程度限定了条件，此外，个人之间在自我实现的成功程度以及描述的能力方面也会存在广泛的差异。但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所有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旧的个人主义最坏的恶果之一就是在假定某些个人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又进而有意或无意地否认其他个人的重要性。当我们超越这种观念而认识到个性化实际上是我们人性发展的一般过程，只有通过个性化和交流我们才能学会怎样去生活时，就必须承认并尊重这个过程的真实规模和复杂性，对于这个过程，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占有一个决定性的理解

位置，更不用说去操纵它了。如果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断学习、创造和交流的存在，那么与他的本性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就只能是一种参与性的民主，在这种社会组织当中，我们所有人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都在进行学习、交流、控制。任何一种更差的限制性的体制都只会浪费我们的真实资源，削弱个人，将个人排除在有效的参与之外，这正在破坏我们的真实的共同过程。

当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往前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长期冲突自身就会消解，变成一种表述上的困难，即如何来表述有机体与组织的这种互相关联的过程，对个人和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说法，而是描述一个将两者都包含其中的连续过程的方式。将“个人”和“社会”抽象化的最大恶果是它使我们的思考被限制在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说这一个人是好的，因为他按照其所在社会所肯定的方式生活；这个社会是好的，因为它允许个人去做这些事。然而一个个人在顺从其所在社会的规范的时候，也可能抑制了某种可以成为普遍价值的变体；或者一个社会准许了某些变体，就可能摧毁自身或是其他社会，或是部分地摧毁其环境。如果我们承认在构成整个生活过程的多种组织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这些现实问题就能获得充分的审视。抽象

119 出某些固定的状态，由此出发展开论辩，这是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通常采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完全是不恰当的。新的观念也许会带来困难，但似乎绝对有必要去努力阐明它，这样才有可能从中学到一些适当的新方法。说得实在一点，我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在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对模式和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已经把这种方法定义为文化分析。在创造、传播和建立制度的实践中存在着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

注释：

- [1] 多恩在《第一个周年纪念日》(*First Anniversarie*)中的这几句诗可拿来作比较：
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会是
涅槃的凤凰，那时没有人
能跟他相比，只有他自己。

社会的形象

我们对社会的思考是在抽象化和实际关系之间进行的一场漫长论辩。社会的实体就是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活生生的组织，它在许多方面被物质化了，又以许多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关于社会或关于某个特定社会的抽象观念既是稳固持续的，又受制于社会的变化。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些阐释，是描述组织以及所设想的种种关系的方式，它们对于建立社会生活现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受到来自经验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在某些时期，这些阐释与经验是相符的，以致不会产生这个层面上的争端，描述和概念根基稳固，得到公认。在别的时期，则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某个特定的描述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存有争议；或者某个描述虽然是准确的，但遭到了另一种关系观念的挑战，以致社会的全部现状和未来都遭到质疑，通常还伴随着分化和论战。我们已经看到关于社会的观念本身是如何在这种充满紧张和变化的时期里生长和发展的。首先是从直接的“伙伴社会”变为更一般的“共同生活系统”，后来又从指涉某个特殊系统变为把所有系统抽象化，即“社会”的一般状态。这个过程既有得也有失，一方面我们需要范围广泛、灵活多变的概念性思考，抽象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思考要有相关性，我们还需要来自现实关系的持续压力，需要一种能够赋予描述过程以实质内容的实际共同生活。我建议要考察社会的某些更普通的形象——这些形象在

121

的影响，并看看它们在社会变化的实际过程中所拥有的重要意义。

1

任何描述的关键都在于其出发点，即作为决定性因素而抓住的特殊经验。一般来说，在我们思考一个社会时，都是从这个地方的这些人开始，但很少始终保持这种朴素的方式。特定的环境有着特定的人类组织，但我们通常是根据某些引导性的因素来描述和阐释它们，我们把这些因素看作其组织原则。困难在于这种因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辨认方式。举例来说，有很多常见的社会思想实际上是以君主为思考起点的。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民，而是这个地方的君主及其臣民，才是其起点。这种对君主的强调通常被迅速地、无意识地接受下来，继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详细的描述：地方和人民的自然性质，政府体制和财产制度，生产组织和贸易组织，关于制度和风俗的报告。但是这种强调渲染了描述。我们不只是在描述组织，而且也还假定了其目的。在所有类型的研究中，我们都一再看到这种实在的倾向。这种组织不仅被看作有效的系统，而且维护这个系统也被看作是支配性的社会目的。你以君主或是现存的社会秩序为起点，那么所发生的一切就都与此相关。因此在宫廷中、在军队里或是在战场上服务就是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而在这些功能之外的生活是根据这些目的来设计和调控的。对法律和制度的考虑也是从使这个系统运作得更加完美的角度出发的，这种有意义的形象就是单独有机体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充当角色”。

当然，确实有许多实际存在的社会可以从这些角度获得准确的描述。122 “这个地方的这些人”这种朴素的思考遭到抛弃并不意外，而是因为事实是人们的生活是遭到很不相同的对待的：实际上，它们是透过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的需要来看待的。大多数封建的和贵族的社会观就是由这种基本的阐释所决定的，有意思的是，认为社会不只是一种特殊

系统的想法，是在这样的社会遭到有力的挑战的时候才出现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思考社会的种种方式——只有在系统的绝对性得到维护的时候它们才是合理的——竟然带着这种力量延续下来并进入到显然不同的社会里。在英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显然满足于把自己说成是“英国国民”，而换一种方式说，他们显然不是也不应该是“英国国民”。法律和实际的社会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女王之臣民的权利及义务”相关的，就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跟“人权”完全不同的说法似的。这部分地可以说是口头习惯的延续，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延续。英国社会的意义和目的集聚于国王和女王一身，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许多世纪，但这并不妨碍许多后继的社会秩序装出一种仿佛如此的假象。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弹性的人类组织，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阐释是上述那种迥然不同的思想所反对并加以限制的，而接连妥协的结果是导致了根本性的混乱：举例来说，像“臣民的自由权利”就是一个误导性的表述，在这个表述里，“自由权利”并不意味着自由（尽管出于修辞的目的而涂上了这层色彩），而只是一个被允许的区域，处于某个不容质疑的责任的边缘地带。就像个人实际上是屈从于被规定的社会秩序的需要，他们生活其中的地方也经历了一种相似的转变。思考我们生活其中的地方以及我们自己跟它的关系，和对于“英国”或“英格兰”的思考，这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在后一种思考中并没有真实的地方，而只有一些特殊的阐述，包括了对责任、作用和性格所做的种种界定。“英国”和“英格兰”因受不断变化的影响已相继变成了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一事实却被一种和“女王之臣民的权利及义务”相似的描述模式给弄模糊了，它暗示着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永恒的，而不是相对的、变化着的。“为英国”或“为英格兰”做事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为呆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我们自己做事情，但这种抽象化的表达却有一种魔力，就好像为“不列颠”做事情比为我们自己做事情更光荣似的。

123

因此，民族国家以不同的巧妙方式强有力地延续了那种关于社会的思考方式，它从既存的秩序出发并使现实个人的需要服从于这种秩序。

在某些方面，这种界定是有意义的：真实的需要（比如对安全的需要）有时候是与从界定中引出的需要相一致的。但它们从来都不必然要一致，超出农奴自身需要的部分必然包括了对其领主的供养。任何真正的共同利益都必须包括我们自身的利益，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抽象的社会秩序出发，就会被说服走上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大多数人造成损害的歧路。社会秩序是不是真的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真实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思想被那一假定——即我们必须从社会秩序出发——所主宰的时候，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发起的最有力的初期性挑战，首先是为争取从事那些为既定秩序所禁止或管制的活动的权利而发起的挑战，其次是以普遍人权的名义而发起的挑战。前一种挑战的结果意义重大，由此开始，在英国才慢慢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民主生长的过程，但事实可能是：在英国，民主从来就没有树立起一种真正深入人心的、截然不同的社会的形象。就因为它大体上生长缓慢，而且经过了渐进的宪法修正和妥协，因此总是很难把民主原则从对某种法制的习惯性忠诚中分离出来。在英国人的头脑中，民主的象征既可能是一些权力机构的古老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宫，也有诸如委员会或陪审团这样的富有活力的大众决策程序。一个更具有决定性的社会的形象来自于这一运动的其他部分，即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在这里，社会不再被当作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你会记得，它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市场。那当然（在形象上）是一个自由市场，包含了与严格的习惯法令不合的激进反对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始终是与伴随着它的那种民主精神重叠的。但最重要的结果最终是整个组织中的一种新因素被挑出来放在了核心的位置。现在你不再以君主或既有的社会秩序为起点，而是以生产和贸易活动为起点，它们很快又被看作社会的根本目的，其他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它们来评估。所有人类组织形式——从家庭和共同体到教育体制——都必须基于对这种支配性经济活动的考虑而加以重新塑造。与此同时，由于首先强调的是个人的自

由的经济活动，关于社会目的的整个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的目的是要维护既有的秩序，因此其规定条款是肯定性的，而新目的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是否定性的，社会的存在是为了给个人创造条件，使他们在经济方面自由进取的精神不至于受到妨碍。社会提供了一个市场，并保护其自由。但这个形象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其法团阶段，社会便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市场：社会自身的组织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组织。从既有秩序出发，关于个人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由“我的社会地位及其义务”所构成的，而在市场社会里，关于个人的观念首先是他是一个负责的自由行动者，其次他是一个有东西可以出售的人。义务和服务遭到了自由和职责的挑战，但这样一来，在最终的形象中，买卖便成了可以评估一切人类活动的条件。在20世纪，人们可以谈论如何“出售”自己（这种交易与罪恶有着古老的联系），谈论他们的“橱窗”，谈论“市场研究”和“市场需求”，而不会有任何名誉上的损失，即使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任何普通意义上都称不上是商业性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

125

我把社会的这些形象抽离出来，试图去阐明它们，而在我们的实际历史中它们当然是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在现代英国，市场的形象有多么强大，是毋庸强调的，我们经常谈起国家，就好像它是一家大公司，其他的国家则是竞争的对手。我们把工作当作“劳动力市场”来谈论，并主要从满足“经济”需要的角度来讨论教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那种从“女王”或是从抽象的“英格兰”出发的思考方式仍然被延续下来。在这个方向上运作的最有力的模式之一当然是现代军队，它通过征召制度将自身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意义层面。它对等级、团队精神以及单一目标的强调已经有力地将一种对关系的思考方式教授给后代，其影响之深入也许超乎我们的想象。只要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世纪，有多少个人经历了这种模式，而且通常是在情感强烈的阶段，对这种影响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社会组织——它们

有着极一般、极普通的社会目的(即便如和平主义、改革或是教育自由等目的)——说是要“招募”成员,招募他们的“列兵”。让我不断感到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中产阶级人士把他们平常的度假说成是“离开”。市场社会早期阶段的自由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和既有秩序的一种古怪融合破坏殆尽。在典型的现代工业或商业组织中,看不到处于实际关系中的人,而在一个平常的政府或地方性的权威机构中,则免不了要看到这么一种古怪的形象:中世纪宫廷(官员们围绕着一张委员会的桌子按等级就位)与现代军队的组成因素(特别是说话的语调和挺直的身躯)混在了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古怪地出现在社会中,而这个社会宣称——当然是在公开场合——这在本质上是体现了对于绝对秩序的观念所发起的第二种主要挑战:不是以今天的自由市场的名义,而是以人权的名义。在某个特定阶段,通过有组织的市场变为绝对秩序这一意想不到的过程,市场和绝对秩序实际上是可以融合的。但我们也许会认为,以人权为基础的形象是不容妥协的。困难当然在于,虽然“人”听起来绝对充分,但对权利的解释却通常是有选择性的,在某个层面上这一准则的确离主体的自由并不遥远。人权的实际内容有很多是从贸易同盟的协定中抽取出来的:市民社会必须保护人们反对某些种类的专制主义,确保他们从事某些活动的自由。因此这种观念常常是限制性的、否定性的,人们得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使用它,但同时却并不承认它也适用于另外一些人——如穷人、未受教育者、外国人以及其他肤色的人。它和民主的形象有些相似,对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朋友,它是绝对无条件的,而对其他人却是相对有条件的。根本的困难可能在于这种观念有一部分是因袭的,有一部分则是出于抽象:它试图把关于主体自由的必然是限制性的观念和关于人类兄弟友爱的必然是普遍性的观念结合起来。实际存在的各种组织以它们自己的语词不断滋养着源于既有秩序的观念和源于市场的观念,相反人权观念中的革命性因素既是从惯例和实践中学到的,也是在绝望和渴望中学到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

较早时期的一些抽象形象反映了——虽然是在超验的意义上——它们的现实对等物。所以“上帝之城”是从教会和国家的实际组织获得了实质性内容，但它并不只是将世俗权力合理化(统治者是由上帝指定的)，它还通过设定限制性的条件超越了世俗权力。在这样一种形象中，社会的最高目的是要以上帝的方式来生活：通过某种既有秩序的世俗的、精神的权威，但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超越它，生活于“天国”之中。人类兄弟友爱观念——它承诺了人的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来源于此，被表述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尽管有此参照，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对某些绝对关系的假定，这些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责任。只有当人类的兄弟友爱首先从人的角度来予以界定，人权的观念才能具有普遍适当性。这样它就获得了近似于“这个地方的这些人”这种表述那样的朴素性，而不带有关于某种秩序的暗中具有决定性的规定，对这种秩序，人们必须保持永久的忠诚。同时它还不能是地方性的、特殊的(“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个世界”，或者最好是“这些地方”)：概念的灵活性和丰富性实际上是由其无法避免的抽象的程度来达到平衡的。

人类兄弟友爱的形象在劳工运动以及通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得到了最清晰有力的表现。在实际的历史中，兄弟友爱当然通常是有限的：在工会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中，它得到了确认并被创造出来，但在某种现实环境中，这些制度常常为了某些东西而变成了反对某些事物(包括别的人)的“兄弟会”。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观——而不是一系列保护性的运动——来超越这种局限性，而社会主义就是界定这样一种秩序的重要尝试。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所提出的是一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其目的在于解放，它以所有人的需要为起点，以现实平等为基础，而不是以跟地位或是借由市场的自由运作而建立起来的等级相应的等级化需要为起点；而在实践中，在某些决定性的意义上，它也必然要提出某些类型的关系和责任。此外，它还是一种必须通过对现有的真实关系的克服或是超越才能建立起来的一种秩

序，不可否认，虽然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的长远想象是兄弟般互相友爱，但其短期想象则充满了深刻的冲突。社会主义对人类关系的想象是由这些条件以多种方式塑造而成的。它对社会阶级的描述既是对现存社会的分析又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指引。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对阶级的强调已经明显地拒绝了兄弟友爱，对现存的或记忆中的阶级境况的愤恨也已经大体转移到那些仍在谈论阶级的人头上。与此同时，在为一种新秩序而奋斗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以及人们致力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已经提供了关于实践结果的大量证据，这些结果包含了一个真实的理论难题：对某种正确秩序——它被设想为具有普遍解放的意义，但仍然还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的允诺通常包括了冲突、限制甚至压抑。人类兄弟友爱的形象还在那里，但也就只是在那里而已，人们试图从以别的方式有力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创造出这种兄弟友爱的形象，但这种真实的努力过程却反而使其变得黯淡无光，以至于这一形象在根本上被弄模糊了。

我们的实际历史——与之相伴的有对依据某种绝对秩序来思考的执著、自由市场向市场法则的微妙转变以及紊乱的兄弟友爱观念——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个人的反抗，即现代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早期形式首先是主张个人拥有做某些事情、说某些事情的权利——社会被判定要保护这种积极自由的行使，并据此加以重新改造。现代个人主义部分地延续了这一倾向，但总体上更偏向于强调一种消极的自由：个人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在社会思想上出现了一种广泛的倒退，这种倒退被下面这个公式给合理化了：善行几乎皆是个人所为，恶行几乎皆是社会所为。这样一来，社会的形象就先天地带有了一些坏的东西：它是一个限制、干涉的冷漠的过程，不管它怎么声称已经建立的秩序是如何合乎美德，或者是在创建人类的兄弟友爱。在这种个人的反抗中，不管社会说它们在做什么，都没有人会上当受骗；而无论社会做什么，个人都可能会受到损害，他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将社会的压力降低到最小：赖以实现的途径是脱离社会，采取冷漠和怀疑的态度，认为至少要让他

和他的家人顺顺当当的。应该承认这种反抗力量很大且有着情感内容，但也需要指出其后果是极具危害性的。这种社会观只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以流行，即社会遭遇了重大的失败，而重申那些已惯常与令人痛恨的压力和失败相伴的观念（义务、责任、兄弟友爱），丝毫无助于击败这种社会观念。这种经验是活生生的，必须被表达出来。但是放弃对社会进行思考却只能使糟糕的社会毫无改观。人们的确普遍认为事情是不会有有多大改变的，根本性的改变是不可信的，或者说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坏，而个人如果转而回到自身，回到“实在的”利益，那就能安稳度日甚至还会感到幸福。

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思考方式对最近形成的关于大众的社会观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观念，它以一种新的方式部分地、简单地重复了那种绝对秩序观：大多数人都是那种所谓的“大众”，他们被某个精英人物或精英群体组织起来，接受他们的统治和教导，还要给他们取乐。这样一个社会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套**既定的**秩序，因为精英有时候多半是世袭的，但精英也会通过竞争或是政治隶属关系而不断地被重新挑选出来。然而，不管精英是如何组成的，他们与“大众”的实际关系却可以界定为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这与在其他类型的绝对秩序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大众社会的观念也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申了市场的观念。“大众”对社会方向产生影响不是通过参与，而是通过表达某种模式的需要和偏好——这是一种新型市场的法则——而对精英们来说，这就成了一个起点：仔细研究大众的需要和偏好（通过诸如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之类的技术手段），然后再去设法说服他们。当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它们就组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形象，这个形象显然是与我们在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里获得的生活经验当中的某些重要因素相符合的，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但其基础却是某种模式的需要；大众传播的高效率技术的集中化控制，但其基础仍然是某种模式的偏好。一方面是公众享有范围广泛的参考信息，另一方面实际的权力却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区域，这两者的结合的确形成了一种意义

重大的模式，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它在本质上却是非人格化的。精英们当然不会关心具体的个人，但他们关心人的各种均质化形象，关心大众模式的一般化趋向。这种技术使精英们的作用变得合法化，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种思考社会的习惯方式。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人活于其间，活着的只有阶级、消费者和各种惯例。如果这就是精英们实用的思考方式，那么它也得到了反对它的一些因素的有力支援。个人反抗肯定了个性在这个非个人的抽象世界中的意义，但这种肯定也是社会思想上的一种后退：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朋友才是真实的，剩下的就是体制了。这种看法一旦充分扩展开来，也就证实了精英们的评价：其他人都不过是碌碌大众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它否认并限制了真实的关系，因而助长了人们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把自己看作大众。个人反抗这个词常常包含有对他人的轻视：乌合之众、群氓、愚昧的大众等等，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这种思想结构的因素之一。当“我与乌合之众”成了唯一的现实，而除此之外的真空地带完全被对“非个人的”体制的接受所填满的时候，也就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现代社会里，浪漫主义式的个人主义、专制主义和抽象的社会思想这三者往往是最终关联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绝望最终是将权力合理化了。不管怎样，由于个人主义总是不会走得太远，“社会”和“个人”、“公”与“私”之间的实际区分通常会得到强化。

131 社会的最后形象——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形象——就是将社会与人分割开来的那个形象。

2

我们继承得来的关于社会的种种支配性形象——绝对的秩序，有组织的市场，精英与大众，甚至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兄弟友爱——在这点上都是相似的：它们都倾向于把社会简化为两个利益领

域，两种思想，两种社会关系形式，即政治的(决策系统)和经济的(维持系统)。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以这种方式思考，通过这些与其权力息息相关的范畴来看生活的其他部分，是很自然的。但对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来说，以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的方式来看社会，就不那么自然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最有变革力量的群体也会受到这种思考方式的束缚。此外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会这样问。说到政治和经济，也就是在说社会，其余的就都是私事或小事了。

把社会局限在它的决策系统和维持系统内，实际上是很荒谬的。我们必须学会把它看作是对阶级社会的各种形式的有条件的反映，在其中社会的真实性质——一种满足共同需要的人类组织——实际上是被对权力和财产的兴趣(对于统治集团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滤除了。社会主义在反抗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常常使自己受到对手所使用的术语的限制：提议建立某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秩序，而不是某种与人相关的秩序。把权力和财产方面的事实看作是实现这种秩序的障碍，这固然必要，但是所提议的另一种社会必须是在范围更广的术语中构想出来的，这样才能为其实现提供所必需的充足能量。事实上，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可能会到来，而与人相关的秩序却鲜有改变，除非是能够建立起这些联结。有一个很好的具体例子可用来说明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一直有讨论但是又遭到了忽视。我们所理解的工作的普通意义是“能得到金钱报酬的活儿”：可与之相比的活儿——不管是“私人性的”或“公共性”的——也许所付出的跟工作一样多，但它们通常被说成是“业余活动”，或者是古怪地被说成是“做好事”。工作和干活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从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但是某个特定社会的种种形式却把这种关系给弄模糊了，并区分出两种工作：一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或为某些“义务性的社会目的”而承担的工作，另一种是为了钱而承担的工作。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直接反映了一个在工资劳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而这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对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表

述的挑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思想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知道该怎么看那些与生产和物品交换无关的活动。我们会倾向于往后退，或是退回到对于“服务”的陈旧定义那里——对某种既定秩序进行思考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批准了这一定义，或是退回到关于“休闲”的奇怪观念那里——“休闲”被认为是一种吃饱饭后的体面活动。这些意义也许能真实地判定当下的经验：即与共同体相关的私人的利益及服务必须作为一个不同的范畴，与我们的日常工作分开来。但社会主义者很难把它当作一个模式来接受。工作和生活的整合，将我们所说的文化活动纳入日常性的社会组织，这些都是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形式的基本要项。在他们看来，决策系统变成了某种比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更大的东西：比如说，它必然要包括对我们劳动的取向及性质进行控制。同样地，正因为所有人及其工作都成了共同的社会决策过程（是工作的共同体而非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所以实际利益的主要部分——包括“私人的”和“公共的”以及“休闲”和“工作”在内——便成了社会谋求的目标。我在《文化与社会》里所描述的那个传统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把对于社会的思考建立在我们的“普遍人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已被接受的系统的需要之上。但这也表明旧的思考方式有多么顽固，因为它被解释成了所谓的“为艺术恳求一块地盘”（有人以为我们会为了艺术或教育而“呼吁”，好像有人会永远屈膝相求似的）。真正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于社会的思考必须从对人的相同假定出发，根据社会中所有人的一般需要来评判工作、政治和财产，而不是简单地认可某个特殊系统并接受它的种种定义，这一要求可以从这样一种看法那里得到支持：艺术要么是和我们的普遍人性有着崇高而必然的联系，要么就是和一切都没有关系。如果社会主义承认“工作”和“生活”——然后它必然要被当作“休闲”和“私人利益”而一笔勾销——是有区别的，如果它把政治看作是“政府治理”而不是共同决策和共同管理的过程，如果它仍然把教育看作是某个系统而进行的培训、把艺术看作是吃饱饭后的体面活动（虽然它可能要求有更多的训练

以及更长久的魅力),如果它在这些方面受到限制,那么它就只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一种晚期形式,或者就只是以某种工业生产体系为中心的对于人的更加有效的组织方式而已。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衰败是与它跟旧的社会形象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密切相关的,也与它未能提供并阐明另外一种替代性的人类秩序的意义有关。

社会中的人传统上被定义为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些社会关系是以某种神圣的秩序、某种已被接受的秩序或是某种已建立的秩序为基础的。这个定义首先是被市场理论家后来又被像马克思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发展了,人所置身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建立在经济活动基础上的: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秩序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这样定义虽然要好一些,但仍然遗漏了很多东西。把决策系统(政治)和维持系统(经济)^[1]联系起来,这是合理的,但还是有两大类关系被排除在外了。首先是学习和传播的系统,对人来说它和决策系统及维持系统同样重要;其次是基于生命养育之上的种种复杂关系,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变化,也是在特定的系统中表现出来的。由于这些重要的系统通常不被纳入关于社会的思考当中,或是仅仅将它们放在了次要的地位,这就免不了需要发展出各种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解释它们。大多数的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社会训练(政治的一个附属分支)和职业训练(经济的一个附属分支)。但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学习和传播的重要作用不能被如此简化:艺术、哲学和科学都不仅仅服务于这些目的,它们也为人性的全面发展服务。在阶级社会里,这个问题却被有意回避了,这些活动被描述成“人文的”(liberal),是“自由人”(free men)的领域,而“自由人”就是那种就其地位而言是摆脱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命令的闲散自在的人。与此相似,教育(最正规的学习和传播系统)对“自由人”来说是所谓的“人文教育”,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另一种东西,即社会训练和经济训练(分别以性格塑造或道德指导以及职业训练或技术指导为人所知)。这种区分远非什么关于学习和传播的有用的社会思想:理想化和贬低都会酿成错误。艺术于是被贬低为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过程的一

种反映，被认为是寄生于其上的；或者是被理想化为一个独立的美学领域——不是经济人便是审美人。但是人身上的创造性因子既是其人格也是其社会的根源，它不能被封闭在艺术中，也不能被排除出决策系统和维持系统。要把人的创造性考虑在内，就必须从根本上修正已经被人们接受的关于社会的思考的全部基础，包括它怎么看置身于社会中的人。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从社会理论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的发展过程。既有的决策系统和维持系统并不把人类的养育看作是原始行为，而认为这是一个系统自身赖以不断获得补充的过程。囿于这种思考方式，人们就把自己非人化了，以至于会把孩子说成是“国家未来的原料”，当你把它和那套关于“劳动力市场”（现在甚至连教育家们也这么说）的说法并列在一起，家庭的整体地位——当然也包括别人的家庭在内——就降低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公众层面上，大多数人心

135 里都很明白，他们不会改变自己平时的看法，还是会相信家庭生活是自己最重要、最真实的生活。人们不需要靠新心理学来告诉自己：他们作为父母和儿女、兄弟和姐妹、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经验对于自身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因为强调人处在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将这种经验排除在关于社会的思考之外，那么这对社会思考来说就非常有害，那样就把家庭和私人生活从社会生活当中简单地抽离开来了。但很显然家庭——其形态在不断变化——是不能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不管它被降格为补充和训练的工具，还是被理想化了，家庭关系总是真实存在的。新心理学已经揭示了在家庭基本关系中习得的感觉模式和行为模式，与更广泛的社会感觉及行为的各种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所谓理想化，就是认为所有社会行为——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形式——都可以用这些基本关系来解释，这种错误类似于从艺术和哲学显然具有的创造性出发，从形式史和观念史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两种观点包含有部分真理，所以会对一些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轻率的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各种基本关系形式抽象化，却不考虑它们明显具有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变数，这既是最轻率的推

衍，但同时也为某种更加充分的解释提供了线索。没有什么形式是可以“永久不变”的，这样各种变化的形式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确实再也不能以旧的、有局限性的政治-经济的方式来看社会关系了。

从目前这种利益和训练彼此纠结的状态，我们应该努力去重新创造一种关于人类一般组织的充分意义。只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是过于狭隘的，摆脱这种思考方式显然可以走得更远。决策系统当然很重要，它的确可以说关乎一个社会的生与死。经济活动同样是根本性的，因为生产和分配不仅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而且它们灵活多变的组织方式也为我们的整个存在增添了色彩，在有些情况下似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一个社会的真相，似乎要在决策系统、传播与学习系统、维持系统和生育与养育系统之间的实际关系中去发现，而这些关系总是异常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寻找某些能够始终不变地决定这些关系的结构的绝对程式。真正要紧的是，这种程式首先要在那些从来就无法真正分开的系统之间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其次它要展现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的历史可变性，从而展现它们在其中运作和存活的各种真实组织的历史可变性。在某些社会中，家庭也是一个直接的经济组织，其决策系统覆盖了一个广阔的活动领域。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既复杂但又相当一致，每个人都跟别人在不止一种活动中发生关系：发生的这些关系，不管是同情、紧张或是冲突，必须遍及整个领域。在不同的社会里，各种关系同样也会最终遍及整个领域，但日常境况——也因而包括日常经验在内——是各种明显不同的关系的聚集：这儿是工作关系的聚集，那儿是家庭关系的聚集，或是决策和学习关系的聚集。正是这种社会的发展导致出现了我们已习以为常的描述和分隔，而在任何现实社会里，如果我们真的能直面经验，那么上述的描述和分隔就会被不断打破：毕竟没人能够或是真的会按照分隔的秩序所要求的那种模式去生活。我们所拥有的当代经验——工作、恋爱、思想、艺术、学习、决策和玩耍等方面的经验——比史上任何一

个社会都要更加零碎化，但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些经验联结起来，实现整合并加以控制，这样我们才能部分地获得成功。

137 在我们对于这些社会描述所作的分析中，所强调的还是这么一个事实，即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它们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心理学从来都是有許多规则构成的系统，这些规则是在曾经是活生生的环境中习得的，就好像永存不变似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同样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试图去探索新的境况，达成某种理解，而这种理解同时也是一种回应，一种控制和改变的方式。在研究人类组织的时候，我们不仅强调了它们的相关性，而且也强调了它们的可变性，这样就必然要把我们引向了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变化的性质和源泉是什么？

3

决策系统、维持系统、学习和生育系统都必定是常规性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些深藏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的规则。它们也经常被物质化，我们把它们当作制度继承下来，也就是继承了一个在塑造着我们同时也在被我们改变的现实环境。我们靠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认知这个环境，同时又被传授了种种常规惯例。拿环境跟常规惯例相比较，就会发现总是存在着一种现实的张力，这种比较既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发生在社会层面上。不同的个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通过传播和比较，他们可以为建立不同的常规惯例而努力，我们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改变了我们的环境，但不管怎样，由于当下环境与已被接受的常规惯例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因此便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怎么被意识到的变化过程。

在这个理论背景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某些实际发生的变化类型。我们的大部分历史其变化都是由征服引起的，当某个外来群体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控决策系统或是其核心部分时，就会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屡

屡发生，自然就会引导人们单独把政治当作变化的主因，并把决策系统说成是权力系统。但不管怎样，征服显然会引出各种不同的后果。征服者所建立的决策系统在实践中必然要与被征服社会的所有异质性因素进行互动。经济状况会因为外来者的决策而彻底发生变化。整个学习和传播系统也会发生这种变化，甚至会达到这种程度：原来的语言被禁止、被遗忘，被外来的语言所取代。但往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征服者的宽容，或者是因为无视征服者的排斥，被征服社会的一些要素被延续下来，即使征服的时间会持续很长。尽管整个决策系统已经被他人掌控，但实际上仍会出现一种表现了整个社会性质的现实关系结构。因为不管决策系统有多么强大，它都必须在一个物质性、常规性的现实环境中运作。征服者可能会和被征服者一起发生变化，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变得跟被征服者难分彼此。而更常见的是会出现一种不断变动的平衡。以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为例，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改变英格兰社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这在语言的演变历史中可以看得最清楚，最后形成的语言既不是诺曼底法语也不是古英语，而是一种深受两种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由此可见，虽然政治变化常常是决定性的，但它永远都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

138

征服是从一种现实关系结构中生长出来的，这种关系结构往往规模庞大，以至于它和被征服社会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显得极其的迂回。这就是它与社会内部的某个群体或阶级夺取决策系统的别的相似方式的差异所在。不管其发生是否很突然、很有戏剧性（就像在内战当中和革命当中），还是一个渗透和改变控制方式的缓慢过程，它在现实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通常都会产生更多的意义：政治的变化可以表现出总体变化的全部复杂性。经济学对征服和内部政治变化的解释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使我们超越了那种认为权力本身即是统治目的的庸俗政治学，而且也给我们指出了决策系统不是抽象的，而是被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形塑的。反过来说，单独把经济活动当作变化的主因，也会陷于简单化和抽象化。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性质缺

139

乏了解，的确不可能了解现代世界，但是也得承认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处于可以相互比较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最精密的政治经济分析，也无法解释清楚这些差异。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种危险，即把这些差异的具体内容抽象化，就像我们在许多文化理论中所看到的那种奇谈怪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系统，社会生活（它是社会学所要研究的日常素材）却是不直接关涉政治与经济的整个活动领域和关系领域。指导人们全部生活的那个意义和价值的模式在短期内可以看作是独立自主的，在其自身范围内不断演进，但是把这种模式从政治的和经济的系统中抽离出来，这归根到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政治的和经济的系统其影响可以延伸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感觉和行为的地带。单独把学习和传播的系统当作变化的主因，也是不切实际的。把教育看作是变化的主因，这种常见的看法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总是要受到实际存在的决策系统和维持系统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取决于这些系统。思想家和艺术家在表达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昭示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单独把他们当中最卓越的创造者当作变化的主因，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这跟某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决定论忽视他们的作用没什么两样。思想家和艺术家以及教育的扩大显然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但只是传播所必须具备的环境方面的影响。人们常常用艺术和思想（通常会极大地扭曲原作）来确认他们自己的模式，其频繁程度至少不亚于他们对它们的学习。在学校就读的孩子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来自课堂，也来自他们的整个社会环境，更不用说这一事实了，即当他们离开学校以后，他们必须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和他们所在社会的具体实践作比较。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这么一个观点，即基本关系——特别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会产生看得见的社会作用，也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变化——比如爱以及爱的能力的培养——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即刻赞同这个观点，即我们最深厚的人性大多是从这些关系中习得的，但是怎么才能把从亲密关系中习得的反

应和价值转变为运行着的社会系统内部的常规化的反应和价值，这方面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我们再次回到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组织，但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返回——组织既存在着，又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它既非系统所能支配也非学问所能改变；改变它的是人，而人也同时被它所改变。

回顾以往，可以发现我们对社会变化性质的种种看法，受到了现实社会以及它们对于各种关系的相应看法的限制，所以强调的自然是在权力和财产的变化，其常见的形式就是征服、革命或是阶级的兴衰。与之相对立的想法则强调个人以及学习和传播的重要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反应，它所回应的不仅是那种将社会理解成权力和财产的狭隘观念，也还有实际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确实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而且还在发展出一些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更有力的学习和传播工具。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正在努力超越上述两种各有偏重的看法，形成一种新的、全面的社会变化观。我们的创造力在延续不断的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仅证明我们有能力去改造世界，而且也催生了更开放的感觉和更真实的改变世界的意愿，而这些都是之前的社会变化观所无法预料的。同样，民主革命也有着持久的创造力，它呼吁我们所有人去获得自主生活的权力。传播的扩大，以及我们随而经历的文化的扩张，使我们愈益分明地看到了一种新的变化。本地语作为新的学习手段的兴起，印刷术的出现，然后是无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的出现，铁路、公路和航空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全民教育体制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社会变化本身的形态。然而，这些手段究竟是为创造性的发展所用，还是只是一些用来组织旧的人类系统的新方式，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有站在民主进程的角度，才能完整地理解工业革命和传播的革命，而民主进程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简单的政治变革，必须彻底坚持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构想，不同个人之间可以自由合作，只有这样，工作技能和传播方面的变化所蕴含的创造潜力才能得到释放。漫长的革命——如今它已位居我们历史的核心——不

141

是为了仅仅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的民主，不是为了对更多的产品实行公平的分配，也不是为了有权使用学习和传播工具的普遍权利。这些变化本身就非常艰难，它们最终从关于人与社会的新的构想中汲取了意义、确定了方向。已经有很多人作出了努力，来描述和阐释这些新的构想，它们也许只能得之于经验。关于创造力和发展的种种隐喻试图将它们付诸实践，但现在压力必定是冲着细节而来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得到证实，除此别无他途。

关于英国工业的兴起和民主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和连续的记述。但关于我们的正处于扩展中的文化，却还没有充分的历史记述：这个过程的某些部分已经被记录下来，但它们常常被塞进关于变化的种种说法之中，在我看来，这些说法似乎都有意或无意地建立在某些偏见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偏见则是当代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在下一个部分，我将检讨文化扩展的某些重要因素：一部分是要尽可能地秉笔直录，一部分是要把卷入历史的种种价值问题带到各种约定得以公开的地步。我也不认为这种文化史只限于一个部门，或只是一个特殊的变化领域。在这个富有创造性的领域，必然会涉及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冲突。这至少是我的起点：在这里，学习和传播都是实际存在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社会的各种形态。我们可以试着把通过这种方式所看到的东​​西运用于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试着说出自己是怎么看待发展和变化的，也许这些新的看待方式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我们已经接受的关于社会的思考。

注释：

[1] 我把经济描述为维持系统，这种说法遭到了批评，这可能是让人联想到了为某种机器服务的狭隘意义。但这个词来自于“维持生活”的说法，当然是在一个可以调整的多变环境中，对经济活动的这种描述，以及与之相应的种种标准，我建议保留下来，以与其他的描述相对照，因为我希望我的整个论述能够借此阐明。

第二部分

教育与英国社会

文化的品质与其教育体制的品质有着清晰易见的联系。如今我们老是说，改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改良并扩展我们的国民教育，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对的。然而，有时候我们说起教育，就好像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抽象的存在，一套稳定的教和学的体系，它给我们带来的唯一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这个群体或是那个群体受教育的人数有多少。组织教育方面的事务——创建各类教育机构，确定课程的时间长度，商定入学和就学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若是办起这些事情来，就好像是在分配某种简单的产品，那就完全搞错了。教育的组织方式可以看作是有意或无意地表现了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更广泛的组织方式，所以那些被当作简单的分配来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社会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积极的塑造活动。不仅如此，教育的内容——它受巨大历史变化的支配——同样也是有意或无意地表达了文化中的某些基本因素，被看作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选择，一整套特定的强化和省略。更加细致地考察对于教育内容所作的这种选择，就能进而看到它是影响教育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内容的选择包含着文化的选择，而文化的选择与包含在实际组织活动中的社会的选择，有着某种有机的联系。我们若要充分地讨论教育的问题，就必须从历史的和分析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有机联系，因为意识到某种已经作出的选择，也就会意识到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其他选择，而在一个承受着各种压力、必将发生变化的时代，能在什

么程度上保持这种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教育的目的看作是一些抽象的定义，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如果我们看一下实际存在的教育体制，就能区分出三个一般性目的，然而其性质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个主要的一般性目的，即按照某种“社会性格”或“文化模式”来培养某个群体的成员，这种“社会性格”或“文化模式”在这个群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或者是这一群体赖以生存的。一旦这种“社会性格”被普遍接受，以此为目的的教育通常就不会被认为可能只是众多培养方式中的一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培养，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当“社会性格”处于变化之中，或是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存在着其他“社会性格”时，这种“自然的培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其他人可能会视之为“灌输”。有些作家把这种社会培养与特殊技能的传授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普遍的氛围或背景，后者则是特殊化的指导。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社会性格都从来不只是某些特殊的礼仪习惯和行为习惯，它还传输了一套特殊的价值系统，涉及对群体的忠诚、权威、正义和生活目的等方面。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教育体制是不包含这种培养在内的，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培养与特殊技能的培养最终是无法分开的。教授技能是在培训一代新人，以便他们能够胜任各种成年人的工作，但我们发现这项工作以及控制着它的一切关系，都存在于给定的社会性格的内部，实际上社会性格的一个作用就是使可以获得的各种工作，以及因它们而产生的各种评价和关系，可以被人们接受。一般性的社会培养和特殊技能的培养，总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彼此限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也就不能分辨出可以区分的第三种目的：即我们所说的“普遍教育”，或者用弗兰德·克拉克爵士^①的话说是“文化的教育”。概而言之，一

^① 弗兰德·克拉克(Sir Fred Clarke, 1880—1952)，英国教育思想家，曾任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曾大力呼吁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进行改革。——译者注

个孩子必须接受三种教育：首先是学习社会公认的行为和价值，其次是学习一个受教育者所应具备的一般知识和看法，第三是学习他赖以谋生并借此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特殊技能。事实上，正如特殊技能与公认的行为和价值必定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同样也能发现，它们又都和一个受教育者所应具备的一般知识和看法有联系，并且还帮着规定了这种一般知识和看法。这从来都不是一种完全随意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灌输”过程，因为如果统治性的社会性格被接受了，哪怕是只被少数统治者所接受，那也意味着其价值得到了承认：一个人所必需的一般培养必定是以社会性格所体现和传达的各种价值为背景的。如果我们相信某种特定的社会性格，相信某一套特定的看法和价值，那么我们自然就会相信，据此而制定的那种普通教育，就是适合所有人的最好的教育：它不让人觉得像是“灌输”或是“培训”，而让人觉得它就是能够提供给人的最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转向历史的分析，这些论点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能够提供给人的最好的东西”的各种变体，而且还有上述三个目的之间的既真实又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性格的培养渐渐蜕变成为各种工作所需的特殊技能的培养，而普通教育的各种定义都是根据这两种培养而定的。我打算从这个特定的视角出发，来考察英国教育的历史：看看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里，在社会培养、课程教学以及如何定义普通教育等方面，各种现实关系出现了什么样错综复杂的变化。既然我们并非站在历史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复杂发展过程的某个点上，所以这种历史叙述必然会引向对我们的教育价值和教育方式进行某种分析。

1

英国教育的起点很清楚地表明，在职业培训、社会性格的培养以及 148

某一特定文明的培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从公元6世纪晚期起，英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学校其首要目的是进行职业培训，但其中也暗含着某种特殊的社会训练以及对某种恰当的一般知识的特殊界定。这些早期的学校属于大教堂和修道院，其明确的目标是要培养未来的牧师和修道士，使他们能理解并施行教会的各种仪式，能阅读圣经以及天主教神父们的著述。在罗马帝国的势力撤出后，操一种不同语言的人们来此定居，这种断裂使得在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当地人都不再使用拉丁文，此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以及大部分有用的学问，所使用的都是未知的语言。奥古斯丁来到英格兰，被描述成“一手拿着拉丁文的布道手册，另一只手拿着拉丁文语法书”（利奇^①语），试图让这里的人们皈依天主教。当时创建了两种类型的学校：文法学校教授拉丁文，歌咏学校教授教堂圣歌。这两类学校实际上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就其目的而言，这两类学校对特殊技能的培训，必然是为培养基督徒及其所代表的特定社会性格而进行的普通训练的一部分。但文法学校却有点特别，不能把它限于这一狭隘的目的。从这些学校（它们是基于希腊的和罗马的模式而建立起来的）进入英格兰之前，到文艺复兴的前夕，关于这八个多世纪里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有一种很重要的观点提供了最有趣的证词。拉丁文是必须教的，否则教会就不能延续，但人们懂拉丁文之后，就不会只读圣经和神父的著述了，他们也会接触到用拉丁文写作的全部文学作品以及“异教徒”的哲学著作。由此引起的问题在格里高利教皇写给高卢的德西德里乌斯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149 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提到它就不能不感到羞愧，那就是你——我们的兄弟——竟然在上什么文法课。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恼怒和不快，以至使我们因先前听到的好消息而感到的

^① 利奇(Arthur Francis Leach, 1851—1915)，英国教育史家，著有《中世纪英格兰的学校》(*The Schools of Medieval England*)等书。——译者注

愉快变成了悲哀和沮丧，因为同一张嘴怎么能既颂赞朱庇特神又颂赞基督呢。你自己想一想，一个主教竟然致力于这么一种即使对俗世之人来说也是不合适的活动，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多么令人震惊。我们已经在核准你的请求，倘若传到我们耳中的这个消息能够被证实为纯属虚言，而你也能表明自己并没有虚掷光阴于愚蠢的俗文学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了，不会被疑虑所困扰。

“文法”是新学校的基础课，但此时它还没有被认为仅仅是语言的骨架（这是在中世纪晚期才有的意义），它是为阅读——尤其是大声朗读——而做的准备，又涉及理解和注释，因此是和内容不可分割的。无论是从教育还是从宗教的背景看，“文法书”都是权宜利用之物，先是编文选，它不仅使许多文本可资利用，而且也根据内容是否合适来加以遴选；然后是讲授系统的文法和教学对话。求知欲强的学生可能会读到更多的东西，特别是维吉尔和奥维德的作品，但是这种选择性的教学传统其性质决定了大部分古典思想——尤其是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仍然被忽视了。现在的有些课程就是从那个时候一路传下来的。比德^①说道，狄奥多尔^②和哈德里安^③在坎特伯雷“讲授圣徒著述的同时，也讲授度量标准、天文学和算术”，阿尔昆^④在约克郡的教学内容则包括了语法、修辞、法律、诗歌、天文学、自然史、算术、几何、音乐和经文等。但只要看一下实际使用的课本，我们即可发现这些课目是根据拉丁文和教会的主导原则来安排的。经文是核心课目，而修辞的教学主要是研究圣经中的措辞形式。文法课是教授拉丁文文法，写诗也是在

① 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 672—735)，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英吉利教会史》，记载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早期活动。——译者注

② 狄奥多尔(Saint Theodore of Canterbury, 602—690)，第八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曾在后世闻名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建立了一所著名的学校。——译者注

③ 哈德里安(Saint Hadrian of Canterbury, 死于710年)，著名学者，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道士。——译者注

④ 阿尔昆(Alcuin of York, 735—804)，卡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时期的著名学者、诗人和神父。——译者注

同样的语境中，尽管有时候也会发展到用方言来朗诵诗。数学(包括天文学)的核心内容是编制繁复的教会日历，简单的普通练习被当作是最重要的“算术”入门，而“算术”的核心内容则是辩论耶稣复活的日期。音乐和法律是为教会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而设的职业学习，自然史的内容是文学和历史掌故，这和亚里士多德学派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个课程表当中，地理、历史和自然科学鲜有容身之地，尽管我们必须记住接受这种教育的比德写下了一部内容宏富的英格兰历史著作。

除了未来的牧师和修道士之外，其他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但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确定这种机会究竟有多大。范围可能偶尔会扩大，肯定会有王室的年轻成员和贵族子弟接受这种教育的记载。不管怎样，在英格兰，学校的发展被丹麦人的入侵给打断了，以至于要在阿尔弗雷德大帝^①的影响下这套体系才得以重建起来，而对此后直到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之前这一时期的教育状况，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新的教育模式和以前的非常相似，即使随着诺曼人入侵、法语取代英语成为教授拉丁文的本地辅助用语之后，也还是一仍其旧。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都附属于大教堂、修道院和牧师会教堂，教授课程显然还是职业性的。到了12世纪，教育机构和教学方式都出现了重大的扩展。大教堂的附属学校增加了，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牛津出现了第一所学院，大学的理念也随之出现。这场运动是与课程的扩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最初的阶段，修辞逐渐获得了跟文法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第二个阶段，逻辑学在大学里有了大发展，这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主要著作愈来愈容易获得有关系，也和诸如法律、医学和神学这些高等系科的扩张和专业化不无关系。虽然教育仍然被限制在基督教的稳固框架内，但可以看到人文教育——作为对法律、医学或神学等专业研究的预备学习——的观念正在形成。“七艺”(文法、修

^① 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国王，因统帅臣民英勇抵抗北欧维京海盗民族的入侵，而被后世尊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译者注

辞、逻辑三科，以及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四科)的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公元5世纪，但只是到了现在，随着来自古典学问的新的资料的流传，以及对古典学问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七艺”的概念才开始得到足够的认识。教师如今需要获得更正式资格(有大学文凭才能任教)，而不是被指定的。研究的范围也有了明显的扩大，有些研究是为了满足实际的世俗需要，如教授书信写作，随着政府部门日趋复杂，这种需要也在日渐增长。有证据表明书写学校已经出现，它与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不同，教授的是书信写作和实用会计学，其教授对象是一个新兴的阶级。虽然有些学校仍然需要得到教会的准许，但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完全独立的。

中世纪教育大体上仍然是职业性质的，但哲学、医学和法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使教育体制部分地脱离了教会的直接监督，而大学为谋求自身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作为学术团体，它们可以自行决定授予学位的条件，因而也就决定了执教的资格。从13世纪到15世纪末，在附属大教堂、修道院、牧师会教堂和小教堂的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体系之外，新出现了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学校，如温彻斯特学校和伊顿学校，它们和牛津、剑桥的新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难以确定统计数字，但据最权威的专家利奇估计，到宗教改革^①前夕，在225万人口中大约有400所学校，平均每5625人拥有一所学校(在1864年，是平均每23750人拥有一所文法学校)。关于中世纪教育，还有另外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即手工艺和贸易方面的学徒制度，以及骑士制度，年轻的贵族子弟被送往豪门巨族充任骑士侍从，通过循序渐进的培养课程而获得骑士身份。这两种制度是和学术体制同时并存的，这提醒我们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对教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辛苦劳作的穷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尽管也有个别穷人家的孩子凭借过

152

^① 英国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16世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掀起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结果是英格兰教会脱离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而获得独立。——译者注

人的信念和突出的才华，通过学校和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对于其他人来说，教育是在与某种固定结构的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而这种固定结构是由学徒、未来的骑士和未来的知识阶层等世袭的、先定的身份和地位所构成的。这种教育体制虽然眉目清楚，但并不完善，因为学院教育总的来说似乎是超出了实际的需要。而即使是在每40人中有一人可获得教士职位的情况下，也并不是所有接受过学院教育的人都有谋生的空间，低级教士往往一贫如洗。此外，知识阶层与直接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学徒制度和骑士制度相比，它所吸纳的成员其社会背景也许要更为广泛。早期的基金学校(foundations)几乎都为“穷学者”提供了职位，尽管对此可以有多种解释，但至少这个系统是相当开放的。与此相关，那种新型的独立学校(如温彻斯特和伊顿)其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温彻斯特，除了创办者的亲戚外，学生都自理费用，他们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子弟，也可能是“出身贫寒的学生，他们品行良好，有绅士之风，且有受教的资质，完整地学习了阅读、素歌和古老的多纳图斯^①语法”(拉丁语法)。这些学校有着独立的地位，所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得以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有人说过，这种教育机构越来越依靠某个阶级，将文法学校的教学方法与骑士制度的社交培训(通过“寄宿”制)融合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注定会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公学，这种说法可能不无道理。鉴于这些学校与大学学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诸如此类的发展都注定会对整个教育体制产生影响。

2

马修·阿诺德曾说过，英国教育已经丧失了很多东西，因为宗教改

^① 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 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语法学家，圣哲罗姆的老师，著有《维吉尔传》。——译者注

革虽然改组了学校，但其教学却并未受到文艺复兴的指引。就学校的实际情况而言，宗教改革的进程带来了许多变化，关闭了许多老式的基金学校，或是降低了其等级，但也创建了可能不亚于此数的新学校。文法学校仍然是核心的教育机构，但在赞助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早在15世纪，就已经能看到这种变化的苗头。那时候，典型的中世纪文法学校是由教会捐建的，而典型的新型文法学校则是由私人捐建的，不同程度地接受教会和国家的监督。然而，文法学校的教育传统还保留着，几乎没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同意弥尔顿和阿诺德的看法，这种状况是有害的。在主要的拉丁文课程之外，增添了希腊语，有时是希伯来语，主要的收获是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文法学校——甚至包括大学——的教学方式仍然很死板，很狭隘，像命题作文和辩论这样一些形式，在过去是有创造性的，现在却被孤立开来，变得很机械。文艺复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如在本地语文学、地理发现、新的绘画和音乐、新的哲学精神及自然探索，以及在个人观的变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普通教育的标准形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在这些传统的教育机构之外，一些初级英语学校却似乎增多了，其形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既有由牧师授课的学校，也有由私人投资的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作为开店铺和做生意的副业来经营的。在很多情况下，“小学塾”（petties）或“识字班”（ABCs）反倒更像学校，它们有时候和文法学校有联系，而有时候在那些老式捐建学校缩减的地方，它们实际上接替了文法学校。此外，“书写学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们教授文书英语和如何记账——这显然是发展贸易所需要的，有些时候这种类型的教学也被纳入到文法学校之中。此时的学校模式颇为复杂，但有三种趋向却可以看得分明：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地语教学；传统的教育机构已无法适应经济变化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大多数领头的学校，从以往接受国立机构的赞助转向接受私人的捐助。

在17世纪，教育理论有了重大发展，其中有些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教育理论，尤其是充当学者型侍臣的理想，

对英国教育机构影响甚微，而事实上其影响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是降低了此类学校的等级，但另一方面又部分地采纳了骑士制度的传统，确立了另外一种模式，即聘请私人家庭教师在家里接受教育，许多家庭都更愿意采用这种教育模式，它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一些特殊的职业教育机构，尤其是法律方面的，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为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的新的普通教育机构，即非国教中学(Dissenting Academies)，也开始出现。在宗教改革后，不信奉国教者遭到了传统教育机构的极大歧视，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中学，其教学维持在较高的中等教育或是大学的水准上。这些中学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可以公正地说，18世纪的时候，在其中最好的一些中学里，关于普通教育内容的一种新定义已经产生并被付诸实践。正是在这里，学校课程才第一次粗具现代的形态，增添了数学、地理、现代语言以及更为关键的自然科学。在同一时期里，那些古老的文法学校则以不同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九所最有名的学校，其中有七所是寄宿制学校，仍然大体上保留了传统的古典课程，但其社会开放度比以前有所提高，总体上是倾向于为全国的贵族和乡绅提供教育服务。大多数靠捐款建立的文法学校则是为当地服务的，其社会基础相当广泛，但课程大体上还是一仍其旧。那些较古老的学校都坐落在大城市里，其服务对象有很多是店主和商人，在他们的大力影响下，这些学校在18世纪的时候，开始扩大了学校的社会构成，也拓宽了课程范围，尤其是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学反映了这一复杂的图景，虽说老课程仍然巍然不动，而且在教学标准上似乎也有所下降，但在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上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穷”学生——农民、工匠、小商人之子——的比例虽然在这个世纪里有所下降，也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数量。在三种古老的职业中，教士仍然主要由大学培养，而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从业者，如今却主要不由大学培养。在新兴职业中，尤其是在科学、工程和艺术领域，大多数从业者都是在大学之外接受训练的，大多数新型商人和制造商也是如此。令人瞩目的是，在18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中学，它们为

商业、工程、艺术和军事机构提供服务。

至于初等教育，由教区学校和私人投资的学校所构成的那个杂乱无章的体系，仍然留存下来，为各种中学以及老式的基金学校服务的预备学校也有了一些发展。但是愈演愈烈的都市化也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解决。17世纪末掀起的慈善学校运动代表了主要的努力成果，它把一种新的意图——对穷人施以道德拯救而不是下达道德命令——与一种更加正规的初等教育定义结合在一起，以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其影响延续到将来。在18世纪最后25年里，随着工业革命加快了步伐，整个教育体系都承受着新的压力，这些压力最终改变了教育体制。

3

从1751年到1821年这70年间，英国本岛的人口翻了一番，从700万上升到1400万，而到1871年，又升到了2600万，几乎又翻了一番。除了人口数量的这种惊人增长外，包括新兴工业城市在内的城市人口的比例，以及儿童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即使是一个比18世纪实际存在的教育体制还要好得多的体系，也会被这些变化弄得乱七八糟。在19世纪上半叶，揭露教育体制之根本不足的报告，简直数不胜数，这种状况一部分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转变而暴露的，一部分也是由这种转变所造成的。期望在比以前更完备的基础上整顿教育，是许多此类报告的主题，但当时反对全面改革的势力也相当大。1816年，在对12000个教区进行的调查中，有3500个教区没有学校，3000个教区有教学质量不等的捐建学校，5500个教区有非捐建学校，其教学质量更是参差不齐。改革者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越过1807年一位治安法官所发表的这一有代表性的意见：

如果仅仅是出于最美好的意愿——即让穷人们能够阅读《圣经》经文，那么普遍地教导他们学会阅读，无疑是可取的。但至于书写和算术，则需要另当别论，这种学识程度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好逸恶劳。

在以前，穷人总体上确实没有受到过教育，尽管在个别教区曾有过此类尝试。但禀赋特异的穷人家的孩子却还是能够屡屡得到资助，进入大学学习。而在新的分配制度下，教育却是在更加僵化的阶级基础上来组织的。

给每一个阶级我们都指定一所学校，来分派
适用于所有阶层的规则和每个人的精神食粮。

（克拉布^①）

唯一不真实的是最后一个理由。

但是从一个地区性的社会秩序体系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阶级体系——这种转变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这一过程此时实际上已经完成，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论阶级而定的教育。高等教育实际上是被垄断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外，而普通教育的理想，被狭隘地限制在“道德拯救”的范围内，在此之外，则被当作原则性的问题而遭到广泛的反对。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第一种新的教育机构是工业学校，它提供手工培训和基础性的指导，而更重要的教育机构是主日学校，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参加，其教育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是根据以下原则来组织，即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穷人应该学会阅读《圣经》，但书写和算术——更不用说别的更危险的课目了——是没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新的走读

^① 克拉布(George Crabbe, 1753—1832)，英国诗人。——译者注

学校虽有兰开斯特^①和贝尔^②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系统，但其教学都以《圣经》为基础，通过采用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贝尔称之为“道德世界的蒸汽机”——即通过实行导生制以及标准化的重复练习，一个老师就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教数百个孩子。据估计，随着主日学校和新的走读学校的发展，以及教区学校和风险投资学校(adventure schools)的依然存在，在1816年的某段时间里，在总数可能达150万的儿童中大约有87.5万人进入了各类学校学习，而1835年的统计数字是，在175万儿童中入学数达到了145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作出充分的评估，我们必须记住，在1835年，同样的调查显示平均入学时间是一年。从18世纪起，有些地方已经批准学校可从地方税收中获得资助，而从19世纪30年代起，学校建设开始获得了国家的资助。到1851年，平均入学时间已经上升为两年，而到1861年，在总数可能达275万的儿童中，估计有250万人曾有过上学的经历，尽管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儿童在11岁之前就已经离开学校。学校的课程有所扩大，此时通常已包括书写和算术，有些学校还有其他的常规课程。1862年的教育修正法案还制定了一套按成绩拨款的制度，即根据阅读、书写和算术方面的确定标准(阅读报纸上的一段文章，听写相似的材料，数学四则运算)进行考核，按考核成绩来给学校拨款。于是，公共赞助的日益增加便和关于最低标准的陈旧规定拴在了一起。在1870年，建立了地方教育委员会以完善学校网络系统，并将它们置于更明确的监管之下。在1876年和1880年，通过推行普及初等教育义务制，教育的普及得到了巩固。1893年，学校毕业年龄提高到11岁，1899

158

① 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 1778—1838)，英国公谊会教徒和公共教育改革家，以创立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而著称。导生制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教师上课时先选择一些年龄较大或较优秀的学生进行教学，然后由这些学生充当“导生”，负责把自己刚学到的内容教给一组学生。导生不但负责教学，而且还负责检查和考试，完全是教师的助手。有了导生的帮助，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大大减轻了，因而能够教育更多的学生。——译者注

② 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 1753—1832)，苏格兰圣公会牧师和教育学家，他创立了“马德拉斯教学法”(Madras System of Education)，即通常所说的“互教互学制”。——译者注

年又提高到 12 岁，到 1900 年更是提高到非强迫性的 14 岁。这样，到了 19 世纪末，虽然初等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只限于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但全国性的初等教育体系却已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老的文法学校也有了广泛的发展，作为阶级面向极为分散的教育机构，其生源在早期阶段主要是由扩充的预备学校网络系统来提供。这些老学校——尤其是九所领头的学校——的入学人数在 1790 年至 1830 年间有了恢复，而且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学校的性质，如 1798 年起巴特勒^①在什鲁斯伯里学校、1824 年起阿诺德在拉格比学校实行的改革即是例子。阿诺德的影响主要还不在于课程改革方面，而在于他重新确立了教育的社会目的，即培养信仰基督教的绅士。巴特勒的影响也许更为重要，他对考试及格的强调，是一种主要趋向出现的标志。到 19 世纪 30 年代，这些学校和各大学之间的升学考试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尽管这提高了这些机构内部的教育水准，但也产生了别的影响，大学入学生源被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社会阶层内，上述考试制度强化了这种明显存在的局限性。在课程方面，古典学是“本分”，而其他课目是附加的，但从 19 世纪中叶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和军事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提升了数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地位，从考核方面来进一步组织学校。在 19 世纪 40 年代，总共约有 700 所文法学校和 2000 多所非传统性的捐建学校，但是 1868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英国城市没有任何类型的中等学校，剩下三分之一的城市其中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明显良莠不齐。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通过两个委员会的成立以及 1868 年公立学校法案的颁布，对阶级基础仍然很狭隘的中等学校进行改革的构想已经形成，并部分地得到贯彻。1868 年的法案废除了许多旧的教育机构章程，建立了一些新的管理实体。从这时候起，新的课程(古典

^① 巴特勒(Samuel Butler, 1774—1839)，英国古典学者，1798 年始任什鲁斯伯里学校校长，他注重古典人文教育，使学校以古典学教育而声誉鹊起。——译者注

学、数学、一门现代语言、两门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画图和音乐)被建立起来,“公立学校”也被确认为应面向不同的阶级。校长联合会于1869年启动,它包括了许多此类在19世纪出现的新学校,也包括了一些旧的基金学校。1867年的汤顿调查委员会(Taunton Commission)设想把中学分为三个等级:为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服务的中学,让其学生读到18岁并接受某种“人文教育”,以准备进大学深造,或是预备从事那些古老的职业;为中层阶级服务的中学,让其学生读到16岁,并预备参军,或是从事较新的职业,进入许多政府部门工作;为中层以下的阶级服务的中学,让其学生读到14岁,使其适合作为“小佃主、小商人和高级工匠”而谋生。如有可能,应该给未成年人提供升学机会,特别是第三等级的中学与小学之间应有连接,使体力劳动者的子弟能够继续接受中学教育。每一千个人口中应有10个孩子有机会接受这三个等级的中等教育,其中有8个人接受第三等级的中等教育。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全国400万儿童中,有6.4万人接受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中等教育,有25.6万人接受第三等级的中等教育。调查委员会评述道:“很显然,这些区分只是大体上对应于社会的分层,根本谈不上有多么精确。”

实际上,中等教育在当时尚未成为一项公共义务,其结果使人联想到教育的组织状况是不均衡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大学地方考试制度——最初被称为“中级考试”——使得第一和第二等级中的捐建学校和私立学校开始将某些公认的中等教育的全国标准定为目标,而由政府 and 某些职业团体制定的考试制度的扩展,也取得了同样的合理化效果。为女子接受中等教育而发起的运动也初见成效,在1889年,威尔士率先通过了中等教育法案,成功地建立起一套有组织的中等教育体制,将寄宿制和义务制的小学与大学联系起来,而且男女都适用。1902年,创建了地方教育局,其职责是满足所在地区的全程教育的需要,这就为全国性的中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三级中学制的推行,小学毕业的年龄也提高了,新成立的地方教育局则各尽其力,纷纷

致力于建设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中学。1899年成立了教育委员会，1904年，教育委员会规定了为期四年的中学课程，包括英语语言与文学、地理、历史、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数学、科学、图画、手工、体育和为女生开设的家政，学完这些课程后方能获得毕业证书。我们若是回顾一下18世纪非国教中学的课程，便能看清传统的主脉之所在。

与此同时，大学教育在这个世纪里也有了急剧的变化。在18世纪的剑桥和19世纪初的牛津就已形成的统考制度，对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项制度在通过时遭到了抗议，抗议者认为这种考试制度使教学变得呆板僵化了。在同一时期，这两所古老大学的宗教排外性，以及课程设置上明显偏向于古典学和数学的狭隘性，使伦敦大学(1826—1832)得以应运而生，而同时新建的杜伦大学虽然由教会管理，却以课程广泛而著称。牛津和剑桥的改革运动引起了19世纪50年代的众多
161 变革法案，它们有着双重的目标，一是要扩大课程范围，另外是要确保培养的学生拥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不是只把目标限于培养“未来的牧师，未来的律师和有地位、有钱财的年轻人”。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进一步施行了立法变革，调整、扩充了院系，从而使其取得了现代大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院校也在迅速发展，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雷丁大学、利兹大学、利物浦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以及威尔士的另外三所学院也都纷纷成立。

19世纪的成就显著地体现在对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大力整顿上，今天我们大体上仍然遵循着这些路线。教育的制度类型以及教育的内容和手段，都显示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对于知识学习进行的整顿，在这个社会中，从主导性社会性格和成年人工作种类的改变这一角度来说，工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是最突出的因素。这些影响对教育这个概念所产生的作用，显然是英国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正因于此，关于教育目的的根本争论也才成为这个世纪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这场争论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抱着教育为所有人服务的理想，另一派则守着通识教育的理念。正如我们所见，前者引起了激烈的争

辩，而这个世纪的历史也见证了在前几十年里一直只占少数的那些人最终获得了胜利。我们可以指出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他们需要得到教育；另外一个则是经济扩张和变化的需要。在长期的争论中，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教育改革者的胜利有赖于以下三个因素：对民主发展的真诚回应，如密尔、卡莱尔、罗斯金和阿诺德等人那样；保守的回应，这是新版的“道德拯救”论，这在围绕着1870年教育法案（这一法案与1867年的扩大选举权相关）而展开的论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未来的主人……至少应该学习他们的文字”；注重实用的回应，它也许是决定性的，福斯特^①在1870年就拿它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论点：“我们的工业繁荣取决于基础教育的快速供应。”在中等教育的发展中，这种着眼于经济的观点就变得更重要了。

着眼于民主和着眼于工业的论点听上去都有道理，但后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它使得教育被从将来成年人工作的角度来定义，带上传授必需的社会性格方面的一些平行条款，如养成有规律的习惯，“自我训练”，服从听话，训练有素的努力。这种定义遭到了两方面的挑战，挑战既来自于对民主的普遍发展持有广泛同情心的人，也来自于那些抱着通识教育——它关乎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的健康——的老观念不放的人。这种有趣的结盟大体上就是我在《文化与社会》里当作一种传统来梳理的东西，而关于教育的论争一直接近于这一延续不绝的传统的核心。一方面，那些对民主和工人阶级组织的兴起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的人争辩道，每个人都拥有受教育的自然人权，政府应该把这一原则当作自己的职责来接受，这是任何一个良好的社会都必须具备的基础。另一方面，那些在骨子里反对民主的人却常常争辩道，人的精神健康有赖于某种超出于专业工作训练之外的教育，这种教育被以不同的方

^① 福斯特(Williams Edward Forster, 1818—1886)，英国工业家、慈善家、自由党政治家，1870年颁布了由他起草的初等教育法案，该法案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岁至12岁的孩童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就学方案，这个法案又被称为“福斯特法案”。——译者注

式描述为“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或是“文化教育”。这场广泛的争论迄今尚未结束，且极为复杂，这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公共教育工作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一个群体——常常与强势群体结成联盟，强势群体办教育，考虑的是如何把穷人训练、锻造成工人和公民，而“通识教育”的捍卫者通常是反对这两个群体的，反对前者是因为通识教育会由于向“大众”普及而变得庸俗化，反对后者是因为通识教育会因为转变为一种专业性的、技能的训练而遭到摧毁。但公共教育工作者也免不了会吸收旧的“通识”教育捍卫者的某些观点，借此避免使普及教育被窄化为一个培训产业工人的体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三个群体——公共教育工作者、工业培训论者和老派的人文主义者——仍可以分辨出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对20世纪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总的来说，19世纪教育课程的演变可以看作是在这三个群体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但工业培训论者更为强势。关于科学和技术教育的漫长的论战，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如果我们纵观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的科学发现，便能清楚地看到科学发现对生产和传播技术的变革还只是其重要性的部分体现，实际上其重要性同样也体现在它改变了人对于自身以及周边世界的看法。然而教育上对这种新的知识所做出的决定性的解释，依据的却并不是它对通识学习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是它为某个特殊阶级的人们提供了技术培训。老派的人文主义者声称在他们的传统学问和新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把问题搞乱了，而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才会产生那样一种荒谬的防御性的反应，即认为一切真正的学问都是不考虑实际用处的。事实上，正如教育史所表明的，古典语言的训练本来就是为职业而准备的，只不过这些特定的职业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传统的尊严，而那些人人都能平等进入的职业却不享有这种尊严。于是，新的学问被忽视了，没能起到扩大普通课程的作用，只是到最后才被极不情愿地承认，然而也只是被看作是纯粹技术性的知识。工业培训论者的压力最终占据了上风，尽管这要等到1889年的技术指导法案通过之后才大体上充分显现出来，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还只说是“指导”而不是“教育”。这一历史对普通教育和新型职业培训都有损害，在那时，只有像赫胥黎这样的极少数杰出人物才能看到这个问题，并恰切地指出：科学必须成为普通教育和通识教养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须有一套适当的非常具体的职业培训体系，作为进一步的预备方案，这种职业培训应扩及一切科学和技术工作，它应与医生、律师、教师、艺术家和牧师的职业训练遵循同一个原则。对工业培训论者所获得的认识，我们只能有限度地感到满意，其僵化而愚蠢的程度一如老派的人文主义者，而且还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赫胥黎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公共教育工作者，而只有在这一传统中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164

如同在19世纪的其他教育思想那里一样，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等级思想所投下的阴影。一方面，贸易和工业始终被贬低为社会下层阶级干的活儿；另一方面，成功的实业家们又期望他们的子孙能够跻身如今已大大落伍于时代的绅士阶级之中，这两者都对英国的教育和英国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这个时期对各种制度所进行的重大改组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最好的知识学问了无关系，对教育的目的以及当代通识文化(liberal culture)的内容也没能给出任何成功的再定义。技工学校(Mechanics' Institutes)^①为工人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起点它们本可以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再定义，但是这种指导仍然限于培训某个特定的阶级，而事实上新兴科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根本要素：这个社会已经转变了其经济形态，在压力下又正在改变其制度，但是在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却仍然在抗拒改变其思想方式。于是对于新兴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提供给他们孤立的科学和技术指导大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正是在技术与其一一般生活的互动之中，这一阶级才开始形成了其自身的崭新意识。政治——在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他们的生活质

^① 技工学校是英国19世纪出现的一种成人教育机构，主要是为工人提供各种科目的技术培训，通常由当地的企业家捐资兴建。——译者注

量和生活方向——被排除出这些技工学校之外，在整个 19 世纪的教育中，政治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排除在外的。恰恰是经过了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只是在成人教育领域，工人阶级汲取了非常古老的思想传统以及英国教育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的异质因素，从而为现代教育的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包括学生自选课程、学习课目与当代现实生活相联系、与指导专家进行平等的一般性讨论等等——仍然很重要，但是在一般教育机构中却没能获得多少进展。和个别的公共教育论者一样，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4

在 20 世纪，从 19 世纪继承而来的架构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和改进。初等教育被重新定义为小学教育，结束于 11 岁，基于这一定义，从 1944 年起，为所有人提供中等教育已经变得可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中等学校被合并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规模大为扩张的体系，按照规划，未成年人基本上都能从小学升入中学，而能够升入高等学校的未成年人则要少得多，那种体制安排，这一规划即使不能说已完全实现，至少也是有效地实施了。数量众多的第三等级的中等学校——它们与未成年人制度存在着有限的联系——也在创建之中，它们的性质都很不一样。在初等教育中，课程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扩展，这也许是这个世纪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正是在这里，公共教育论者发挥了最有效的影响。大学虽说情形不等而且有时缺乏清晰的界定，但也通过一些很重要的方式扩展了课程。恰恰是在中等教育的层次上，不管是传统的“文法”学校还是“现代”学校，根本性的争论仍然延续下来，从而再次揭示了课程设置与教育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理论上，公共教育论者的原则已经被接受，即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受教育的自然权利，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政府将此原则当作自身的

职责来接受。可实际上，这一体系仍然深受其他一些原则的掣肘，这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在预备学校和公立学校发展期间，仍然存在着私立教育的网络，在社会中它也许是值得向往的，或者是并非如此，但不管怎样，它展现了这么一种教育及其必需的投资水平，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会认为这种教育本身是合适的。比如说，大众阶层从一开始即深受公共教育之苦：在兰开斯特制学校里，每 1000 个学生才有一名教师，其后的城市寄宿学校每 60 到 80 个学生有一名教师，即使在今天，通常也仍然是每 40 到 50 个学生才有一名教师。而在私立学校里，人数少得多的小班，以及为此而必需的投资，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私人性质职责，其方式和公立学校系统中对公共性职责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其成员必须接受的最低教育水平线被确定为至少要上到第二等级的中等学校，通常还要接受进一步的职业训练，而公众为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所定的最低教育水平线则要低一些，大抵还是停留在老式的第三等级学校的层面上。此外，为达到这个较小的社会群体所制定的最低教育水平线，所设课程中还包括了一些只对整个社会中的少数人才有用的课程。虽然我们不能轻率地说这个人数有限的社会群体没有权利为其成员提供它认为是适当的教育，但它与提供给大众阶层的教育之间的鲜明反差却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等级思想的残余，从而限制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公共性职责的实际执行。在分析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时，这一点往往遭到忽视，却以人的智力存在着差异来搪塞。人们常常说，在“大众”教育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因为人们的智力状况实在是相差太大了。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事实上在这个人数有限的社会阶层的教育历史中，自始至终也要处理相同的智力差异的问题，实际控制这个阶层的教育组织状况的，并不是被认为与某种特定的心智测量相合的智力水平，而是其成员所要求达到的教育水平。如果我们这样来表述，即一个孩子要成为这种类型的成年人，就必须达到某种规定的教育程度，那么对于这一模式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些。

学习能力上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的，但将这些差异划分成一些彼此不同的、独立的类别，则是非常危险的。对孩子应该因材施教，这没有错，但由于这本身取决于他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其个人性格成长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其真实社会环境以及环境给予他的刺激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过早地划分智力等级会部分地制造出一种必须面对的处境。弗农教授饶有趣味地描述了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激发智力表现所带来的结果：

在英国，我们在 11 岁以后所接受的环境刺激的差异程度加大了。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必须学习复杂的概念和思想模式，文法学校、现代学校和其他学校所提供的不同的教育类型，以及他们各自家庭的不同的智力水准，可能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了 15 岁，大多数人都会离开学校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绝少能训练他们的“头脑”，他们的业余消遣也多半是非激发性的。但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却能继续接受智力上的激发，直到 17、18、21 岁甚至更迟，而且他们更有可能进入能够运用其头脑的职业领域，并得以尽情享受闲暇时间的文化消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已经得到清楚的证实——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的确会影响到最终成年后的智力水平。接受过完整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其智商要比那些智力与 15 岁的人相等但此后未接受进一步教育的人平均高 12 分。

这就是隐藏在心智测量背后的现实，它被用来证明教育等级体系的正确性。抱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平庸想法，把智力当作一种确定的数值，这便否认了人的成长，也否认了智力本身，最终是为了某种特定模式的社会系统的利益。除此我们还能怎么解释这种被植入现代英国教育之中的古怪原则呢？它认为学得最慢的人理应用最短的时间来学习，而那

些学得快的人就能延长学习时间，比前者多学七年。这就是所谓“机会平等”的实际情况，它和真正的社会平等完全是两码事。事实真相是，对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我们会有这么一种设想——尽管不完整——即不管他们的智力水平如何，都要求他们应接受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而对这一阶层之外的大多数人，我们却没有这种设想，或者是仅有一种要求低得多的设想。这一事实与其他社会过程一起，持续不断地扩大了种种生来就有的不平等。在智力与某个特定职业群体的成员之间当然不存在绝对的关联。这些职业群体的孩子们其智商的平均值是不等的，但这些群体内部的差异却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更大。而如果少数人可以用钱买来更长的教育，由以前的现实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又使他们能永远获得更有利的学习环境，那么生来就有的不平等就会被再次扩大，并具有了某种直接的社会关联性。如果一个人被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时时刻刻记住“不要成为一个空想家，而要考虑到在教育大众方面所存在的困难事实”，那要他保持耐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始终要面对孩子们在学习能力上存在的众多差异，同时又必须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事实，即我们现在是在某个特定的方面碰到了这个问题，它最终扩大了差异，却又把这些差异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秩序。我们只有摆脱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等级思想，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并开始从尽可能地延长每个人的学习过程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教育。对于一个阶级社会来说，人分五类，各有等级，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必须以一种真正开放的方式来重新看待人类的学习，将其视为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真实资源，因而是我们必须提出某种特殊的理由去加以限制而不是放任不管的某种东西。也许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要构想一种真正开放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19世纪的思想中，对中等学校进行分级的设想根本来自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既有的阶级结构应该获得再生产。因此所设定的种种教育标准也就是阶级的标准——是一个绅士、或是一个专业人士抑或一个小商人所必须达到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技术人员或是一个技工所

必需的标准，但仍然缺少我想要确立的原则，即一个有教育的、参与性的民主社会的成员需要什么。这一原则的实现受到了某种现实变化和改革的干扰。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会服务的扩大促进了职业门类(包括教学在内)的发展，组织(包括民主组织和商业组织在内)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管理的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则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些发展已经制造出一个正在扩大的新阶级，其性质与旧的绅士阶级和旧的资产阶级大为不同。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个新的阶级与旧的工人阶级很相似，因为它不靠财产也不靠做生意而是靠出卖雇佣劳动来谋生。这种被出卖的劳动是一种技术性劳动，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虽说这种情况也越来越适用于工人阶级本身，但这个新阶级所接受的预备训练却是在教育系统内部完成的，而工人阶级则仍然主要是在“边干边学”中接受训练的。为了训练这个新阶级，旧的绅士教育已经基本上被新的公仆教育所取代，正是在这方面，“服务”的意识形态被极大地强调，先是在经过改革的公立学校中，后来又扩大到以公立学校为榜样的中等教育体系中。事实上，在每个阶段甚至是在今天，为这个新阶级提供的教育还是远不能满足实际所需，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起先是因为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其后则是因为不愿面对这种需要对旧的阶级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到了19世纪后半叶，当时的中上层显然已无力满足这种正在扩大的需要，国家对中等教育加以组织管理，实际上是对这一形势转变的姗姗来迟的承认。虽然这些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部分仍来自于中上层阶级，但毕竟也为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填满剩余的空额。这项政策算是在道义上回应了被认为是对现存体制最有力的批评——有特长的穷人家孩子因为得不到“机会”而被毁掉了。这些教育机构的稳步扩展是想要跟上新阶级不断扩大的步伐，尽管这种努力总是有点滞后，提供合乎标准的技能服务也因此成为中等教育的指导原则，这一定义自然而然引出了一种不是基于社会出身而是基于智力水平的挑选原则。教育现在与其说是对某个阶级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尽管在私立学校网络里仍然保留着这方面的强调)，不如

说是对一定数量的原料进行分类处理，以满足不断扩大的专业、管理以及工业生产的需要。

这种训练本身是绝对必要的，但从如此狭隘的角度来构想中等教育以及入学挑选程序，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教育理论的层面上，这都是极为有害的。它不是致力于重新解释当代文化，也不是为我们整个社会规划一种普通教育，而是在机构组织方面以及教育者的头脑中强化了那些排序和分级的方法。这些变化和扩展已经体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它们主要是由新阶级在工作性质上的变化所决定的。与此相关的“社会性格”——把人训练成一个可靠的人，他愿意在一个给定的框架里承担起责任，并有充任领袖的意愿（实际上这种想法更适合中上层的公务人员，他们管辖一方，主动积极，强调要对“领袖”所属的机构保持绝对的忠诚）——也是在经过改革的公立学校中打造出来的，并且在全国的教育系统内被广泛而成功地加以效仿。

171

公共教育的另一个传统所奉行的原则是中等教育应面向所有人，但它仍然显得较为薄弱。汤顿委员会建议把学校分为几个等级^①，我们只需将这种简单的阶级观与哈多^②、斯宾斯^③、诺伍德^④等人的报告以

① 汤顿委员会(1864—1868)把文法学校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学校实行寄宿制，以升学为目的，为上层资产阶级服务。第二类学校培养军队、医务、法律、文官、工程和商业方面的人才，课程包括拉丁文、英语、政治、经济学、数学、科学，学生离校年龄16岁。第三类学校为下层阶级而设，课程包括拉丁文或一门外语、英语、历史、初等数学、地理和科学，学生离校年龄14岁。三类学校分别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教育体制。——译者注

② 哈多(Sir William Henry Hadow, 1859—1937)，英国教育改革家，他在担任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期间，曾主持发表了6篇系列教育报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6年发表的题为《青少年的教育》报告，该报告提出要全面改革基础教育，每个人都应接受中等教育，因此就必须有多种不同的中学，以适应青少年的不同需要，特别是要创建现代中学，这是一种非学术的中学，不以升学为主要目标。这份报告通常被称为“哈多报告”。——译者注

③ 斯宾斯(Sir William Spens, 1882—1962)，英国著名教育家，1938年主持发表《咨询委员会关于中等教育特别是关于文法学校和技术中学的报告》，报告提议改进文法学校，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技术中学，课程侧重于数学和科学。这个报告通常被称为“斯宾斯报告”。——译者注

④ 诺伍德(Sir Cyril M. Norwood, 1875—1956)，英国教育家，1943年发表了由他主持的中学考试委员会所提交的题为《中学的课程与考试》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中等教育实行文法中学、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三轨并行的设想。这个报告通常被称为“诺伍德报告”。——译者注

及 1944 年教育法案^①的实际效果作一个比较，就能看到虽然经济有了变化，但那种从严格的阶级社会中产生的思想模式仍然在根本上延续着，只不过是“从根据出身来分等变为根据职业来分等，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变化中的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等级体系”。另一方面，公共教育的传统也依赖于对社会变化轨迹有一种更宽广的解释。它承认职业方面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也坚持认为这些变化只是我们总体发展进程的一个方面。英国缓慢地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之上的民主国家（这一进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尚未彻底完成），从而使得决定重大社会政策的职责被移交给了全体民众，这一变化显然非常重要，并且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教育。此外，文化传播系统——从发达的全国性报刊到电影、电台和电视——的显著发展，已经使整个国民文化品质的决定权落到了全体民众手里，因为日益明显的是，即使是得到了最顽强的捍卫的小众文化的各种标准，也受到了在更广大的领域里确定的各种标准的影响。此外，在职业方面还在发生大规模的变化，而且看来肯定会持续下去，并且可能会加快速度，对一个新的技术阶层进行有选择的教育，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与少数人相关的问题，而成了一个为一切工作作准备的问题。

置身于公共教育传统内的批评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是中等教育的组织，其聚焦点落在这一问题上，即一种真正属于中等教育类型的平民普通教育是否会向所有人敞开。为此而提出的具体计划很有意思，而且也有过许多成功的试验。但是在所有这些规划中，的确也存在着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方面的重要问题，很难认为目前文法学校的课程，或者是部分地模仿它并加以局部扩充的现代中学的课程，所碰到的也是这种问题，即只是一个更广泛地予以推广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以往各个时

^① 1944 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1944)又称“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它改变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学教育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延长义务教育到 15 岁，每个学生都能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免费的中等学校分为文法学校、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三种形式。——译者注

期里屡屡见到的那样，教育课程表现了一种继承得来的利益选择和对新的利益的强调之间所达成的妥协。在历史出现变动的时刻，即使这种妥协可能会延迟，也会常常被弄得乱七八糟。事实上我们目前的课程基本上是在19世纪创立的，它遵循了18世纪的某些模式，接近其核心的部分又容纳了中世纪课程的一些因素。其中每一项都可以举实例为证，但种种遗漏也是惊人的。社会学习——即使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学习——实际上是被遗漏了，因为它只限于每个孩子都确信能达到的层面，而且也很难说诸如对国会和地方政府的运作方式、对法律和公共行政、对工业组织、对现代社会集团的演变及特征、对借以研究和影响现代社会的各种技术等方面的详细描述，它们和教育的相关性就不能跟关于南美洲地理状况的详细描述相比，而后者现在仍然是传统的教育内容。除了极个别的学校之外，社会学习方面的教育完全被放弃了，就像现代语言和科学在19世纪越出了“商业”的范围一样，它也越出了“商业”的范围，所讲授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从简单的描述到以“公民教育”而为人所知的那些散漫的、带有劝勉性质的说教（它真是秉承了“道德拯救”的遗绪），等等不一。在文艺方面，贫弱的课程也同样没能应对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所要讲授的各种问题，除了文学，就只有实用绘画和音乐，几乎没有想过要来讲授音乐和各种视觉艺术形式的历史及评论，或是关于每个孩子都喜爱的电影、电视剧和爵士乐等形式的评论。即使是英文课，尽管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付出了努力，但大多数孩子在毕业的时候——即使是从文法学校毕业，也还是没能学会如何来批判性地阅读报纸、杂志、宣传、广告，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他们成年后阅读的主要内容。同时，在科学方面，科学发现的壮阔的、令人激动的历史及其社会影响，也同样没能得到足够的关注。

173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课程设置的问题。我们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文法学校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其中有些已完全落后于时代。从教授死语言中发展出来的那些方法，仍然被普遍用于现代语言的教学，而以目前的国际交流状况，这种情况想必是值得注

意的，即一个英国人可能会在多佛给英国孩子教法语词形变化表，而一个法国人则可能会在布伦给法国孩子教英语词形变化表。在其他课程方面，考试取代辩论也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影响，运用知识的能力，获得日常公共辩论方面的技巧，这至少还是旧教育体制的一个目标（它直接关乎有效的民主生活），而在新的教育组织中，这一目标虽说未遭到排除，但至少是被削弱了。那种考查记忆力的教学方式，是现代教育体制酿成的最大弊端，与选择和运用知识方面的训练（它教导我们怎么在各种可行的行动方案中作出可靠的选择）相比，它和我们的实际需要之间的联系要薄弱得多。

对现有课程体系的批评招来了反对的声音，最常见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课程已经超负荷了。事实上，在19世纪，当人们提议增加科学以及历史方面的教学内容时，听到的也是这么一种回答，但从直接实施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也总是有些根据的。而正是在这点上，那种学校分级模式，连带着与未来职业紧密配合的就读年限规定，暴露了其最大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在拥有一种有效的民主制度和大众文化的情况下，还不能在现有体制内部，在这些方面提供充分的教育，却在竭尽全力地维持教育以便为不同等级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选择，是某些价值观的精巧表达，需要我们去挑战并加以改变。在现有的轨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前行之路：为培训教师提供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学校建筑；缩小班级的规模；将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这些都是可行而且是必须进行的改革，但我们还得问一句：是不是只要做到这些，我们就万事皆妥，就能受到充分的普通教育了呢？在实践中，我们还要根据某些劳工阶层的情况，考虑必需的一般文化素养的各种等级，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没有阶级差异的，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尽其所能，去“选择”他将要跻身进入的阶级。但是这种选择，以及这种机遇，却取决于孩子个人的学习能力是否与某些规定的课程相符合，进一步说，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如果一种教育体制使得很多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低于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社会以及依靠

民众支持的艺术所要求的水准，那么就不能说它是适当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教育在 15 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在这个年龄，即使之前接受的教育堪称完备，很多明显不同的成长过程 and 选择都还没有涉及，而教育显然可以培养他们这些方面的素质。如果一个拥有中等学习能力的孩子不能在目前规定的年限内，学到当代普通教育的精髓，那么唯一明智的答案是给他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抱着一种顺从天命的遗憾心情，将一些精髓弃之不顾。我们必须考虑作进一步的扩大（就像生活在 19 世纪的人们那样迎着困难去思考，而他们当年想要达到的标准如今已被我们全盘接受），这是顺从于我们的需要，而不是顺从于我们所继承的模式。

这些精髓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清晰一致的认识，因为我们基本上不这样想问题，而是被机构组织方面的问题牵扯了太多精力，或者就是只对 19 世纪的定义做些小修小补。下面我将提出每个受教育的普通孩子所应达到的最低目标，作为讨论的基础：

(1) 在基础英语和数学方面的大量练习；

(2) 对我们自身以及周遭环境的一般知识，在中学阶段，它们不是作为独立的学术性课目来教授，而是作为从在更高的学习阶段才能弄明白的各学科中抽取出来的一般知识来教授的，比如说： 175

① 生物学，心理学，

② 社会史，法律和政治制度，社会学，描述性的经济学，包括实际的工业和贸易在内的地理学，

③ 物理学和化学；

(3) 历史和文学批评，视觉艺术，音乐，戏剧表演，造景与建筑；

(4) 民主程序方面的广泛实践，包括开会、谈判以及选举和担任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在利用图书馆、报刊、电台和电视节目以及其他信息资源、舆论和影响方面的广泛实践；

(5) 至少要对一种异族文化有初步了解，包括其语言、历史、地理、制度和艺术，这种了解应部分来自于访问和交流。

根据这种定义，我们可以来调整教育机构。我们也许不该让青少年在目前这种学校里呆到 16 岁以上，在这个年龄，他们的人生成长最迟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课程中许多最有趣的工作可能要推迟到这个年龄之后，而且是在比现在种类更多的机构当中来做，伴随着普通教育的延续，在许多情况下为开始特定职业的培训而作准备。在可以建立的机构中，包括了郡立学院、技术学院、夜校、与当地的大学有联系的高级学校、“三明治”课程班^①、见习学校、脱产学习机构、海外学校、探险学校等等。其准则应该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并且提供一切职位都必须以能认真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为前提条件。既然工作的性质变了，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急于把人赶进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教育机构都是能够被青少年以及刚成年的年轻人所接受的那一类，并且他们能够通过参与机构的直接管理工作得到实质性的民主训练，那么我们就极能极大地削弱那种已经在逐渐弱化的对于教育的抵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教育是按照孩子的需要来设置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它被认为与将来的成年人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在这个发展阶段，教育机构的多样化所要应付的，可能更多的是能力和兴趣方面多样化的问题，而不是粗略地给两到三种“思维类型”分出等级，并随而让一种主要“类型”自行其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向，从大约 16 岁到 25 岁之间的年轻人，会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设定他们自己的标准，并且拒不承认他们是孩子，也不认为他们紧接着会变成成熟的成年人。教育上的巨大挑战和机会正在于此，如果我们把中等教育当作是为这一阶段所作的准备，那么我们就只有奋起应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表述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形态，而不是复制其他社会的种种模式。

乌托邦式的想法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拥有良好教育的、共同参与的民主社会，工业和服务业都有着充分的人际交流，并且拥有一种高质量

^① “三明治”课程班(sandwich courses)，三至六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译者注

的共同文化，它宣扬这一切美好之物，并且还我们的培训机构以其本来面目。我相信前面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会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逆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性质，或者我们是否还要固守那些建立在一个人数有限的统治阶级、一个中产职业阶层以及一个人数庞大的劳工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模式和教育模式，它们被那些不容挑战也不会被改变的力量熔铸在一起。那些传承下来的特权和屏障无论如何都得打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用自由运行的市场来替代它们，还是用一种旨在表达并创造一个有教育的民主社会和一种共同文化之价值的公共教育来替代。

读者大众的发展

根据对读者大众(reading public)这个词的不同解释,历史学家可以放开手来,为读者大众在英国的出现选择几个不同的日期。经常性的阅读——即使是读报纸,仅仅是在20世纪,才在我们大多数人当中普及开来,而只是在我们这一代,经常读书的人才勉强够得上多数。但在19世纪,也有过阅读方面的巨大扩展,这种扩展有时候是波澜壮阔的。在18世纪,同样也有过重大的扩展,既创办了定期性的报章杂志,也改变了文学的社会基础。由此再往前追溯,便可以发现,在17世纪的时候,其实也有过这种发展,尽管发展得并不平衡,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这种发展追溯到引入印刷术的15世纪70年代。事实上,如果我们取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探寻定期制作各种书籍复本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纪。在罗马统治时期,实际上有一套从抄写到听写的团队系统在组织安排各种书籍的制作,而且据说依靠这种方式,在任务下达的一天之内,一版书籍的制作量可以达到500至1000册。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工作室当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我们现在还保存有阿尔昆时代的约克郡此类书籍制作的相关记录。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的确很慢(一天之内出一版要靠几千名奴隶的劳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可能也是罕见的特例),也很容易让人低估人们能够获得的书籍的数量,这些书籍很多当然是为了直接的专业用途而抄写的,但同时也有迹象表明这些书也在修道院之外售卖,而在大学加入修道院的书籍制作之后,书也在大学之外售卖。在印刷术引入

之前的14和15世纪，卖手写书籍的，有集市上的商人、走街串巷的小贩，在伦敦则有店主，主要是杂货商和绸布商。我们似乎可以大体不错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中世纪，一个由教士、学者和大学生、医生和律师组成的庞大的专业读者大众一直在稳定地发展，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又有数量虽少但值得注意的一群普通读者加入进来。有意思的是，当卡克斯顿^①开始印刷业务时，他最主要的出版物当中，有些是一般性的文学读物，而且用的是本地语言，这既是为了满足在手抄书时代晚期众所周知的书籍需求，同时也标示了未来的大势所趋。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一时期阅读的发展所知甚少，当时的读物可谓五花八门，既有中世纪皮藏的圣经典籍、基督教神父的福音书以及拉丁文和希腊文世俗作家的著述，也有学校用的课本、本地语翻译作品以及诗歌、史书和罗曼司。但话本(chapbook)、笑话集、歌谣以及大报^②的流行，则至少要等到16世纪，它们的流行意味着一个广泛的读者大众业已形成，尽管其规模尚小且参差不齐。对这一时期识字率的估测有较大的差异，莫尔^③暗示识字率超过了50%(十个人里还是有四个以上的人从来就不读英文)，而加迪纳^④则认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1518年，科普兰^⑤在回复一位请求印刷自己作品的作者时，这样生动地写道：

站在你的立场上我乐意印，
但我想它只能有一丝微音。
书籍本不应该被弃如敝履：
我猜想它的时代已经过去。

①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1422? —1491)，英国印刷家，他于1476年第一个将印刷机引入英格兰。——译者注

② 大报(broadsheet)，一种沿街叫卖的大幅印刷物，通常为单张，单面或双面印刷，尺寸比一般报纸大，内容包括歌谣和政治讽刺文等。——译者注

③ 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以《乌托邦》一书而名垂青史。——译者注

④ 加迪纳(Stephen Gardiner, 1483—1555)，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主教。1547年，时任温彻斯特主教的加迪纳在一封书信中有此评述。——译者注

⑤ 科普兰(Robert Copland)，英国印刷家、作家，活跃于1515年前后。——译者注

骰子和纸牌都有美酒相伴，
双陆棋、九柱戏和球也好卖。
人们让孩子们用这等贱货，
可要说到买书就不肯许诺。

当然，如果我们将书价和那时候人的收入——即使是牧师和学校校长的收入——相比，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抱怨了，它似乎也预言了将来的情况。自那以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忧心忡忡，说过“书籍本不应该被弃如敝履/我猜想它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话。但书还是到处皆有，而且显然大有市场，其数量之多足以使圣保罗学校的科利特^①要把这些“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流水账”的书籍统统“扫地出门”。这一评判如今已为人熟知，它的出现，令人感到一个真正的读者大众在那时已经开始形成，与此相联系的一些问题也已经存在。

读者大众的历史可绝不只是与技术水平相关，事实上它自始至终都与两个很难解而且经常混淆不清的价值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那种很平常的记录也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一方面是担心随着读者圈的扩大，标准会降低，文学会受到“流水账”的威胁。与此相关却又包含着其他偏见在内的，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恐惧，即担心一旦普通人都能阅读，素养和秩序（有时候两者可以互相代替）就会遭受威胁。对素养可能遭到威胁的强烈忧虑，常常导致对实际的阅读史作出极不真实的描述，把笛福或是《花边消息》^②看作是洪水猛兽一样。与此同时，各路权威一时之间都纷纷公开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来阻止或是限制阅读的发展，或者是对必然会推动阅读发展的教育加以阻遏和限制。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关于素养和

^① 科利特(John Colet, 1467—1519)，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他创建了著名的圣保罗学校。——译者注

^② 《花边消息》(Tit-Bits)，1881年在英国创办的一份周刊，全名为 *Tit-Bits from all the interesting Books,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 of the World*，意思是从有趣的书、期刊和报纸中摘录的各种花边消息。——译者注

关于民主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了，这两种争论貌似不相干，实际上却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从而使文化上的论辩屡屡走入死胡同，让人感到极其沮丧和困惑。我们必须重新去翻检记载资料，把那些老套套放在一边。

什么是好的阅读，什么是不好的阅读，其间的分野在读者大众形成的最初这几个世纪里，基本上是教条性的，和宗教有关。正如我们在对教育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抬高基督教作家，抹煞或是贬抑“异教徒”作家，这种分别对待的主张，在几个世纪里从来不曾断绝。在中世纪晚期，这种区分被有效地打破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将越来越多的希腊语和拉丁文作家从“异教徒”带入“经典”的殿堂。但是，这一进步遭到了两股力量的限制甚至是部分抵消：第一股力量是围绕赞成改革还是反对改革而进行的长期的宗教论辩，结果是从正统和异端的角度，对“好”和“不好”作出了新的定义；第二股力量是清教主义，它使能够改良人心的作品与扰乱人心、腐蚀思想的作品之间的陈旧区分死灰复燃。就前一种情况来说，1538年发布了一个公告，所有英文书籍都必须接受审查，不管它们是本国生产的还是进口的，1543年的法案本着“增进纯正的宗教信仰，取缔敌对势力”的宗旨，禁止以下人等阅读任何一种英文圣经：工匠、雇工、身份低于自耕农的男仆、农夫、劳工，以及非贵族和士绅阶层出身的所有妇女。同时，在俗文学的领域里，戏剧和罗曼司一直遭到攻击，它们被认为不是什么严肃读物（在公共图书馆的统计说明中，我们看到这种区别对待仍然残存着），和礼仪举止、家政管理、旅行、自然史、公共事务（通常不是当代的）方面的书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干预和判断当然影响了阅读的发展，但最终还不能决定其走向。大量小说和罗曼司都伪装成旅行、历史或礼仪方面的书籍，在当时，它们虽然遭到了镇压性的抨击和批评，却为廉价小书（chapbook）、大报以及谣曲集的畅销打下了基础。晚至伊丽莎白时代，对手抄书的尊崇和对出版市场的厌恶，都还严重影响到文学的流通，有很多冠冕堂皇的劝诫，以及对小说的清教徒式的抵制，这使得关

181 于读者大众及其标准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莎士比亚、琼森等人的剧作的出版，则是异峰突起：它们是高端文学，将古典和通俗的传统兼容并蓄，对消闲性戏剧的清教徒式的指责，对图书业之粗俗的冠冕堂皇的厌弃，以及学院中人拒绝承认英国戏剧可算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它们最终获得永恒的地位。这也是一个翻译作品繁盛的时期，英国读者大众能读到的书的质量，事实上在稳定地提高，尽管它们与当时关于“标准”的大多数定义是相抵触的。想一想有多少我们今天所推崇的作品在那时却广受责难，被当作那个时代的荒唐怠惰以及粗俗鄙陋的标本，这真是够讽刺的。实际上，读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在稳定地上升。书价从霍林思赫德^①时候的 26 先令降到莎士比亚时期的 4 便士或 6 便士（6 便士相当于当时两顿饭钱）。在 16 世纪初，印刷商的数量只有两到三家，1558 年上升到 13 家，1563 年有 34 家，1577 年有 40 家，而在 1590 至 1595 年间，更是上升到了 97 家。其后，通过特许专卖权来实施的贸易保护限制了印刷商的数量，但在 1649 年和 1660 年，伦敦仍然至少有 60 家印刷商，在 17 世纪 90 年代，又开始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扩展到了郡县。剔除谣曲集和小册子之后，实际出版的书籍数量很难估计，但总的趋势很明显：1510 年有 13 种，1530 年有 28 种，1550 年有 85 种，1581 年可能有 150 种，此后大体稳定在这个数字上，直到内战时期和共和政体时期，才有了更迅速的上升。王政复辟时代有所下降，年均出版量稳定在 100 种左右，直到 18 世纪中期为止。与此同时，每版印数从 16 世纪最高的 1500 本左右（语法书和祈祷书除外，它们可以高达 3000 本），上升到了平均 2000 本，在 18 世纪之前，每版印数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准上。《失乐园》在两年内卖了 1300 本，非常流行的夸尔斯^②的《寓意画和象形文》（*Emblems and Hieroglyphikes*）

① 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 1529—1580），英国编年史家，著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通常被称为霍林斯赫德编年史。——译者注

② 夸尔斯（Francis Quarles, 1592—1644），英国诗人，从 1635 年开始，他出版了多种寓意画册（*Emblems*），这些画册配有诗和木刻插图。——译者注

更是在两年里卖了 5000 本。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预卜历书”(prognosticating Almanacks)的销量来估算更普通的读者大众的规模，在 1646 到 1648 年间，在众多流行历书中，每一种的平均销量超过了 16000 册，谣曲集、大报和廉价小书的读者数量至少不下于 20000。在读者大众开始形成的这些初期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更大规模上被不断重复的一种模式：对文学、哲学及类似著作感兴趣的读者群发展较为稳定，对那些昙花一现似的读物感兴趣的读者群，其发展更为迅速。但是这种质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这种昙花一现似的读物——特别是小册子、传单和谣曲——所占有的比例，一方面是标志着传统的大众消遣品转向了印刷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人们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的兴趣在上升，并在内战期间达到了顶峰。

182

在王政复辟之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很难加以分析。我们在某些方面所掌握的不完整的材料一方面是暗示着常规的扩展模式仍在延续：严肃的读者群发展缓慢，偶尔阅读的读者群则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阅读的扩展显然是限于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之内。在这个新的时代，人们对大众教育的态度的确有所不同，在从王政复辟到 18 世纪末这段时间里，总识字率似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可能是下降了。正是从 17 世纪 90 年代起，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读者群有了明显的增长，它与中产阶级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构成这个中产阶级的，主要是商人、店主、管理人员和文员。报纸、期刊和杂志等新的阅读形式，使读者大众有了较大的扩展，继之而起的是小说，它从一开始就与这个特殊的读者群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的印刷所从王政复辟时代的 60 家增加到 1724 年的 75 家，到了 1757 年，更是增加到 150 至 200 家。在 18 世纪 40 年代，《绅士杂志》^①每期能卖到 3000 份，排名居前的报纸也能达到这一数字。小说的销量也在增加，

183

^① 《绅士杂志》(*Gentelman's Magazine*)，创刊于 1731 年，是近代第一份以杂志命名的刊物，内容包括文艺、科学、新闻等方面的资料。——译者注

比如《约瑟夫·安德鲁斯》^①在13个月里卖了6500本，《蓝登传》^②在一年内卖了5000本，《查尔斯·格兰狄森爵士的故事》^③在几个月里卖了6500本。这些发展影响到作者、图书商和读者之间的整个关系结构，笛福在1725年这样写道：

写作……已经变成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图书商都是大商人或大雇主。作家、写手、抄写员和审稿编辑以及所有跟钢笔、墨水打交道的人，全都是那些大商人的雇员。

这一评论被哥德斯密^④换成了人们更熟悉的定性评判：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革命，写作沦落为一桩机械的生意。

印刷的传播被看作是对文学和学问的一种威胁，对消遣性期刊、报纸以及小说的谴责也时有所闻，而且要比前一个时期更加严厉。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作出判断还是很难。报纸和期刊虽说往往很糟糕，但作为新的形式，它们似乎也有着不容质疑的文化价值；而有一部分小说则必须看作文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其重要意义可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优秀戏剧相比，那些剧作同样也是矗立在大量劣作的基础之上的。

读者大众虽然在继续扩展，但令人诧异的是，书籍生产的总量却变化很小。在18世纪中期，每年出版的书籍，其品种数量与17世纪持

① 《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菲尔丁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于1742年。——译者注

② 《蓝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小说，出版于1748年。——译者注

③ 《查尔斯·格兰狄森爵士的故事》(*The History of Charles Grandison*)，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出版于1753至1754年间。——译者注

④ 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或1728—1774)，爱尔兰作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威克斐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等。——译者注

平，约翰逊的《词典》印了2000本，用了4年多时间才卖完。只需看一下书价，也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蒲柏^①的《伊利亚特》每套售价是6个畿尼^②；克拉伦顿^③的《历史》每卷售价为30先令；希克斯^④的《词库》售价为5英镑。同时期的小说，装订本每卷售价为3先令，未装订本每卷售价为2先令3便士，所以《汤姆·琼斯》可以卖到18先令或是13先令6便士，而《鲁滨孙漂流记》因形式不同，5先令就能买到。书价这么高，买书受到了社会性的制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读者大众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集团购买的方式来获取书籍的。私立图书馆通常附属一些文学和哲学社团，购买的主要是历史、哲学、诗歌、神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在许多城镇发展起来的图书俱乐部所购书籍其范围则要宽一些。就拿小说来说，在矿泉疗养地最多见的流通图书馆的迅速发展，也是一个限制因素，尽管这些图书馆要收取最低为10先令6便士的会员费。报纸和期刊的售价虽然只需几个便士，但它们被广泛阅读，还是靠了咖啡馆和俱乐部。这些因素制约了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扩展速度，但如果民众教育做得更好的话，也完全有可能在相同的条件下，使这一读者群获得更广大发展。事实上，对历书、廉价小书、谣曲集、大报以及小册子的需求似乎并未放缓，反而可能有了较大的增长。小册子售价在3便士到1先令之间，话本和大报售价在1便士到6便士之间，谣曲集售价为半便士或1便士，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种小册子在1750年卖了105000本。很多小说在报纸和廉价小书上连载，在伦敦以及一些比较大的城镇里，似乎极有可能已形成规模相

① 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他翻译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于1715年开始出版。——译者注

② 畿尼(guinea)，一种英国货币，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的，因此得名。一畿尼为21先令。——译者注

③ 克拉伦顿(Edward Hyde, 1st Earl of Clarendon, 1609—1674)，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其代表作为三卷本巨著《英国叛乱史和内战史：从1641年起》(*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Begun in the Year 1641*)，出版于1717年。——译者注

④ 希克斯(George Hickes, 1642—1715)，英国神学家、学者，其《词库》(全名为*Linguarum veterum septentrionalium thesaurus grammatico-criticus et archæologicus*)出版于1703—1705年间。——译者注

当大的读者大众。

在 19 世纪最后 30 多年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卫斯理公会的信徒们热心地组织开展民众阅读活动，并为此而印了不少小册子，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也随着主日学校运动的广泛开展，一场更加广阔的扩展运动已初露端倪。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上升了，其情形与内战前大致相仿。在 1776 年，普莱斯的《关于公民自由的评论》(*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卖了 60000 本；而在 1791 年，潘恩的《论人权》(*Rights of Man*) 虽然售价高达 3 先令，却在几周内卖掉了 50000 本，其廉价版的销售量的确更大，但 150 万这个估测出来的数字，却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很显然，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确实扩大了读者大众的队伍，从在早期的阅读扩展中未被触及的群体那里，发展了一批新的读者。此时，每年出版的书籍数量也在迅速上升，在 1792 到 1802 年间，平均每年达到了 372 种，这和 1750 年代相比，的确有了很大发展，那个时候，年均出版书籍数量只有 100 种。至于说到书价，在这个时期，情况也有了奇妙的变化，普通书籍的价格上升很快，在 1780 年后，出版商更喜欢采用小印数、高定价的出版方式，而不是加大印数，定价却维持在世纪中叶的水平上。另一方面，书籍的定期重印也是最早出现在这个时期，这些再版书的成本极为低廉，贝尔^①的《英国诗人》、《英国戏剧》和《莎士比亚》，售价低到 6 便士，随后出现了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的标准系列再版书。在那个世纪里始终受欢迎的小说连载，此时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正规的出版商们在不断提高书价，同时也有很多新的出版商在对许多再版书吸骨敲髓，进行盗印，或是加以剪裁，这样就永久性地扩大了读书大众的规模，使其人数达到了与报纸期刊的读者大体相当的地步。

^① 贝尔(John Bell, 1745—1831)，英国出版家。从 1777 年到 1783 年间，他出版了《英国诗人：从乔叟到丘吉尔》(*Poets of Great Britain Complete from Chaucer to Churchill*)，此书是为普通读者编撰，共有 109 分册。《英国戏剧》和《莎士比亚》也是这种多卷本出版物。——译者注

读者大众的基本发展趋势再次变得很明朗，但在这个时代，阅读全面扩展的步骤过快，这使得比例失调的问题变得异常尖锐。读者大众高速扩展的势头，到了19世纪30年代才真正地被打断。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以及彼得卢屠杀^①的那一代，通过阅读在许多方面都深受政治危机的影响。18世纪的扩展仍然沿着熟悉的路线在继续推进，书籍的年均出版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792至1802年间的372种增加到1802至1827年间的年均580种。所增加的书籍大部分是小说，这种增加也跟流通图书馆的成功直接相关。在18世纪80年代，每年出版的小说，数量上升很快，并始终保持着这种迅猛的上升势头。但是书价也在不断上涨，这使得读者大众没能因为书籍品种的增加而获得相应的扩展。书籍每版的印数不等，通常的情况是，严肃些的著作，平均印数为750本，而放在流通图书馆里的小说，其平均印数为1250本。司各特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玛米恩》(*Marmion*)在一年内卖了11000本，每本售价31先令6便士；售价相等的《罗布·罗伊》(*Rob Roy*)更是在两周内卖出了10000本。这些数字所表现的还只是通俗小说在18世纪中期的适度发展，而同样是在这60年里，报纸的年均销售量更是从700万份上升到了2400万份。在介于书和报纸之间的地带，长篇连载或是定期刊物仍然很成功，廉价的再版书系列也不断在推出，尽管其规模仍然极为有限。激进派作家在继续扩大读者群，约翰·韦德的《黑皮书》^②一版卖了10000本，科贝特^③的《告雇工与劳工书》(*Address to the Journeymen and Labourers*)在两个月里卖掉了20万本。

① 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1819年8月16日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的一场流血惨案。聚会群众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废除谷物法和取消禁止工人结社法，却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11人死亡、400余人受伤。由于镇压这次集会的军队，有的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故讥称这次流血惨案为彼得卢屠杀。——译者注

② 约翰·韦德(John Wade, 1788—1875)，英国激进的政论作家，其《黑皮书》(*The Black Book: Corruption Unmasked*)出版于1819年，此书详尽地披露了贵族和教士阶层的收入、皇室专用款、警察和法院等机构的费用等多方面的信息，销售总量超过了5万册。——译者注

③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英国小册子作家、新闻记者。1802年创办《政治纪事报》。——译者注

但正是在此时，当局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来阻止阅读的扩展，借口是过于广泛的阅读会带来政治危险。对报纸课以重税，再加上一系列的起诉，目的在于全盘扼杀激进出版物。对这种政治危险的另一种反应是廉价宣教手册的发展，这种“劝善”手册被用来抵消科贝特等人的成功影响，在最初阶段它们都获得了大笔的资助。与此同时，在真正流行的层面上，历书、谣曲集和大报的销量在不断上升，在整个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出版数字是由詹姆斯·卡特纳赫^①所创造的，在玛莉亚·马滕谋杀案中，他以凶手马滕的“临终遗言和忏悔”为名撰写的案件解说和执刑报道，卖了116万份。我们若是总览19世纪30年代初的状况，就能发现阅读物的范围与初期的报刊是基本相似的，但还是有两个重大的变化：文学书籍与大报在实际发行量上的差距在拉大，而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是小说、杂志、报纸等一系列新读物，正是它们满足了仍然处于扩展中的中产阶级读者群的阅读需要。正是19世纪30年代的这一系列新读物，引出了阅读扩展的下一个主要阶段。随着蒸汽印刷机的运用，报纸在19世纪30年代一马当先，那种在星期天发行的类似于警方公告性质的报纸，和以前的老式大报很相似，这种报纸的发行量一直领先于那些在18世纪创办的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廉价杂志随即跟上，尽管民众教育杂志取代了激进派的杂志，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它们又都被一系列旨在“改良”家庭的杂志所取代。连载小说扩大了其读者群，《匹克威克外传》第一期首印只有400份，但到第15期时，印数已扩大到4万份^②，和《便士杂志》的发行量不相上下。狄更斯和雷诺兹的连载小说其印数都曾达到10万份。随着蒸汽印刷机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推广使用，小说和非小说类的廉价再版书扩大了印数，而且由于发展出了新的装订方法——用纸板和布料代替了皮

^① 詹姆斯·卡特纳赫(James Catnach, 1792—1841)，英国印刷商和出版家，撰写并出版了不少廉价小书。——译者注

^② 《匹克威克外传》在20个月(1836年3月到1837年10月)里，共分19期连载出版。——译者注

革，书价也明显下降了。每年出版书籍的品种数量，从 1820 年代的 580 种上升到了 19 世纪中期的 2600 种以上，而新书的平均售价却从 16 先令降到了 8 先令出头。在增加的图书品种中，大部分是小说，而平均书价的下降则主要归功于廉价的系列出版物，事实上其他品种的书籍有很多是涨价了。

在同一时期里，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在 1750 年，英国本土人口约为 700 万，1801 年上升到 1100 万，1851 年接近于 2100 万，1901 年则达到了 3700 万。直到 18 世纪末为止，识字人口的比例一直上升很慢，在 19 世纪，由于初等教育发展较慢而且很不平衡，这一比例的上升仍然很缓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比例的确在上升，从保存下来的 1837 年的国家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出大体趋向。能够在结婚登记时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作为一个指标，显然还不足以证明本人是否具备阅读的能力，但在那个时候阅读方面的教育比之于书写，要普及得多，所以这项比例的变化可能不无重要意义。其中一份样本是这样的：

能签名	男 人	女 人	总 数
1839	66.3%	50.5%	58.4%
1873	81.2%	74.6%	77.9%
1893	95.0%	94.3%	94.65%

从初等教育的历史我们已经知道，1870 年的教育法案并没有马上带来识字率的暴涨。从 19 世纪的历史看，识字率似乎基本上是在稳步提高，在这方面城市（尽管在新老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和男人带头走在前面，而随着教育时间的延长，识字率的这种简单的扩大，也就意味着实际阅读能力的稳定提高。虽然识字率的扩大对读者大众有所影响（比如说为激进派的以及星期天发行的出版物提供了某种基础），但如果认为在那个时候读者大众的普遍扩展和识字率问题之间只存在一种简单关系，那是一种误解。不管就书籍来看，还是就杂志、报纸来看，读者大众在 19 世纪中期的扩展，仍然远远低于哪怕是按最低限度来估测

的一般识字率水平。真实的历史远不只是将廉价的读物提供给已有的识字人群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以及60年代的情况作一个大致的推算，将销售数量转换成读者数量，并把它纳入成年人口部分，那么就会看到下面的结果。在1820年，阅读日报的读者数量只占人口的1%左右，星期天出版的周报刚刚过1%，杂志在3%左右，那些不定期出版的大报大约为10%。在1860年，日报的阅读上升到3%，周报上升到12%，杂志接近20%。这些数字都远远低于这两个时期实际的识字人口比例。如果我们转向书籍，就会发现每一版书的实际印数有着相似的增长比率，尽管品种数量已有大幅度上升。《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①一年内卖了2万册，《悼念》(*In Memoriam*)^②在初版18个月里卖了25000册，《古罗马方位》(*Lays of Ancient Rome*)^③的廉价版卖了46000册。小说方面，《汤姆叔叔的小屋》在1852年出版后的最初6个月里，卖了15万册，但这只是一个特例。狄更斯和雷诺兹的连载小说能卖到10万份，但就在同时，萨克雷曾于1857年估算过自己的读者只有15000人，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卖得相当成功，但在第一年里也只取得了原版销售3350册、廉价版销售11000册的成绩。19世纪中期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虽然阅读书籍的人肯定是有所增加，但无论就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就实际数字而言，都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但不管怎样，随着全面扩展的启动，可称之为识字大众的人群和更广泛的读者大众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差距总还是存在的，就如同“预卜历书”的销量曾是《失乐园》的十倍，如今《世界新闻》的销量也是《亚当·比德》的十倍。但实际数字上的悬殊现在变得更为惊人，随着一个“群众性”的读者大众的发展，人们所熟悉的围绕着品质而展开的争论，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紧迫性。

① 司各特的叙事长诗，出版于1810年。——译者注

② 丁尼生为悼念亡友哈勒姆而写的哀歌，出版于1850年。——译者注

③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叙事诗集，出版于1842年。——译者注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这个阶段还不存在“群众性”的读者大众。就拿报纸这一最流行的阅读形式来说，在20世纪以前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人口多数的读者大众，周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登上了这一台阶，日报则要更晚些。然而在大扩展的第一阶段末期，也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新的出版形势的轮廓已经清晰地浮现出来。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读者大众在不断扩展，而如今其规模之大已足以吸引一种新的投机商人。笛福将写作说成是“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其组织管理采用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典型形式，这是准确地预见到了未来的形势，这种形势在市场变得真正巨大的时候才完全呈现出来。报界的贝尔，大报行业的卡特纳赫，“便士小说”（penny fiction）的劳埃德，他们都率先采用了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发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图书方面，到了19世纪中期，流通图书馆已达到如此成功的地步，以至其业主的趣味和需要竟可以对出版施加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流通图书馆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为那些有能力支付1畿尼年费的人群（当时中产阶级下层的年均收入是90英镑，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在150至400英镑之间），它们倾向于保持高费用，并限制读者规模。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打破了这一局面，并且革命性地改变了杂志、报纸以及图书的发行方式。铁路系统是最显著的因素，正是在新火车站的书报摊上，特别是在W. H. Smith的连锁书店里，书报得以以一种新的方式转到读者手里。廉价的Palour文库以及随后的Railway文库，就通过这个渠道来倾销：黄色的封底，花哨的封面，带有彩色插图，封底还附带广告。对报纸、广告和纸张征收多年的税捐被取消了。印刷机器很快得到改进，新的造纸工艺也被成功地开发出来（1860年后采用细茎针草作为原料，1880年代后改用木浆）。在社会和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总体收入水平在上升，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下层在迅速扩大。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投机商们抓住了机遇，但主要与老式流通图书馆的读者群捆绑在一起的传统的图书出版商们，却反应极为迟钝。晚至1880年，马修·阿诺德才评述道：

190

我们的国家文明程度更高了，真心喜爱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我们看到，在目前的英国，新书的售价还是太贵，造成这种状况的系统，以及人们借阅图书的出借图书馆系统，其古怪、牵强和不能令人满意，实在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体系卵翼了糟糕的文学，使之得以不断繁衍，同时又使好书变得如此高昂。

人们不能以如今已变得可能的低价格直接获得高质量的新书，主宰市场的是

一种廉价的文学，面目狰狞，卑贱下流，像那些摆在火车站书架上的眩人耳目的俗艳小说，它们似乎是奔生活水准较低的人群而来的，就像很多别的货色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中产阶级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一样。

阿诺德把低标准归因于“中产阶级”，如果我们记住这一如今已为人熟知的判断，那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阅读扩展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一非常重要的论争常常被混同于对“低下”社会群体的变相的蔑视，但我们必须把它与这种混淆区分开来。由于“廉价文学”被用来作为阶级区分的一种形式，关于它的全部论争也因而遭到连累，但经验不足与应付经验不足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的问题所在。当然，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记住这些问题并不是伴随着工人阶级学会识字而产生的，这对中产阶级无疑是有好处的；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也都犯过相同的错误，而且也显然受到了剥削。对后来者的讥笑永远都不会真正消失（目前英国最堕落的文化，是对滑稽可笑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嘲笑，从《戴尔太太的日记》^①到

^① 《戴尔太太的日记》（*Mrs Dale's Diary*），是 BBC 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部重要的系列广播剧，始播于 1948 年 1 月 5 日，1969 年 4 月 25 日停播。——译者注

《就此开始》^①，从《每日电讯报》到《每日镜报》，从伦敦西区平日里上演的讽刺剧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聚会时模仿可笑的“老土”腔调来表演的小节目，都是这类货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决不会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了。面临着这些新问题的人们若是以肤浅的方式回避真实的问题，是与己不利的，而这些问题正是阿诺德(尽管他也不时地会犯这种错误)曾经予以界定并努力去解决的。

在19世纪后半叶，出版工业这个“英国商业的分支”其规模发展得非常迅速。杂志的扩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时期，而在图书方面，廉价的标准文学再版书系也开始与黄皮书并驾齐驱。高收费的流通图书馆逐渐衰落，到了19世纪末，收费相对低廉的图书馆——尤其是1900年后的布茨图书馆^②——取代了它们的位置，拥有了更大的读者群。从19世纪中叶起，公共图书馆也在缓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日渐重要的分支。

到了1900年，具有现代特征的读者大众的各种组织形式已经被摸索出来，并且固定下来，它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阅读的历史如今变成了这些形式内部的扩展史。报纸和杂志的大规模扩张需要单独进行研究。在图书出版方面，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从19世纪50年代的2600种上升到了1901年的6044种，在1913年又上升到12379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有所下降，在1924年跌到了12690种(包括3190种再版书在内)，到了1937年又上升到17137种(包 192
括6347种再版书在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均出版品种的数量再次下跌，但到了1950年又回升到17072种(包括5334种再版书在内)，而在1958年更是上升到22143种(包括5971种再版书在内)。书价已再次上升，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平装书数量的激增，其中

① 《就此开始》(*Take it from Here*)，BBC广播电台在1948至1960年间连续播放的一档广播喜剧节目。——译者注

② 布茨图书馆(*Boots Library*)，是一家连锁的图书出租机构，创建于1898年。——译者注

主要是再版书，但有意思的是，也包含了一部分新作。这一发展对于阅读的总体扩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商业性的流通图书馆继续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据估计（因为没有完整的数据）它们一年的图书流通量将近 2 亿册。正儿八经的书商仍然不够稳定，但为平装书而建立了许多新的销售点，从香烟店到加油站，它们加入了火车站书店和连锁店的行列。到了 1911 年，公共图书馆系统已经能覆盖 62.5% 的人口，到 1926 年，更是提高到 96.3%。现在几乎是到处可见，尽管在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流通量已经有了稳定的上升，在 1948 至 1949 年间达到了 3.12 亿册，在 1957 至 1958 年间更是达到了 4.31 亿册。把图书流通的各种方式都考虑在内的话，在目前阶段，全国平均每人每年读书 15 本，按成年人来算则达到了人均 20 本。这个平均数当然是掩盖了个体之间的极端不平衡，但可以说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才第一次有了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书籍读者大众（可与之对比的是，1910 年有了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周报读者大众，在 1918 年后不久有了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日报读者大众）。

随着这一扩张，关于品质的争论——对文学与“流水账”的老掉牙的区分——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尖锐起来。但是，只有站在历史分析的角度并且参照社会其他各部分的发展，这种争论才有磋商的余地。最糟糕的错误是假定我们的先人——年代也许难定，但他们总归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遇到过这些问题。有证据表明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这是一个贯穿整个扩展过程的问题。更切中要害的探询是去探究文学与

193 “流水账”的性质在不同的社会 and 生活方式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两种形式在它们的时代里，都被谴责为低劣的、无聊的——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通俗戏剧和 18、19 世纪的小说，但今天却隆重地代表了我们的文学标准。保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决不都是那些传统上得到认可的形式所留存下来的作品。报纸和期刊本身也是丰富的宝库，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很糟糕的例子。另一方面，也有大量

的作品恰如柯勒律治所精辟地形容的那样，

其特征即在于有能力将人类天性中两种既对立又并存的倾向——即对懒散的沉迷和对空虚的厌恶——调和于一炉。

这种安逸而又沉迷的阅读方式，是多如牛毛的速朽读物得以永久存在的前提。但问题还在于是什么样的外在条件使得这种沉迷成为一种需要。我认为有这么一些条件：时代的不健康，紧张，青春期成长的骚动，以及工作后的疲惫，在笼统地谴责“沉溺性的阅读”时，这些都是很容易遭到忽视的因素。我怀疑，受过教育的任何一个人都曾用这种方式来读过书，不管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书。个人和社会都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阅读严肃文学所需要的那种注意力。我们应该充分关注产生社会变异的各种条件：铁路旅行和这种阅读方式的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显然很重要。更难以分析的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明显区分，有些生活方式激发了人们的注意力，并给他们带来安宁，而有些生活方式则既不能激发注意力也不能带来安宁，反而制造了一种茫然的躁动不安，需要想方设法去平息。这些都是与整个社会相关的根本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存在着社会组织方面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特别盛行的心态，特别是可以解释当我们发现有很多路都被堵死、但我们又必须经受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并寻找其根源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不可能单独在出版领域里获得解决，但是在这个有限的领域里，我们都能看到相比较而言是无害的沉迷与有害的沉溺之间的差异，Q·D·利维斯曾举过这方面的例证，理查德·霍加特最近也曾举例为证，如果把这些例证的社会背景考虑进来，那么它们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发现、讲解并讨论这种差异，以及文学著作与速朽读物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是教育所要做的事情。而社会所要做的事情（除了在不那么重要而且被弄得乌烟瘴气的“淫秽”读物这一领域之外，其余方面全都被忽略了），是创造并维持使这种必定是艰难的发展得以继续下

194

去的种种条件，特别是要通过创造和巩固一些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机构应该建基于一些更加恰当的原则，而不是建基于那种使投机商得以捷足先登的迅速获利原则。我们所追踪的这些变化，以及由此而获得的认识——即生产和分配的形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至少可以为我们接下来的思考扫清道路。

大众报刊的发展

报刊在英国的发展，尤其是大众报刊的发展，对于解释我们文化上的全面扩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意义，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一个中产阶级读者大众开始确立，后经一系列的扩大，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形成了全民性的阅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报纸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显然值得加以分析，这不仅是因为它贯穿了始终，而且也是由它作为传布最广的印刷品的地位所决定的。

这个发展过程的某些事实真相已很难证实，事实上，有些事实由于记录材料的遗失或是未获保存，已不可能被证实。但还是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可用来建立一个一般性模式，而报纸的历史可以充分忠实地再现这些事实。但一旦进入分析，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主要缺陷。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是，我们仍然没能把报刊史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在一起，而报刊史是必须放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内部来解释的。此外，还存在着一种令人诧异的倾向，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报刊发展的某些固定说法，似乎很少是从报刊发展的史实中得出的，而更多的是出于附会。先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解释总体的文化扩展，然后不顾事实地把报刊史塞进去，使之与这种总体解释相吻合。

这些说法中最常见的一种，是认为在《花边消息》和《回音》^①于

^① 《回音》(Answers)，一开始名为《记者回音》(Answers to Correspondents)，是诺斯克里夫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译者注

196 19世纪80年代问世之前，以及诺斯科克利夫^①的售价为半便士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在1896年创办之前，英国是没有什么廉价的出版物的。1870年颁布的教育法案被说成是新报刊的基础，英国的普通民众正是因此而学会了阅读。在这一点上，这种老套的说法还引出了另外两个结论。其中之一是说，作为有活力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大众报刊得以创建，是这个进程的一个结果。另一种则说，随着大众登上文化舞台，报刊大体上变得无聊了，堕落了，而在以前，当它为少数受教育者服务时，是认真负责的。

这两种结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如今已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但凡对报刊史或是教育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在胡说八道。颇为有趣的是，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诺斯科克利夫那里，他在1883年跟马克斯·彭伯顿^②这么说过：

寄宿学校每年都在培养几十万渴望阅读的男男女女。他们不喜欢普通的报纸，对社会也不感兴趣，但他们愿意读一切简单而又有足够趣味性的东西。搞出《花边消息》的那个人，是抓住了一件超乎其想象的大法宝。他只是抢先站在了一个即将改变整个新闻界面貌的发展过程的起点。我将试图和他取得联系。

这是一个投机商的真实想法(吉辛在《新格拉布街》里曾经这么说过)。它表明了一种态度，因此不无重要意义。但后来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R·C·K·恩索尔^③在《牛津英格兰史：1870~1914》一书中，把1870年当作一个分水岭，并且说这是一个“英国新闻界赢得尊严的时期”，

① 诺斯科克利夫(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Northcliffe, 1865—1922)，英国报业巨头。——译者注

② 马克斯·彭伯顿(Max Pemberton, 1863—1950)，英国通俗小说家，擅长写冒险故事和神秘小说，代表作有《铁海盗》(*The Iron Pirate*)。——译者注

③ 恩索尔(Robert Charles Kirkwood Ensor, 1877—1958)，英国作家、诗人、记者和历史学家，《牛津英格兰史：1870—1914》是多人合撰的多卷本《牛津英格兰史》中的一卷。——译者注

其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延续到 1886 年甚至更后。但是其毁灭的种子已经发芽。在福斯特教育法案颁布十年后的 1880 年……纽恩斯^①开始意识到新的学校教育正在塑造出一个新的潜在读者阶层,这些人被教会了如何去识别印刷字体,却没有学到更多的其他东西。于是他创办了《花边消息》。

在这之后,这种说法就牢固地盘踞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并且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数次被印刷成文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在 1947 年的皇家出版调查报告中读到: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卖半个便士的报纸,其读者对象不是 197
受过较高教育并有着政治头脑的少数人,而是数百万的群众,1870 年的教育法案使他们掌握了阅读能力。

如果我们像通常那样,从这么一个被当作事实来提供、实际却并非事实的假设出发,来开始探询,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往前,提出真正相关的当代问题,也不可能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即用实际的历史教训来照亮我们目前的紧迫局面。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事实能够得到澄清。但首先要做的事情,简要地说,是确定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关捩点,以及它们所表明的一些问题。报纸是商业中产阶级(主要是在 18 世纪)所创造的产品。它通过提供与商业行为相关的新闻来为这个阶级服务,并就此将自身确立为一个财务上独立的机构。与此同时,期刊和杂志则是为整个中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而服务的:舆论的形成,礼貌的养成,观念的传播等等。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报纸加入进来,部分地承担了这些功能。

^① 纽恩斯(George Newnes, 1851—1910),英国出版家和编辑,他于 1881 年创办了《花边消息》。——译者注

在形成舆论方面，历届政府都曾试图控制和贿赂报纸，但都因为它们有着很强的商业根基而最终告败。《泰晤士报》是这些报纸中的一份，当它在19世纪初宣称完全独立的时候，发现自己因为这一举措，以及靠着新的(蒸汽)印刷机器的助推之力，而占据了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并能将势力扩大到范围广大的中产阶级。

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还明显存在着其他的生长点。在18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之间，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20年里，在新近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当中，曾不断作出过种种努力，以反抗政府的严厉压制，并在一个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创建某种报刊。就其直接形式而言，这些努力是被摧毁了，但一种有着更广泛的民众基础的报刊却以另一种方式实际上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周日报纸(Sunday paper)这种机构来实现的，尤其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周日报纸具备了一种与日报完全不同的特色和作用。在政治上，这些报纸的立场是激进的，但其突出的重点却不是政治，而是各种材料的大杂烩，在类型上与较为陈旧的通俗文学形式基本相似：谣曲集、廉价小书、历书、谋杀和行刑故事。从1840年以来，销路最广的英文报纸不是《泰晤士报》，而是这些廉价的(便士)周日报纸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

在1855年，随着对报纸征收的税捐最终被取消，日报有了彻底的改观。由《电讯报》引领的一种廉价的(便士)都市日报，迅速取代了由《泰晤士报》所引领的那种旧型报纸而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在中产阶级的下层中得到了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地方报纸也稳定地发展起来。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新闻纸价格的下降以及铁路的四通八达，报纸的发行量上升很快，在1880年达到了70万份。但周日报纸的发行量仍然居前，到了1890年，报纸的发行量达到了172.5万份，其中位居首位的报纸销量达到了将近100万份。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还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报纸类型，即晚报，它的编辑方法很多是从周日报纸那儿搬来的。

在19世纪90年代，继大众期刊有了新的扩张之后，出现了一种更

便宜的日报，即售价为半便士的《每日邮报》，它有意识地模仿了《泰晤士报》，但面向的却是一个不同的读者群。这份报纸的出现明显推动了日报在迅速发展中的中产阶级下层中间的流行，尤其是在那些较大的城市里面。报纸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报纸是由老式的商贾阶层支撑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大众”广告。到了1900年，日报的读者人数（以一条仍然相当平缓的曲线）攀升到了150万人，到1910年则达到了200万人。周日报纸拥有大批新老读者，仍然位居前列。

在1920年，虽然对新闻的需求已不如战争期间那么迫切，但日报的读者人数仍然超过了500万，周日报纸的读者人数则超过了1300万。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日报开始真正扩展到工人阶级当中，尽管在1937年前，日报的读者人数甚至还不如1920年的周日报纸的读者人数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报的内容有了急剧的转变，同时展开的是一场扩大发行量的竞赛，其目标是获得更多的“大众”广告收入，而若是没有广告收入，报纸就将出现巨额亏损。一种新的报纸《快报》（*Express*）超越了《每日邮报》，它把政治时报和杂志混合在一起，其驳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从其外观的变化即可明显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报如同读者大众一样，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1947年，其读者人数接近了1500万。与此同时，周日报纸的读者人数则增加到了2900万以上。大众报刊读者数量的直线上升和真正确立，以周日报纸而言，是在1910到1947年间，而以日报而言，是在1920到1947年间。此外，它的确立，首先是靠着整个报刊界将传统的内容与1820年以来周日报纸的办报方式结合起来而实现的，其次是因为报纸拥有了新的经济基础——其运行本身是亏损的，需要靠“大量”广告的收入来弥补。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周日报纸（《观察者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它们有意识地模仿老式日报的办报样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而那些仍然存在的老式报纸同样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在这一波大扩张的最后十年里，一种新报纸，即《每日镜报》，从《快报》手中夺取了领先地位，而且现在明显地走在前面。这种新型报纸进一步地采用了大杂烩的手法，其外观变化也更大。在办报方式和内容上，《镜报》部分地吸收了传统周日报纸的经验，也部分地采用了新的广告（如今它已成为日报的商业基础）手法。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整个读者大众已被有效地覆盖，全面扩张的步伐放缓了，此时却出现了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在60年代，这一趋势仍然延续着），一方面是成功地向最极端的杂烩形式发展，另一方面是成功地固守着那些延续至今的老式报纸的最鲜明的风格。那些处于新闻报纸与杂烩之间、带有以前的混杂风格的报纸，则逐渐失去了读者。^[1]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最重要的地方（它们仍需要通过下文更全面的描述来放大）来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如今得以确立的大众报刊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内容和风格上，它是从一种旧的通俗文学发展而来，伴随着三个重要的转变因素：首先是由工业化引起的生产和分发手段的巨大改进；其次是同样由工业化引起的社会混乱，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追求民主的斗争；第三是作为报纸财政基础的广告制度的出现，它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以及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读者群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识字率本身并不是一个转变因素，即使假定1870年的法案为大众识字创造了基础——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识字的成年人的数量足以使其买下比现在《每日镜报》的每日销售总量还要多的报纸。识字率只是一个与其他变化相关的因素。所以，尽管提高识字率是明智之举，但在探寻大众报刊得以发展的原因时，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关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它的各种服务的支付方式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我们才算抓住了要点。

其次，大众出版的传播基础是什么？18世纪的《广告报》（*Advertiser*）和19世纪的《泰晤士报》都有一个特定的读者形象作为基础，他和报馆老板和新闻记者们都属于同一个阶级。20世纪的大众报刊有着一套特定的程式作为其形象，它的形成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

代，在19世纪90年代新的广告制度出现后又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一套关于“群众”(mass)或“大众”(masses)的程式，这样的“群众”或“大众”是一种特殊的非个人的群体，它与我们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工业组织的各个方面都是相符合的。20世纪的大众报刊最本质的新奇就在于它发现并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程式，在明智地关注这一程式的具体装置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大众”的程式与我们社会的实际性质、我们的文化扩展以及争取社会民主的斗争之间有何关系。 201

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入理解我们的报刊，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处于扩展中的文化的性质及状况，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指数。提出这些问题，并在它们所打开的领域中寻找答案，这是报刊的实际历史所引出的真实结果。我们若是拘泥于现有的状况，就可能会提出一些错误的问题，或者纠缠于诸如此类的没有结果的争论：有人说不管怎样报刊是自由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说无论怎样报刊都是琐碎浅薄的，而且已经堕落不堪。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僵局，而报刊的历史就提供了一条途径。

现在我将转向报刊的实际历史，我把它分成七个阶段：1665—1760年，是中产阶级报刊的早期阶段；1760—1836年，是争取出版自由以及新的大众报刊出现的阶段；1836—1855年，是大众报刊扩展的阶段；1855—1896年，是大众报刊扩展的第二阶段；1896—1920年，是大众报刊扩展的第三阶段；1920—1947年，大众报刊的扩展已告完成；1950年代，在大众报刊已达到的扩展范围内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1) 1665—1760年

英文报刊在最初阶段创基立业的故事，就是一个中产阶级读者群逐渐成长的故事。在英国文化的发展中，18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关键时期，新闻报纸和期刊，连同流行小说以及家庭戏剧一起，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文化的这种扩展其范围广阔且纵贯许多不同的层面，因而有着重大的意义。报刊的发展全面地反映了文化扩展的范围和层面，并在这种扩展过程中奠定了一种在随后的历史中变得极为重要的模式。 202

一个强大的新兴阶级的文化需要决不能被置之不理，但它们获得满足的方式却可能取决于法律、技术和政治方面的许多因素。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对报刊最大的因素，首先是通讯状况，尤其是邮政服务系统，其次是印刷业务从必须获得国家准许逐步过渡到面向市场的商业化状态。国家对印刷的控制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控制，它将这种传播消息和舆论的强大的新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也曾有过许多努力，想利用印刷来实现这一社会目的，但这些努力都受制于直接的政治审查。“科兰特”、“每日纪事”、“通道”、“情报员”^①都各显神通，以避免政治审查，但它们在根本上还是书或小册子。1637年，每周公共邮递系统的建立为采用一种新办法创造了可能性，这就是新闻邮件(news-letter)。其流传方式是：读者向书商订阅，书商雇人抄写，这样就能避开对印刷的种种限制。新闻邮件的好处在于自由，但在技术上却是明显退步了，而当一种技术上更先进的方法也能提供同等的自由时，新闻邮件就被淘汰了。但这要等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才会发生。^[2]

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是新闻纸而非书或小册子的发展——事实上是在官方指导下发生的。在1665年，《牛津公报》(*Oxford Gazette*)由官方正式发行，它采用了新的单页形式。它后来改称《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如今虽只是一份官方发行物，但在当年却是一份真正的报纸。而在同一时期，国家对印刷的控制采用了新的方法。为了阻止“对印刷的滥用，以及未经许可的煽动性的、叛国的书及小册子出笼”，1662年颁布的许可法案将主要印刷商的数量控制在20家以内；203 1663年，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被任命为报刊检察官，这实际上是垄断了新闻的印刷出版。所以，在找到适当的技术形式的

^① “科兰特”(Corantos)是一种早期的报纸形式，最初是单页，后来发展为8至40页的新闻书(newsbook)。“每日纪事”(Diurnalls)是17世纪内战时期流行的一种新闻书。“通道”(Passages)和“情报员”(Intelligencers)也都是这一时期的报纸或新闻书。——译者注

同时，对它的开发利用却遭到了顽固的限制。

然而政治力量的均衡局面如今已有了明显的改变，正如 1688 年在政治上是一个重要的日期，1695 年在报刊历史上也有着重大意义。在那一年，国会否决了 1662 年法案的延续执行，从而为以后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除了新获得的自由外，邮政系统也得到了改善，周二、周四和周六都有国内邮班，到肯特郡的邮班更是每天都有。这一扩展并不是缓缓来临的，在 1695 年到 1730 年间，三种形式的公共出版物确立了其牢固的地位，它们是：日报、地方性周日报纸以及期刊。在那些年里，这些新的报刊覆盖了文化发展的全部范围。

第一份日报《科兰特日报》出现于 1702 年，随后问世的有《邮报》(*Post*, 1719 年)、《日志报》(*Journal*, 1720 年)和《广告报》(1730 年)。在同一时期里，还开始出现了许多按照国内邮班的日期每周出版三次的早报和晚报。地方性周日报纸也在纷纷创办：在 1695 年到 1700 年间创办 2 家，1701 年到 1710 年间创办 8 家，1711 年到 1720 年间创办 9 家，1721 年到 1730 年间创办 5 家。在期刊方面，笛福的《每周评论》(*Weekly Review*)创刊于 1704 年，斯蒂尔的《闲谈者》(*Taller*)创刊于 1709 年。然而几乎是在同时，推出了一种新的国家控制形式，即征收印花税(根据版面大小征收 1/2 便士或 1 便士)和广告税(每插入一段广告征收 1 先令)，征收此项税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却是“禁抑流言蜚语的最有效的办法”。这种新的控制方式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国家许可证被市场税收所取代。

报刊扩张的压力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就消化了这些税收。尤其是每天出版的报纸，它们满足了新兴阶级的如此明显的一种需要，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其发展。只需瞥一眼其内容，就都一清二楚了，因为它们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商业利益的需要。在一开始，新闻主要是国外新闻，包括市场和船运的新闻。国内新闻中，最主要的一类是“股票价格，汇率变化，以及那些宣告破产的人的姓名及情况说明”。进出口物品的清单也赫然在列，然后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新闻，比如结婚、

死亡和审讯的消息等等。最后是那些实际上支撑着 18 世纪报纸的材料：大量的不起眼的商业广告。随着贸易的发展，最后这块内容曾一度变得最为重要，1730 年，《广告报》的问世便表明了对商业广告的重视。它开始完全是以商业传单的面目出现的，在广告不足的时候，就扩充内容，包括了“对国内外所发生事件的最新也最好的描述”。

《广告报》成了 18 世纪中期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它给予广告以优先的地位，把广告而不是新闻放在头版，从而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

而与此同时，期刊也在许多层面上满足了正处于上升之中的这一阶级的广泛兴趣。日报通常不染指政治评论，这倒不是因为政治评论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是因为它在期刊上更能挥洒自如。笛福的《每周评论》是此类政治刊物中的第一份，它引来了大批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人们需要的还有社会评论，如对礼仪以及对高雅的文学和戏剧的评论。

《泰特勒》(*Tatler*)即满足了这一需要，它同样被广泛地模仿。这些种类的期刊的创办是第一个阶段，在此之后，在 1730 年到 1760 年间，又发生了一次大范围的扩展。“杂志”这个词的使用，就能方便地用来说明这场扩展，最早采用这个词的是 1730 年的《绅士杂志》，此后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伦敦杂志》、《环球杂志》(*Universal Magazine*)、

《城乡杂志》(*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牛津杂志》、《杂志宝库》(*Magazine of Magazines*)、《杂志大宝库》(*Grand Magazine of Magazines*)等刊物都陆续采用了这个词。这些刊物清晰地勾画出了它们所服务的那个读者阶级日益膨胀的文化野心。这些杂志的内容质量

205

不等，目的也不同：有些原创作品可以恰当地归入文学，有些是文雅的报道，还有些明显地就是“文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文化扩展其特征在于：出版物范围广泛，从那些希望对事实、文学和舆论获得第一手认识的人，到那些希望凭借这些简略而又便利的信息来实现文化速成的人，他们中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在整个期刊领域，作品的目录让人印象深刻，尽管也不必把它说得太理想化。有许多好作品，但也有很多以“事先消化过”自居的关于趣味和行为方面的

指南，有些则连带利用了人们对名人的流言和丑闻的兴趣。那时候不仅有斯蒂尔的《泰特勒》，也有曼丽夫人(Mrs de la Riviere Manley)的《女流泰特勒》[曼丽夫人是《上流人性事秘录》(*Secret Memoirs and Manners of Several Persons of Quality, of both Sexes*)的作者]；不仅有发表在《环球纪事》(*Universal Chronicle*)上的约翰逊博士的随笔，也还有像《杂志大宝库，或环球纪实》(*Grand Magazine of Magazines, or Universal Register*)这样“囊括了国内外杂志、评论和纪事报中一切稀奇古怪的、有用的或是娱乐性的内容”的杂志。事实上，当一种文化开始扩张的时候，它总是会在兴趣爱好及严肃正经等所有层面上尽力铺展开来，其中有些层面往往是被拿来利用的，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

与此同时，日报也正在发生变化，其内容、组织和抱负都有了变化。期刊的一些特色，比如点评、综合新闻，以及戏剧短评、轻松的文学读物、评论等“杂志的兴趣点”，都逐渐被日报所吸纳。这一扩张是在报纸的商业作用得到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自从18世纪40年代以来，广告的含量大幅增加，一张成功的报纸就是一家越来越赚钱的商业企业。这一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早期的报纸通常为印刷商所有，报纸的定期印刷很对他们的胃口，这能让印刷机一刻都不闲着。在某些情况下，报纸从副业逐渐变成一项主要的业务活动——这一发展要等到19世纪初才总体上宣告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报纸改由不固定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运营，印刷商则从业主变成为受雇的代理商，这是那个时代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206
这些公司中的第一家组建于1748年，以运营《伦敦公报》，这种变化对后来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报纸的销量也在上升。在1711年，报纸的销售总量是225万份，到1753年，报纸的销售总量上升到了700万份。读者的数量比销售量更大，因为咖啡屋和类似机构的报纸订阅量要大于个人订阅量。1757年提高了印花税，但这并不能阻遏报纸的扩张。实际上，随着报纸财力的增强，它们开始渴望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政府不断向报社行

贿，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报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在沃波尔^①执政的最后十年里，收买报纸和小册子作者的费用就超过了5万英镑。报刊作为有着自身权益的政治机构，到了需要严正声明自由权利的时候了。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报刊是否享有自由报道国会议程的权利，在这点上，期刊站在了最前列。1736年，凯夫^②开始在《绅士杂志》上报道国会辩论。1738年，凯夫的报道被判为越权，但他仍然以“小人国上院”为名继续发表报道；1752年，他恢复了直接报道，只不过是发言人名字的首尾两个字母来代替。这场斗争虽然尚未取胜，但已经明确提出了权利要求。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报刊的自由和政治地位成了其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报纸已经开辟出一个广阔的市场，一片繁荣，它就和那些和它有着相似历史的事物一起，开始试图在国家治理中取得更大的权利分享。

(2) 1760—1836年

1762年，威尔克斯^③的《北不列颠人报》(*North Briton*)创刊，适时地拉开了争取报刊独立的斗争的序幕。威尔克斯写道：

207 报刊的自由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是捍卫这个国家的各种自由的最坚固的堡垒，理应受到尊重。

到了18世纪60年代末，在一份老牌商业报纸《公共广告报》(*The Public Advertiser*)上，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朱尼厄斯来信”^④，以此争

①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英国政治家，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任首相。虽说在沃波尔的时代，“首相”这一职位尚未获得法律确定，但沃波尔权倾朝野，其地位事实上相当于首相。——译者注

② 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 1691—1754)，英国出版商、编辑，《绅士杂志》的创办者。——译者注

③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7—1797)，英国新闻记者、政治家，1762年创办周日报纸《北不列颠人报》。——译者注

④ “朱尼厄斯来信”(Letters of Junius)，以朱尼厄斯为笔名发表的系列信件，从1769年1月21日起到1772年1月21日为止，连续发表长达三年时间。其主要内容是告诉公众他们作为英国人理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同时揭露政府是如何损害了这些权利。——译者注

取报道的自由。1771年，在威尔克斯的煽动下，有好几家报纸都开始刊登详细的国会报道，从而成功地颠覆了特许报道权，尽管它并没有被正式取消。但是这一胜利却因为曼斯菲尔德勋爵而大打折扣，在一起因朱尼厄斯来信而引发的案件中，他从法理上对诽谤罪作了解释，其结果是将判定某种出版物是否构成诽谤的权力交到了王室而不是陪审团的手中，根据这些条款，也曾有过几次对印刷商的起诉和判决。一直要等到1792年“诽谤法案”颁布以后，判决诽谤是否成立的权力才重新回到了陪审团手里。

尽管个别印刷商吃了些苦头，但在这些年里，整个报刊界还是向上发展的。两份重要的报纸——《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和《邮政早报》(*Morning Post*)分别于1769年和1772年创刊。随着它们的诞生，伦敦的日报出版迎来了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阶段。《泰晤士报》紧接着在1785年创刊。尽管1776年再次提高了印花税，但报纸的发行量仍然在上升。在1753年，报纸的年销售总量是700万份，1776年上升到了1223万份，到了1811年，更是上升到了2442.2万份。在1784年，伦敦有8家早报，到了1790年，则有14家早报。发行方式也得到了改善，先是在1784年，邮政马车开始使用，接着在1785年，报纸的发送又与普通邮件分开来。发行条件的改善使第一份定期晚报《星报》(*Star*)得以在1788年问世，其发行量达到了2000份。《信使报》(*Courier*)随后于1789年创刊，发行量达到了7000份，而当时领先的早报，发行量也仅在2000到3000份之间，由此可见其利润有多么大。在1790年代，《邮政早报》的发行量一度下降得很厉害，掉到了350份，面临着停业的威胁。而与此同时，第一份周日报纸《星期日观察报》(*Sunday Monitor*)于1779年面世，随之出现了许多短命的照样画葫芦的报纸，但也有一些获得了成功，如《观察者报》(*The Observer*, 1791)、《贝尔信使周报》(*Bell's Weekly Messenger*, 1796)和《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 1801)。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报刊都在扩张，但与此同时对报刊征收的税额也在急剧上升。1789年，印花税

提高到 2 便士，广告税提高到 3 先令。1797 年，印花税提高到 3 便士。1789 年，租赁报纸的业务被禁止，尽管它并没有停止。这些措施导致报纸发行量暂时下降，尽管对报纸的需求仍然在增长。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由于政治气氛极为激奋，报刊的影响让政府深感忧惧。托利党人的《反雅各宾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 在 1801 年挑明了这一问题及其背景：

我们早就认为报纸在这个国家的出现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不幸之事，而由于报纸依靠其广泛的流通取得了支配性的影响，我们只能视其为一种最令人痛惜的灾祸。

痛惜归痛惜，但补贴制度还是延续下来，留存至今的账目显示，在 1782—1783 年、1788 年和 1789—1793 年里，支出的补贴相当可观。后面几年的账目显示，有 9 家报纸接受了补贴，额度从《信使早报》(*Morning Herald*) 和《世界报》(*World*) 的每年 600 镑到《泰晤士报》的每年 300 镑以及《公簿报》(*Public Ledger*) 的每年 100 镑不等。《神使报》(*Oracle*) 1794 年的生产费用显示每年需花费约 6864 镑，《泰晤士报》1797 年的费用则达到了 8112 镑。因此前面所提到的补贴在报纸的财源中，是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但又并非必不可少的决定因素。补贴显然是受欢迎的，但当时《神使报》的每日发行量达到了 1700 份，这足以使它有钱可赚。《泰晤士报》事实上也是赚钱的，其发行量在 2000 份左右。这些数字不包括借记的日常运营开销以及赊欠的广告税在内，但总的来说比较成功的报纸其营利状况显然不错，如果它愿意的话，是可以实现财务独立的。政府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施加影响的手段。在 1793 年 6 月之前，政府每年直接付给新闻记者的津贴最少也有 1637 镑。在 19 世纪 20 年代，津贴额达到了最高点，其后政府倾向于采取这么一种办法，即只允许那些听话的报纸刊登政府公告。从总体上看这种状况，情形似乎是：虽然政府显然可以通过收买来施加影响，

但这反而证明了报刊有着很强的实力和影响，而这种实力和影响——即使报刊发行量很小，它们也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读者而使自身的影响得以成倍增加，而对报刊的发展始终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广告收入则提供了财务上的保障——使得报刊只要下定决心去争取，就能获得真正的独立。然而，政府也制定了新的防范措施。1815年，印花税提高到4便士，广告税提高到3先令6便士。新税制的实行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将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到报刊的发展之中。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砍掉了新闻，专注于舆论批评，从而不需要缴纳印花税便能发售，这份周日报纸只卖2便士，销量达到了惊人的44000份（实际读者数量接近50万人）。伍勒^①于1817年创办《黑矮星》（*Black Dwarf*），销量达到12000份。在关键性的这几年里，一种新型的大众报刊涌现出来，它在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面向的是新的阅读阶层。政治的明显升温催生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政治性报刊，科贝特和伍勒所创办的报刊即代表着这种新精神，甚至代表着舆论，在它们背后还有放言直论的新型季刊（如1802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以及它的竞争对手1809年创刊的《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在1818年它们的销量都达到了14000份），激进的周刊[如1805年创办的《新闻周刊》（*News*）和1819年创办的《审查者》（*Examiner*）]，以及独立精神日渐增长的《泰晤士报》（巴恩斯^②于1817年接任编辑）。它们都是独立精神的源泉，而科贝特和伍勒则将这种精神在一个新的读者群中扩展开来。政府很快就作出了反击，1816年的通函和1819年六法案中的两项，都以压制报刊言论为直接目的（“亵渎宗教的和煽动性的诽谤文字”），这些新的大众报刊虽说没有被摧毁，但其力量却至少是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埃伦伯

① 伍勒（Thomas Jonathan Wooler, 1786—1853），英国出版家，以创办讽刺性杂志《黑侏儒》而著称。——译者注

② 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 1785—1841），英国新闻记者、随笔家和编辑，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编辑。——译者注

勒勋爵^①明确地解释了政府的态度：

这项议案(1819年的报纸印花税法案)所要反对的不是体面的报刊,而是那种穷酸报刊。

- 210 从此以后,就出现了“穷酸报刊”和“体面报刊”之间事实上的分裂,这一分裂有着重要的意义,前者是在表达新的政治言论和社会言论,而后者是在“体面的言论”的条条框框里推进报刊在财务上和编辑上的独立进程。单独站在后者的角度上,很容易写出一部报刊史,但是独立的激进报刊的发展历史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针对公开的压迫,科贝特、伍勒、卡莱尔^②、赫瑟林顿^③等许多人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斗争,宪章派报刊就取得了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是此类报刊的经济基础仍然非常薄弱。这条路线随后往下经由布拉奇福德^④和兰斯伯里^⑤直到我们时代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s*)和《论坛报》(*Tribune*),展开的就是一个不断地遭到财务方面压力的故事,但包括新闻记者、通讯员和卖报人在内的从业人员都把办报当作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商业企业来经营,靠着他们坚持不懈的义务劳动或是报酬极低的劳动,这些经济压力才得以缓解。对于这类报纸来说,根本不能指望像有着广告收入和组织完备的发行系统的“体面报刊”那样拥有稳定的财源,但它们却敢于冒着新的风险,不断地往前走,与政治上的变革步骤保持紧密的联系。没有这类发出不同声音的报刊,不仅是新闻史,

① 埃伦伯勒勋爵(Edward Law, 1st Earl of Ellenborough, 1790—1871),英国托利党政治家,曾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印度总督(1842—1844)。——译者注

② 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 1790—1843),英国激进书商,积极鼓吹确立普选权和出版自由。——译者注

③ 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 1792—1849),英国印刷商、出版家。——译者注

④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 1851—1943),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新闻记者和作家。——译者注

⑤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 1859—1940),英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报纸编辑。——译者注

甚至是政治史和舆论史的撰写，都将难以举笔。

在英国，商业中产阶级是报纸服务的首要对象，因此英国报刊的经济机构实际上主要是站在这一阶级的立场上来组织的。当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报纸被一个更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时，它们是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靠参与活动或是真诚的团体关系来招徕新读者的。在科贝特所生活的时代，随着一个新的读者群的出现，报刊漫长历史的起点就变得显明了。没有哪一份报纸是以整个社会共同体为服务对象的，每份报纸都有着特殊的利益。激进报刊在政治基础上与“体面的报刊”分道扬镳，而“体面的报刊”则继续寻求商业上的独立，不仅是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且最终也独立于社会之外。

在1820年到1850年间，独立的激进报刊展开了第一轮持久的努力，它们见证了《泰晤士报》转换了新的立场。在彼得卢大屠杀案中，它反对政府，在围绕卡罗琳王后^①展开的论战中，它又站在了民众一边，稳步地成长为“体面的”改革派的喉舌，在它背后是那个结成一体、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读者群。在1820年前，其销量达到了7000份，而在卡罗琳王后论战时期，其销量在短时间内上升到了15000份。由于立场更激进的竞争对手都遭到了公开的压制，《泰晤士报》在其稳固的商业管理基础上又往前跨出了一步，从它在政治上所代表的阶级那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广告支持。《泰晤士报》之所以能够在同类报纸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1815年到1832年间推行了改革政策，在这关键的十来年里，追求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追求独立的愿望两者得以结合起来。此外还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从其创建之日起，《泰晤士报》便和印刷技术的改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它的创办是为新的“连合

^① 卡罗琳王后(Caroline of Brunswick, 1768—1821)，英王乔治四世之妻。两人婚后不睦，长期分居。1820年乔治四世登基，卡罗琳赶回英国要求册封为王后，遭到乔治四世拒绝，他甚至强迫政府提出一项法案，剥夺卡罗琳的王后头衔，并解除她与国王的婚姻关系。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要求推进政治改革的民众乘机掀起了一场反对国王的激进运动。——译者注

活字”^①印刷术作广告的)。而到了这一关键时期，它在技术上仍然保持着领先。1814年(在1807年试验成功之后)，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印刷机所开印的就是《泰晤士报》。每小时印刷速率从250张提高到1100张，接着又提高到1800张(双面印刷900张)，而在《泰晤士报》的事务所里，又对蒸汽印刷机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将印刷速率从每小时1827张提高了双面印刷4000张。而在此之前，报纸发行量的扩大曾受到印刷方面因素的制约。总之，《泰晤士报》的匹马领先，是由其商业地位、中产阶级的改革方针以及技术上的优势共同造成的。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就因为《泰晤士报》将商业、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各种要素关联起来，它便成为了创造报纸这种印刷品的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的完美的喉舌，使他们得以参与国家的管理。

这一时期新闻出版发展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必须简略地提一下。最重要的是周日报纸的增长，其源起前面已经提到。在1810年前，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日报，达到了一万份，而在1820年代之前，《泰晤士报》还达不到这一发行量。排名靠前的报纸大多数是支持改革的，并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与此同时，在《快讯报》(212 *Dispatch*)的带领下，它们开始划出大量版面来详细报道谋杀、强奸、诱骗之类的案件，体育(赛跑、摔跤和职业拳击)也占据了不少版面。在1815年之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以《贝尔伦敦生活报》(*Bell's Life in London*)为例，一份典型的19世纪20年代的报纸在头版会这般描述其内容：“本周新闻、时尚大全、机智幽默，以及有趣的真人真事，尽萃于此。”实际上也就是包括了一栏国外新闻，一栏选举会议的动态报道，半栏国内一般新闻，一则关于肥胖的“有趣病例”的报道，以及一篇包括了两起谋杀案、一桩越狱未遂案和一件抢劫案在内的杂录。报道的风格是直白的，标题用小字号。由于印花税上调，所有报纸都采用小字排印，间距很密，以节省版面。其结果是读起来很费力，甚至

^① “连合活字”(logography)，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的活字。——译者注

都不如 18 世纪的报纸。需要顺便指出的是，不断有人企图从法律上取缔周日报纸，尽管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但一切努力却都归于失败。考虑到就此展开的论辩所使用的措辞，似乎很可能周日报纸所影响的人群比之于“体面的”日报，要更加贫穷。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杂志。获得成功的期刊的队列中又加进了诸如《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 (1817) 和《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 (1820) 这样的月刊，以及一种被众人认为“可耻”的新周刊，如《约翰牛》(*John Bull*) (1820)，其发行量迅速达到了 1 万份。在 1830 年代初，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新的文学周刊，像《钱伯斯周刊》(*Chambers'*)、《便士杂志》(*Penny*) 和《星期六杂志》(*Saturday*) 这些大获成功的廉价杂志，都创建于 1832 年，其发行量在 5 万到 20 万之间波动，这一决定性的扩张促成了一个新的阅读阶层。这些杂志原本是为工人阶级量身定制，但它们似乎大多是被仍然缺少读物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买走了。据说在 1830 年，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每年的收入约为 200 到 300 镑，而含税的日报每份售价 7 便士，这是它们所承担不起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廉价的杂志显然是更有吸引力的。日报在这个读者群中扩散开来，那要等到下一次重要的立法，它直接影响到报刊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213

(3) 1836—1855 年

在 1836 年，印花税从 4 便士降到 1 便士，广告税也从 3 先令 6 便士降到每则 6 便士。这就引发了一场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日报以及周日报纸的大扩张，周日报纸的扩张更为明显。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某些时候，《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曾超过 15000 份，但在 1830 年，它的平均发行量只有 1 万份。1831 年略有上升，可到 1835 年前夕又明显低于 1830 年。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已经确立，但其下一波发展则要等到 1836 年的降价之后，在 19 世纪 40 年代，其发展势头尤为强劲。1837 年的发行量是 11000 份，1847 年已上升到 30000 份，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在 1855 年已接近 60000 份。乍

一看，这数字很惊人，但令人更感意外的是，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发行量都有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因为《泰晤士报》此时已没有真正的对手，其他日报的发行量都仍然不到 10000 份。售价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一份售价为 4 便士或 5 便士的私营报纸，其财源仍不免限于拮据。《每日新闻》(1846)的发行量曾达到 22000 份，但每份售价只有 2.5 便士，所以仍然碰到资金不足的问题，落在了后面。

虽然《泰晤士报》的崛起抢尽了风头，但人们所期盼的扩张还是发生在周日报纸上。到 1837 年前，《快讯报》和《纪事报》这两份周日报纸已每期卖到 50000 份，在 19 世纪 40 年代，周日报纸的发行量更是普遍有了明显的上升，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典型的两份周日报纸是《劳埃德周报》(*Lloyd's Weekly*) (1842) 和《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 (1843)。到 1855 年前，这两份周日报纸的发行量都达到了 10 万份。1850 年，所有周日报纸的发行总量估计达到了 27.5 万份，而所有日报的发行总量只有 6 万份。很显然，这是现代商业性报纸的第一个扩张期。

前面已讲到 19 世纪 20 年代周日报纸的内容，19 世纪 40 年代新涌现的报纸堪称得其真传，其激进的基调与选择新闻的方式都如出一辙。在一开始，为了省下甚至已降低到 1 便士的印花税，《劳埃德周报》不刊登真实的新闻，而是代之以系列故事和一些假新闻，配上丰富的插图。可在 1843 年前，它已开始恪守更老派的风格，并确立了一种独具一格的“周报样式”。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1842 年 2 月 27 日的《贝尔便士快讯报》(*Bell's Penny Dispatch*)，副标题是“体育与警事公报，及罗曼司新闻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惊天阴谋，暴行未遂”，并配有大幅的木刻插图和详细的报道。这是一种常见的样式，尽管也需要指出，《世界新闻》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标题“严加监管吸毒和暴行”采用了小字号，也没配插图。

这一类新闻报道的源起其实并不算久远。历史悠久的廉价小书和谣曲集刊载的就是这类货色，特别是与谋杀、死刑和潜逃相关。在 18 世纪，这些廉价小书和谣曲集异常流行，木刻插图加上大字标题，已经

成为它们的经典样式。这些都延续到了19世纪，尽管同类的虚构作品的发行量也有所上升，但报纸的时代已经来临，它凭借广告收入、政治新闻和舆论以及先进技术，成为买卖相同素材的最有效的工具。正像18世纪的报纸吸纳了一部分“杂志的趣味”一样，19世纪的报纸吸纳了廉价小书、谣曲集和历书的趣味，而且售价要便宜得多。在新闻报道的历史上这是再次出现的一种趋向：即吸纳以前通过各种途径而广泛流传的材料，打造出一种成本低廉、易于散播且有着多种用途的印刷品。新闻报纸的经济状况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一路线，报纸的集萃与廉价等因素显然是与一种在不断扩展的文化相适应的。这种读物竟吸引了如此广泛的兴趣，而在其扩展的每个阶段，充当先锋的都是最便宜数量也巨大的报纸。

215

(4) 1855—1896年

1855年，1便士的印花税也最终被取消，而在此前，广告税已于1853年废止。这些变化降临的时候，报刊已经处于扩展之中，而且在新闻采集和报纸分发方面也开始广泛采用了新的技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标志着报纸全面扩展过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阶段。不过，在我们转而考察这一阶段之前，还应该试着评估这种扩展在社会条件方面已经达到何种地步，以及对此有着明显影响的其他社会因素，如识字率等等。

要想准确地理解这个扩展过程，就必须明确地把日报和周日报纸区分开来。从一开始，周日报纸给人的印象就是其读者群与日报所迎合的读者群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从面世之日起，周日报纸就从未被认为是“体面的出版物”，在19世纪最初十年里，其读者群通常被等同于“下层阶级”。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一份典型的周日报纸售价为7便士，与日报相同，以这样的价格，自然很少有人能够逐期购阅，即使是对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和日报早期历史中的情况相似，购买周日报纸的主要是一些机构。新型的咖啡屋已经出现，那里有将近一百种报刊，每一种报刊通常都只需花1便士便可读到，而

216 且因为有了煤气灯，阅读时间也得以大大延长。在工场中，也会有人合起来买报纸，而且甚至会大声地读报，但是酒吧和理发店却日益成为了主要的阅读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星期天的早上是最受欢迎的一段时光，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何在19世纪上半叶是周日报纸引领了报纸的扩展，需要指出的是，周日报纸的这种引领地位一直保持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报纸降价之后，有更多的人能够自己买报来看，但即便如此，周日报纸也仍然有其优势，因为它们出来的那一天正是大多数人真正空闲的时候。前面所引用的1850年的数据——周日报纸的总发行量是27.5万份，日报的总发行量是6万份——已经足以将两个读者群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它们在读者数量上的差距可能要比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日报纸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似乎有可能是集体性购买并阅读的。人们总以为报纸的大规模发行仍然集中在伦敦一地，但实际则不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星期日出版的报刊就已经在伦敦牢牢地扎下根，成为名副其实的流行读物，报纸的整个扩展历史必须据此予以重写。在剩下的半个世纪里，日报大举扩展，流入正在扩大中的中产阶级。19世纪大众报刊的历史也就是周日报纸的历史，其目标所向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在差异的读者群。

在1816至1836年间，即实行4便士印花税的时期，报纸的销售量增长了33%。在1836至1856年间，报纸的销售量增长了70%。在1856年后的25年里，报纸的销售量至少增长了600%，报纸从此开始大规模扩展开来。1855年取消印花税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两种新情况：大都会的日报更便宜了，地方性的日报也更普及了。在报纸销量上升、兴旺发达的同时，周日报纸以及售价更贵的日报的发行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报纸的扩展有着众多极为有利的条件，绝不只是取消印花税这一项。印刷技术在不断改善：每小时印刷量从1827年的4000份提高到了1857年的20000份。纸张的价格也在下降：一令纸在1794年的价格是21先令，在1845年是55先令，但在1855年却下降到了40

先令。1860年取消了纸张税，造纸技术随后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从而使纸张这一主要原料的价格得以持续下降。商业的普遍发展提升了对广告版面的需求量，尽管大多数报纸在充分利用这一良机提高广告费方面显得有点迟缓。在新闻采集方面，1837年有了电报，尽管电报的充分利用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才能实现，但在1847年后，通过电报来传送新闻已经是习以为常。靠铁路分发报纸的方式也逐渐推广开来，在1871年前，铁路书报摊的分售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在整个经济所营造的那种充满信心且不断扩张的总体氛围中，所有这些因素都起到了作用。

1855年6月20日，印花税被依法废除，而与此同时，一份在此后40年里引领日报扩展大潮的报纸也问世了，那就是《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在头三个月里，其售价仅为1便士，到1860年发行量达到了14.1万份。1856年问世的《晨星报》(*Morning Star*)售价也是1便士，《标准报》(*Standard*)在1858年也将售价降低到1便士。虽然有《新闻报》(*News*)和《标准报》这样的主要对手，《每日电讯报》的销量还是在不断上升，1870年将近20万份，1880年将近25万份，1890年更是将近30万份。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的印刷机器每小时可以印16.8万份报纸。

《每日电讯报》在这波廉价日报的大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它被认为是为“一个从来不看周报或月刊的新读者群”服务的一份报纸，是属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份报纸”。在风格上它的确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泰晤士报》有明显不同，但它并不是第一份走轻松路线的报纸，甚至在日报中都不能算是第一份。这方面的先锋是《邮政早报》(*Morning Post*)和《世界报》(*World*)，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而我们也必须牢记，维多利亚时代的《泰晤士报》即使与其早期任何一个阶段相比，也都要显得严肃许多。拉布谢尔^①曾这么批评《每日电讯报》：

^① 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 1831—1912)，英国政治家、作家和出版家。曾自办周报《真理报》(*Truth*)。——译者注

一旦那些与文学毫无瓜葛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报馆主人，他们自然会不惜牺牲风雅，把办报纸当成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

- 218 《每日电讯报》的老板是印刷业的利维(Levy)家族，但拉布谢尔的批评实际上隐含了这一层意思：新出现的文学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分离是无法接受的。早在18世纪末，作家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分离就已清晰可见，尽管两者偶尔也会有重叠，而印刷业主却从来都是平民阶层。利维对报纸的确有着新的设想：“我们所需要的是那种记录人类行迹的报纸”，他指定一批新人来办《电讯报》，而且认为政治也必定不是报纸读者唯一感兴趣的内容。马修·阿诺德注意到了这一结果，他称之为一种“新式报纸”。

从内容上看，这种报纸其实并不新。但在这一时期，对犯罪案件、性暴力和奇人畸行的关注，的确从周日报纸蔓延到了这些日报上面，甚至连《邮政早报》这样的老报纸也不能免俗。早在1788年，《邮政早报》就曾宣称：

由于彻底远离了文学的优雅，报纸已经迷失得太久了，它兜售的不是丑恶的货色，就是毫无意义的家长里短。在这方面，不能只谴责报纸，作为报纸主顾的公众也难辞其咎。

维多利亚时代的《邮政早报》是很体面的，但在博思威克^①掌控期间，它确实也登载了大量的犯罪报道。“新式报纸”是复杂多样的，因为扩展本身也在创造着某种新东西，即这些日报在严肃认真的程度上是有差别的。1855年之后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发展出了一种比以往更好的崭新的新闻报道，更侧重于新闻，而不是像前半个世纪那样，老是

^① 博思威克，即阿尔杰农·博思威克(Algernon Borthwick, 1830—1908)，他于1852年接任其父在《邮政早报》的编辑之职，并于1876年收购《邮政早报》。——译者注

纠缠于派系斗争。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在观点意见上日趋统一，这种统一已强大到足以包容宪政上的政党冲突，在这样一个时期，许多报纸就能放弃以往那种近乎疯狂的打笔仗的方式，而是为这个读者群提供新闻以及有节制的各种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政治氛围的这种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治在新闻报道中的首要地位，在前半个世纪里，关于政治活动的报道在廉价报纸上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而此时则强调新闻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泰晤士报》和一些有着较悠久历史的报纸旨在为那些根基稳固的社会阶级提供一种新颖的、更客观的新闻报道，《每日电讯报》等新出现的报纸则将目标对准那个地位较低却处于上升中的新中产阶级，为他们提供一种更活泼的新闻报道，这种活泼劲儿不仅在政治新闻上有所体现，而且也洋溢于其他各种新闻报道中。

219

《泰晤士报》的读者的普遍反响与后来人们对卖半个便士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批评如出一辙：“有活力，但是粗鲁而庸俗。”但必须强调的是，就粗鲁鄙俗而言，这种新型的新闻报道与18世纪的报纸相比，未必就能说是青出于蓝，然而考虑到其扩展的程度，的确有点触目惊心。“伯明翰惊现阴阳人”，1856年的《电讯报》曾如此报道；“一妇人遭狂暴蹂躏”，这是1957年的一则报道，诸如此类的报道，不胜枚举。伯纳姆(他是利维家族的后裔，与《电讯报》仍有联系)在谈到《电讯报》的历史的时候这么写道：

只要翻阅那些旧报合订本，任何一个诚实的传记作者都不会怀疑这一事实：《每日电讯报》正是靠着报道罪案而发家的。

用整整三栏的篇幅来描述一个女人的上吊自杀，诸如此类的例子提醒我们：这种以前在廉价的文学小册子中常见的老把戏如今已在日报中扎下根来。

新闻报道的风格此时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这要归因于电报的经常运用。旧的报道风格，最好的是有着书卷气，最糟糕的则迄今仍被语文

课本斥之为“新闻体”（这种低劣的报道文体在一些地方性报纸中仍然僵而不死，因为这些报纸极少使用电报）。由于想尽量压缩文字以节省电报费，新闻报道遂趋向于采用短句，并突出关键词。删繁就简当然助益良多，但往往也会造成一些损失，或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是对关键词的强调走向了畸形。如何在这些方面保持一种均衡，这对于新闻文体来说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每日电讯报》是一个先驱者。在发动公共呼吁方面，它不比《泰晤士报》及其他报纸差，而在组织公共集会以及在制造自我宣传的噱头方面，更是技高一筹，前者如1887年组织3万名儿童前往海德公园参加女王执政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后者如1882年策划留下大象江波^①的活动。然而在排版印刷方面，《电讯报》仍然很保守，还是一成不变地采用密密麻麻的“日报”版式，这种版式是在向报纸征收印花税的时期形成的，此时已被周日报纸所抛弃。同一时期的美国报纸采用了更为疏朗的版式和更大的标题（与20世纪中期《泰晤士报》的新闻版面大体相当），却屡屡遭到英国同行的责难，或是视若无睹。廉价日报真正担心的是被混同于周日报纸。

与此同时，从1855年起，地方性日报也是日益兴盛。光是1855年这一年里，此类报纸就创办了17家，新闻机构的发展使它们逐渐摆脱了对伦敦报界的依赖。其中最成功的报纸其发行量高达4万份。虽说这个销量在当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报纸的大量繁衍却表明报纸的读者群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由于它们都是地方性报纸，因此也就避免了像伦敦的报界那样为争夺不同层次的读者而展开竞争。它们的目标是为本地所有读者服务，因此所奉行的是一种全面的而不是从特定角度出发的报道方针。在这些报纸中，有几家已经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① 大象江波(Jumbo)，1861年生于法属殖民地苏丹，1865年被运入伦敦动物园，成为孩子们喜欢的动物明星。1882年江波被卖给美国的巴纳姆(Barnum)马戏团，当时《每日电讯报》曾发动十万名学童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请求不要售卖大象江波。——译者注

里最出色的报纸，它们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

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创办廉价报纸的势头变得更加迅猛。1861年，出现了一份不成功的半便士报纸〔《伦敦半便士报》（*London Halfpenny Newspaper*）〕，但其实在1855年后，在伦敦之外的一些地方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半便士报出现。在伦敦，卖半便士的晚报《回声》（*Echo*）创办于1868年，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正是晚报标志着廉价报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人们对体育尤其是足球的兴趣不断高涨，晚报有了一项新的功能，1880年代伦敦的几份新晚报〔如1881年创办的《新闻晚报》（*Evening News*）和1888年创办的《星报》（*Star*）〕正是靠着牢牢抓住这个兴趣点才最终站稳了脚跟。

《新闻晚报》是一份由保守党资助的政治性报纸，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成功，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诺斯克里夫的执掌下却大获成功。 221

《星报》在当时是成功的楷模，在办报方法上堪称里程碑。像访谈、文内小标题以及美国风格的大字标题这些办报技巧最初见于斯特德^①主编的《帕尔摩尔公报》（*Pall Mall Gazette*），但奥康纳^②的《星报》却把新型报纸的这样那样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奥康纳承诺道：

我们每天都会刊登一篇长短不等的文章，但通常会把它限制在半栏之内。当天的其他内容将是一些短小精悍、用词直截坦率的记录。我们相信，日报的读者除了政治报道之外，还希望读到更多的内容，我们将为他献上足够丰富的非政治的文学作品——有时是幽默的，有时是感伤的，还有趣闻轶事、统计材料以及流行时尚和持家之艺术等等，有时还会刊登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在报道栏目里，我们将抛弃那种陈腐过时的新闻腔，现身于公共论坛

① 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 1849—1912），英国记者、编辑，1883—1889年间任《帕尔摩尔公报》主编。——译者注

② 奥康纳（Thomas Power O'Connor, 1848—1929），英国记者、编辑，1888年创办并主编激进派报纸《星报》。——译者注

或是教堂神坛以及法庭之上的男男女女，都将通过他们的一呼一吸、一颦一笑获得生动的刻画，而不是只死板地记录下他们所说的话。

这一描述可谓倾向鲜明，但是奥康纳的办报方针虽具有里程碑意义，却还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在廉价早报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趋势，现在在廉价晚报这种新产品中被扩大了。《星报》的新颖根本在于它对兴趣点的全新布排方式，这是在19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的，如今在版面样式上得到了确认。从此以后，新型报纸开始变得表里如一了。

《星报》创刊号卖出了142600份，《每日电讯报》的销量则仍然维持在30万份左右。但实际上发行量最大的还是周日报纸。在1855年，周日报纸的总发行量已上升到45万份，其中销量最大的达到10.7万份。而到了这一时期末，周日报纸的总发行量大约为172.5万份，居于领先地位的《劳埃德新闻周报》(*Lloyd's Weekly News*)在1890年的发行量是90万份，1896年达到100万份。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后，是周日报纸引领了大发行量报纸的发展，在诺斯克里夫^①之前就已拥有这么大的发行量，借此我们可以来评估所谓“诺斯克里夫革命”的性质。这些成功的周日报纸其内容迎合了人们一贯的口味。比如对开膛手杰克^②一案的报道，就有力地助长了《劳埃德新闻周报》的发行量。此外，由于周日报纸刊登整整一周的新闻，因此深受那些在日报扩展后仍无力订阅的读者的欢迎。

① 诺斯克里夫(Alfred Harmsworth, 1865—1922)，英国新闻出版家，1896年创办《每日邮报》(*Daily Mail*)，该报很快一跃成为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所谓“诺斯克里夫革命”是指《每日邮报》所代表的报纸商业运作模式上的转变，广告收入而不是报纸本身的销售收入成为报纸的商业基础，报纸内容也因此做了相应的调整，变得更加感官化、通俗化。——译者注

②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19世纪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从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他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作案期间，他还多次写信给新闻社、警方等单位，公开向社会挑衅。这起连环杀人案经媒体大肆渲染，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巨大恐慌。1892年，警方在经过多年侦破而无果的情况下，宣布停止侦办白教堂连续凶杀案。——译者注

(5) 1896—1920 年

当我们更仔细地回顾 1855 至 1896 年这个时期的发展，就会发现发展最快的时期是 1855 至 1870 年间，在这之后发展的势头就有所减缓。在 1855 到 1860 年间，日报的发行量提高了三倍，在 1860 至 1870 年间，又提高了一倍。1870 至 1880 年间，却只提高了 30%，1880 至 1890 年间，更是只提高了 12%。另一方面，地方性报纸发行量的大幅提高是在 1870 至 1890 年间，晚报发行量的显著增长则是在 1880 年之后。

在报刊工业内部可以找到几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这种发展，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一种新的广告模式变得愈益重要起来。老式新闻报纸的财源依靠的是数量众多的小广告，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分类广告”。在其他媒体中，尤其是在招贴广告中，广告的样式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报界的态度却仍然很谨慎。特别是编辑们，任何想要突破他们所负责页面的固定栏目版式的做法，都会遭到他们的顽固抵抗，因此他们反对增多广告的表现样式。广告客户千方百计想说服报纸，但鲜有成功，只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报纸迫于压力才开始成功地使用了在海报中发展出来的一些技巧（这最终真正改变了新闻报道的面目）。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插图杂志上，出现了纯洁的裸体或是类似的形象，来给药片、肥皂以及引领新广告术风气之先的其他物品做广告。最后，在诺斯克里夫的带领下，报纸抛弃了分栏的成规，允许使用大字号和插图。我们注意到，在 1897 年，《泰晤士报》也开始允许“刊登那种在三年前会被认为只适合于街头招贴的广告”，而在当时，《每日邮报》的首页已经挤满了一排排来自新兴百货商店的广告画，上面画的是穿着连裤内衣的娇羞女郎。“谦逊、服务、诚信”获得了大号铅字的那种抽象的体面。

在这些变化背后是经济上的重大变化。在工厂制度的早期阶段，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没有做大量广告的情况下卖出去的，需要大做广告的主要是那些新奇而稀罕的产品。为基本日用品做广告的，主要是些

小店主，这些广告也就是报纸上一直都有的分类广告。在这个相对简单的阶段，大规模的广告和商品品牌自然还只是处于边缘，或者说的确还是新生事物。在19世纪后半叶，范围虽然有所扩大（尤其显著地反映在特许生产的新食品的品牌冠名上），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广告的重心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萧条全面笼罩了从1873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尽管有偶尔出现的复苏和局部性的力量打破这一局面），它标志着在两种工业组织模式之间以及两种根本上不同的销售方式之间的一个转折点。在经历了大萧条和物价的巨幅下跌后，对生产力的担忧变得更加普遍，而且还在不断加深，随之也出现了将工业所有制重组为更大联合体的明显趋向，人们愈益渴望实现产业组织化，并尽可能地控制市场。此时广告就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其覆盖的产品范围在不断扩大，并成为发育完全的市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市场控制体系还包括关税制度、地区优惠权、联合企业定额、贸易战、厂商定价制度以及经济帝国主义等。^[3]出口商品的广告有了协同一致的扩张，在国内虽然出现了激烈的广告战，但也能看到随之而来的合并，比如有几家烟草公司合并成了帝国烟草公司，以抵抗美国的竞争。1901年，有人想出“天价”买下《星报》的全部八个版面，虽然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但《星报》仍然拿出了四个版面来印广告，“这是全世界最昂贵、规模最大也最有说服力的晚报广告”。出售广告版面的制度也改变了，在18世纪是由店铺直接出钱在报纸上登布告，后来出现了广告代理和经纪制度，最终是全面建立了独立的广告代理机构，而在报纸内部，全职的广告经理也很快从低级职位提升为高级职位。广告代理商给报纸施加压力，要求报社公布报纸销售量。诺斯克里夫在经过短暂犹豫后（他试图不借广告之力来运营《回音》），很快第一个认识到广告可以成为报纸新的财政基础。他公布了自己旗下报纸的销售量，逼迫其对手跟进，从而创建了作为产业的报纸的现代结构，报纸所展现的是与“读者大众”的市场关系。

如果报纸拥有巨大的发行量，那么其生产成本无论如何都会上升。

通过把办报方针定位于大发行量，诺斯克里夫在新的广告形势下发现了生财之道。于是他对新闻工作本身迅速进行了技术改造。1896年他创办售价半便士的《每日邮报》，就使用了昂贵的新机器（新的滚筒印刷机将每小时印刷量提高到了20万份，19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莱诺铸排机要比手工排字快十倍），为了使报纸更快地卖出去，他还做了一些新的安排（早在1900年前他就已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印刷点）。这些改进意味着只要发行量足够大，每份报纸的价格就能大幅削减，而达到一个新的规模的广告收入则成为支付所必需的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事实上，“诺斯克里夫革命”在实际新闻工作方面的创新，远不如它对报纸经济基础的彻底变革来得意义深远，这一变革将报纸与新型广告捆绑在一起。 225

和1900年创办《每日快报》的皮尔森一样，诺斯克里夫也是从办期刊起步的。自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杂志面世后，这一领域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插图杂志的兴起，时间从19世纪40年代起，其发行量达到了20万份以上；第二个阶段是走轻快路线的周刊的发展，时间是在六七十年代（《名利场》创刊于1868年，《世界》创刊于1874年）。1881年，纽恩斯的便士杂志《花边消息》及其追随者《皮尔森周刊》（*Pearson's Weekly*）以及诺斯克里夫的《回音》的创刊，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根本上说，这些杂志强化了1855年后的日报和1820年代后的周日报纸所开启的“杂烩”风，但它们几乎完全不登载通常意义上的新闻。这些周刊常常被斥之为“鸡零狗碎”，而用这种方式来报道严肃的新闻当然会极其糟糕。但正是这种对“杂烩”风的强化，使得这些杂志在功能上近似之前的一些期刊，如18世纪中期的杂志和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杂志，它们都处于文化扩展的特定阶段。这些杂志，尤其是诺斯克里夫办的杂志，还以“平民教员”自我标榜，但其品质却较为低劣，这其实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症状：文化赞助人与真正的教育和文学之间的距离在日益拉大。到了19世纪80年代，文化“水平”的分层和实际存在的文化上的阶级差异变

得愈益明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此外，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真正致力于平民教育的人，有很多在其早期阶段都是通过报刊来出力的。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皮尔森、纽恩斯和诺斯克里夫都只是投机商而已。他们所办的期刊，其发行量都是精打细算地靠着各种广告花招堆起来的，这些花招有的是利用了服务的不平衡发展（比如由纽恩斯率先推出的读者享受免费保险，这一招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大众报刊的一大卖点），其他的则采用了赌博的形式（寻宝有奖，每周花1英镑赢终生的竞猜，等等）。虽说后两种招徕术很快被宣布为非法，但到那时早已翻出了许多把戏，不仅用以招徕读者，而且也靠它们吸金以进一步加大投资。举例来说，诺斯克里夫的《回音》第一期卖了1.2万份，到年底卖出了4.8万份。接着便推出了后来被宣布为非法的每周花1英镑赢终生的竞猜活动，就靠这一招，《回音》在第二年的销售量升到了35.2万份。严格地说，这同样不能算是一种代表着进步的新闻业界的创新，只不过是一种新出现的销售和广告策略而已。盈利增长了十倍，诺斯克里夫就有了扩张的资本：先是创办《漫画剪辑》（*Comic Cuts*）、《勿忘我》（*Forgetmenot*）和《家常话》（*Home Chat*）等其他期刊，然后又买下《新闻晚报》，最后是在这些新企业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创办了《每日邮报》。

在1896年，在日报中处于领先的《电讯报》销量约为30万份，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扩张之后，它已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诺斯克里夫创办的半便士报纸基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理念，他带领报纸进入了下一个扩张阶段。在一开始，《每日邮报》的平均销量大约为20万份，1898年上升到40万份。在1900年前夕销量已经达到98.9万份，一个新的时期显然已经到来。在这儿必须强调的是，和周日报纸相比，《每日邮报》在办报手法上要相对保守些：头版是广告，最重要的新闻版面在布局上和新出现的晚报相近，采用单栏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版面总体上较为疏朗。它看上去（就是说在视觉上）和已有的晨报没什么大不同，所做的都只是程度轻微的改变。在当时它执报界之牛耳，稍加

分析,便可看出其成功与当年《泰晤士报》的兴起竟是如出一辙。理由有三:首先,其成功都建立在对报纸之经济基础的清晰认识上,即广告量与发行量是互动的;其次,技术领先,在生产手段和销售方式上都具有优势;第三,走平民政治的路线——《每日邮报》扣住的是帝国的情愫,而《泰晤士报》扣住的则是改革的情愫。就像《泰晤士报》当年随着改革法案的论战而一举登上了第一个高峰一样,《每日邮报》也在南非战争期间登上了第一个高峰。《泰晤士报》的读者是商业中产阶级,而《邮报》的读者主要是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小商人、职员和技工。《邮报》的成功使得每天买报纸的读者数量在1896至1906年间翻了一番,而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邮报》及其竞争对手们又使读者数量翻了一番。这一扩展相当惊人,但必须牢记的是,即使因为战争刺激了对报纸的需求,使得报纸销量在战争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在1920年,每天买报的人仍然只有543万人,而在1947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500万。只是在两次大战期间以及1939到1945年的战争期间,日报才大规模扩展到工人阶级读者那里。周日报纸则自始至终都走在前面。在1896至1920年这一时期里,《每日邮报》的上升势头的确盖过了周日报纸,但扩张幅度最大的仍然是周日报纸。到1920年前夕,这些报纸的销量达到了1300万份,几乎是日报读者总和的2.5倍,一直要等到1939至1945年间,日报才终于达到这个数字。大众性的日报、晚报、周报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这些报纸扩展到已被周日报纸占领的读者群中去的过程。然而在关于报刊史的几乎所有讨论中,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反倒是这么一种观点占据了上风,即认为新的读者大众在1870年的教育法案生效之前,几乎就没读过什么东西。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真正的新鲜事物,乃是报纸出版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每日邮报》体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它对当时存在着的那些因循守旧的报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泰晤士报》自然已经被《电讯报》远远甩在了后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记录了中

228 产阶级的日益强化的区分，它被分为中产阶级上层和中产阶级下层两个部分，而《电讯报》服务的对象正是人数更多的中产阶级下层。从1870年起，《泰晤士报》的发行量一直在减少，到1908年前，其发行量甚至跌到了1855年的水平线以下，诺斯克里夫在击败了皮尔森的竞争之后，成功地收购了《泰晤士报》。《电讯报》本身已被《邮报》远远甩在后面，其读者也在慢慢流失，1920年前已经下降到18万份。在其他的大众性便士报中，《标准报》衰减得很厉害，最终于1917年停刊。与此同时，《新闻报》在将售价降到1便士之前，其销量也在下降。这些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表明《邮报》所服务的对象还不仅仅是那个新的日报读者群，还包括相当一部分老读者。

皮尔森紧跟诺斯克里夫的步伐，于1900年创办了一种新型日报[先是《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然后是《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创办廉价便士周报的三剑客中的另一人纽恩斯于1896年试办了一份便士报《每日导报》(*Daily Courier*)，但失败了。从办报方法看，《快报》比《邮报》要新得多，头版开头就是新闻(这是在跟风成功的廉价晚报)，并率先采用了通栏标题。接着，诺斯克里夫又办了另一份新报纸《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1903)，这本来是一份面向女性的报纸，未获成功，在将售价降到半便士并转变为第一份图画报后，这份报纸获得了成功。从1911年起，《镜报》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邮报》，在1911到1912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万份，成为第一份发行量达到百万的日报。

报纸出版在经济上的改变导致了其所有制方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有着影响深远的重要意义。在前几个时期，虽然也偶尔会有某个印刷商或业主同时拥有两到三家小发行量的报纸，但是掌控报纸的始终都是单独一家报纸的所有人，或者是某个印刷商或印刷商家族，或者是某家联合股份公司。而现在，在新型的投机性所有权人周围，汇聚了整整一批报纸和刊物。随着第一家企业在便士周报领域获得成功，资本得以积聚，然后投资于新期刊，这反过来又为创办新的报纸或

是收购旧报纸打下了基础。正是这样,《回音》被转化为资本,用以创办《每日邮报》,然后《每日邮报》又被资本化,一份日报依靠的是公众的投资,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到1908年底,诺斯克里夫手里掌握的不仅有几个期刊,以及《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这样的新企业,而且还买下了《泰晤士报》、两家周日报纸(《观察家报》和《快讯报》)和一家晚报[《新闻报》(*News*)]。与此同时,皮尔森手里也有几个期刊和新办的《每日快报》,还买下了《标准报》和《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 [包括《圣詹姆斯公报》(*St James's Gazette*)在内]。其他人也都在跃跃欲试,很多新报纸都是以这种方式创办的,其中包括《星期日画报》(*Sunday Pictorial*, 罗瑟米尔^①创办于1915年)、《星期日图画报》(*Sunday Graphic*) [随后是赫尔顿^②于1915年创办的《星期日插图信使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 此时赫尔顿已经拥有《体育纪事报》(*Sporting Chronicle*)、《星期日纪事报》(*Sunday Chronicle*)、《每日快讯报》(*Daily Dispatch*)和《每日速写报》(*Daily Sketch*)]和《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 比弗布鲁克^③创办于1918年)。就这样,在这一波大扩展中,以新型的大众广告为条件,在报界出现了一场真正的“诺斯克里夫革命”,它把报纸从独立自主的私人企业转变为一种新型的会员制的资本联合体。这实际上是为20世纪的大众报刊奠定了现实基础。

(6) 1920—1947年

在1896到1920年间,报刊的读者数量在扩大,而产权却在日趋集中。1920年后,读者数量继续在扩大,产权的集中出现在一些新的报刊领域,而在其他领域里则有所减缓,报纸的实际数量也开始下降,这

① 罗瑟米尔(Harold Sidney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Rothermere, 1868—1940),英国报业巨子,英国联合报业(*Associated Newspapers*)的老板。——译者注

② 赫尔顿(Edward Hulton, 1869—1925),英国报纸出版商。——译者注

③ 比弗布鲁克(William Maxwell Aitken, 1st Baron Beaverbrook, 1879—1964),英国报纸出版商、政治家、作家,1916年买下《每日快报》,在他统领下,《每日快报》很快发展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1918年以及二战期间,他还曾多次入阁。——译者注

种情况在整个报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报刊扩展的正负两个方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这一时期的基本因素。

读者数量的扩大分为两个阶段：1920到1937年，和1937到1947年。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全国性日报的读者在激增，众所周知，这是通过新闻业之外的一些非常手段来实现的，其始作俑者是《每日电信报》，很快又得到纽恩斯、皮尔森和诺斯克里夫的推波助澜，比如组织大型社交集会，发起促销活动，提供保险，以及给读者赠送各种物品[为促销《每日信使报》(*Daily Herald*)，索思伍德^①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手段]。所有的大众报纸都以这些典型的商业宣传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读者数量普遍扩大了，却没有出现一家匹马领先的报纸，而在之前的几个发展时期，通常都有一家领头的报纸。1920年，日报的总发行量达到543万份，而在1930年，光全国性早报的总发行量就已达8567567份，1937年更是达到9903427份。在1920年有两家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一百万份，1930年有五家，1937年有两家报纸超过两百万份，有三家报纸超过一百万份。《邮报》的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1932年，此后就被《快报》和《信使报》超越。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报纸已经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尽管并不平均。此时，年收入超过500英镑的群体订购报纸数量较大，年收入在250至500英镑的群体订购数量相当大，年收入在125至250英镑的群体订购数量明显要少，年收入在125英镑以下的群体则相当少了。与周日报纸进行比较，仍然不无意义，在1930年，周日报纸的发行总量达到1460万份，而日报的总量是8567567份，1937年是1570万份对9903427份。然而，明摆着的是，在1920到1937年间，周日报纸的扩展速度和日报相比要慢得多，前者的销售总量增长了20%，而后者则增长了80%。与此同时，地方性报刊却完全没有扩展，甚至还有轻微下降。

^① 索思伍德(Julius Elias, 1st Viscount Southwood, 1873—1946)，英国报纸出版商。——译者注

在这一时期，报刊一开始就碰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在1914年，新闻纸每吨价格为10镑，1920年涨到了每吨43镑，1922年是22镑，到1935年才回落到10镑。在头几年，由于成本太高，有几家报纸关闭了，竞销费用的提高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在1921到1937年间，全国性早报从12家减少到9家，全国性周日报纸从14家减少到10家。同一时期里，地方性早报从41家减少到28家，地方性晚报从89家减少到79家。与地方性报刊的萎缩相关的是，对地方性报刊进行联合控制的区域在扩大，尽管报刊数量的减少并不是导致区域扩大的最主要原因。产权连锁的地方性早报从1921年的12.2%上升到了1937年的46.35%，地方性晚报则从7.86%上升到了43.01%。有联合产权的周日报纸也从28.64%上升到了47.11%，但是由居于领先地位的各联合集团所控制的全国性日报却是不升反降，从50%降到了22%。

在办报风格方面，1920到1937年间，引领风气的是《每日快报》。这时期的报纸，其标题样式和版面构成都深受美国报纸的影响，但它们也吸收了英国报纸既有的两种风格：即《镜报》那样的带插图的报纸风格，和周日报纸那种带有杂志格调的报纸风格。1914年8月5号的《快报》使用了字号较小的通栏标题，头版使用的是普通的直栏和小标题，这些小标题数量并不比文内小标题多，只是在每条消息上面可能会出现两到三个这样的小标题。到1937年前（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标题变得更大了，插图也更多了，版式也采用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错落有致的拼版。1914年的《快报》在7栏中有 $5\frac{3}{8}$ 栏是以常见的方式印刷的新闻，1937年降低到了 $3\frac{1}{2}$ 。到1937年前，这种类型的其他报纸实际上都是在模仿较为成熟的《快报》，而《邮报》则仍然把广告放在头版。同一时期的带插图的报纸，如《镜报》和《每日速写报》，只拿出头版的三分之一版面来刊登新闻。

在1937到1947年间，尽管在战争期间出现了新闻纸短缺的状况，

但在总体上报刊仍然有了较显著的扩展。日报的销量从1937年的9903427份上升到1947年的15449410份，周日报纸的销量有了更惊人的提高，从1570万份上升到2930万份。伦敦的晚报销量也有所扩大，从1806910份上升到3501599份。这种扩展模式跟以前相比有所不同，因为在日报中有两家报纸如今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快报》和《镜报》的销量都接近了400万份，其竞争对手的发展却要慢得多。周日报纸的扩展也存在着类似的模式，《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从不到400万份上升到将近800万份，另外两家报纸[《人民报》(*People*)和《画报》(*Pictorial*)]上升到400万份以上。当然，很难断言这种扩展何时才算大功告成，但似乎正是在1937至1947年间日报才完全流行开来，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广泛地定期订购日报，尽管日报的平均销量仍然只略高于周日报纸销量的一半。与此同时，当扩展达到这一顶峰之后，所有类型的报纸又都碰到了新的困难。在战争年代及其后，报纸的尺寸缩小了不少，从而抵消了新闻纸价格的大幅上涨。而现在随着取消对报纸尺寸的限制，一种新的竞争就将拉开序幕，它不再是为了提高订购报纸的全体读者的数量，而是为了提高自身在现有读者中所占的份额。1920至1937年间的扩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报纸的数量有所减少；而在1937到1947年间，情况则相对稳定些。要等到下一个阶段，报纸才会再次遇到趋于集中所造成的压力。

最后，必须作为该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来指出的是，老报纸（《泰晤士报》和《电讯报》）的读者在日报读者总数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新的周日报纸（《观察家报》、《时代报》）所占比例也有很大提高。尤其是在1937到1947年的这一波扩展中，这些“高品位”报纸的发行量有了颇为可观的增长，它们不像在前几次扩展中那样落在后面，或是遭到淘汰，而是慢慢地扩大了它们在整个扩展中所占的份额。这标志着扩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7) 目前

在英国，每一千人拥有日报的数量是609份——这是全世界最高

的，在成年人口中平均有 88% 的人读日报，有 65% 的人读晚报，有 93% 的人读周日报纸。换一个方式来表述，如果我们把销量转换为读者数量——以平均每份报纸有三个人读来推算（这一估算对前面几个时期来说是偏低了，而对于之后来说又是偏高了），然后用读者人数在不同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那么就能看出到目前这个阶段，报纸扩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日报的读者数从 1800 年的 1% 上升到 1850 年的 1.2%，1875 年的 11.5%，1900 年的 18%，1910 年的 19%，1920 年的 54%，1930 年的 75%，和 1947 年的 120%。周日报纸从 1800 年的 1.3% 上升到 1850 年的 5%，1875 年的 19%，1900 年的 33%，1910 年的 60%，1920 年的 125%，和 1947 年的 233%。由此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日报的读者超过了人口的半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覆盖了全部人口。到 1910 年之前，周日报纸的读者超过了人口的半数，到 1920 年之前，覆盖了全部人口，到 1947 年之前超过了人口总数的两倍。

从 1937 年到 1950 年代的销量如下：

	1937	1947	1957
日报总销量	9903427	15449410	17000000
周日报纸总销量	15700000	29300000	26888000

单纯从数字的角度看，扩展到这个程度似乎是到了最后的阶段。

而在同一时期，报纸的实际数量却在不断下降：

	1921	1937	1947	1959
全国性早报	12	9	9	9
伦敦地方晚报	4	3	3	3
地方性早报	41	28	25	23
周日报纸	21	17	16	15
地方性晚报	89	79	75	75
周报	1485	1303	1162	900

报业的收缩进一步强化了产权集中的趋势。就全国性日报而言，四家

234 报业集团控制了日报发行总量的 77%，而且它们还控制了周日报纸 57% 的发行量。还有两家周日报纸的大集团则控制了另外 14% 和 24% 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周日报纸有 95% 是掌握在六大集团手里。这六大集团中有两家还控制了伦敦地方晚报 66.7% 的发行量，这两家中的一家以及六大集团中的另外一家还控制了地方性晚报 30% 的发行量。产权连锁制在日见萎缩的周报业界获得普遍推广，而杂志的不断合并则制造出了两个几乎可以一手遮天的集团，而它们也正是六大报业集团中的两个。读者超过人口半数，而产权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意味着实际选择余地正在逐步缩小），这种强烈对比似乎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集团在商业电视领域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4]

不同类型的报纸在整个扩展过程中都有哪些遭遇呢？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分类把报纸粗分为“高品位”、“大众”和“小报”三类，就能发现以下趋势：

	1937	1947	1957
在实际销量中所占份额%			
“高品位”日报	8	9.5	9.5
“大众性”日报	71.7	62.4	55.5
“小报性”日报	20.3	28.9	35
“高品位”周日报纸	3.5	3.5	5.5
“大众性”周日报纸	82	76.5	71
“小报性”周日报纸	14.5	18.5	23.5

这些数字并不能支持这么一个观点，即认为一份质量较好的报纸刊稳定而缓慢的发展是与教育的进步相关的。高品位报纸延续了上升的势头，而且相当稳定，但最重要的发展是小报的崛起，而当我们注意到杂志也在朝着同样的新闻报道方向稳定发展时，这种趋向就变得尤其重要了。在杂志方面，市场正在稳定地走向细分化，这和广告收入直接联系在一起，适合所有读者的大众性杂志正在逐步被淘汰。这种报刊发展态势看上去甚至不像是一个普及教育的民主国家所应有的。相反，它看上去倒更像一个组织得日趋严密的传播市场，“大众”的程式成为了主导性

的社会准则，而报刊的多样化功能日益被简化为只是寻找一个“卖点”。 235

最后，不同类型的报纸其社会分布状况如何呢？这里有一些最近收集的数据，按年龄群和社会阶级来分，社会阶级依据的是广告商的划分（关于读者的几乎所有统计数字现在都是通过与广告相关的途径来收集的，这再清晰不过地暴露了那个主导性的准则）。

	AB	C1	C2	DE	
按“社会阶级”分	5580000 %	6570000 %	11692000 %	13783000 %	
《镜报》	16	28	44	39	
《快报》	36	36	32	28	
《邮报》	25	20	13	12	
《信使报》	4	9	18	17	
《每日速写报》	9	12	13	11	
《纪事报》	11	12	12	11	
《电讯报》	25	11	3	2	
《泰晤士报》	10	2	1	1	
《卫报》	7	3	1	1	
《观察者报》	19	8	2	2	
《星期日快报》	47	33	21	17	
《世界新闻报》	24	36	55	58	
《画报》	20	34	49	41	
按年龄群分	16—24 %	25—34 %	35—44 %	45—64 %	65+ %
《镜报》	42	43	41	32	20
《快报》	32	32	35	33	26
《邮报》	14	15	15	17	16
《信使报》	14	12	14	16	13
《每日速写报》	13	13	13	11	7
《纪事报》	8	9	11	13	14
《电讯报》	5	7	8	7	8
《泰晤士报》	3	3	2	3	2
《卫报》	3	3	2	2	1
《观察者报》	6	7	6	5	4
《星期日泰晤士报》	6	6	6	6	5
《星期日快报》	24	27	28	25	23
《世界新闻报》	54	47	46	30	42
《画报》	48	53	44	33	21

236 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那种一厢情愿的简单演进过程，也看不到在一般讨论中惯用的简单的社会隶属关系。倘若考虑到年龄群的趋向，那么可以预料上述趋向将会延续下去。从阶级的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在富有和宽裕阶层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日报，既不是《泰晤士报》（实际上它已被《镜报》超越），也不是《电讯报》（它和《邮报》大致持平），而是《快报》，而在所有“大众性”报纸中，《快报》是最接近于小报风格的。与此相似，在周日报纸中，《观察者报》在这个阶层中竟然不敌《画报》，《观察者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都输给了《世界新闻报》，在《星期日快报》面前，更是一败涂地。如果说富有和宽裕的社会阶层（如通常所言）是传统文化的实际捍卫者，他们反抗扰攘大众的粗俗鄙俚，捍卫着“接受过良好教养且有着政治头脑的少数人”的利益，那么从他们所购阅的报纸来看，其行为似乎极为怪异。

是否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随着报纸数量的减少、产权集中在几个大集团手里，以及最糟糕的新闻报道样式都能被接受（在各社会群体之间有变化，但总体上很明显），英国报刊的漫长历史将抵达其终点？这个进程与1870年大众的大举进入显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这一进程，那么它与1820年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作用于整个社会，要理解这个进程，需要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不仅包括糟糕的新闻编辑方针，还包括产权以及与广告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不能靠对历史的理解来解决关键问题，但是任何有效的方法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充分的历史意识之上，这种历史意识所反对的正是在平常的生活中运作的种种神话。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注释：

[1] 近年来，对杂烩风格的强调已经对传统的“高品位”报纸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周日出版的报纸、杂志和增刊显然与广告收入有关，但可能也与随着电视的发展而来的新闻报纸的处境的变化有关。与此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分隔的教育体系的社会的两极化和文化的两极化，也在整个报刊界有着鲜明的体现。

[2] 我不认为内战及共和政体时期的新闻工具有多么重要。尽管决定性的社会根源即源出于此，但是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创议一样，其发展受到了整个政治经济状况的

阻碍，新的开端则要俟诸将来。

[3] 这里关于现代广告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历史的叙述，是对原拟作为本书单独一章中内容的简要概括，我抽出了这一章，以便可以在一次广告研讨会上正式提交，这部分内容后来没能进一步补充材料。我将在下一本书中发表这一章内容，并补充必要的论证材料。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分析，关于广告的讨论就缺少了一个基本的维度。

[4]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里提到的所有这些趋势都还在继续。更新的阐述，参见拙著《传播》（企鹅出版社，1962，修订版即将由 Chatto & Windus 出版社出版）。我修改了1959年周报的数字，由于分类方面的技术原因，这一数字很难核定，但是正如给出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周报的数量确有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从1960年以来，已经有五家全国性报纸或周日报纸关闭，而全国性早报中约有八分之七被三个报业集团所控制。如果不采取一些决定性的公开行动，这种收缩和集中化的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剧。

“标准英语”的发展

1

说话方式是社会阶级的一个标志，凡是在英国生活过的人，恐怕都不会低估它的重要性。我们对说话方式所作出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某些声音、词语和节奏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记忆。我们应该跟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说同一种话，这种感觉也极其强烈。实际上正是靠着这种模仿的欲望和能力，我们人类赖以交流的必不可少的语言，才得以产生。同时，模仿的过程也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任何一种活语言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最简单的群体内部，说话的习惯也存在着多种变异，在表达经验以及在与其它群体接触时所碰到的困难，使我们不断地修正用来模仿事物的语音。这既是对我们的处于变化中的现实经验的确认，又是对这种经验的发现，因此语言要存活下去，就必须作出改变。然而，无论是谁，在其有生之年里，以及在任何社会内部，我们对所熟悉的说话方式的依恋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意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个家庭、某个群体和某个民族，这种意识极为重要，它会与发出和倾听某些声音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发声和倾听是我们的社会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

模仿和改变这两股强大的推动力构成了语言必要的张力。这种张

力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基本过程的一部分。在一般的语言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向：一是不同的语言各自发生演变，一是共同语在某些条件下引人注目地发展壮大。从威尔士和英格兰到意大利和俄国，几乎所有的现代欧洲语言以及像印度斯坦语和波斯语这样的亚洲语言，都有着共同的起源，是在历史中各自发展起来的。而在比较简单的社会中，即使是在很小的区域内，也还是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异，以至相距6英里或8英里的村庄之间往往就不能彼此听懂，或者是在一个有10万人的岛上，竟有多达四十种方言，且往往不能彼此听懂。当一群人发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将它扩展到几英里以外或是遍及半个大陆时，作为这一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将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形式。赋予这个群体以社会凝聚力的因素，也恰恰使之与其他地方的相似群体在根本上区分开来。但另一方面，尤其是现在随着共同体的日益扩大以及传播系统的极大改善，某些语言（英语是最突出的一个）扩展开来，很红火，为许多不同群体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工具。而即使在这些共同语言内部，随着言语共同体向外扩展的强烈趋势，在说共同语的不同群体中，发展与变异的过程也将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这些语言变体可能是地区性的，也可能是阶级性的，而阶级言语的变异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共有与变异之间的张力获得了最微妙的呈现。

238

阶级就是存在于某个地理共同体内部的集团，就其自身权利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共同体。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某个阶级会强调它与自身所属的那个共同体的区别，甚至会实际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或是僧侣所使用语言中的一种，如梵文；或是一门外语，如在19世纪俄国所使用的法语，它被认为是文化优越感的一个标志。而更常见的是，阶级言语往往会成为地方日常言语的一种形式，而这种阶级专用语与地方日常言语（它本身还往往会在更小的地域里发生变异）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综合体。以英语为例，这个综合体灵敏度极高：有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对自己讲英语的方式一直有点

239

紧张，有点焦虑。这个问题与英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它仍然没有得到很清楚的理解。这通常是因为缺乏一种历史的观点，此外也因为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实践上的偏见。得益于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努力，我们有不少材料可资利用，尽管它们也存在着某些一眼可见的漏洞，但这毕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英语提供了条件。我打算把这些历史材料当作形成观点的路径来检阅，并藉此作出一些必要的澄清。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期之于英语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们想必都能感受到在历史和理论的背后，一种复杂的社会经验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2

在被诺曼人征服后的英格兰，人们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法语和英语，拉丁语是第三种语言，它不只是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而且也是学者们平常说和用的一种语言，因此获得了发展。法语和英语之间的界限也就是阶级的界限；这在那位以格洛斯特特的罗伯特^①而知名的编年史家笔下得到了最出色的描述，这段话写于1300年左右，现翻译如下：

英格兰从此落入诺曼人掌中，当时诺曼人只会说自己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法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教他们的孩子，所以在这个国家里，有身份的人都有着诺曼人的血统，固守着为他们所承认的同一种语言，一个人若是懂法语，就会遭到轻视。但下层阶级的人却仍然坚持说英语和他们自己的语言。

^① 格洛斯特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Gloucester)，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著有《编年史》(Chronicle)，此书记载了公元13世纪诺曼人统治下的英国社会生活状况。——译者注

在1204年，诺曼底被纳入英国的版图，诺曼人的法语开始沿着独立的轨迹向前发展，并受到了来自英语的影响。在此之前，古英语在诺曼人法语的影响下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语言就这样逐渐形成，它是这两种变化着的语言所孕育的产物。1362年，英语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从此之后，共同语的成长便高踞于一切之上，在1500年左右已接近于现代英语的形式，大约在1700年之前相对固定下来。 240

与这段历史相关联的社会进程非常有意思。在道德品质与阶级名称之间划等号的做法，可谓源远流长，我们可以从中追寻到阶级歧视的蛛丝马迹。贱人(base)、恶棍(villain)、乡巴佬(boor)和吝啬鬼(churl)，适用于穷人；仁慈(kind)、自由(free)、和蔼(gentle)、高贵(noble)，以及自豪(proud)和危险(dangerous)，则适用于有钱人。但更为重要的一笔遗产是它对所有的学习用语都产生了影响。英语在它独自发展的时期，仅仅流布于未受过教育的、无权无势的众庶之口。因此，与学识和权力相关的词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连同关于富裕生活的大量词汇，都源自于诺曼人。这些方面词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拉丁语，直到14世纪，在文法学校里仍然以法语为媒介来教授拉丁语。当然，一旦共同语形成，从理论上说，全部词汇就可为所有人使用。但是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接受长久而持续的教育，他们在学习拉丁语和法语的同时，也说自己的语言，这个人数有限的阶级从而得以使用自己的语言资源，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教育范围的扩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真正的共同语得以扩大其疆域，但就英语而言，学习用语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上了这一特殊的阶级印记，指出这一点可能仍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特殊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英语分裂为比以前多得多的方言。古英语有三到四种重要的地区方言，但在它们内部存在着意义重大的中心化趋向。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往往是一些主要的中央机构——政府、法律、学习、宗教以及文学等方面——的发展，使得在来自不同地区、参与这些机构活动的人们中间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共同

语。但在诺曼人统治下，这种中心语言是外来的，随着英语的这种中心化趋势的消失，日常方言就变得更加多样化了。当现代英语作为中央机构所使用的语言出现后，中心地带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比以前更复杂了。不管怎样，中心化的趋势仍然存在着，中心地带的言语就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新的共同语的基础。中部偏东地区的古方言——它也受到其他地区方言的影响——成为中心地带共同语的基础。但这与其说是某种地区性方言的兴起，倒不如说是一种阶级专用语的出现。地区性方言的优势在于它是各地——上到首都伦敦以及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所使用的口语。而新的共同语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与这些城市的居民们日常所说的话有着明显的不同。假如我们说伦敦、牛津和剑桥这三个地方的英语说得最好，那指的是在来自四面八方、从政和求学的人们中间所发展出来的共同语，而不是在当地出生的大多数居民所说的话。在书写语言上，这一差异显得尤其明显。这种书写语言是在这些中心地带受训、然后又返回原籍的人们所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书写语言的各种形式，新的共同语才得以在英国传播开来。在口头语尚残存着地区性影响的时候，一种共同的书写语言的存在对其后英国的阶级专用语的发展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虽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书写语言，但是各地的口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在中心地带也是如此。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与中央机构有联系的英国人用一种共同语来书写，但口头说话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差异程度在减小。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伦敦，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也仍然差异很大，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而感到不安。在1530年，帕尔斯格雷夫^①提到了一种“正确的发音方式”，这是现存最早的记录；而帕特纳姆^②则写道：

^① 帕尔斯格雷夫(John Palsgrave, 1485—1554)，英王亨利三世时代的宫廷牧师，曾编撰过教科书。——译者注

^② 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 1529—1590)，16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著有《诗艺论》(*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1589)。——译者注

故今日之作家不会步《农夫皮尔斯》或高尔^①、利德盖特^②乃至乔叟之后尘，因彼等之语言已遭弃用；亦不会用北人日常所操之语，毋论其为贵族、为绅士或其同侪；不会用特伦特河以北之语，其人虽确为今日英国撒克逊人之嫡裔，然吾南方英语之典雅流利非彼等可及；西部边鄙之民，其语更毋论矣。故吾等将用宫廷正语，伦敦及其方圆六十英里内所操之语亦可，然不可越此樊篱。英格兰诸郡固皆有绅士能人，其言语行文悉归于醇雅，即与吾等居于米德尔塞克斯郡或萨里郡之南人相论，亦不遑多让。然各郡之普通百姓则另当别论，于彼等之语，绅士学人实多有迁就。吾人久已奉英语词典及鸿儒硕学之著述为圭臬，故无需舍此另觅他途。

242

这的确是当时的发展趋向，但此时书写语言仍处于变化之中。一个重要现象是拉丁语的词汇和句法被吸纳进来，尤其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尽管这种影响有相当部分后来被断然否决了。灵活多变的口语对书写形式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戏剧繁盛一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活泼多变的口语大量涌入相对局促的共同的书写语言，这一时期英语之生机勃勃，于此可见一斑。只有在经历了这一扩展之后，走向统一的趋势才能压倒口语的各种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帕特纳姆提到了词典，但词典这种工具真正发挥影响是在两个世纪之前。语言仍在变化中，尽管与之前的几个世纪相比要缓慢得多，而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此时将发挥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力。书写语言标准化的过程仍在进行，而且变得越来越有信心，但标准语的来源此时却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帕特纳姆写到，标准语显然是

① 高尔(John Gower, 1330—1408)，与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和乔叟同时代的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人类的镜子》(*Mirour de l'Omme, or Speculum Hominis, or Speculum Meditantis*)等。——译者注

② 利德盖特(John Lydgate of Bury, 1370—1451)，英国诗人、本笃会修道士，主要作品有《王子的毁灭》(*Fall of Princes*)等。——译者注

243 宫廷社会和大都会的用语，他还马后炮似的向“鸿儒硕学”致谢。在王政复辟时代，宫廷用语为国外风气所染，曾经风靡一时，但此后便好景不再，早已不是什么中心了。斯威夫特虽也承认它曾风光无限，但还是把它描述为“全英国成绩最差的学校”。与此相似，在现实生活中曾被宫廷革职的托马斯·斯普拉特^①在其《英国皇家学会史》中，斥责“所有的书籍或作者都非好即坏”，根据这套理论，他试图寻找到一个“口才便给、不偏不倚的宫廷”，但他推荐的却是

一种严密、朴素、自然的说话方式，表达明确，意义清晰，自然从容，使一切事物都尽可能地趋近数学一般的清楚明白；须优先择用工匠、农人和商人的语言，而非俳优或学究的语言。

此时英格兰的阶级结构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我们可以将这个新时期概括为：崛起中的中产阶级正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同言语。在经过了多次重要的改变之后，这一目标终于在19世纪前实现了，也正是在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标准英语”这种说法，它指的是言语——它和早已建立起来的书写“标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以“标准”来命名，暗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它不再是共同语，而是一种模范语言。这种命名表明一种关于阶级言语的新观念已经被充分意识到了，如今它不再只是某个都市阶级的实用的利器，而是社会区分的工具和重点所在。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探讨的正是这一历史过程。

3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有许多群体抱着不同的目的，竭尽全力

^① 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 1635—1713)，英国牧师、神学家。——译者注

地推动英语的合理化改革。皇家学会“改良英国本土语言”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成立，表明一种新的科学哲学为了自身的话语，努力想清除语言中的杂质。另一群人——从艾迪生和斯威夫特到其后的蒲柏和约翰逊博士——关注的问题则是在新的社会里尚缺少一种“文雅的标准语”。而在这些知识分子集团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实际的压力，施加这一压力的是刚刚才变得强大并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自认为骤然间已享有社会名望但匮乏社会传统的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级认为“正确性”实在是必须获得的一套系统化的规则。18世纪的伦敦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拼写教师和发音教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都是无知之徒。即便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都是一般公认的所谓学者，结果也不会相差太多。学究气十足的语法教学被锁定在这么一种幻觉中，即认为拉丁语的语法规则是引导人们正确掌握英语的最好途径。约翰逊博士也曾大肆宣扬过一则同样是错误的教条：拼写单词是引导读音的最好途径，“最出色的演讲者……是最少偏离书写语言之人”。因此，新的“标准语”便不同于之前的共同语，共同语主要是从社会交往及各种现实关系中发展而来，而“标准语”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人造物。语言的种种习惯可谓顽固之极，所以不可能被那些意志坚定却有点无知的教师们全盘改变，但他们的努力仍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他们所制造的张力也仍然紧绷着。

244

在这一时期里，共同的发音（有别于各种地区性的变体）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部分地是通过平常的变化，部分地是凭借了“正音”的教学。众所周知，在引导发音方面，英语拼写实际上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往好里说，它记录的往往是已经废弃不用的读音，但实际上早在拼写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很多读音就已经被废弃了，而且很多简单的错误在那时候就已经种下了。iland、sissors、sithe、coud 和 ancor 这些词被那些不知其来源但确信其有错的人改成了 island、scissors、scythe、could 和 anchor，但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它们的读音。然而与此相似的一些错误改动，比如 fault、vault、assault（不需要加上 l 这个字

245 母), 或是 advantage 和 advance(不需要加上 d 这个字母), 却在拼写和读音两方面都铸下了永无更改的错误。以拼写为准绳的原则把 offen 这个音变成 often, forrid 变成 forehead, summat 变成 somewhat, lanskip 变成 landscape, yumer 变成 humour, at ome 变成 at home, weskit 变成 waistcoat,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类词也是可以标明“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不同说话方式的压力点, 但实际上那些未受教育者由于受“正确性”教条的束缚较少, 反倒保存了传统的读音。

与这一过程相关的一桩有趣的事情, 是在文学和新闻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未受教育者拼音法”。英国中产阶级的一项主要娱乐活动就是记录那些说 orf 或 wot 的人所犯下的可怕错误, 即使这些人能够拼写出标准读音。他们错就错在以为平常的拼写能够引导人们如何正确发音。我们可以试举一例, 这个例子出自一部流行的侦探小说(作者是牛津大学一位导师的妻子), 其中有一个很雷人的来自北部地区的导师:

菲尔德站在那里, 眨着眼, 挠着冻疮。他突然傻傻地一笑, “好吧, 林克先生, 你可以有一次机会来马上表明你的原则。”(他把 chance 和 once 读成了 channse 和 wonnce)

在这里, 麻烦就在于一个挺不错的人(没有生冻疮)究竟该如何来读这两个词。如果他按照平常的拼写来读, 那么他发“chance”这个音就极可能带有北方腔, 而发“once”这个音就根本不像是英语了。事实上, 就这个例子来说, chahnse(这样拼更确切)和 wunce(这是小孩和没知识的人的拼法)才是更加清楚明白的拼法, 但它们被埋没了。我们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对自己的语言有足够多的了解, 停止这种拼写游戏, 不再赤裸裸地歧视街巷俚语以显示自身的文雅。但我们还是可以试着来看看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中, 已经使用拼写法来表示诸如威尔士士兵或萨默塞特的农夫之类的外来元素, 而在王政复辟时代的戏剧中, 则有了更精细的区别, 不管是纨

跨子弟的矫揉造作的腔调，还是那些无缘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的“错误”发音，这些区别都有其社会基础。但只是到了18世纪，在小说和戏剧中，拼写法的真实发展才变得引人注目，19世纪自然更是其全盛期。我觉得若是将18世纪贵族妇女所写的书信与拼写法的发展对照着来看，会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在那些书信里，包含有诸如此类的措辞和听音拼写：

between you and I, Sis Peg and me, most people thinks, sarve, sartinly, lerne(learn), schollards, Frydy, Mundy, byled, gine(join), went down of his knees, jest agoing to be married, the weather has been wonderfull stormie, he is reasonable well agane, I don't see no likelyhood of her dying.^①

这些信也流露出一种腔调，而这正是急于纠正自己的拼读的中产阶级所试图改变的：

I believe I shall Jumble my Guts out between this and russell street. (斯特拉福德的安妮女公爵)^②

I was at her Grace of Shrewsbery's who I think is more rediculouse in her talk than ever. She told all the Company as they came in that she was very much out of humour for she had things growing upon her toes like thumbs.^③(斯特拉福德的安

① 大意是：在突然得知弗莱迪和芒迪这两位学究一起拜倒石榴裙下即将大婚后，大家都认为佩格姐姐你和我之间是前嫌冰释了，暴风雨的天气来得正好，我看一时不太可能平息。——译者注

② 大意是：“我相信我会在此地和拉塞尔大街之间翻肠倒肚地奔波。”——译者注

③ 大意是：“我在施鲁斯伯里的格蕾丝那里，我认为她的谈吐比以往更可笑。在客人们进来的时候，她当众说自己情绪糟透了，因为事情多得没完没了，把她的手脚都缠住了。”在这里，had things growing upon her toes like thumbs是一个不知所云的错误表述。——译者注

妮女公爵)

I danced with Ld. Petre, and he is a nasty toad, for I long'd to spit in his face. ①(萨拉·伦诺克斯女士)

She is femenine to the greatest degree, laughs most heartily at a dirty joke, but never makes one. ②(萨拉·伦诺克斯女士)

我们当然也能看到，在这个阶级内部，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动，这也正是贝恩夫人③吃尽苦头之后才认识到的。在作别“未受教育者拼写法”之前，我们也许可以根据已知的18世纪晚期中产阶级的发音方式，以正规的拼写方式来记录那个时代里一个受过教育的绅士所说的话。

247

Aye, he's an ojus feller, if he is a Dook. Her leddyship's more obleegin, I've offen taken a coop of tay in her gyarden, and admired her lalocs, which she thinks more of than goold. A umorous ooman, and her gyearls the prettiest in Lunnon. But to be in the Dook's neighbrood's summat dauntin. He talks only of his fortin and his futer, as if he was some marchant of cowcumpers or reddishes. And he wears a cyap and weskit like a sarvant's, and sits in his cheer like some chaney Injun. You know that kyind. ④

① 大意是：“我和 Ld. 彼德跳舞了，他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癞蛤蟆，我想把唾沫吐他脸上。”这里 for 是误用，前后两句并无因果关系。——译者注

② 大意是：“她真是一个极品女人，听到肮脏的笑话会开怀大笑，但自己却从来不说。”——译者注

③ 贝恩夫人(Aphra Behn, 1640—1689)，英国剧作家和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剧作《逼婚或嫉妒的新郎》(*The Forced Marriage, or the Jealous Bridegroom*)(1671)、《多情王子》(*The Amorous Prince*)(1671)等多种以及小说《王子的奴隶生涯》(*Oroonoko*)。——译者注

④ 大意是：“对啊，他是我们的朋友，不管他是不是公爵。夫人她很好客，我经常在她的庭院里喝茶，欣赏她的谈吐，而她的思想就更其美妙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她的几个女儿也是全伦敦最漂亮的。可要是坐在公爵身边，就有点气闷了。他只谈他的钱财和交易，就像个牛马贩子或是商人。他戴的帽子和穿的背心都像是佣人穿的，坐在椅子上就像一个傻呵呵的印第安人。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副模样。”——译者注

看看这一番描述，会有趣地发现如今关于赶时髦的中产阶级之粗俗面目的描绘，多少有着过去的影子。

大约在 1775 年到 1850 年间，后来被称作“公认的标准语”的发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诸如 *past* 和 *path* 这样的词里，元音被拉长了，如今这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说话方式，但在这一时期之前，它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乡巴佬的口音。*Boiled* 失去了其 *biled* 的发音，几乎所有带“oi”的词都是如此，而在诸如 *servant* 和 *learn* 这样的词里，“ar”的发音（在“正确”的伦敦话中，大约始于 1500 年）也消失了，只有个别几个词是例外，如 *clerk* 和 *Derby*。有趣的是，这几个词如今却因为其反常性而获得了褒奖，被认为是优雅的发音。正如我们现在还能听到的，*had* 和 *man* 逼肖于 *head* 和 *men*。在大多数词中“r”被进一步弱化了，*more* 向 *maw* 靠拢，而在像 *orator* 这样的词中，更是只弱化为一个滑音。在 *bird* 这样的词里，“r”完全不发音，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宝贵的元音语音，它留存至今。随着传播手段的改善，这些变化以及类似的变化被传播开来，而将它们作为优雅的发音方式确定下来的最主要的动力，无疑是在公立学校里所兴起的统一化热潮。这其实是“正确性”、（语言的）自然发展以及矫饰等混杂而成的大杂烩，但它却俨然一副从来如此的模样。它不再是某种英语，或是一种有用的共同方言，而是“正确的英语”，“优良的英语”，“纯粹的英语”，“标准的英语”。凭借这种名义，有那么几千人就可以傲慢无礼地指斥别的英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说。随着教育的扩展——主要是沿着中产阶级所指引的方向，这种态度蔓延开来，它原来只是某个阶层的一个特征，现在却发展到这种地步：所有受教育的人都会认同于这种发音方式，而那些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老师和学生，竟会以自己父亲的说话方式为耻。

这就把我们带入到 20 世纪持续不断的社会变化之中，我们必须来 248
观察这段历史对当前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

4

在语言理论上，现在通常区分出三种英语口语语言：公认的标准语，我们已经回顾了其历史；地区性方言，在很多地方都还有着各种不同的存留；修正的标准语，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习用形态，代表着地区性方言的某种发展，但还没有达到公认的标准语的高度。

使用这种分类法的人，大多数当然都将他们的言语习惯归为“公认的标准语”，其影响之大甚至波及学术层面，以至像 H·C·怀尔德^①这样出色的语言史家也会诡辩说：在公认的标准语中，path 和 last 中的“a”发长音听上去要比发其他的音“更悦耳更响亮”（这种说法虽然出于一种自然的喜爱之情，但未免太武断了）；他还诡辩说，倘若在“bird”中插入“r”这个音，就会失去元音的特质和长度（对于有着不同的言语习惯的我来说，“r”这个音就是悦耳响亮的）。而 R·W·查普曼^②则可以这般写道：

在语音方面，英格兰总算没有遭受某种民主暴政的压迫；在一个宽广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无所羁绊地畅所欲言。

但凡对语言有些想法的人，都会在这一番话里面异常清楚地听到一种阶级歧视。查普曼还进一步把公认的标准语定义为一种阶级言语，

这个阶级尽管不能说自大到排外的地步，但其成员必须是有

^① 怀尔德(Henry Cecil Kennedy Wyld, 1870—1945)，英国词典编纂家、语文学家，出版有《英语通用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32)。——译者注

^② 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 1881—1960)，英国学者，以约翰逊博士和简·奥斯丁著作的收藏者和编辑者著称于世。——译者注

限制的。维系其传统的，主要不是大学，而是公立学校。

怀尔德认为，能够“始终如一地以最正确的方式”说“最好的英语”的那个阶级，是“英国正规军的军官们”。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得以明白为什么“公认的标准语”不会发展成为“最好的英语”。

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从广大的农村地区吸收了大量人口，随着识字率的上升以及印刷散播范围的大幅扩大，也随着旅行的增加以及社会流动影响到更多的人群，一种共同的英语言语明显加快了其发展速度。很难估计我们迄今已抵达这一演进过程中的哪一点，而这正是“公认的标准语”乞求回答的问题。若从整体形势上看，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地区性方言明显有所衰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说话还不大能听明白，这种情况现在不多见了，而在以前却司空见惯。此外，尽管仍然有很多人讲一种清晰的地方语——通常是剔除了遣词造句方面的某些极端习惯，但还是有很多人讲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只是带有当地口音而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真正意义上的方言正在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同语在各地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言说方式。其中有些从发音上看，纯粹是地区性的，其他的则似乎代表着某些言语形式的跨地域发展，它们当然不是“公认的标准语”，也不是作为其前身的旧的地方方言。在个别情况下，可以看到这两类言语形式之间仅有细微的差别，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它们涵盖了全国说英语人口中的大多数。但是用来描述它们的名称，无论是“地区性方言”还是“修正的标准语”，都会引起误解。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区域性的经过修正的地方言语形式。“修正的地方语”和“修正的标准语”意义大不相同，后者假定凡我同类都以学会这门阶级专用语为目标只是未能实现而已。

下一个发展阶段当然是言语的“跨地域”发展，正是在这里，共同语言的产生才遇到了真正的难题。我们已经看到，“修正的标准语”把根据拼写就能发音的习惯当作它的首要因素之一。虽然它也可能会

250 误读音，但作为一条原则，它显然是一个普遍而永久的进步。“修正的标准语”包括了基于这条原则而产生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已经被广泛接受，甚至影响到许多可以辨别的地区性言语形式。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修正的标准语”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南方言语形式的发展而已，包含着某些纯粹的阶级因素。因此，虽然从某些方面看，“修正的标准语”没有离开英语演变的总路线，但在其他方面它又偏离了这一路线，事实上它越来越被等同于某个特定阶级。当然，它在教育领域已经是根深蒂固，随后又进军广播电台，因此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通过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化，日常的语言也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修正的标准语”在开始被等同于“公立学校英语”（这其实是对它的更准确的描述）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阻碍它被普遍采用的障碍，它们无疑会抵消它在教育以及广播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在广播方面，由于阶级专用语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所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异。流行艺人或广播员的标准口音除了模仿“公立学校英语”及其衍生物之外，也常常采用一种伪造的美国口音。某种外来的或是合成的替代用语可以避免阶级的和地区的复杂性。

“公立学校英语”的确有一度看似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跨区域语言，但现在似乎可以肯定，以它当初所设想的种种形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用言语形式来表明阶级区分（当然，这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只能使它失去成为一种真正的共同语的机会。它对权力、学问和物质成功（这些因素自然会驱使人们去学它）的认同，在容易引发争端的势利和愤恨的人性领域，遭到了一些强烈情感的反抗。看看“未受教育者的正字法”是怎么去适应公立学校英语的正字法（它尤其适用于怀尔德所谓的“最优秀的阶级”——英国正规军军官们）的，这种有趣的事情第一次昭示了形势会如何发展，比如这个例子：

We head a chahnce of pahchasing that fohm, but a bahd

in the hend seemed maw vehluable, evenchalleh. ①

在这里，阶级的言语形式遭遇了根据拼写来发音的强大潮流，从前所谓的“公认的标准语”不仅被用于喜剧性的表现，而且也用来衬托根据拼写来发音的拼读法的“正确”，所以尽管有着众多强大的有利因素，它被普遍采用的机会却很小。事实上，急于自封为“公认的标准语”的“公立学校英语”开始抛弃了一些按照“正确”规则来看是错误的读音，而正处于发展之中的跨地区言语则结合了老的“公认的标准语”和某些较重要的经过修正的地方言语形式。在“what”以及类似词里，“h”被确认要发音，而在19世纪的“公认的标准语”里却不发音，这些送气音由于拼写的原因而逐渐变得常规化了，即使在那些说“公认的标准语”的人那里，也是如此。“r”这个音也在回复到从前，尽管还不是很明显，在“more”和“bird”这样的词里，元音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受拼写影响所致。“a”这个非常重要的音也在变化之中，所以尽管“chance”仍然发“chahnce”的音，但其重读音的音长却缩短了，而在像“had”这样的词里，接近于发“e”音的趋向则得到了扭转。在所有这些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受教育面更广的社会里，人们是根据拼写来说话的，这比曾经被认为可笑的不发音或弱化发音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公认的标准语”早在30年前就已确定，现在却正在沦为一种地方性言语，因为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对这些语音不加区分，但他们说的英语却已经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地方特征。比之于女人，这种变化在男人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但平心而论，也可以说那些听上去与“公认的标准语”基本相同的语音，正在变成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性的使用。我们不能说这是作为最佳言语形式的“公认的标准语”自身在进化。事实上，我们仍然处于共同语音发展的初期阶段，因为诸如标

① 大意是：“我们曾有机会买下那张条凳，但最后还是把钱留在了手里，这似乎更有价值些。”——译者注

准之类的东西还有待采用。

252 在这里所碰到的还不只是跨地区的问题，还有国际性的问题。在美国人听来，“公认的标准语”一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在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互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美国英语占据着优势。有许许多多美国英语词汇、言语形式以及发音方式，都已悄悄地被吸纳进英国英语之中，不仅如此，美国英语的言说方式几乎对所有传统的英语言说方式产生了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它和“公认的标准语”所认可的每一个单独语音都是相抵触的。此外，通过赋予权力和物质成功以其他口音，它也就剥夺了“公立学校英语”从前在这方面所独享的垄断权。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中，但这不能只说成是英语的美国化，确切地说，是有另外一种因素加入到了英语口语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当中。

哪一种言语形式将成为通用语，这根本就无从确定，但不管怎样，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削减神秘化和歧视的地盘。上流社会用语与非上流社会用语之间的争论^①，就其受欢迎的程度而言，与其说是危险的，倒不如说是可悲的，因为它最终表明的，是阶级界限——就词汇而言——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动。当然，总会有某些人和某些群体急着要表明他们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但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语言，其深层的发展过程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尽管可能会暂时受到干扰。我们只想说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过去的语言因素一直都活着。与此同时，在一个扩大的共同体中，我们也要彼此交谈，既保留各自的实际差异，但也要消除那些我们觉得不恰当的表述方式。我们几乎已经越过了用日常话语难以清楚地表达意义的阶段，尽管由于教育体制所限，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必要出现的困难，这是一切有组

^①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曾展开过一场关于上流社会用语和非上流社会用语的大辩论，词汇的使用是争辩的焦点。中产阶级喜欢用一些别致的新词，这些词往往带有委婉色彩，中产阶级以此来显示自己谈吐优雅。而上层阶级则多半坚持使用更加质朴的传统词汇，这些词汇也是工人阶级所使用的，因为工人阶级无需通过使用那些委婉的词汇来显示自己的谈吐有多么优雅。——译者注

织的学习都会碰到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些问题与情感上的紧张关系相关，这些问题肯定还会延续下去，但我们若是把丰富且又延续不断的英语发展历史作为理解的基础，并学会以开放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减。格洛斯特的罗伯特曾写道：“不懂法文的人，只能遭到轻视。”这说明在当时作为征服者的法国诺曼人是高高在上的，然而还是在这个国度里，当年他所提到的那种优胜的语言比之于他用来书写的语言，显然离我们更加遥远。历史并没有在 1800 年前后终止，也不曾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停下脚步。在这方面，活力四溅的语言给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证词。

253

英语作家的社会历史

1

作家的社会出身，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形式，他们的谋生方式，以及他们所期望并获得的读者类型，对文学会产生哪些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过很多的争论。理论上的问题往往是非常艰深的，它们当然也卷入了这种争论，但是最显著的困难却在于对各种事实所作的概述，这种概述可以用来验证某些理论原则。偶尔也会有一些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人们彼此开出一些名单，来证明自己对那些已有定评的作家的出身及隶属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些名单中，挑选的原则通常很明显是和某个特殊的论题相关的。我们似乎需要这样一种事实的概述，它依据的是一份标准的名单，然后由此出发，重启讨论。我已在努力给出这样一种概述，依据的是牛津版《英国文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的作家名录，以及很权威的《英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当然，如果要做得更理想，那我们还需要做更加详尽的研究，但是这项考察已包括了将近350位作家，他们的出生年月在1470年至1920年之间，这也许可以初步描摹出一个轮廓。提出的问题落在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出身，教育类型，谋生方式。关于社会出身，我根据生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列出了

八种具有相当连续性的家庭类型：贵族，乡绅，专业人士，大商人，小店主，农民，手工艺人和体力劳动者。关于教育，列出了四种中学受教方式：国立文法学校（1860年以后改称“公学”），地方文法学校，非国教中学，家庭或个人。关于大学，则采用了传统的分法，即牛津、剑桥和其他大学。关于谋生方式，采用了三种普通的类型来表明主要的收入来源，即自立型（继承了遗产或有财产），雇佣型（除了作家赖以出名的写作外还做别的工作），以及职业型（主要收入来源于作家在其赖以出名的那个领域内的工作）。这三种类型之间有很多重叠的部分，特别是在第三类里，但这是可以允许的。当然，同样很明显的是，家庭类型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相对而言的重要性，在历史上也已经有了变化，在评估出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虽然存在着这些困难，但我想这个浮现出来的概略图也许还是有点用处的。

历史分期是以50年来划段的。出于几种理由，包括最后日期在内的实际的历史分期是这样的：1480—1530，1530—1580，1580—1630，1630—1680，1680—1730，1730—1780，1780—1830，1830—1880，1880—1930。如上所列，我认为这些历史时期与实际文学史之间的关联要比任何一种常见的分期法来得更加紧密。把作家归属于哪一个时期，依据的是他出生后第十年的时间，因为在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教育当中，十岁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龄。这也意味着这里所收录的作家没有一个是出生在1920年以后的，对192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现在当然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名单。

在我们所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从1480年到1530年，我们看到的是一批创造了都铎王朝文学的作家。在所列的21位作家中，有3位的出身无法确定。在剩下的18位作家中，有11位出身于贵族和乡绅（分别有3位和8位），4位来自与乡绅关系紧密的专业人士家庭。只有3位可以确知是来自别的阶层：2位出身于农民家庭，1位来自手艺人家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又大大提高了这种由乡绅主导的文化的同质化程度，据我们所知，有17人曾上过这两所大学。例外的4位中，1

256 位是贵族，2位是苏格兰人，曾上过苏格兰本地的大学，还有1位则没有相应的记载。就教育机构而言，学校教育就不那么一致了：在有记载的14人中，4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5人上的是地方文法学校，还有5人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在内容上，这个时期的文学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神学和教育方面的著述，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顺藤摸瓜地发现多达10人是靠着他们赖以出名的职业为生的，他们主要是在教会和大学里。有3人在其不同的生活阶段里，曾在职业型和雇佣型之间摇摆，还有6人主要是受雇佣的。从雇佣类型可以看出机构和家庭之间的紧密关联：或者是在宫廷服务，或者是担任皇室和贵族的家庭教师。只有2人似乎是完全自立的，虽然有很多例子表明他们从地产获得了额外的家庭收入。

在下一个时期里，即1530年至1580年间，我们看到的是创造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文学的那些人。在38位作家中，有2人其出身无法确定。在剩下的36人中，15人来自贵族和乡绅家庭（分别有3人和12人），9人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他们和乡绅家庭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了。有12人出身于大商人、小店主和手艺人家庭（分别有4人、3人和5人），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变化。然而，与各种机构相连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其重要性仍然非常突出。在有记录的36人中，27人曾上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2人上过国外的大学，另外7人（包括一名贵族和一名宫廷侍从）没有上过大学，其中3人是小店主和手艺人之子。在有学校教育记录的19人中，8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9人上的是地方文法学校，另外2人是在家里和宫廷中受的教育。至于谋生方式，有7人是完全自立的，2人虽在宫廷服务但实质上是自立的，11人除了其作家的行当外还受雇佣于宫廷、教会、法院、大学，或是在贵族家里担任秘书或教师。前一时期的某些职业基础被保留在教会中，但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一个职业作家阶层已经出现，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第一代戏剧家，以伦敦的剧院为中心。以前戏剧和教会或学术机构通常是有联系的，在这个时期，新出现的剧院取代了教会和学术机构的位

257

置。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剧作家都出身于那些崭露头角的阶级：或者是和乡绅没什么联系的专业人士家庭，或者是小店主或手艺人家庭。这是一个全新的因素，而与此同时英国文学的其余部分其内容以及作家出身的分布状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都铎王朝时期的格局。

下一个时期，即 1580 年至 1630 年间，我们看到的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玄学派诗人、“骑士”诗人与清教徒诗人，还包括到霍布斯为止的一批政论家。在列出的 33 位作家中，有 3 人的出身无法确定。在剩下的 30 人中，9 人出身于乡绅家庭，13 人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1 人出身于大商人家庭，4 人出身于小店主家庭，2 人出身农民家庭，还有 1 人出身于手艺人家庭。与各种机构相连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延续了其重要性：有相关信息的 30 人中有 28 人曾上过这两所大学。12 人上过国立文法学校，9 人上过地方文法学校，3 人是在家里或宫廷中接受的教育。值得关注的是，从许多人的个人生涯看，大学时代的结交对那些出身寒微的人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前半个世纪里，也有一些迹象表明了大学时代的结交对个人生活有重要影响。其结果是一旦牛津或剑桥不再遥不可及，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向上流动。谋生手段方面，剧作家们仍然可以从事他们在剧院里的职业（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社会出身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大一样，又回归到了乡绅以及与乡绅有关系的专业人士家庭，出身于大商人、小店主和手艺人家庭的人有明显的下降）。有更多的作家受雇于他人，离开了他们的作家行当，有的栖身于旧的机构里，有的充当某个贵族家庭——通常是在大学里结识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的秘书或教师，后一种有相当大的增长。33 人中有 7 人是完全自立的，托身于教会的人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在下一个时期里，即 1630 年到 1680 年间，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王政 258
复辟时代的作家，以及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一些作家。在列出的 22 位作家中，有 21 人的出身是可以确认的。这个时期作家的总数有所减少，出身于贵族和乡绅的作家共有 9 人（分别有 2 人和 7 人），比例有所回升。7 人来自专业人士家庭，3 人（其中 1 人迟至 18 世纪才有著作问

世)来自小店主家庭,还有2人(班扬是其中之一)来自手艺人家庭。与以前的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更加封闭,其阶级基础也更为分明。牛津和剑桥的重要性依然很明显,有相关信息的21人中有13人上过这两所大学。另有3人上过爱尔兰的大学,1人上过法国的大学,剩下4人中有2名贵族、2名穷人。在有学校教育信息的18人中,6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7人上的是地方文法学校,1人上的是非国教中学,还是4人是在家受的教育。在谋生手段方面,数量有所减少的剧作家们仍然主要以不多的几家剧院为根基,他们占据了10名职业作家中的一大半。有8人是受雇佣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们常常是在政府机构服役,还有4人则是完全自立的。

下一个时期,即1680年到1730年间,我们看到的是奥古斯都时代和18世纪中期的一群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哲学家。大体上看,1660年到1730年间的英国文学总体发展较为缓慢,因此有记载的作家的数量也相应减少了。从1680年到1730年这一个时期,作家社会出身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所列出的19位作家中有13人来自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专业人士家庭,只有2人来自于贵族和乡绅家庭,还有4人来自于大商人、小店主和手艺人家庭(分别为1人、2人和1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重要性相对而言有较大提高,而上过牛津和剑桥的作家人数则第一次不到半数(19人中有8人)。在有学校教育信息的人当中,6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9人上的是地方文法学校,2人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在谋生手段方面,这些作家中仅有2人是完全自立的。对有些作家来说,已逐渐有可能完全靠专业写作来维生了,尽管往往还不能达到充裕的地步,一个职业作家阶层——其中不少是雇佣写手——出现了,这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点。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作家中,大多数在以著述为业的同时还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通常是专业性的(包括教会在内,但不像以前那样频繁),有时候也会选择诸如秘书或教师之类的旧的服务形式。可以获得的政府职位也比以前多了。令人瞩目的是,通过婚姻来获取钱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这一时期还是恩主资

助的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组织更加完善的图书市场的兴起。一个出色的作家其平常的生活格外地起伏不定，各种收入来源都不稳定，在很多时间里都只能过一种勉强果腹的生活，直到鸿运降临——不是得到了恩主的资助就是从市场上大赚了一票——才有转机。形成中的作家阶层也有了一种区别的意识，作家们可以分成两拨，一拨是遵循传统文学形式的，通常能得到恩主的资助，另一拨则只能去迎合新的市场。但是在好几位作家的生涯中，这种区分是很模糊的，因为整个这一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系统和形式之间的重叠交错。

下一时期，即从 1730 年到 1780 年间，我们看到的是 18 世纪晚期的作家和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中的几位。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的作家仍然占据了多数，在列出的 25 位作家中有 11 人。只有 2 人来自贵族家庭，来自乡绅家庭的则一个都没有。来自小店主、农民和手艺人家庭的作家异军突起，成为一支新的力量，在 25 人中占据了 11 席（分别有 4 人、4 人和 3 人），与专业人士家庭平分秋色。1 人来自大商人家庭。苏格兰和爱尔兰相对而言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延续。和前一个时期一样，牛津和剑桥的重要性下降了：25 人中只有 8 人曾上过这两所大学。4 人上过爱尔兰或苏格兰的大学，但是也有 13 人完全没上过大学。学校教育方面，4 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5 人上的是苏格兰或爱尔兰的中学，3 人（包括 2 位女性）是在家里受的教育（第三位是科贝特，他真的是自学成才的）。随着出身于农民和手艺人家庭的作家（彭斯^①、布莱克^②和潘恩^③）的崛起，一些崭新的思想方式和感觉方式进入了文学。谋生手段方面，有 3 人是完全自立的。恩主的资助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有些作家在国立文法学校上学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有势

260

① 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苏格兰诗人，出身于佃农家庭，家境贫寒。——译者注

② 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出身于伦敦一个贫寒的袜商家庭，代表作有诗集《天真之歌》、《经验之歌》。——译者注

③ 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国政论作家、激进民主主义者，出身于诺福克郡的一个小镇塞特福特，父亲是裁缝。代表作品有《常识》(1776)。——译者注

力的朋友，他们在以后给予这些作家各种形式的帮助。在教会、司法界和医疗界另外找一份工作聊以维生，这种情况很常见，而政府职位的重要性也变得更明显了。但是这一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作家们的极度贫困，这在前一个时期已稍露端倪，而现在则有更多的作家陷于贫困。虽说有足够大的图书销售市场，连带着雇佣写作的活儿也挺多（这使得靠写作谋生得以成为可能），但是那些没有任何私人收入而且也没有有势力的朋友作为靠山的作家，尽管很努力，也常常会陷于赤贫，得不到保护。

下一个时期，即从1780年到1830年间，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以及早期和中期的维多利亚时期作家。最关键的事实是英国文学的扩展此时已变得非常明显，这个扩展过程早在18世纪就已部分地展开，虽然发展并不均衡。社会出身方面，这些作家中数量最大的一群来自专业人士家庭，在57位作家中占据了25席。有1人来自贵族家庭，8人来自乡绅家庭。9人来自大商人家庭。出身于小店主、手艺人、穷苦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家庭的作家有13人（分别有5人、5人、2人和1人）。最后这一群作家思想方式较新，关注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贡献尤其突出。此外，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女作家。

在有学校教育信息的52人中，有18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14人上的是地方文法学校，4人上的是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学校，16人（包括8位女性在内）是在家里受的教育，但多半是不够的。牛津和剑桥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回升，57人中有24人上过这两所大学。7人上过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大学，1人上过伦敦的天主教大学，另有1人上过法国的天主教大学。通观整个名单，可以发现这些作家中沿着标准的人生道路来走的非常少。57人中只有10人是出身于乡绅或专业人士家庭然后从国立文法学校一路读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谋生手段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这要归因于图书销售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杂志的重要性和稳定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早先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剧院或是更近

一些 18 世纪的咖啡馆，曾经起过文化机构的作用，那儿是职业作家们居住和社交的地方，如今作家们则是明显地团聚在伦敦和爱丁堡的一些杂志的周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个得到公认的新的“伦敦文坛”。在 57 中人约有 9 人在收入方面是完全自立的，但有许多人轻松地确立了其作为职业作家的身份，却不只是通过著作，而且还通过文章、评论、编辑、旅行记等，当然还包括在杂志上发表的系列作品。从比例上看，受雇佣从事一份与作家的的工作相去甚远的差事的作家非常之少。在那些人当中，在政府部门和教育界谋职的最多，还有一些则是在教会和司法界。对于那些在小说和杂志的世界里如鱼得水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安逸的时期，但我们注意到诗人——不管他是有独立的收入，还是要依靠别人的帮忙和资助，甚或这两者都做不到——和他们在 18 世纪的前辈一样贫穷。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里，女作家以及那些来自较为贫穷的社会群体的男作家所作出的贡献是格外显眼的。

下一个时期，即从 1830 年到 1880 年间，我们看到的是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一批作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组织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的上层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列出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来自贵族家庭，而来自乡绅、大商人和专业人士家庭的作家，现在普遍地联系得更紧密了，在 53 人中竟多达 44 人（分别有 7 人、6 人和 31 人）。其余 9 人来自小店主和手艺人家庭。与 19 世纪前期相比，社会出身的类别明显减少了，这对较为穷困的群体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学校教育方面，有 19 人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16 人上的是英国的地方文法学校，7 人上的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学校，2 人上的是非国教中学，另外 7 人接受的是其他形式的教育（2 位女性和 2 位男性接受了充分的家庭教育，其他人接受的教育则并不充分）。牛津和剑桥相比较而言的重要性依然如故，53 人中有 24 人出自这两所大学。9 人上过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大学，6 人上过英国的其他大学，还有 14 人则没有上过大学。6 人能自立谋生，8 人受雇从事的是与其为众人所知的工作不一样的差事。在这一时期，职业的基础已变得非常清晰，不是落在扩大了了的图书和杂志

市场上，就是落在诸如大学之类的相关机构上。从事想象性创作的作家在每一个方面都要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加多样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典型生活道路是从专业人士家庭到国立文法学校再到牛津或剑桥。

在最后一个时期，即 1880 年到 1930 年间，我们看到的是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家，以及出生在 1920 年之前的当代作家。在社会出身方面，格局与前一时期基本相似，1 人贵族出身，53 人中有 39 人出生于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乡绅、大商人和专业人士家庭（分别为 7 人、2 人、30 人）。专业人士家庭成为最大的单一来源，其重要性在前一个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来自于小店主、农民、手艺人 and 体力劳动者家庭的，在列出的 53 人中有 13 人（分别为 5 人、2 人、4 人、2 人）。教育模式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别，生活在现代的人大多数上的是国立文法学校（现在称为“公立学校”），所以在 53 人中有 32 人拥有这一教育背景。8 人上的是英国地方文法学校，2 人上的是私立学校，4 人只上过小学，还有 4 人（包括两位女性在内）是在家里受的教育。有 32 人上过牛津或剑桥，1 人上过爱尔兰的大学，4 人上过英国的其他大学，1 人上过德国的大学，还有 13 人没有上过大学。在前一个时期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那种典型的人生道路现在变得非常普遍了：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上的是公立学校、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53 人中有 4 人有着坚实的自立手段，3 人还受雇从事与作家本行不相干的工作，而大多数人则有着相当清楚的职业基础，扎根在由书籍、杂志以及一些相关机构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现在还不能把这种事实性调查再往后推，因为还没有一份出生于 1920 年以后的作家的权威名册。一般认为 1945 年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前一个时期那种有规律的多数模式有所不同。根据我个人拟的一份属于这个年龄且又引起了相当关注的作家的名单，粗粗看去，的确可以看到社会出身更加多样化了（12 人中有 6 人来自小店主、职员和产业工人家庭），学校教育的模式有所不同（公立学校 2 人，地方文法学校 7 人，其他的地方当局的学校 3 人），牛津和剑桥延续了其相比较而

言的重要性(12 人中有 7 人), 职业模式分成了两种: 全职写作和在大学里教授英文。对这些轮廓的勾勒还不能看得太重, 因为这份名单肯定有较大的选择性, 其中一些作家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当然, 这份名单也可能会遗漏掉一些最终应该包括进去的作家。但即便如此, 这些勾勒还是证实了那种印象, 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所有这些调查所获得的证据显然价值有限, 还需要有更长期的研究来验证和补充。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发现这仍然是有意思的, 即使它只是证实了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关于某个时期作家的总体印象。具体的事实证明了有些人还死抱着不放的那种偏激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观点认为英国文学完全是自主发展的, 不受机构、读者和观众、社会机会和教育机会、可获得的谋生手段等方面变化的影响。这种观点的确很不合理, 要不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常常是以同样极端而且站不住脚的方式来表达的话, 它也许根本就得不到支持。作家的社会出身和教育经历显然常常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但如果认为社会阶级和社会机构才是最重要的, 个人只不过是它们的代表而已, 那就完全是误导性的了。在某些重要的例子里, 不仅个人会背离其出身的群体, 而且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也要比简单地划出身所能表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样, 由于个人的成长与某种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习得的模式相关, 就认为创作是自主的, 是个人完全自由的创造行为, 这种观点也同样是误导性的、过于天真的。

简要地审视这种证据, 看看社会和文学之间的哪些相互关系是合理的, 这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都铎王朝时期的文学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似乎是很清楚的, 它发展为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文学, 看来也肯定和体现在作家身上的巨大社会变化有关。尽管很难说这种关系密切到

什么地步，但我们看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剧作家大多数出身于崛起中的社会群体，可到了詹姆士一世时期和查理一世时期，却又回到了以前的状况，可见文学与社会背景之间似乎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与这一轨迹相应，在这些年里，戏剧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种大众戏剧退回到了一种社会范围更加狭窄的戏剧。不仅如此，这一变化轨迹还延续到了社会等级化很露骨的王朝复辟时代的戏剧中。在18世纪早期，大多数作家来自于专业人士家庭和小店主家庭，在文学中也出现了常常被描述为中产阶级文学的一些新的形式和模式，这两者之间显然也有着某种关联。18世纪后期没有表现出这种简单的关联性。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但是文学上突出的发展——即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却没有表现出它与作家们的社会历史有什么一致的关系。实际上，这是所有的社会阶级、教育模式和谋生手段都得以呈现的一场运动，常常伴随着与继承得来的社会规范明显不同的个别变化，也许这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肯定与这场运动的部分性质有关系。在19世纪很多最有独创性的社会思想中，新的社会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全盛期，这些社会群体以及妇女也很重要，其间存在着正面相关性。在1870年到1950年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相关性则可能是负面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些年里，很多重要的虚构文学作品出自于那些在多数人使用的英语模式之外的作家的手笔，这部分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如此，而在最近这些年里，来自国外或是少数民族的作家以及女作家的重要性更是明显提高了。哈代、亨利·詹姆斯、萧伯纳、辛格^①、叶芝、艾略特、康拉德、劳伦斯、奥凯西^②、乔伊斯、托马斯^③，由这些作家所组成的名单虽然不长，却很重要，这倒不是因为这

① 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西方世界中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译者注

② 奥凯西(Seá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和传记作家，他是最早在剧作中描写都柏林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家。——译者注

③ 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译者注

一事实，即少数民族——爱尔兰除外——就值得关注，而是它提出了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里多数人使用的英语模式（即正规的英语模式）好像更缺乏创造性。由于这关乎对作品质量的判断，所以进行分析并不那么简单，但在我看来有某些迹象可以表明社会和想象力都变得狭隘化了，这和主要作家的社会历史变得更加标准化有关。在最近这些年里，文学作品的基调和内容都出现了某些新的因素，实际上这很可能与在这种标准化模式中所暴露出来的雷同有关。

一个社会的性质与它所产生的文学的特征之间不存在单一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多种重要的或可能重要的关系，它们似乎是随着实际历史而变化的。既然社会出身确实是以不同的方式与教育机会以及谋生手段（它会影响到作家能否从事他的本行）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永久的重要性，而且显然会部分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光强调社会出身。传播系统的性质以及读者和观众的角色变动，显然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文学的特征。当我们看到从某个新的社会群体中涌现了一批重要作家时，就不能只看作家本人，还应该注意他们所在的更大的社会群体所创造的各种新的机构和形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院就是一个格外复杂的例子，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它主要是由个别的中产阶级投机商建立的，为剧院写剧本的作家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以及小商人和手艺人的家庭，但事实上剧院却遭到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强硬反对，虽然它是为平民大众服务的，但它得以幸存却是靠了宫廷和贵族的保护。正是这种保护后来使得戏剧和观众的范围不断地被窄化，以至到了王朝复辟时代，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完全把持了戏剧。在18世纪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中产阶级观众群，这部分地是因为某些作家本身就是从同一个社会群体出来的，但也可以认为这个观众群是独立形成的（这也许是更主要的），它把作家们吸纳进来并给他们提供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产阶级观众群的扩展和进一步组织化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晚期，它把社会出身不同的新作家吸引过来，通过它的很多文化机构，赋予他们某种普遍同质性。这种总体状

况始终没有变，但是在 19 世纪已经有了一些断裂的迹象，个别人偏离了多数人的模式，而到 19 世纪末，又出现了少数派的有组织的背离。在 20 世纪，文学的社会情境主要是延续下来的多数人的模式（它们日益趋向于标准化）和明显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之间的互动，这个少数派倾向于支持并高度评价那些来自于多数人的模式之外的作家，并为多数人

267 群体中的异见分子提供另一条出路和另外一种社会连带关系。我们若是比较一下 1850 年到 1870 年和 1919 年到 1939 年这两个时期里文学的社会基础，就会发现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个作为主要因素而存在的有组织的中产阶级读者大众，但在前一个时期，文学更同质化一些，大多数作家与实际的读者大众都来自于同一个社会群体；而在后一个时期，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多数和少数这两种读者大众，前者延续了以前的关系类型，后者不是来自于另一种文化就是来自于其他社会群体，在吸引个别的异见分子的同时，也从外面发现自己的重要人物。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包括许多小说、剧作以及几乎全部诗歌——是通过这个少数读者群的文化机构来传播的，这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多数读者群的文化机构仍然和当时最重要的作品密切相关的。我们注意到在最近这些年里，一些来自文化内部的新社会群体的作者，通常都是通过这种少数读者群的文化机构而崭露头角的。事实上，大多数出身于职员和产业工人家庭的新作家，其读者不限于他们所来自的社会群体，还包括了中产阶级中的异见分子。正在扩展中的小说和戏剧的读者当然包括了新社会群体的成员，但总的来说，他们是被吸纳进了既有的多数读者群。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少数读者群也许会很快变成唯一可以确认的群体，有着明显而又特殊的社会连带关系——主要通过大学教育来界定。有迹象表明，多数读者群与其最有创造力的成员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很容易从外面渗透进来的文化真空。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能理解为何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大多数大众艺术形式会迅速地美国化了，尽管有那么多优秀的英国艺术和思想和一个可以确认的社会少数派紧密相连，但是由于教育体

制的限制，实际上大多数英国人都没有机会真正进入这个群体。

由此可见，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会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社会变化了，文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方式常常不可预料，因为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反映。有时候，某个上升中的社会群体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机构，它们好像能给属于这个社会群体的作家带来解放。在其他时候，出身于新的社会群体的作家们就只是进入到现存的机构之中，基本上在其规定的范围内工作。这为讨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而关于社会流动，我们在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里已经听得太多太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般都是主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讨论社会流动，作家则经常被当作一个例子：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他可以出生在任何地方，而作为个人，他可以很快从社会的最底层爬到社会的最高层。但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向上流动类型：一种是个人职业生涯方面的流动，作家常常被当作这方面的例证；另一种是整个社会群体的上升，它创造了各种新的机构，在有些时候——比如在18世纪早期——也带着属于这个社会群体的作家们一起向上流动。如果不作这种区分，那么向上流动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充分的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有影响的作家首先是个人流动与相对稳定的机构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这从许多以当代社会的流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来。早在18世纪末，戈德温在《凯莱布·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中就提供了这种职业生涯的一个早期例子：个人的流动非常有限，赖以运作的相关机构既强大又严酷。司汤达在《红与黑》里把这种情境推到了更深入的地步，最后以个人遭到毁灭而告终，先是品性被毁灭，然后是实实在在的毁灭，而不只是迫于无奈地作出某种妥协。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在处理这个主题时通常暗含着控制的意思(在缺少这样或那样的不可思议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人们的出生界限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尊重，否则个人就会堕落。哈代在《无名的裘德》里提出了抗议，但这种努力却是没有希望的。劳伦斯提出了一种新的境况：其典型情况是通过艺术迅速地上升

269 (尽管是带着怨愤),进入到持有异见的少数人文化当中,然后最终走向自我流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模式是:拥有更多流动自由的个人,要么是嘲弄或怒斥那些他能够加入的各种机构,要么是默认现状,忍受迅速堕落的痛苦(可以比较一下《幸运的吉姆》^①、《愤怒的回顾》^②和《向上爬》^③这三部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被逼入死角的感觉,而在这种境况下所产生的经验似乎多半是枯燥乏味的。可以这么理解,这是因为向上流动的条件是被令人绝望地限制死的。个人流动与机构及思想方式的僵化不变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人逼入这种死角。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经验尤其容易具有误导性,虽说这种经验记录了某些特殊的、局部的紧张关系,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真实的流动经验多半是这么一种经验,即所有社会群体都跨进了新的生活方式:不仅个人地位上升了,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然而,在那些吸纳作家和思想家的机构还保留着有限的社会参照对象(social reference),而新的社会群体又不能相对成功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机构的情况下,后面这种经验就非常难以处理。存在着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虽然有更多的不同社会出身的个别作家被吸纳进来,但他们不是被各种既存的标准模式(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显然就是一个例子)所同化,就是在全力以赴地与这些模式作斗争,而不是想办法去创造新的模式,这就使得作家流动所带来的好处变得很有限,甚至被抵消了。关于个人流动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推进到这个认识层面,即只从个人的角度来定义流动显然是不够充分的。整个社会都在向前发展,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来创造新的相关机构。

① 《幸运的吉姆》(*Lucky Jim*)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的一部喜剧小说,出版于1954年。小说通过吉姆·狄克逊这个人物的荒唐遭遇,对英国的大学教育体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译者注

② 《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是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 1929—1994)的一部剧作,1956年在伦敦上演后大获成功,1958年被搬上电影银幕。剧中塑造的Jimmy Porter成为了“愤怒的青年”的典型形象。——译者注

③ 《向上爬》(*Room at the Top*)是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 1922—1986)的一部小说,写一个出身下层社会的青年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译者注

优秀的作家可以出生在任何地方，证据就在于其社会成长模式可以是千差万别的，倘若想把这种模式标准化，那就非常危险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成长是自主的，也不意味着社会所做的一切——通过机构以及各种传播形式——就不会影响到他。一个社会所能做的恰当的事情，是调整并扩展其机构，首先是在教育上，其次是在传播工具上，直到这些机构与社会的现实结构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一般关系，这样作家和读者就都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脱离危险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追溯的作家的社会历史仍将不断地发生变化。

270

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

以前我们常常说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具有社会性的，在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的。剧作家和诗人或小说家一样，也是用语言来工作的，来创造某种特殊的经验组织，但在剧作家这里，这种组织的性质是从表演的角度来说的：他调遣安排的词语将由其他艺术家——即演员们——在正常的传播过程中说出来、演出来。因此，尽管文本与表演、文学作品与戏剧演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社会里是大不一样的，但从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扩展为一种社会的创造活动，这一轨迹仍然是清晰可见的。此外，与诗歌和小说不同的是，诗歌和小说作品通常首先是被暂时独处的个人所接受，而戏剧通常（尽管不能说普遍）是被一群人、一群实实在在的观众所接受的。因此，无论是从传播方式还是从接受和反应的方式来看，戏剧明显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中运作的，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戏剧的社会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艺术的社会历史更容易理解的原因所在。这种探询还能继续深入下去吗？作为一项可行的实验，我想简略地回顾一下英国戏剧的社会历史：一方面是要借此描述在整个社会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中，戏剧和社会之间的实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借此来处理这么一个棘手的难题，即是否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变化与戏剧形式以及某种艺术特征的实际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即认为在社会变化和艺术变化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说法却很难得到具体的证明，而正因为有这种困

难，许多人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加入到全面后退的行列中，把艺术提升到或者交托给一个自治的领域。如果我们可以在戏剧中找到这种可以证实的关系，或者即使找不到这种关系，但可以坦率地直面困难并藉此修正那种笼统的看法，那么我们在这些关系的全部领域里就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对于我们探讨那些社会性显然较弱的艺术门类是很有帮助的。

1

中世纪的英国戏剧初看上去，像是一个特别清楚的例子，社会形式和戏剧形式之间有着某种明显的关系。最早的戏剧其形式取自于礼拜仪式，它首先是被用来向教堂会众形象地讲解宗教经文中的部分故事的，因为用拉丁语来诵读这些故事，是很少有人能听懂的。“你们找谁？”（*Quern Quaeritis?*）这种形式的短剧——表现天使跟三位徘徊在耶稣空坟前的妇女说话的情景——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表明戏剧的参照作用是指向了某个主要社会组织的目的。中世纪的宗教剧一开始是被插入礼拜形式之中的，后来又发展出了圣歌游行的功能：先是用于走向教堂的圣歌游行以及在教堂里面的圣歌游行，后来用于穿越全城的圣歌游行。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戏剧表演不仅和宗教节日结合起来，而且也和中世纪城镇生活以及商业和工业组织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基督圣体游行——伴有各种神秘剧和奇迹剧轮番上演——不仅是城镇生活中的官方事件，而且也是通过行业公会来组织的，每个行业公会都要各自承担不断上演的剧目（比如，面包师公会的剧目是《最后的晚餐》，制革工会的剧目是《撒旦的沉沦》，织布工会的剧目是《最后审判日》）。这种形式从为基督教故事中的某些事件提供形象的解释起步，将宗教仪式的语汇与戏剧的规则结合起来，发展为一种能够连续地表现整个故事的形式，从上帝创

世到基督升天以及圣徒行录，都被一一展现出来。在每一个片段中，其直接形式都首先是由讲解的功能所决定的，但是其整体形式却随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情节剧，由实际的游行活动所决定。这种基本架构变成一种流行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在后来与许多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那些焕然一新且独具英国特色的戏剧形式。

除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及方法与特定的戏剧形式之间的这种清晰的关系之外，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在中世纪社会与形式更加复杂的道德剧及其后继者插剧^①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关系。道德剧的形式与方法完全是从中世纪宗教和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情感模式那里得来的。它与神秘剧和奇迹剧的不同在于：它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的，并不是某个宗教故事，而是一种信念和一种人类共同命运的具体形态。很显然，只有在某些社会的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凡人”(Everyman)^②的观念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当生与死的根本问题有着真正共同的意义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因而能够自然地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普遍命运的时候，道德剧的形式就具有了有机的形状，尽管它所表现的人物是抽象的，它对人的一般品性和弱点的表现也是戏剧化的——因为它们是被作为无需和

^① 插剧(Interlude)，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4世纪前后，原本指在宫廷府邸的宴会席间演出的短小有趣的娱乐节目，采用男童唱诗班来演出。到了都铎王朝时代，插剧的演出地点不再限于宫廷府邸的宴会厅，而扩展到了修道院、学校以及行会的集会场所，除了男孩仍然担当主要演出者之外，成年人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表演者的行列。——译者注

^② 在戏剧史上，“凡人”这个概念来自于15世纪晚期英国的一出同名道德剧。在这出经典道德剧中，上帝抱怨人们贪图迷恋物质财富，却忘掉了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于是他派死神把剧中主人公凡人押送天堂，对其一生进行清算，然后予以审判。凡人获悉后极为沮丧，他想贿赂死神，却遭到拒绝。死神告诉他可以找一个同伴一起上路，或许这位同伴可以为他说点好话。凡人先后求助于友伴、亲戚、财物，但他们都拒绝与他同行。凡人又求助于善行，善行对他说：由于她平日里不曾受过他的眷爱，所以身体虚弱，无力陪他前往。善行请妹妹知识陪凡人一起去看望忏悔，在忏悔那里，凡人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并用鞭笞来自我惩罚，从而获得忏悔馈赠的一件宝物——苦行。在凡人涤除了自己的罪行之后，善行恢复了健康，已能够陪伴凡人踏上旅途。善行又召来了美、力量、谨慎以及凡人的五智(即感觉、想象、幻想、评判和记忆)，可当凡人告诉他们此行的去向之后，他们却同样不愿陪他前往，只有善行没有抛弃他，陪他通过坟墓来到天堂。这个经典道德剧的寓意在于告诉人们：一个人最终能够带人坟墓的只有自己的善行。从此以后，“凡人”通常被用来指一个普通平凡的个人，他往往被置于某种不寻常的极端情境中，以此来表现人类的普遍品性和共同命运。——译者注

具体的个人联系在一起普遍存在的东西来感受的。然而这种有趣的形式还不是社会的完整形式。即使在道德剧内部，我们也能看到来自其他类型的想象性作品的影响。《凡人》里的“拯救之宅”（House of Salvation）与《坚忍的城堡》^①里的城堡在结构上是相关的，城堡不仅与有着漫长传统的民间传奇故事——它们是从基督教传奇故事中发展出来的——中的寻找之地有着明显的联系，而且也与社会组织的某些真实要素相关——中心之地，教堂、城堡或山冈等等，是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在那里人们彼此相连、结为一体），它也成为人们追寻价值与安全的自然对象。道德剧发展为插剧的过程也展现了戏剧的基本模式与缓慢的社会变化之间极有趣的互动方式。插剧的社会基础与道德剧不同。道德剧是在城镇中的公共场所演出的，而插剧则是在深宅大院的会堂里演出的，在插剧的时代，中世纪的各种形式正在开始向都铎王朝时期的社会形式转变。这场从通俗的宗教剧发展到更加复杂的道德剧的运动把道德理解为一个舞台，只是在插剧出现后这场运动才告完成。不过典型的插剧也保留着中世纪社会思想的很多印记，比如《四个以 P 开头的人》^②，里面的人物仍然是社会功能性的，而不是特定的个人。

274

一方面是宗教故事或宗教寓言和道德寓言中的人物，另一方面是某种特定社会背景中的个体的人，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它在其后英国戏剧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奇迹剧和神秘剧中，首要的功能是以虔敬之心来描画那些不能以常人视之的人物，不仅是耶稣和圣母，而且包括先知和圣徒，都不能被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人；但是也存在着一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

① 《坚忍的城堡》（*The Castle of Perseverance*），15 世纪的著名道德剧，也是现存最早的一出大型的英国本土方言剧，共有 3649 行。——译者注

② 《四个以 P 开头的人》（*The Four P's*），这出插剧写三个人——卖赎罪符者（pardonner）、药剂师（pharmacist）和朝圣者（palmer）——在一起争论他们之中谁才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第四个人小贩（pedlar）提议他们各说一个谎，谁说得最好，谁就是优胜者。卖赎罪符者和药剂师说的谎话都带有厌女症倾向，朝圣者却声言自己行迹所至从未见过有一个女人曾失去耐心。小贩于是判朝圣者获胜。——译者注

来处理人物的强烈倾向，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人物首先是那种不需要向他表达虔敬的人物，比如希律王——狂暴的希律王，他也许是所有这类戏剧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其次是一些跑龙套的人物，如基督诞生那晚的牧羊人。也许最好是把这一切看作是传统故事中的固定角色与用来进行阐释的鲜活的当代经验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作用的程度不同，个性化的程度以及表现当代现实所达到的水准也就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是那些大人物也都是当代的：上帝天父在注视着这个世界，基督和天使，撒旦和恶魔，都是活着的，出没于这个世界当中。像诺亚这样的人物，都是在中世纪的世界里思考和说话的，同时又保留了他们的传统角色。威势煊赫的希律王也走进了这个当代的世界，真的以戏剧的形式走上了中世纪的街道。在汤利连环剧^①中的《第二场牧羊人之剧》(*Secunda Pagina Pastorum*)里所出现的牧羊人，都是约克郡的牧羊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方言，关心的也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也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圣经故事中跟天使说话、随后虔诚地膜拜圣母和耶稣的那些牧羊人。

把关于个性化的程度以及表现当代现实所达到的水准的这套想法带入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更大也更成熟的戏剧世界里，有着重要的意义。游行剧的片段式架构和道德剧的象征模式都混合着新的因素，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即使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也还是存在着这种多级渐变的同时代性。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悲剧中，主要人物(尽管被赋予了英雄般的个性，对此我们还将进行探讨)保留了来自别的地方和别的时代的陌生因素，也保留了中世纪戏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因素，但是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这些人物根本上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历史人物，活在剧作所产生的那个时代里。如果我们大致看一下这个渐变的过程，就能发现在跑龙套的人物身上，这种程式持续得更为长久，直

^① 汤利连台剧(Towneley Plays)，英国中世纪的一套连台神秘剧，共包括32个片段，它被兰开斯特郡的汤利家族记录在15世纪的一份手稿中，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到《哈姆雷特》里面的掘墓人和教堂司事，《无事生非》里面的巡警和警官，以及许多相似的人物，都明显属于戏剧作品所在的那个时代，这和汤利连环剧里面的牧羊人是一样的。这一成规似乎体现了人们对于戏剧模式和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当新的社会在旧的社会模式中孕育发展的时候，仍然还保留着混合的形式。而在旧的社会稳如磐石的时候，单一的模式就已足够了。当新的社会逐渐被人们完全意识到的时候，混合的模式就会被合理化。另外，在中世纪晚期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中，那种混合的成规又使得人物既可以作为个人也可以作为象征的典范和社会的典范来发挥作用，它们各自强调的程度则有所不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戏剧的丰富性，尤其是它所具有的可以在几个不同层面上传播的能力，多半可以与某个意识阶段联系起来，而这个意识阶段又是和社会发展中的某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的。

2

到15世纪末，在英国各地，通俗宗教剧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衰败了，它的那些通用的旧形式也被抛弃了。我们不仅可以把它和宗教感情——它们在宗教组织的根本变革中爆发出来——的变化联系起来，也可以把它和与戏剧直接相连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在都铎王朝时期，曾作为旧戏剧主要组织之基础的行业公会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完全成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受到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区中，手艺人和小商人之间的冲突在变得愈益尖锐）中的各种商业利益的控制。都铎王朝早期的戏剧显示了旧的社会组织的某些残余，但也显示了新组织的某些重大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巡回演员剧团的发展，他们在客栈庭院里演出；此外，在学校、学院和豪门巨宅里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演剧表演。通过这些相关的渠道，特别是通过戏剧与各种空间场

所——它们向传统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戏剧敞开了大门——之间的紧密结合，新的大方向就有可能确定下来，特别是在本地的大众戏剧衰落之后。决定性的发展出现在16世纪70年代，最早的一批剧院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建造的。其标志是戏剧的组织工作落入到投机商手里，剧院则建造在伦敦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商业中心，伦敦在那时候仍然在不断发展，建造剧院部分地就是为了在来往于伦敦的旅行者中间吸引观众。而建造剧院的环境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强势社会集团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于下个世纪在物质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打断了戏剧的发展进程。和旧的巡回剧团一样，新剧院招来了已在城镇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戏剧不断发展，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当然是由于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但如果不是宫廷和贵族给予了积极的庇护，那么这种大众的支持可能也是难以支撑的。这个伟大的时期堪称辉煌，但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它却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种短暂的辉煌，在那个时候，民族生活中的许多复杂因素都醒目地但又必然是短暂地熔合在一起，这些因素稍后就会分离四散。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欧洲文艺复兴的丰富多彩与大众传统中的活力及现实主义互相激荡，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民族形式。最显著的新因素是对个人经验有了高度的意识，而中世纪及都铎王朝初期的戏剧，由于植根于明显不同的社会思想模式，显然缺少这种意识。在悲剧和浪漫传奇中，这种新因素被以一种新的修辞样式表达出来，使戏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激烈、快速而又复杂的情节是这些新的个人情感模式的外在表现，而新涌现的剧作家们又都是居无定所、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一群人，他们把语言提升到一个相当有活力、有力量的地步。然而，这些因素与旧的情感方式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如果没有这种互动，那么就像在尤弗伊斯体^①中以及

277

^① 尤弗伊斯体(Euphuism)，16世纪80年代在英国流行的一种华丽而矫饰的文体，喜好使用对比、头韵、明喻、重复等修辞手段。——译者注

在与彭布罗克伯爵夫人^①连在一起的“古典”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新的影响或者会沦为毫无意义的铺陈，或者会趋于矫揉造作的精致。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通俗剧的主干部分中，显然存在着旧传统的因子，它们不只是残留物，而且也作为同等重要的因素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价值模式中，象征作用的意义是和绝对个人化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联结在一起的，这不仅可见诸伟大的悲剧——在悲剧中，新旧模式之间的关系一向就是基本的主题——也可见诸稍后出现的莎士比亚和琼森的高水平的喜剧。于是，个人的雄心和固有的模式就都通过语言，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汲取了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让人觉得在这个短暂的时代里，民族生活中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在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令人称奇的戏剧中获得了表达。

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激动人心的发展被新出现的“清教”因素的势力增长打断了，其标志是在1642年剧院纷纷被关闭了。但是这种民族戏剧的瓦解，以及构成这种戏剧的各种因素的分崩离析，却是早已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十五年里，以及在詹姆士一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戏剧借以表现民族生活主流的那些条件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是与那些很快在公开的政治领域里爆发的矛盾相对应的。我们还看到在新世纪之初，戏剧开始在向一种阶级的戏剧发展，这种趋向其实在都铎王朝初期即已见端倪。“私人剧院”尽管事实上是向公众开放的，却开始依赖于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小的观众群。在以前，宫廷曾保护过商业中产阶级所反对的通俗戏剧，而现在随着宫廷作为民族生活中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日渐降低，戏剧本身的特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戏剧日益变得精致、壮观，但这

278

^① 彭布罗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embroke, 1561—1621)，本名玛丽·锡德尼(Mary Sidney)，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文学著作获得声望的女性，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和文学庇护人。其“案头剧”(closet drama)《安东尼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ntonie*)对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产生过一定影响。——译者注

种精致、壮观是作为被消费且能娱人耳目的形式因素，而不是作为戏剧体验本身的因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喜剧中，有着一种稳定的进展，经由米德尔顿^①、马辛吉^②、博蒙特和弗莱彻^③，发展到雪利^④和布罗姆^⑤，趋向于一种新的趣味和标准，自然地过渡到王政复辟时代的风尚喜剧。正如德莱顿^⑥后来所说，弗莱彻对“绅士言谈方式的理解和模仿”，远胜于莎士比亚，这种发展也说明了在一个变化、分裂的社会里，随着戏剧日益狭隘、只认同于某个阶级，社会阴谋、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时尚就会日益成为戏剧关注的主题。在16世纪90年代的戏剧中曾经显得那么重要的民族因素，以及体现了旧社会种种价值的传统模式，都渐渐消失了。喜剧的发展趋向于时尚和嗜欲的刺激，创造出风尚喜剧的形式，这种喜剧虽然更为精巧，但丧失了提供一般人性参照的作用。悲剧的发展则趋向于将种种驱动力抽象化，尤其是把“荣誉”从一种社会功能抽象为血统家系的一个标记：其结果是个人所遭遇的命运就不再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一个英雄所表现的也不再是一种民族精神（如在成熟的历史剧里），而在“英雄剧”所虚构的那种主要由阴谋来推动的社会环境里，荣誉和命运的地位也降低了。这些发展变化的迹象可以追溯到此前的那个伟大时期，但随着戏剧的社会基础

① 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创作有大量的悲剧、历史剧和城市喜剧，喜剧代表作有《齐普赛街的童贞女》(*A Chaste Maid in Cheapside*)。——译者注

② 马辛吉(Philip Massinger, 1583—1640)，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代表性喜剧作品有《旧债新还》(*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和《城市太太》(*The City Madam*)。——译者注

③ 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弗莱彻(John Fletcher, 1579—1625)，两人均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合写了不少剧本，代表喜剧作品有《是国王，又不是国王》(*King and No King*)、《目空一切的妇人》(*The Scornful Lady*)等。——译者注

④ 雪利(James Shirley, 1596—1666)，英国查理时代剧作家，他的剧作将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加以提炼，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开创了王政复辟时代戏剧之先河。代表剧作有《浪荡女人》(*The Lady of Pleasure*)、《舞会》(*The Ball*)等。——译者注

⑤ 布罗姆(Richard Brome, 1590? —1653)，英国查理时期剧作家。代表作有《对跖地》(*The Antipodes*)、《穷开心，或快乐的乞丐》(*A Jovial Crew, or the Merry Beggars*)。——译者注

⑥ 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出现萎缩，这些迹象就如许多旧趣味的消失一样，变得越来越显著。在剧院于1642年纷纷倒闭之前，随着戏剧的倒退变得日益明显，民族戏剧便蜕变成了一种阶级戏剧。

3

王政复辟时代的戏剧是以两个“特许剧院”为根基的，它们在1660年获得了查理二世的授权。这两个剧院是一种新型剧院，其舞台介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平台和现代布景舞台之间。由于它们蒙受宫廷的庇护，所以观众实际上只限于王公大臣及其随从，观众面这么窄小，剧院便始终难以作为成功的企业来营运。在形式上，首先是更强调音乐和场面——剧景的制作更加精细，早在詹姆士一世时期的私人剧院以及随后的假面舞和歌剧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向。戴夫南特^①是其中一家新剧院的执掌人，早在1634年，他就写过一出早期“英雄剧”《爱情与荣誉》（*Love and Honour*），在剧院关闭的时期，还曾写过一个歌剧《围攻罗德岛》（*The Siege of Rhodes*），这个歌剧将英雄剧与音乐、场面方面的发展糅合在一起，本身是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歌剧的影响。要想理解英雄剧的发展，就要明白我所说的驱动力的抽象化（关于荣誉和天真的种种成规越来越被形式化），它把悲剧风格转变成一种精致的样式主义^②。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期成熟的素体诗萎缩了，原来非常接近于日常语言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不是变为英雄体双行诗，就是变为虚饰的王政复辟时代的素体诗，这就是这场全面转变的主要标志。然而，即使有这些变化，英雄剧的形式，以及继之而起的复

^① 戴夫南特（Sir William D'Avenant, 1606—1668），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剧作家。——译者注

^② 样式主义（Mannerism），16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作品具有奇异夸张、玄奥晦涩、矫揉造作的特点。——译者注

280 兴的素体诗悲剧，跟剧院所要表现的狭窄的生活也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这个时期真正获得发展壮大的是风俗喜剧，它和作为其基础的那个狭小社会之间有着一种真实的对应关系。

我们必须把王政复辟时代的喜剧区分为两个时期，有趣的是，它们与剧院实际的财运周期若合符节。从1666年（在大瘟疫和大火灾之后）到1679年政治危机重现的这段时期，王政复辟时代的合法剧院，虽然观众极其有限，但还能支撑下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埃瑟里奇^①和威彻利^②，他们的剧作最明显地体现了戏剧形式和观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这种戏剧形式中，当时流行的性游戏^[1]的规则得到了详尽的解说，而新出现在王政复辟时代舞台上的女演员，则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就其前后发展背景看，这种类型的喜剧远离了其他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不同的情感和价值，这反而使得情感和风格得以达成统一，而这种统一，就其本身而言，与此前的阴谋喜剧（intrigue-comedies）相比，是有了明显的进步，而阴谋喜剧因为还要顾及其他标准，仍然有点复杂。即使戏剧作品只是为了取悦于观众而反映他们的生活时——就像在埃瑟里奇以及威彻利的早期剧作中那样，这种明确的关系也还是能产生一种特有的自然生动的效果。站在普通的道德立场上来批评这些戏剧作品，这也许是需要的，但如果用后来的标准来评判，完全无视这些戏剧形式在当时所取得的短暂成功，那就愚不可及了。而早在威彻利的《光明磊落者》（1676）中，礼仪道德本身就已遭到质疑，他抨击了个人的背信弃义和自私自利行为，但这种抨击很难纳入这么一种形式——简单地说，它把与行为相关的所有问题都简化为一种得体的、或许不那么脆弱的欢乐。到了17世纪80年代，政治危机日渐加

① 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 1635—1692），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可笑的复仇，或浴盆里的爱》（*The Comical Revenge or, Love in a Tub*）、《如果能够，她愿意》（*She Would if She Could*）、《时尚人物，或弗普林·弗拉特先生》（*The Man of Mode or, Sir Fopling Flutter*）等。——译者注

② 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 1640—1715），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乡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光明磊落者》（*The Plain Dealer*）。——译者注

剧，中产阶级成功地接近了权力的最高舞台，剧院陷入到困境中，随后又因一项统治政策的实施而得以复苏。1695年以后，随着有更多的演员兼任剧院总监——他往往也是剧作家，一个新的戏剧传统已然浮现。然而，在1693到1705年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此时真正的王政复辟时代已告结束，市民和他们的太太们开始频繁出入于剧院，非贵族出身的剧作家也明显增多了——我们所说的王政复辟时代喜剧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更辉煌的阶段，像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又很快熄灭了。范布勒^①和早期的法夸尔^②奇怪地秉承了埃瑟里奇和威彻利的戏剧模式的遗绪，但这时候，康格里夫^③还是在《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中成功地将风俗喜剧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个剧作在刚面世的时候却并不成功，整部戏的情节就是一个奇怪的例子，证实了观众与戏剧形式之间存在的那种复杂关系。在法夸尔的后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情感模式的影响，与同样滥觞于17世纪90年代的“感伤喜剧”(sentimental comedy)是同调的。但是从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奇怪的事实：一种戏剧形式它的社会基础即使不能说已经分崩离析，至少是在迅速地消亡，但就是在这时候，这种形式却得到了最好的表现。在艺术史上，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艺术形式在其基本条件已经消亡的时候，却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我们无需为此感到惊讶，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个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回头来看，《如此世道》所达到的成熟和均衡似乎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那就是王政复辟时代的风俗喜剧也就只能到这个地步了，对它的各种模式的完整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它们所作的概括性的总结和评价。[2]

281

① 范布勒(John Vanbrugh, 1664—1726)，英国建筑家和剧作家，戏剧作品有《故态复萌》(*The Relapse*)、《怨愤的妻子》(*The Provoked Wife*)。——译者注

② 法夸尔(George Farquhar, 1677—1707)，爱尔兰剧作家，戏剧代表作有《招兵官》(*The Recruiting Officers*)和《美男计》(*The Beaux' Stratagem*)。——译者注

③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英国剧作家、诗人。戏剧代表作除了《如此世道》外还有《以爱还爱》(*Love for Love*)等。——译者注

艺术形式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直接结果，而当一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便会遇到批评方面的一个大难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某种技巧高超、极其成熟的艺术形式反倒被那些相对粗糙的、失败的艺术形式所取代。王政复辟时代的戏剧是建立在一个贵族的、时髦的观众群基础上的，随着它的终结，一种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为基础的极为混杂的中产阶级戏剧便取而代之，于是我们看到了关于上述说法的一个最清楚也最著名的例证。当时的大多数批评家都是保王党人，他们把这一变化看作是戏剧的一场灾难。然而的确有必要从一个更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王政复辟时代戏剧的狭隘性，以及在它之前曾有过的一个更广泛的观众群的瓦解，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尽管18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早期产品在过去被认为是粗俗的（这通常是公正的评判），我们还是必须说出它的完整的故事，往下追踪其发展，直到“粗俗的”小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遭到轻视的“布尔乔亚悲剧”和“感伤喜剧”这些形式也臻至成熟，并为现代戏剧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事实上，中产阶级戏剧的发展是最有趣的个案之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是怎么直接引发了形式上的根本创新。

4

商业中产阶级对戏剧的反对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从17世纪90年代起，又掀起了新的一波批评浪潮，从而有效地打破了王政复辟时代戏剧的精神，但其方式却毫无新鲜可言。科利尔^①的批评（《略论英国舞

^① 科利尔(Jeremy Collier, 1650—1726)，英国戏剧批评家、神学家。《略论英国舞台之不道德与猥亵》(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1698)严厉地批评了以康格里夫和范布勒为代表的1690年代的英国喜剧。——译者注

台之不道德与猥亵》)逐条控诉了当时喜剧的放荡不羁,在其背后可以发现对于戏剧的那种古老的敌意。但现在,宫廷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不再积极地庇护戏剧,中产阶级的反对就必须慎重对待了,范布勒善意地回应了批评,而法夸尔和一批新派剧作家则有意识地对戏剧进行改革,以迎合那些直接的批评意见。要恰当地评价18世纪的戏剧,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形式勉强地或是表面上被改变了,以呼应新的道德论调;但在别的情况下,通过扩展或是发现,一些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来正面地表现新的精神。这种混合的结果可以从观众群实际所发生的变化这个角度来理解。从17世纪80年代起,商人及其太太们就已开始出入剧院,在18世纪,这部分观众人群在稳定地增长。但还没有出现观众群由放荡不羁的宫廷中人变为体面的中产阶级的急剧转变,实际上要等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这种变化,“体面的”中产阶级才成为普通剧院的观众。18世纪的真实状况是: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的一些因素在加入到一个仍然很时髦的戏剧观众群中,而那时宫廷和贵族的公开的腔调本身也已经有所修饰。很多剧作者开始从商业中产阶级观众群里跳出来,“只写过一个剧本的作者”(one-play author)是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标志性人物。公平地说,18世纪戏剧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提供了中产阶级及其德行的某种自觉形象,但是这种新的意识所具有的创造潜力却很不平衡,特别是在戏剧当中,它们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戏剧形式的不稳定与观众中那股追逐时髦的风气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了演员身上。这样一来,剧作的价值似乎就主要在于它们是展现特殊的表演才能的工具,而戏剧也就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混合物了。于是我们发现,在18世纪的戏剧中存在着一一种对于戏剧性效果本身的特有的兴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新的戏剧形式只能取得有限的发展。

283

在当时的各种新形式中,感伤喜剧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最没有吸引力的,尽管它作为英国戏剧的一种主要形式,曾经在舞台上长盛不

衰。我们可以以西伯^①的《爱的最后转向》(*Love's Last Shift*, 1696)和《粗心的丈夫》(*The Careless Husband*, 1704)以及斯蒂尔^②的《撒谎的情人》(*The Lying Lover*, 1703)为起点来描画其自觉的发展过程。尽管其独特的意识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确实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但它们直接付诸同时代人的行为,却是到这时候才变得更加明显。斯蒂尔的《撒谎的情人》前言中的一段文字即清楚地表现了这种新出现的对于道德的强调:

他虚情假意,酗酒成性,还杀了人,但在第五幕中他却幡然醒悟,受到良心的谴责,痛悔不已,而这正是一个身陷囹圄的人所应有的反省——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痛苦,以及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和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那样的困厄中所共同承受的那种悲痛,也许有悖于喜剧的原则,但我确信就道德的原则而言它们是正当的:表现这种自然本性的片段在舞台上常常能赢得掌声,其实我们早就不该从那些国教教导我们应怀着厌惧之心去看的形象中汲取欢乐之源了。

- 284 作为对新的戏剧形式的一种描述,这段话的根本要点在于喜剧和悲悯这两者的混合,而且有着一种清晰的道德指向,这就引出了“哭泣的喜剧”(weeping comedy)或“感伤的喜剧”(道德评价)——在“感伤”这个词的复杂历史中,这两种因素是结为一体的——这样的另类描述。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由于“第五幕的洗心革面”是在戏剧中常见的阴谋所带来的激动之后出现的,这么突然地走向“良心谴责和痛悔”,自然不免有点古怪,也因此落下了把柄,不断地招来伪善和多愁善感之讥:“在还没落幕前,就好好欣赏吧,然后道一声遗憾”。哥德斯密在

① 西伯(Colley Cibber, 1671—1757),英国剧作家、桂冠诗人。——译者注

② 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爱尔兰作家和政治家,曾与艾狄生(Joseph Addison)共同创办著名杂志《旁观者》(*Spectator*)。——译者注

批评感伤喜剧时也持有这种观点，他写道：

即使它们碰巧有毛病或弱点，观众在教导之下，也要抱着善意，不仅要宽宥，而且还要鼓掌欢呼。

这一批评很到位，在很多此类剧作中，感伤喜剧的这一面都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以至哥德斯密这句经久不衰的名言，甚至可以用在不少现代戏剧头上。他继续写道：

然而有一点对感伤喜剧颇为有利，这将使它不致被赶下舞台，尽管人们所能说的一切都于之不利。那就是在所有作品中，它是最容易写的。才能虽不足以对付一部小说，但用来做一部感伤喜剧，却是绰绰有余。只需将剧中人物稍稍抬高一点就够了，给男主人公饰以缎带，或是给女主人公也来上那么一点；然后把一些毫无个性与幽默感的寡淡无味的对话塞进他们的嘴巴，给他们一副好得不得了的好心肠，以及华丽的衣服，再摆上一套簇新的布景，设计一两个惨兮兮的场景，然后从头到尾洒上些软绵绵的忧郁的对话，这样毋庸置疑，女士们全都会哭出声来，而先生们则全都会鼓掌欢呼。

这个批评也是公正的，但是在不经意中为小说所做的开脱，却让我们不免要驻足片刻。那时的小说和感伤喜剧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蜜饯，哥德斯密对它们嗤之以鼻，依据的是老一套的标准（他对将喜剧与悲悯混为一体的批评，用的是古典主义的术语，认为是混淆了那些截然不同的旧的形式类型）。然而，尽管这类糟糕的例子层出不穷，但它们所展现的情感却部分地来自于新的意识，实际上是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概排斥的。在传统的悲剧和喜剧中，往往通过表现罪孽最终导致了崩溃和灾难、恶习和过错又引出了十足可笑的结果来获得一种判断，要做到这一

点，就得依靠一种比新兴的中产阶级实际所拥有的道德更为绝对的道德，它或者是基于宗教制裁，或者是基于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严厉的标准。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以及17世纪戏剧的某些发展中，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种类以及它们的基本看法常常是混乱的，出于相似的原因，它们的判断方式也是隐而不显的。浪漫喜剧早已为感伤喜剧开辟了道路，而“第五幕的洗心革面”也即是一切都必须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明显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王政复辟时代的喜剧包含有这些因素，但因为对一个极为狭窄的社会等级有着自信的判断，所以获得了一种调和情感的手段：只要冒犯了文雅的上流社会，就得遭到驱逐，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是冒犯了上帝和耶稣，但只要尊重那一套文雅的规则，也还是可以原谅的。出于一些正当的理由，新兴的中产阶级戏剧试图在不同的层面上跳出这个框框，作出一种新的评判。和之前的戏剧一样，它也精心设计了幸福的结局，加上旧喜剧的辛辣的讽刺，当然常常是以感伤为底子。但在涉及当代生活时，它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王政复辟时代风俗喜剧所短暂地确立起来的地位构成挑战，将婚姻的圣洁、家庭生活以及关怀弱者当作绝对的美德。在王政复辟时代的喜剧中，这些是被忽略的，或者是加以嘲笑，就因为戏剧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是寄生性的：剧中行为的真实的因果关系，从来就没有被充分地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尽管很狭隘，但它至少呈现了这么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果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对付的事情要比跟在一个受到人为保护的阶级的屁股后面赶时髦多得多。对这些价值的吁求，以及对那些我们会斥之为“家庭内部的美德”的品行的自我炫耀，都有那么一点“多愁善感”，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自己的立场所在。有些批评家似乎在幻想中自我认同于保皇党的荡子淫

于一种根本的“善心”，认识到每个人离恶习和愚行都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对于那些有过错的人，怜悯便是最恰当的感情，而且必须相信他们可以改过自新；最后，它认识到世上极少有绝对的价值，宽容和仁慈才是最大的美德。感伤喜剧的早期代表作和它之后的历史都难免要遭到谴责，但我们在谴责它的时候，也应该愿意承认，就各种道德预设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生活的全部感觉而言，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与感伤喜剧血脉相连的。

感伤喜剧失败了，其失败还在延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花力气——哪怕是一丁点——去解决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它相信某些社会美德是至高无上的，但另一方面又相信好人也是可以违背这些美德的。它始终不能直面这种冲突，不是悬想出一些虚假的解决方案，就是“洒上一些软绵绵的忧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形式在真实的个人关系方面是失败了，但在某些财产关系方面——这是早期的布尔乔亚悲剧的基础——却是成功的。窃贼、奸滑的学徒、见财起意的杀人犯和勾引者，都直接受到了严厉的、绝对的审判。然而即使这样，这种戏剧形式也仍然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悲悯，只要执行审判，也可以有同情，事实上也真是如此。在利洛^①的《伦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 1731）中，学徒巴恩威尔（Barnwell）在其情妇米尔伍德的勾引下堕落为一个窃贼和杀人犯，最后跟她一起走上绞刑架，那样一种气氛既有着对旧道德的确认——

我们须留意是什么令他们毁灭，
戒之避之——否则便难逃覆辙

也混杂着一种新的悲悯——

287

^① 利洛（George Lillo, 1693—1739），英国剧作家，《伦敦商人》是其最著名的剧作，也是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的一部代表作。——译者注

心在淌血泪在流，我们表现出作为
一个人，对别人的惨痛的宽宏理解。

在这儿，同情若是不伴以审判和教训，就是“空洞无益”的，感情也因而以在感伤喜剧中并不常见的一种方式与行动整合在一起。

布尔乔亚悲剧的兴起非常重要。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也曾有过“家庭悲剧”，但直到18世纪初，人们仍然觉得真正的悲剧必定只能发生社会地位高的人身上。然而现在，人们坚称悲剧感是一种普遍人性，一出严肃的悲剧也可以基于平凡的、日常的生活：

脱去王家的华贵，耀眼的显摆，
缪斯献上一个私密的悲伤故事，
描摹源自普通生活场景的悲哀，
背叛的兄弟，以及受伤的妻子。

但这一主张需要努力去推行，不能只是想想而已：

从下层的生活我们引出舞台上的不幸：
——让同侪的遭遇赢取你更多的怜悯。

这一发展尽管在一开始不免有些狭隘，但它显然是一切严肃的现代戏剧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即使它承认的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剧境况起先只局限于某些社会范畴——欠债、奢靡、谬行、贪婪酿成种种苦果——也仍然取得了实际的进步。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悲剧，只限于按照一种完全自然的秩序来表现人的一些基本欲望，正是这些欲望的广度和强度酝酿了悲剧的张力，中世纪的戏剧则未能掌握这个诀窍。然而，在英雄剧雄霸剧坛之前，这些制高点就已经丢失了，王政复辟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的伪古典悲剧暴露了相似的衰退。布尔乔亚悲剧则试图从头再来，与英

雄剧和伪古典剧的那种操弄相比，这是一种更有意义的创造活动。它是社会悲剧，尽管就其本身而言常常显得有点狭隘、粗糙，但早在布尔乔亚悲剧作出这种努力的一百多年前，那种普遍的悲剧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伦敦商人》是英国18世纪戏剧中为数不多的创造性作品，在本质上它明显要高于诸如《加图》^①和《道格拉斯》^②之类的老套作品。

这一时期第三种令人感兴趣的新形式是民谣歌剧(ballad-opera)，它也是中产阶级有意针对贵族的趣味而发起的一场挑战。民谣歌剧异乎寻常的成功并没能延续多久，主要原因在于其推动力大半来自于政治讽刺，而在1737年的特许法案颁布后，政治讽刺被禁止了。1705年以后，意大利歌剧成为一种时尚，《乞丐的歌剧》^③(1728)及其后继者则是对这种趣味发起的本土性挑战，它们在风格和情感上都具有一种真正的创造性，这一传统的失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总的来看，18世纪戏剧令人感到纳闷的一点是，在中产阶级文化的早期阶段，它在布尔乔亚悲剧和民谣歌剧中的确有一种创造性反应，但在后来，这种创造性反应实际上又失落了。(在荷加斯^④的讽刺画及其后继传统中，同样可以找到这种先挑战然后回归的例子)布尔乔亚悲剧的发展扩散到法国和德国，但是在英格兰，直到19世纪晚期易卜生使之上升为一种主要的戏剧形式之前，它却再也没能在可以入目的水准上重返舞台。民谣歌剧则销声匿迹了，直到我们这个世纪，喜歌剧(comic opera)的微弱传统才又复现于英国舞台。现实主义小说是同一个阶级在同一个时期所做出的一种创造性反应，虽说它一直要强一些，但也还是在走下坡路，只有1750年到19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是个例外。虽然中

① 《加图》(Cato)，艾狄生的五幕悲剧，以罗马政治家加图(公元前95—前46)的生平事迹为蓝本。——译者注

② 道格拉斯(Douglas)，苏格兰剧作家约翰·霍姆(John Home, 1722—1808)的一出素体诗悲剧。——译者注

③ 《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英国诗人和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创作的三幕民谣歌剧。——译者注

④ 荷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画家、雕刻家，其讽刺画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译者注

289 产阶级曾作出过有力的挑战，但它似乎缺乏组织的能力来把这种挑战贯穿到底，至少在戏剧方面是如此。总的来说，其后果是尽管剧院的数量扩大了，但充斥其间的却是五花八门的低劣形式。在1600年，伦敦有6家成功的剧院；在1700年，在经过王政复辟时代的缩减之后，只剩下了两家剧院。在1750年，尽管两家特许剧院仍然雄霸剧坛，但还另有5家剧院和一家歌剧院，在赶时髦的各郡治中心至少还有5家剧院。在1800年，伦敦的情况几乎没什么改进，但在各个郡却有大约40家剧院。在1850年，伦敦有21家剧院，而在各个郡大约有57家剧院。在1900年，在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扩展之后，伦敦有63家剧院，50家音乐厅，而各郡的剧院总数则超过了300家。由此来看，从1750年以来戏剧似乎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都有了真正的发展，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以所期待的永恒价值来衡量，从1750到1850年这一百年，却是英国戏剧史上最贫瘠的一个时期。只有哥德斯密和谢里丹^①创作的高雅喜剧(high comedy)在18世纪70年代的短暂复兴，算是一个例外。剧院增多了，但戏剧本身却衰落了，怎么来解释这一矛盾呢？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这一时期虽然有像哥德斯密和谢里丹这样的暂时的例外，但戏剧实际上是失去了和文学的联系。在印刷品方面，满足新兴阶级需要的，不仅有新的通俗读物，还有一个发展中的文学传统以及一个新形成的严肃报刊的传统。在戏剧领域，尽管已经有创造性反应，但其主要的发展自始至终还是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尽是一些闹剧、哑剧、滑稽戏以及视觉的盛宴，然后从19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情节剧(melodrama)。在同一时期里，莎士比亚的剧作确实也开始频频上演，但是这些演出绝大多数不是篡改原作，就完全是借机展示奇观、炫耀表演而已；另一个后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被作为文学典范而受到狂热崇拜，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当代新形式所蕴含的潜在价值的关注。在18世纪初期，有些剧作是只为阅读

^① 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爱尔兰剧作家和辉格党政治家，代表剧作有《造谣学校》(A School for Scandal, 1777)、《批评家》(The Critic, 1779)等。——译者注

而写的，这种事情屡屡发生，令人沮丧地见证了戏剧与文学的脱离，而在当时文学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支配性因素。在这种情形下，戏剧不仅是在严肃的剧作家那里丧失了某种活力，而且戏剧文学本身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它背弃了所在时代所蕴含的各种潜能，而倾向于在一些僵死的形式上下功夫。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贡献了从《浮士德》^①到《培尔·金特》^②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伟大剧作，但也产生了古装阴谋剧这种毫无价值的形式，它虽然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却是一条死胡同。

290

由此可见，在英国中产阶级戏剧的历史上，新的阶级和有效的新形式之间，明显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一发展的时间坐标，尽管这不免让人感到气馁。18世纪的中产阶级打破了种种旧形式，这些旧形式所依赖的各种意义和旨趣都已经衰朽。一些另类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但它们是相对孤立的，或者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只是在很晚之后，当这个阶级建立起了自己的各种主要社会机构，才实际转向创造一种在所有重要层面上都有所区别的文化传统。在戏剧中，这种转向要晚于出版界，这主要是因为戏剧与这个阶级的联系始终是边缘性的，而不是居于其中心。在19世纪30年代，报纸、期刊、书籍和剧院的稳定扩展是清晰可见的，也正是在这个年代，旧的社会形式所带来的诸多限制以各种方式被废除了，如1832年颁布改革法案^③，1936年削减印花税，1843年结束了特许剧院的垄断，1855年取缔了印花税。只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有了遍布于所有领域的文化进步。在戏剧方面，这种进步的确仍很缓慢：虽然一个更严肃的新观众群正在形成，但要等到60年代，在罗伯斯顿^④的带领下，才重新认真地

① 《浮士德》(Faust)，歌德的悲剧作品，这是一部典型的“案头剧”，即只适合阅读而不能直接搬上舞台的剧作。——译者注

② 《培尔·金特》，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取材于挪威民间关于猎人培尔·金特的故事。——译者注

③ 1832年的改革法案修改了议会选举资格，使选举权从原先的身份资格转向财产资格，从而扩大了下议院的选民基础，中产阶级亦借此成为有权阶级，在下议院中有了自己的势力。——译者注

④ 罗伯斯顿(Thomas William Roberston, 1829—1871)，爱尔兰剧作家，他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剧作，并在舞台导演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译者注

捡起了由利洛和盖伊所开创的改革尝试，然而其粗糙的程度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然后，在一股兴建剧院的热潮中（在 1860 到 1890 年间，伦敦西区新建了 27 家剧院，在郊区和各郡，剧院的扩展也极为迅猛），戏剧很快得到了复苏，到了世纪之交，英国便又有了一种严肃而又卖座的戏剧。在我们转向最后这个阶段之前，还必须瞥一眼 1840 年以来音乐厅的发展状况。随着特许剧院垄断地位的终结，伦敦的小剧院逐渐开始上演“合法的”戏剧（由于垄断法案的存在，它们以前一直只上演一些“非法的”戏剧形式，尽管这种区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且其间的界线也很难划清）。音乐厅起先附属于客栈，然后接收或是新建了一些房屋，随着旧的“非法”剧院转为“合法”，音乐厅有了飞速的发展，

291 而它们的经营多半只是延续了自身的传统。人们通常会带着感情来评价音乐厅，认为它们表达了“古英格兰”的精神（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根本不是什么古老的东西），或者象征着伟大的文化活力。事实上，音乐厅是一个极其混杂的机构，从 18 世纪乱糟糟的剧院经由音乐厅再到现今泛滥于电视上和电影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面有着一条直接的线索，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就太愚蠢了。抱怨这类东西的当代产物——从脱衣舞表演到“流行”歌手，却将音乐厅当作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认为它充满着活力和健康，这完全是罔顾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即非法剧院和音乐厅正是此类娱乐活动的始作俑者。如果你不喜欢它的今生，按理说也就不能喜欢它的前世，而时尚的繁荣、高得离谱的薪酬以及高强度的宣传，所有这些后来出现的现象，在音乐厅的历史中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但可以一说的是，除了香槟查理^①、用长毛绒和金丝线装点的奢华演出以及染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奇观和歌曲之外，也还有罗斯(W. G. Ross)（“烟囱清扫工萨姆·霍尔”^②）、珍妮·

^① 香槟查理(Champagne Charlie)，流行于 19 世纪英国音乐厅的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译者注

^② “烟囱清扫工萨姆·霍尔”：“萨姆·霍尔”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歌，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众多版本。喜剧歌手罗斯在 1850 年代将它改编为一首受欢迎的音乐厅歌曲。——译者注

希尔(Jenny Hill)、丹·莱诺(Dan Leno)、阿尔伯特·切瓦利尔(Albert Chevalier)、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这样的艺人,他们把新的经验和经验领域带到表演中来,而这些却是“合法的”戏剧所忽视或是无理地轻视的。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城市工人阶级在这些演员身上听到了他们的最真实的声音,音乐厅的这部分传统自然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18世纪,由于创造性反应必须在混杂不堪的机构里找到存身之地,而且所追寻的目标又往往很不一样,所以很容易造成这种状况,不是忽略不见,就是过于高估。一种新生活的核心显然已经出现,但和之前在类似的变化时期所出现的创造性反应一样,它也没能在所有的形式和机构中确立自身的地位。

5

292

闹剧、情节剧和奇观剧从来就没有放缓其前进的脚步,事实上,现代戏剧——它通过电影、无线电和电视扩大了分布范围——的大部分历史都不过是18世纪的故事的一个延续。而且,在英国,依赖于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观众群的严肃戏剧,其形式大半都是感伤喜剧——只不过在小说的影响下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精致而已,它们虽然将这种情感形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是在一出又一出的剧作中,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时尚的感伤、柔弱的忧郁和好心干坏事这些配置。真正的复兴不是在这里,而是主要体现在布尔乔亚悲剧的成熟上,以及风俗喜剧(王尔德)和社会讽刺喜剧(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

布尔乔亚悲剧已经彻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把当代的日常经验纳入到悲剧当中。事实上,其成功已足以使我们可以扔掉“布尔乔亚”这个词,这样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悲剧”的现代形式了。与古希腊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相比,其重

要区别在于：在现代形式中，兴趣的中心落在了某种社会的和世俗的经验上。悲剧的主人公不是一个陷入到某种普遍模式之中的人，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及其特有的道德法则产生了冲突。从易卜生到米勒^①，这种形式的最优秀之作都有着一种独具的特征，那就是强烈的批判意识，它通常与一些重要的思想旨趣联系在一起，被带入到对这种经验的表达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式是在这么一个时代里成熟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价值——它们是早期的布尔乔亚戏剧试图论证和阐发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悲剧及其支流“问题剧”（problem play）通常是“进步的”，它不表现一个人如何受到某种绝对法则的审判（布尔乔亚戏剧尽管根基狭窄，在这点上倒是与古希腊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相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关心的反而是怎么依据特殊的经验来批判这些法则。它代表了个人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由主义的。之前的悲剧表现的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但其结局却总是在为与个人敌对的法则辩护。社会悲剧中的现代主人公其区别特征就在于他是一个反抗者，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来反抗某种法则，英雄气概就来自于这种反抗，即使失败了，也仍然不失英雄本色。此外，在有些剧作中，从提供替代性的价值和法则这个角度来说，反抗是被普遍化了：有着自由精神的主人公变成了以解放者现身的英雄。

事实上这类剧作依靠的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社会支持，其观众来自于致力于改革的群体，或者至少是愿意倾听改革呼声的。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在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英格兰，这类群体的增多都直接在剧院的观众群上反映出来，而新戏剧主要依靠的就是这种日渐走强的趋势。“自由剧院”和戏剧俱乐部的成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发展现象，它们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为新作品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地

^① 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译者注

起到替代作用的舞台。正如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的戏剧及剧院的历史（戏剧工厂^①、皇家宫廷剧院^②）所昭示的那样，我们目前仍处于这一时期。这股戏剧发展潮流主要依靠的是一个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分道扬镳的中产阶级异见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它使社会悲剧以及社会讽刺剧都达到了目前的鼎盛状态。此外，从 1918 年以来，它拓宽了戏剧的社会面向，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也成了戏剧表现的内容，这一趋势仍在发展中，尽管力量仍然有点单薄。

于是，一方面是中产阶级主流戏剧仍然延续不绝，另一方面，一场意义重大的新戏剧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那些更严肃的早期戏剧形式所蕴涵的潜能。当然，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两方面的简单叠加。实际上，社会悲剧的诸形式在遭到强有力挑战的时候，仍然还处于成熟的过程中。在这些形式中，兴趣点通常仍然只局限于个人与特定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异见群体对种种价值的质疑，其范围往往要比普通的社会批评更广泛。对于某些特定的经验而言，发展和改良各种旧形式似乎是不够的，或者说这种发展达到了这种地步：旧形式崩溃了，各种新因素甚或全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有时候，在单独一场运动中，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会在短时间内将社会剧（social drama）的成熟与新戏剧的发展与创造统一起来，就像在爱尔兰戏剧运动中那样。对民族传说或历史材料的使用，滥觞于浪漫主义戏剧《浮士德》和《培尔·金特》，它们对这种素材（在一般的古装剧中是很常见的）进行改造，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戏剧元素加以使用，来表达某种宗教上的或是哲学上的经验，其影响之深远堪与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相比，就此而言，

294

^① 戏剧工厂(Theatre Workshop)，以英国戏剧导演琼恩·利特活(Joan Littlewood, 1914—2002)为核心的一个戏剧团体，组建于 1945 年。受布莱希特的影响，利特活主张打破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让观众也参与到演出中来，从而使戏剧演出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事件。——译者注

^② 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建成于 1870 年，当时的名称是新切尔西剧院。1956 年被英国舞台演出公司(English Stage Company)收购，成为一家非营利性的剧院，主要演出英国及世界各国的新剧。1956 年，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在皇家宫廷剧院上演，轰动了英国戏剧界，从此这儿就成了扶植左派青年剧作家上演新剧的主要场所。——译者注

这两部剧作迄今仍是绝无仅有的典范之作。在爱尔兰戏剧运动中，主要由叶芝推动的新戏剧之所以能够很快拥有自己的观众群，并和演出剧院建立联系，就因为它是一场全面展开的民族戏剧运动的一部分。在其他地方，它也拥有自己的观众，尤其是在已经重视运用古典神话的法国。可是在英格兰，这类严肃戏剧（必须把它们与感伤喜剧或其他的旧形式对历史或传说材料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寻找其社会基础方面却不那么成功。它实际所依靠的是两类观众：第一类观众与教会有联系，他们有时候也赞助这类作品，艾略特的《教堂谋杀案》^①就曾得到过他们的大力推介；第二类观众偏爱古典题材的剧作，他们人数有限，接受过古典教育，往往更乐意通过收听小众的广播而不是通过上剧院来欣赏戏剧。严肃的现代戏剧泰半都落入到这个传统中，由于它与演出剧院联系较弱，加上其自然形成的观众群必定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它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实际上还不时地会出现停顿。

然而，在实际经验的逼迫下，社会剧的各种形式还是在扩展中，有时候也会中断。在早期布尔乔亚悲剧中，尽管其狭隘的预设前提是确定的事实，但也显然存在着一种表面看来是非社会性经验的因素，这种因素最好是用命运来定义。它通常所起的作用就是确保某些法则碰巧得以实现，这些法则不是上帝的法则，它们是命运而不是天意，在当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它们是成功地支持了而不是挑战了布尔乔亚悲剧这种形式。在易卜生的作品中，甚至是在那些明显具有社会性的剧作中，这种命运因素尽管有时候会以旧的方式用来强迫执行某个由其他理由所决定的行动，但最终还是必须以全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命运常被用来解释为戏剧的社会行动所不容的那些经验。正是来自于其他经验的压力使得平常的社会形式被许多作家所改变。通过在现实主义的框架里运用一些非现实的因素，这种戏剧在与成熟的浪漫主义戏剧根本

^① 《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艾略特(T. S. Eliot)的一部诗剧，描写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在教堂遇刺的事件。——译者注

相似的一些方面得到了扩展。不管剧情在形式上是当代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传奇的，它所处理的经验如今已不再局限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领域，这些关系原本是这种形式想要表现的对象。在易卜生那里，这种发展显得尤其清晰、尤其重要，不管它直接表现的对象是什么，新戏剧在本质上都有着一种“象征的”、普遍的特征，而它的重要优势就在于它是从观众所熟悉的习俗出发的。

但在其他方面压力依然存在。布尔乔亚戏剧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体散文，这种样式虽说对于最初提出的目标来说是够用了，但对于这些更进一步的目标来说似乎就不够了。这种样式后来被称为自然主义，它基本上是以这些初始假设为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表面活动中得到证实。从根本上说，对自然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不断滋长的怀疑，不相信真有这种可能性。“无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怎么都无从表达的经验，是产生这种怀疑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显然是人们日益确信，我们无法根据现有的社会价值来充分地思考人类的价值，实际上这种信念构成了推动社会剧走向成熟的独创性反抗的一部分。这样，在语言和情节方面，旧形式的根基都日益被削弱了。

296

从对旧形式的拒斥中涌现了两种相当重要的新形式。一种是现代诗剧，它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情节框架，同时又大量使用戏剧性的诗歌，来表达那些(通常意义上的)情节所不能表达的经验。这种尝试已经贡献了一些有价值的剧作，但是它的使语言脱离情节的内在倾向，导致它在创造一种真正统一的形式方面遇到了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另一种新形式是“表现主义”戏剧，它有意识地打破了自然主义的情节框架，所设计的场景首先指向的是心灵的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能够正常地表现为清晰可见的情节，通过这种方式，它试图表现更为广阔的经验领域。就像浪漫主义戏剧常常使用神话一样，表现主义戏剧也试图创造神话，它们都意识到情节应该表现一个普遍的经验领域。有时候它会变成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戏剧，在这样的层面上来表现一个孤独的心灵的活动，即别人都只是为了这一个心灵而存在的。在其他的例

子中，这种方法也被用来表现那种在研究历史、分析社会时显现出来的变化和张力，但即使是在有可能会根本影响到共同生活的时候，它们也不一定会显现在局部行动的细节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意识层面的表现主义，即“个人的表现主义”和“社会的表现主义”。布莱希特所取得的成功和影响使得这条路线在当今的戏剧试验中变得格外重要，而布莱希特的成功多半要归功于他后期所做的改造，通过采用一个道德的和知性的系统——它在总体上是强大的，但又是突出个体的——他成功地改造了这种总是有可能趋于晦涩的形式。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衰落以来，20世纪的戏剧第一次成为了一种主要的艺术活动，在某些领域里，它还恢复了与文学之间的富有活力的联系，并且通过设计与别的主要艺术门类建立了联系。英语歌剧的复兴，以及创作严肃的当代音乐剧的努力，也协力推动了戏剧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在今天，戏剧流布之广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尽管在电影、广播、电视等新的表演媒体产生之后，剧院常常是举步维艰。虽然说戏剧流通的增长多半只是扩展了一些旧形式，但新媒体的巨大灵活性也已经成为实际推行新形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诗剧在广播中播出；表现主义和严肃的浪漫主义戏剧出现在所有媒体中，特别是电影中；一种扩展开来的社会剧同样也出现在所有媒介中；在戏剧手法和观众群方面，它们都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在自己的世代里，要想看清形势是像1630年或1735年那样充满活力却没有什么持久的基础，还是像1590年或1890年那样处在一场伟大运动的开端，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所有戏剧种类的观众人数都在有规律地抵达历史最高点。然而，形式的混乱，尤其是少数人的戏剧和多数人的戏剧之间的分隔（在有些时候显得尤为突出），也是严重的限制因素。很显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新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创造性反应。可是这些新形式通常依靠的是少数社会群体，所以在戏剧领域里，似乎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中世纪或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那样的相对统一的观众群，尽

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里，这样的一个观众群可能正在形成。我们无法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有一条原则也许是可以想到的，那就是决定戏剧历史的因素，决不是新的观众群的出现，而是一些新形式的创造性发现，这些新形式能够表现这些观众群当中的某些真实群体的意义和价值。新的观众群总会出现，但他们的需要却不会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得到满足，在表面上的扩展当中也会出现实际的衰减。发现这些新形式是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要做的工作，但是确保一种形式存活下来所必需的种种惯例和态度，却依赖于个人发现与新的共同意识之间所能达成的一致程度。在我们现有的戏剧形式中，社会剧——大体上属于自然主义的那类——的力量就在于，作为一种倾向于将自身内容限制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社会领域里的艺术，它和它的扩大了的生活是相关的。这种戏剧的弱点也许就是那种常规性的限制，从自由党人反抗的时期，到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的主题，都可以看到这种限制的存在，尽管它偶尔也会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但最后还是走向了与某些表现主义戏剧相似的孤立和崩溃，即只为一个少数人的群体服务，并使其他的形式——甚至是那些低劣的形式——离普遍经验显然是更近了。另一方面，在扩展了的社会戏剧、某些浪漫主义戏剧以及表现主义戏剧中，也能触及到另一种冲突——即某些特定的人类价值和关于人类活动范围及目标的既有定义之间的冲突，它能阐明一种更普遍的意识变化。我相信我们的危机将是一种社会危机，但无论是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关于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的说法，还是那种固定的冲突——对权力的滥用及其补救之间以及权威与其批判者之间的冲突——似乎都不能说明这种危机的状况。更有活力的形式能够触及那些难以表白的经验，触及可能存在着的共同的、普遍的参照，在我看来，它们和我们的真实历史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我认为，迄今为止，这些形式的各种弱点都有着某种社会基础，因为它们通常吁求的价值——特别是在英语诗剧和某些浪漫主义戏剧中——都不是基于当代的经验（这并不非得要求有明确的当代背景或参照），而是基于其他社会和其他戏剧所保存的价值，而支

298

持这些价值的群体在根本上是与我们社会的总方向相对立的。于是，一方面是在社会中重组的少数派未能推动真正有规模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这个在构建更广泛的参照的少数派却作茧自缚，固执地将眼光投向过去，一味地想从中寻找到价值和意义。然而，在有些方面，一些令人满意的形式似乎也在形成之中，其共同特征是有能力处理运动，能触及某些特定的经验，这些经验消解了常被挂在嘴边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固定范畴。在我看来，电影技术和表现主义戏剧所充分展现的那种活力，以及当代音乐、舞蹈和一种更加多样化的戏剧语言的结合，是与我们的真实的社会历史相应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能接受这种说法，即戏剧的形式不管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有着真实的社会历史，那么我们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并抓住它们与实际的运动和观念(它们无疑要依赖于这些运动和观念)之间的联系。在一个如此广阔而复杂的领域里，尽管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接受从我已经考察过的各种真实关系中得出的关于这一历史的真相。由于变化本身是不平衡的，对变化作出的反应也必然是滞后的、多样化的，所以这些反应就显得极为复杂，尽管只有一部分反应能获得充分的传播，但大体轮廓是必定存在的，据此我们不仅可以把戏剧看作一种社会艺术，而且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主要的、实用的变化指标以及意识的创造者。

注释：

[1] 这种性游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性游戏(pseudo-sex)，它和婚姻中的财产因素的关系，以及它和伦敦社交界沦为一个婚姻市场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为探讨王政复辟时代喜剧的道德态度和基调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基础，特别是联系到虚假的性游戏的习俗以及婚姻的情感状况。

[2] 康格里夫也许还代表了对这些模式的某种提炼，是在迈向一种看似独立的文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样式很容易在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被模仿，而且是在明显高于滑稽模仿的层面上，谢里丹(Sheridan)和王尔德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

1956年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英语批评术语出现的一百周年，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在这一百年里，其历史如此辽阔、复杂而又艰辛，以至任何庆祝事实上都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吵闹。然而现实主义并非一个有待确认的对象，好像一旦固定下来就可以到处套用。更确切地说，它是描述某些方法和态度的一种方式，而这些描述在平常的经验交流和发展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变化万端。最近我一直在重新考虑把这些描述作为一种可行的方式，来界定和概括我对当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主旨的某些个人观察。现在我打算落实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的“现实主义”现有的各种变体；其次是我自己对现代小说发展道路的看法；第三是现实主义可能拥有的新的意义。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现实主义”一词的简单的技巧性使用，即用来形容某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描绘一些观察到的细节时所展现出来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一显然是简单的用法包括了所有后来出现的复杂事物，但起初它似乎还能足够准确地将一种技巧与其他技巧区分开来：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是观念化或漫画式的讽刺。但从一开始，这种技巧的意义也遭到了来自侧面的攻击，这种攻击涉及内容：某些种类的题材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它们与别的题材迥然不同。最常见的定义是：现实主义的题材是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现实，与之相对立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的、浪漫的或传奇的题材。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现实”的鼓吹和拥

护，通常是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题材
301 在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之前，是被称为“家庭的”和“资产阶级的”，其间的关联很清楚。在文学中，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随着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家庭戏剧尤其是小说，已成为表现这种新的意识的主要工具。然而，当“现实主义”的描述来临时，其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惊人的”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形容“现实主义”，而在描写“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现实”的主流之中，也能辨别出一股特殊的潮流，它关注的是那些被暴露出来的令人不快的污秽之物。现实主义因而部分地表现为对平常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抗，现实主义作家对平常的题材作进一步的拣选，他们挑选的题材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们宁愿视而不见的。于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口号便传给了各种进步的、革命的运动。

这段历史是与“自然主义”的发展相平行的，自然主义也有一种简单的技巧性的意义，用以指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但它也曾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对象范围拓宽为“平凡的、日常的现实”，从而成为一个革命学派的旗帜（尤其是与左拉有关），1881年的《每日新闻》称之为“对令人不快的事情进行毫无必要的忠实描绘”。

因此，在19世纪的含义中，与技巧方面的描述相缠绕的，还有学理上的各种关联。最积极的莫过于斯特林堡，他把自然主义定义为对上帝的排斥：按照哲学上的各种先例，自然主义是与超自然主义相对立的。然而在19世纪结束之前，随着我们的认识变得愈加益清楚，“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被区分开来：在艺术中，自然主义仍然保留了简单的技巧的涵义，而现实主义虽然也保留了这方面的因素，却被用来描述主题以及对于主题的态度。

20世纪的主要发展已是新奇纷呈。在西方，在已被接受的各种用法之外，还有一种用法已经变得很明显，那就是在“忠实于心理真实”的意义来使用“现实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艺术
302 手法，来确信某种经验是真实的，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不必将主

题限制在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现实这一范围内。而在苏联，现实主义的早期定义被保留下来并加以扩充，依据其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内含的要素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传统。它有四大要素：人民性、典型性、理想性和党性。人民性实际上与表现技巧相关，尽管它是精神的某种表现：它反对“形式主义”的艰深，要求通俗简明以及传统艺术的清晰明了。理想性和党性指的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党派依从关系，就像人民性是对现实主义的那种常见的技巧含义的重新阐述，理想性和党性则是发展了上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看法和革命的态度。根据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依从关系，可以非常简明地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区别开来。事实上，西方的通俗文学很多都属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它们对理想性和党派依从关系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而且通常坚持人民性。而当涉及第四个因素典型性的时候，问题就扩大了。

恩格斯把“现实主义”定义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观点可能会在最平常的意义上被接受，但这里面却隐含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部分。典型性是对这一定义的发展，它对整个现实主义问题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苏联的理论家告诉我们，“典型”不能混同于那些“常见的人物”，真正的典型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的理解”之上的。现在暂且不去考虑这一观点在苏联文学的具体个案中是如何应用的（在这方面，作为批评试金石的是肖洛霍夫的杰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与之相对的是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它采用的是外部描写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典型性的概念修改了“现实主义”的含义，“现实主义”不再是对观察到的现实的直接复制，而是变成了一种有原则、有组织的选择。如

303

主义的——所阐发的意义显然相距不远。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从这个复杂的故事中挑出一种我们所喜欢的用法，挑出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应该接受各种实际的含义，加以区别和澄清，并看看哪一种（如果有的话）是有助于描述我们对文学的实际反应的。

欧洲 19 世纪小说的主要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传统，人们同样认定这一特殊的传统至少在西方已经终结。近来有人说，现实主义小说早已随同汉森出租马车一起消逝了。可是要一下子明白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绝大多数的现代小说，包括那些我们仍然视之为文学的小说，仍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一般准则。现代小说不仅仍然专注于各种当代主题，而且由于破除了某些禁忌，普通的日常经验的各种因素在现代小说中以多种方式获得了比 19 世纪小说更为明显的表现。当然没有人会抱怨现代小说缺少了对那些触目惊心的或是惹人不快的因素的描绘，而这些却曾是“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所提出的目标之一。应该描写对象实际呈现的面貌，极少有小说家会反对这一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描写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常常说现实主义小说已经被“心理小说”取代，对某些意识状态、某些新近获得理解的心理状态直接进行研究，这的确已成为一个首要的现代特征。但是在描写这些状态时，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指导目标，并没有被广泛抛弃。这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对“日常的、平凡的现实”有了不同的理解，而且为描写这种新的现实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新技巧仍然有着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目的吗？这些问题显然是很难回答，而接近问题答案的一个办法是把人们通常相信的这种说法——即我们已经抛弃（发展超越）了现实主义小说——拿来和我自己的感觉放在一起，我的感觉是在现代小说中存在着一一种形式上的断裂，这使得它无力表达某种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经验，也正是为了这种经验，“现实主义”这个词才会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还不能包罗文学的全部，但在其广阔疆域里，几乎每一种当代写作都能找到栖身之地。如果把小说等同于任何

一种散文作品，那么就会对小说的传统以及必需的小说批评造成巨大的损害。这种错误的等同甚至使托尔斯泰说出这样的话：《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小说”。一种实际上包括了《米德尔马契》和《迷惘》、《呼啸山庄》和《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虹》和《魔山》在内的文学形式，的确更像是我所说的文学的全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小说现在似乎仍然存在着形式上的缺口，这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庞大的文学形式都必须以填补这一缺口为指向。但由于小说就像是文学的全部，所以小说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上的缺口似乎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我想到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小说：它从个人品格的角度来创造和判断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性质。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或许是维持一种平衡。初看上去，这似乎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大多数小说都是这么做的。《战争与和平》、《米德尔马契》和《虹》就都是这么做的。这类小说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以及由个人组成且大于个人的社会作出了评价，同时它也对人们的各种创造作出了评价，这些人既属于这种生活方式，又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还能帮助定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说，他们本身就是绝对的目标。生活环境、社会和个人都不占有优先地位。社会不是借以研究个人关系的背景，个人也不只是用来阐明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例子。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会深受整体生活的性质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完全是个人的领域里，整体生活恰恰显得最为重要。我们全力以赴地关注整体生活的每一方面，而价值的中心却总是落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不是任何一个孤立的人，而是构成整体生活实体的许许多多的人。托尔斯泰，特别是乔治·艾略特，就曾多次说过与此相近的话，认为这正是他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这一现实主义传统中，成功的程度当然会有大小不同的差异，但是这种观点，这种对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特殊理解，却可以看作是一种模式。我们必须牢记，这种观点本身即是发展成熟的产物，18世纪以

来的小说史在本质上就是面向这一立场的一种探索，在其早期也曾屡遭失败。18世纪的小说在形式上与今天的小说非常相近，承受着相似的压力和不确定性，而正是在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小说的形式才真正地成熟起来。当别人跟我说现实主义的 tradition 已经崩溃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这种成熟的观点在新的特殊经验的压力下被抛弃了。我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总是或是应该和某种特定的风格捆绑在一起。那种与“汉森出租马车一起消失”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主义）描写决非现实主义的本质，也许在诸如贝内特^①这样的作家那里，这种描写甚至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替代而已。现实主义的洞察力并不是通过对商店、小会客室或是车站候车室进行精雕细刻式的描写来实现的。这些描写可以用作情节的要素，但并非现实主义的精髓所在。如果为了这种描写就把它们放进小说，那么实际上就会破坏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本质的平衡，比如说，它们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人物转移到事物上。在这种配备齐全的小说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实际上正是这种感觉导致“现实主义”的名声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损害。最极端的反动出现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海浪》里，在那里，所有的家具甚至人的肉身都飞出了窗外，而我们却被抛在一边，和声音和感觉待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所见，这种虚幻的声音同样也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平衡。我们也许真的可以从风格的两极分化——客观现实主义和主观印象主义——这个角度来撰写现代小说的历史，但更加重要的两极分化是现实主义小说自身的分裂，这主要发生在1900年之后，现实主义小说根据个人的实质和品格来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和品格，如今它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传统，即“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在社会小说中，也许有着对整体生活亦即作为聚合体的人群的精确观察和描写；而在个人小说中，也许

^① 贝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英国作家，其作品深受法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专注于描写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代表作有《老妇谭》(The Old Wives' Tale)。——译者注

有着对个人亦即作为一个组成单位的个体的精确观察和描写。但它们都缺少一个维度，因为生活方式既非聚合体也非组成单位，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过程。

现在我们通常也会这样来区分“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实际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兴趣的这种区分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举几个例子，实质性的问题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现在的“社会”小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描述性的社会小说，是纪实性的。它首先要创造的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一个特定的社会的或工作的共同体。在这些小说里，当然有各种人物，有时还刻画得相当精细。但在谈到这种类型的小说时，我们通常只是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矿山小镇的生活，或是在一所大学里、一艘商船上甚至在缅甸的一艘巡逻艇上的生活，那就去读这种小说吧。这种小说有很多的确很有价值，好的纪实小说往往是饶有趣味的。这种小说当然应该继续写下去，而且应该尽可能多地写出各种各样的背景。但我们显然忽视了这个方面，即这些人物首先是矿工、大学教师和士兵，然后才是生活方式的图解。但这并不是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重点，好像人物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完全在于其自身，相反这些人物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在现有的全部小说类型当中，这类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显然最接近于我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在阅读的时候还是能一眼看出它和现实主义小说的重大区别：社会描写的功能实际上享有优先考虑的特权。

307

和这种小说迥然不同的是另一种非常有活力的社会小说，这种小说现在很流行。其要旨不在于描写，而是要发现一个关于社会的公式并把它具体表现出来。也就是从社会经验的总和中抽绎出一种特定的模式，再依据这种模式创造出一个社会来。在幻想未来的小说里可以看到这方面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些小说里，“未来”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通常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因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很明显都是当代社会，实际上这成为了书写社会经验的一种主要方式）消除了已选择的模式和平常的观察之间常见的张力。《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

《华氏 451 度》都是很有力的社会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一种从当代社会中抽绎出来的模式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获得了完整而具体的表现。其他的例子有戈尔丁的《蝇王》和《继承人》，以及几乎所有严肃的“科幻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数是仿照现实主义小说来写的，是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运作的。它们基本上都包含着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套看法，通常是一个善良的个人或是一个小规模的个人团伙反抗一个邪恶的社会。小说的情节通常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张力最后得到了缓解，我只说是缓解，而不是解决，因为它们通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只是巧妙地改变了张力，把它们放在一种事先选好的眼光中看，这样与其说是在探究这些张力，倒不如说是在迁就它们。疏离、异化和自我放逐的经验是当代感觉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任何一部当代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必须认真地处理这种经验（顺便说一句，具有讽刺性的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几个关键点上，也曾处理过这种经验，但得出的解决办法却与“用流放来对抗大众，僵持不下”的当代公式迥然不同，在《罪与罚》当中，以及通过《战争与和平》中的别祖霍夫，都能看到这种明显的不同）。我们的公式化小说很生动，那是因为它们所写的都是活生生的社会感觉，但它们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没能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血肉丰满的人物。^[1]其结果是在这些作品中，共同生活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个人生活则是由它们在公式中所发挥的功能来定义的。

“现实主义”小说被分为“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小说又被进一步分为社会纪实小说和社会公式小说。我们确实可以在以前的各个时期里找到这两种小说的例子，但它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成了模式。“个人”小说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把它相应地分为纪实的和公式的两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佳小说当中，有些是非常巧妙精细地描写了一些经过选择的个人关系。这些小说往往很像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组成部分，在写作方法和内容上也存在着某种延续性。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在这部小说中，那种老式的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平衡关系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但它还是属于个人小说，尽管有着较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小说中，出于满足某些人物的需要，印度社会的各种因素将现实社会浪漫化了。在这种形式的小说中，这种手法是司空见惯的：表面上呈现的是一个社会，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表现的却通常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景致，所要说明或是衬托的是某种个人肖像，而不是实际上将个人包容其中的国家。格雷厄姆·格林作品中的社会场景就是明显的例子：他笔下的布雷顿、西非、墨西哥和印度支那都有着一些共同的主要元素，它们与当地的实际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和他笔下人物的需要以及他自己的情感模式有关。如果坦率地、彻底地以这种方式来写作，就像卡夫卡那样，那么至少不会有什么混乱，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却只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不平衡，现实主义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在描写社会的小说中也同样能看到这种维度的缺失，只不过是方向不同而已。在那些小说里，人物是社会的不同侧面；而在个人小说里，社会则是人物的一个方面。而我们铭记在心的那种平衡是指这么一种状况，其中整体生活方式和个体的人都被看作是绝对存在着的。

当然，很多个人小说尽管就其自身而言往往是很不错的，但在这些小说中，整体生活方式并没有得到表现，哪怕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部分地打着购物、战争爆发、公交中断、来自另一个社会阶级的古怪的未成年人物的反抗等幌子。在这样的个人小说里，社会是外在于人的，尽管它有时会粗暴地闯入人们的生活。当然，只要有对材料的精心选择和精心提炼，这种个人小说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那种直接的个人经验也有着重要意义，对这样一个广阔的经验领域也能进行激动人心的探索。但在我看来，在这类小说中能有意识地对材料进行选择的（比如说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对材料的提炼是完全合理的，从而间接地创造了一幅描画整体生活方式的杰作），只是千分之一而已，大多数作品都不能突破瓶颈，它们缺少一种自觉的意识，认识不到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影响到最内在的个人经验。当

然，如果对这些作家来说，社会已经变成最糟糕的社会小说当中最乏味的抽象事物，那么他们不觉得社会必定和自己息息相关，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他们坚持认为人首先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社会单位而存在的，这种立场当然没错。但他们却丢掉了构成共同实体的要素，对这种共同实体，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是能够再三有所领会的。在小团体内部，个性会得到尊重，但在小团体之外，个性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是人，人们不时地能在字里行间听到这种呼声，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很重要，但对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打杂女佣”或“乡下女人”——在她们身上感受力从沸点骤然降到了冰点——来说，那又不一样了，这个奇怪的例子象征着某种普遍的限制。这不只是社会的排斥或是势利——尽管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诊断，而且也是一种失败，即没能认识到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般社会因素的性质。我们是人（这些小说如是说），人，就是这么着；除此之外就是世界、社会、政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些报纸上刊登的无聊乏味的玩意儿。但事实上我们既是人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这种整体观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

310 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描写个人的小说往往也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但其明显的趋向似乎是在逐渐地自我瓦解，转变成另一种个人小说，即个人公式小说。和社会公式小说中一样，个人公式小说也从经验总和中抽象出一种特定的模式，不过从这种模式中创造出来的却不是社会，而是个体的人。这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小说所采用的方法，这种小说就其自身而言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创作方法似乎在迅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即诡辩小说。我们可以说这类小说只重视一个人物，但一般来说，它们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的确是极其认真的。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不仅按照这种方式来写，而且还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重点包容在作品中。我们提到这部名著，也就是承认小说的表现强度的确有所增强，小说的虚构手法也真的有了发展，这些都是这一重点的具体表现。世界被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靠的是某个人物的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不是通过叙述来表现的，

也不是有距离的，而是被看作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在《尤利西斯》里，乔伊斯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巨大优势，他不是通过一个人物而是通过三个人物来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一个世界，小说中有三种观看方式和三个世界——斯蒂芬的、布鲁姆的和莫莉的，但这三个世界实际上又合成了一个世界，也就是小说所表现的那个完整的世界。《尤利西斯》没有从头到尾保持这种平衡，整本书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就已经大体上奠定了小说的基本布局，最后那部分则是一个尾声。在这里，现实主义传统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在技巧上有所改变，但所要表达的经验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尤利西斯》之后，由于这种技巧日渐削弱，成果也就相形见绌了。卡里^①的《马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小说里的那种观看方式是被孤立开来的，而世界也是与之相吻合的。这种分析也是理解艾米斯的《那种不安感觉》和韦恩的《生活在当下》所代表的那种流行的新小说的关键。这些小说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们似乎是当代创作中最真实的一类作品——它们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因为它们记录了很多真实的感受；但另一方面，它们最终所描绘的现实却是戏仿的、可笑的。这就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困境：虽然这些作家是从真实的个人感觉出发的，但为了支撑并证实这些感觉，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行动的世界，就会像以往那样，免不了要在他们给定的形式中被挤压成一幅讽刺漫画（这也是狄更斯的处理方式，受到他能够公开看到或是陈述的东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讽刺性的模仿和多愁善感乃是同一块硬币的正反面，被用来避开真实的协商^[2]）。把这些感觉置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在紧要关头发生滑稽变形的小说世界中，实际上就是要对这些感觉提出质疑，并由此进一步对现实提出艰难的质疑。但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种真实的张力，却只看到一种虚幻的解脱：在电

311

^① 卡里 (Joyce Cary, 1888—1957), 爱尔兰小说家。《马嘴》(The Horse's Mouth, 1944) 是其第一个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画家吉姆逊落魄、荒唐的生活遭际，探讨了艺术家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译者注

话里咒发誓，发一通嘲讽性的演说，寻找一个可以将所有攻击火力集中在他身上的类型化人物。正因为这些小说的作者是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一批作家，所以他们最清晰不过地证实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困境。在我们的感觉和我们对我们社会的观察之间横亘着一条危险的鸿沟。

在某些当代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种诡辩小说的形态，这些小说把某个人物的感觉和需求加以绝对化，并从这些单一的角度出发来塑造其他人物。这在很流行的第一人称叙述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采用这种叙述方式通常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间的那些章节创造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实，在这种现实内部，个人叙述获得了一片宽阔的天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其讽刺虽然不无裨补，但是缺少了这种异向度，随着小说的推进，这种局限性就变得更加醒目了。布莱恩的《向上爬》是完全失败了，因为它丝毫没有涉及其他的现实，我们目睹的只是那种谙熟已久的粗野和自怜之间的互相交战，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消极的道德姿态。就以卡森·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为例来作比较，《婚礼的成员》有其现实主义的向度，其中由个人感觉构成的现实尽管逐渐变成了虚幻，但它与滋生这些感觉的那个世界一直是相互作用的，维持着必要的张力。或者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萨冈的《你好，忧愁》，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是以客观的方式来刻画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按照中心人物的幻想来定的。麦卡勒斯和萨冈之间的对照，就是现实主义与其失败形态之间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见得最多的正是那种失败之作，第一人称叙述——在它身上人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技巧方面的才智——如今常常被用来给这种失败赋予一种合理性。诡辩小说还包括了那些在形式上仍然酷似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在鲍温^①的《炎日》里，尽管没

^① 伊丽莎白·鲍温(1899—1973)，爱尔兰女作家，其作品致力于表现潜伏在现代生活中的不安感和危机感，创作风格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长篇小说《炎日》(1949)讲述的是一个二战期间发生在伦敦的爱情悲剧，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主人公斯特拉爱上了一位英国军官罗伯特，但罗伯特实际上却是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他最后在英国警探的追捕下跳楼身亡。——译者注

有第一人称叙述，甚至还有着某种类似于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以便使诡辩显得不那么露骨，但是其中的人物却首先是作为核心人物的情感风景中的一些自然要素而存在的，根本不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他们或是对他们作出评价。个人小说目前还在继续发展，等到它对大多数人都弃之不顾的时候，也就走到了尽头。一旦社会现实被排除在外，最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极少数个人之外，其余的一切都被排除在作品之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小说所描写的那么多的个人感觉实际上都是一种崩溃的经验，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提出了这种四分法——社会描写、社会公式、个人描写以及个人公式——把它当作一种方法来着手对当代小说进行概括性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对比来界定现实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已经被上述四种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取代了。现在的问题是：这几种小说是不是与现实变化相对应的，把旧传统当作汉森出租马车那样完全落伍的东西给丢开了，还是它们其实是经验中的某种非常深刻的危机的征兆，这种危机虽然产出了这些天才的作品，但它仍然存在着，没有得到探讨，因此根本就不能令我们感到满意。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作家是存心要抛弃现实主义的平衡，故意地背离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而被许多迷惑不解的读者斥之为乖张荒谬。在我看来，这种危机太深刻了，任何一种简单的谴责性的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就其整体性质而言，这又是什么危机呢？

这里有几个直接的因素可以说明问题。现实主义小说显然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人不是只通过一种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或家庭关系——而是通过许多种互相勾连的关系连在一起的。在20世纪，要找到这样一种共同体，显然很困难。《米德尔马契》是由个人、家庭和工作这三方面的关系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它的全部力量就来自这三方面的关系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中的互相作用。然而，在大多数当代小说中，个人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是单一的、暂时的、断断续续的。这首先是在社会——至少是大多数小说

家最方便接触到的那部分社会——中发生的一种变化，然后才表现为文学形式上的变化。另外，与此相关的是——但也受其他强力因素的影响——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经验是倡扬和保护个性（这和 18 世纪的经验颇为相似），而 19 世纪特有的经验则是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安顿下来。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通常以一连串的和解、订婚以及建立正式的关系来结尾，这种安排是每一个拙劣的模仿者都知道的；而 20 世纪的小说其结局通常是一个男人孤身出走，从一种被宰制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从而找到了自我。这种情况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模式之前，确实也真的发生过。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这样的解脱和发现是必要的、有价值的，记录下来的个人历史可以汇聚成一部共同的历史。在旧的权力机构苟延残喘之际，一些支配性的新权力机构在不断地创立，必须不断地促成这种脱离，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被赋予了形式和实质，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它威胁着要独占文学的全部内容。因为对这些压力有所了解，所以我承认这些反应有其合理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陷入僵局，而探索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定义也许能打破这一僵局，找到一个有创造力的方向。

当代小说反映并阐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所存在的危机，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求助于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只有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才能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但文学是致力于表现已知经验的细节的，即使是有益的社会变化，也同样会对文学构成一种实际的、负责的约束。我们是从认清我们的实际处境开始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个人和社会被割裂成了截然相对的两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已经反映在文学形式中。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努力是为各种关系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努力是全体性的，可以认为它既是个人的努力也是社会的努力，是在实践当中学习如何扩展各种关系。有着伟大传统的现实主义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因为它具体地展现了那种生气勃勃的互相贯通——思想渗入感觉，个人融入共同体，变化转为安定——作为一些生长点，它们正是在我们这个分裂的时代里所需要的。在最高的

现实主义中，基本上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又从社会的角度——通过各种关系——来看个人。这两方面的整合控制着一切，当然，这是无法只靠意愿的作用就能实现的。如果完全做到了，那么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发现，就可以(也许只能)被记录在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

但既然这是发现而不是失而复得，既然怀旧和模仿不仅与之毫不相干而且反而会带来阻碍，那么任何一种新现实主义都不会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一模一样，而且也会把个人现实主义的各种新发现——它们是20世纪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包容进来。联系到在知觉和传播方面的各种现代发现，这个观点可以从理论上阐明。那种旧的、幼稚的现实主义无论如何都已死亡，因为它是建立在自然视觉(natural seeing)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这套理论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当我们以为只需要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一个平常的世界时，我们就会把现实主义设想成一个简单的记录过程，对它的任何一种背离都是有意为之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实际上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的这种创造——即发现我们怎么才能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里活下去——必然是能动的、积极的，那种从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的目光出发的旧的、静态的现实主义只是一套僵死的成规而已。当人们第一次发现人是通过其感知的世界——即人对外在于他的物质世界所作出的阐释——来生活的时候，就以为这为摒弃现实主义提供了根据，只有个人所看到的才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艺术不只是感知，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反应，是全部的人类传播的一部分。用我们的话说，现实就是人们通过工作或语言使之能为人们所共有的那种东西。所以，正是在感知和传播的活动中，个人所看到、所解释和所组织起来的東西与那些能被社会所承认、所了解、所赋形的东西之间的实际互动，才丰富而微妙地显现出来。这种基本的互动非常难把握，但在这里无疑有着我们所要寻找的线索，它不仅有助于理清我们对个人见识与社会传播之间的关系思考，而且也有助于理清我们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思考。个人通过遗传而

获得了一个进化的大脑，它给了他共同的人类基质。通过遗传以及其所在文化所传授的种种形式，他学会了观察。可是由于这种学习是活动的，他所看到的世界又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改造，所以新的感知、解释和组织行为不仅有可能出现，而且非常有必要。从个人方面来说，这是人的成长，但是实质性的成长是在互动中发生的，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个人努力传播他所学到的东西，把它拿来跟已知的现实相比照，并通过工作和语言来构造一种新的现实。通过共同的努力，现实不断地被建构起来，艺术即是这种进程的最高形式之一。然而，建构现实的斗争必定是异常艰苦的，张力会非常大，也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失败和崩溃。在我看来，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成长时期——就像我们所经历的并将继续经历的这个时期——张力将会变得异乎寻常地巨大，某些失败和崩溃可能会烙上鲜明的特征。将创造性的努力记录下来，是为了探究这些崩溃，但要把它和那种对于崩溃的简单的、往往因为不成熟而瞎激动的利用区别开来，往往并不那么容易。要不然，就是转身回到已知的形式中，这些形式使我们想起以前获知的各种现实，并通过这种提醒试图去创建某种可能性。其结果是张力要么可以被减弱，就像在普通的社会小说中那样；要么是可以被耍弄，就像在普通的个人小说中那样。这两种结果都脱离了我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活生生的张力，是在一种可以传播的形式中实现的。不管这是不是被看作一个与社会中的个人相关的问题，还是一个与所提供的描述和已知的描述相关的问题，它都要面对相似的创造性挑战。现实主义的成就在于它总是能够达到一种平衡，但在当代小说中的各种形式中，却往往看不到这种平衡，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挑战。为获得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平衡而作出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必将是复杂而艰巨的，但如果我们要坚持文学的创造性，那么这种努力就是必需的，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也是必需的。

注释：

[1] 欧文·豪(Irving Howe)认为，我在寻找的东西，就其定义而言，是这种形式所无法提供的。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我不觉得那种形式主义的途径是可以轻易接受的，形式本身，以及“就其定义而言”它“无法做到”的事情，当然都必须承受从普遍的经验立场出发的批评。我常常赞同豪先生的意见，但这次却只能抱歉地坚持己见了。

[2] 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用来说狄更斯，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曾经探讨过狄更斯观察人的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它必定是和对生活和社会的某种特定的、批判性的看法相对应的。参见《狄更斯小说中的社会批评》(*Social Criticism in Dickens*)，*Critical Quarterly*，Autumn 1964。

第三部分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

我们一直试图发展出一套分析方法，从文学到社会机构，都是其分析的对象，它能够清楚地揭示实际存在的感觉结构——那些存活在作品和各种关系当中的意义和价值，并阐明使这些结构得以形成和改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部分里，我将试图在此意义上描述当代英国的状况，这当然只能是一个勾勒，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分析和测量来加以扩充，但它能提供对于基本语言——那些被创造出来而且本身也有创造力的各种意义——的一种解释，这种语言是我们继承下来的现实教给我们的，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语言，新的现实才得以形成并达成协议。我赖以展开这番描述的背景，就是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那个历史过程。

1

在我们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英国社会实际运作的历史模式似乎相当清楚。工业革命仍在延续，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阶段。文化扩展也在持续，同样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方面，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英国近年来主要处于守势。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民主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国会和地方政府稳固地建立在普选权的基础之上，阶级制度显然也已打破。从这些方面看，英国的前景似乎相当清晰：工业先进，民主制度牢固，教育和文化的总体水平也在稳定上升。

320 这种看法的确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它不仅是一种广泛的共识，而且向它发起的挑战大多数似乎也不够理智，即使是局部性的猛烈批评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那种稳定不变和普遍进步的意识。然而，在也许还没有被揭示的更深刻的层面上，这种关于好的社会是自然而然演化而成的观念可能格外地具有误导性。也许正是由于对此有着一种直觉的领悟，人们才会有这么一股情感的力量来指斥一切，拒绝一切，而这正是最近几年所特有的现象。即使可以证明这些指斥所依据的只是经过选择的证据，以及特定的少数人群中间的一些矛盾，但它们所证实的经验仍然不能被轻易地放在一边。

在我看来，最麻烦的是人们都已经习惯于认定我们的社会将依靠一些单一的模式来治理，这是在平均估测了经济活动、政治行为及文化发展等人们所熟悉的领域的总体趋势之后得出的预设。鉴于这种状况，我们需要有全然不同的分析形式，它们能使我们看到每个模式内部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矛盾，而更重要的是，看到整个变化过程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分析不仅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还需要发展出新的范畴和描述，如此方能看到全部真相。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那些最一般的描述方面，我们显然还处于摸索的阶段，留下了某种不确定性，以至于那种把一切都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进化的最乏味的陈词滥调都能乘机钻空子，这当然不是诸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之类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能补救的，毕竟对这个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

我们不得不指出，关于英国经济前景的常见的乐观主义，可以合乎情理地看作是天真的自鸣得意。^[1]根据目前的迹象以及人们以为有可能实现的发展，根本就不能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能保证在这个高度经济化且拥挤不堪的岛国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未来五十年里能够稳步上升。在其他地方也有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许多现在尚不发达的地区确实也在稳步走向工业化，这对于一个如此依赖于贸易而且其繁荣实际上是得力于工业上起步较早（现在正被别人快速超越）及其帝国体制

(现在不是在瓦解就是在改变性质)的国家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种长时段的思考实际上才刚开始,思考与贯彻思想的有力行动之间的差距,似乎不是由平常的惰性而是由种种习惯所造成的,这些习惯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还能够令人满意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对总体规划——在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它常常是可行的——的极度反感,在这个长时段中,也许真的不起什么作用。而这种反感本身也部分地是民主革命的一个观点——坚决反对严格管制——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这里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矛盾,我认为它现在仍然潜藏在深处。实行总体规划的强大理由是它不仅能避免浪费,而且也能推动必要的发展、研究以及整顿,但实际上它被一种完全值得称赞的激情给抵消了,那就是我们必须拒绝用这种经济体制观念来控制我们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被一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给控制了,并且将来也还是要受其控制。这种体制虽然会否认它对人的控制,但它的确是顽固僵化的。首先,它很隐蔽,很难辨别;其次,正是通过其结构和意识形态,它似乎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自由感,在许多地方它的确是这么做的。实行总体规划的理由似乎永远不可能被广泛接受,除非是不仅其形式能够做到合情合理,而且其方法也能够与这种自由感协调共存。民主化的规划说起来很容易,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它将如何运作。在其他国家里,经济规划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但这些成就毕竟没有与任何一种普遍民主相伴共存。上述那种矛盾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即在于此,在我们依然迫切需要实行规划的时候,我们却轻易地认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来拒绝规划,这些问题将来还会存在,因为在再三权衡之后,我们发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困难了。

事实上,要全盘考察我们的整个经济活动,仍然很困难。对经济

322

的经济成败，就是这种带有欺骗性的简单的总体曲线图。只有当我们知道实物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并且提出需求和质量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才能进行实实在在的思考。某部分生产可能确实不是必需的，但更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不同种类生产之间的平衡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用以解答此类问题的答案通常是一套特定的说词，即市场，人们认为需求和质量方面的问题受市场调节。“购买是出于需要，如果东西没人买，也就不会被做出来。”当然，这里还留有一个需要思考的大问题：需要与购买能力是否匹配呢？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描述总归是粗疏的，因为它忽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为了和产量这种大宗数字相匹配，我们还提供了另一种大宗数字，即消费者。“消费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当代术语，值得予以关注。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无意中表达了对于经济活动之目的的一种确实非常古怪、非常片面的看法（其意象来自于炉子或肠胃，然而我们既不会吃也不会烧的东西何其之多！）；其次，它具像化为一个个人形象（总体规模可能极为庞大，但其行为却是个人性的）——即一个有着种种需要的个人，这些需要都可以从市场那里得到满足。

为什么“消费者”会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必须回到关于市场的那套观念那里，才会有所明白。市场当然是一个有着实际意义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获得各种必需的物品，但在供需过程实际上已经改变之后，场所的意象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们过去也常常以顾客的身份去市场和商店，为什么现在却被当作了消费者？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愈益明显的是，根本性的变化即在于必须事先作出计划并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调研作为一种合理的预防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摸清需要以便组织生产。但实际上，由于生产未经全面的规划，而是许多互相竞争的公司决策的结果，所以市场调研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广告，而广告本身也已经发生变化，从宣传某种特定产品的方法转变成一套刺激和引导需要的手段。有时候这种刺激是说这个产品比那个产品更好（Mountain 牌是最好的），但更常见的是激发一种新的需要（你需

要袖珍式收音机)，或是复兴一种正在衰退的需要（每天要喝一品脱牛奶）。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认为推销商和供应商处于平等地位的简单的市场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此就能明白“消费者”作为一个描述的概念为何会大受欢迎了，虽然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明显是为了满足已知的种种需要，但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是为了确保我们去消费那些产业界觉得便于生产的商品。随着这一趋势愈益增强，愈益明显的是：不是社会控制着其经济生活，而是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社会。这种强大的经验试图把人类活动简化为一些可以预测的需要模式，从而直接导致那种有着明确目标的社会思考日趋衰弱。如果我们不是什么消费者，而是使用者，也许就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社会，因为“使用”这个概念涉及一些一般的人类判断——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以及为何使用这些物品，还要知道这些特殊的使用对我们的整个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与之相反，消费带有糊口谋生的粗糙模式，它倾向于取消这些问题，用刺激出来的、受控制的产品吸引力来取代，而这些产品则是由一个外在的、自动运行的系统所生产的。我们还没有完全被这种新的趋势带着走，仍然还有可能逆转这一趋势，但这种诱导模式背后的确有着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支撑。

关于“消费者”的这套说法还带来一个同样重要的后果，那就是通过具像化为个人形象，它阻止我们去充分思考经济活动的真正使用范围。有很多东西虽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不是一个人去使用或是消费，而是如通常所言，是在社会中使用或是消费的。一种生活方式若不能使我们将社会性使用视为评判经济活动的一个标准，那么它就是一种可怜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却在被推往这个方向，对“消费者”的强调，假定的市场法则，以及作为其源头的生产和分配体系，都构成了推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人们开始广泛认识到，社会供应与个人需要之间如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而且似乎还有可能加剧。看一眼当下英国的商店橱窗，很容易获得一种丰裕感，但要是去看一下学校、医院、公路和图书馆，就常常能发现长期存在着的短缺。即使

在事情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时候——在直接的日常经验中，正如在新汽车的数量暴涨和公路系统的荒唐可笑的匮乏这个最壮观的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那种割裂开来思考的魔力似乎仍然很强大，难以打破。这种类型的危机似乎肯定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主宰我们的经济，因为即使是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开始考虑到个人使用模式的社会后果、更不用说社会目的本身的时候，似乎还是会发现以一种真正的社会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供给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思考个人的使用模式，是从花费和满足这种赞同的角度出发，思考社会的使用模式，却是从剥夺和征税这种反对的角度出发。用于社会目标的资金大半来自个人收入，这似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缺陷。这笔资金是通过收费和征税敛取的，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社会是一个在不断剥夺和限制我们的怪物，——没有这套系统，我们的钱会花得更值得。有谁没听到过现代的街头抗议者这种充满激情的呼声：“你花的都是我的钱，别动我的钱袋！”？指出我们只能依赖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制（我们太容易相信它是理所当然的），否则谁都挣不到钱，甚至于活不上几天，这帮不上大忙。我记得一个矿工在跟我谈到某人时曾这么说：“他就是那种人，一早爬起来就按开关，指望灯就会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都是这种人，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习惯性地遮蔽了我们的现实关系的大片领域，包括我们对别人的真实的依赖。我们就抱着这些天真的想法，只考虑自己的钱，自己的“光”，因为构成我们社会理想的那些部分已经从根本上凋谢了。在现有体制里，我们几乎不能设想可以通过社会生产筹措到实现社会目标所需要的资金，这个办法将以真实的方式不断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又在干些什么勾当。在一个其生产几乎完全依靠错综复杂的、不间断的合作以及社会组织的社会里，我们期待去消费，仿佛我们就是孤立的个人，踽踽独行。于是我们被迫进入对个人消费与社会税收所作的愚蠢的比较——前者是可取的，有待扩大；后者很遗憾是必需的，但要加以限制。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物质上的不平衡。

除非我们能对共同体获得某种现实的感觉，否则我们的生活标准就仍将是扭曲的。事实上，从消费者和市场这个有限的角度来思考经济活动，实际是掩盖了我们中间许多人在做的事情，以及经济生活模式所发生的变化。如今，工作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不是从事生产或是流通，而是从事公共管理或是各种形式的一般性服务。长期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在稳定上升，而且可以肯定还将继续上升。可是这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却不能用消费者和市场这样的描述来解释，反而可能会遭到曲解。每十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多一点的人从事运输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平时关于运输系统特别是铁路的争论，却显得异常艰难和混乱，这时候，寻找比消费更恰当的标准、比直接的市场盈亏更切实可行的计算方法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了。至于行政机关和一般服务部门(从医疗和教育到艺术、体育和娱乐)，那争论就更是混乱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我们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从事这类工作，其产出几乎完全是在生活和体验方面，而不是实物。对那些能够估量某种生活及某种体验之价值的人来说，在这里怎么计算才算恰当呢？这类工作的部分进程可以简化为人们更熟悉的一些表述：医疗节省了工作时日，教育培养了工作技能，体育带来了健康，娱乐则让人精神振奋。但我们都知这些服务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医生也会竭尽全力拯救一个已经过了工作年龄的病人，每所学校教给学生的都远不只是直接的工作技能，等等。把一种基于市场的计算法强加于人，这不仅愚蠢，而且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做法多半会落此下场：不仅费时长、曲折多，而且几乎看不到有任何值得为之付出的价值。最开明的平常反应是把这些活动纳入一个可称之为“生活”或“休闲”的边缘地带，其规模大小则由“常规”经济活动的形态所决定。另一方面，我们若是不从市场而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那么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这部分工作活动，而且也就有了一种赖以评判“常规”经济活动本身的工具。这样，不仅是人力和资源的分配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而且连某些种类工作会对使用者和生产者产生哪些影响的问题，都有可能获得恰当的磋

326

商。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把人硬塞进体制而不是让体制来适应人，这种危险已经被广泛认识到，虽说还不那么清楚。认识上的模糊不清表现在人们错认了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比如说，批判工业化生产，而事实上若是没有它我们会挨饿；批判大规模的组织，而事实上传播的扩展正是构成我们很多发展的实质；最后，批判各种社会压迫，而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意识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对我来说，在评述这些迹象的同时，我敢肯定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它是组织工业生产过程的一种特殊的、暂时的体系——造成了我们思想的混乱。资本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只能是市场，因为其目的是从特定的活动中获利，对社会使用则缺乏全面的构想，它把所有权集中在共同体的某些阶层手中，使得高于市场决策的公共决策大多数都受到了限制，或是根本就无法形成。很多工业方面的工作如今都被组织起来了，它们不是单调乏味，就是令人沮丧，而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度必然会趋向于将工作的意义缩减到只剩下工资。有意思的是，我们社会最主要的骚动正是出现在工资这个领域里，这种持续不断的斗争破坏了安居乐业、团结一致的国家形象。每当发生重大的罢工，或是面临罢工的威胁，我们的反应都是倾向于定义一种不同的工作观，它强调的是为社会共同体服务，为他人负责，齐心协力。这种反应是非常正确的，工作就应该包含有这些意义。在按下开关打开电灯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常常不能从内心深处承认那些使电灯亮起来的人们也有着各种需要。如果我们想要结束罢工，我们就要把这种反应贯彻到底，因为这种劳动协议制度必须包括这项内容，即卖方有权拒绝以买方的出价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在其他买卖协议中一样，这是最后一招。罢工是市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若想有所得，当然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甚至会到紊乱失序的地步。当我们仍在谈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全然不顾长期存在的抗议，还是一意孤行），对与之相应的行为应该有所预料，而不是在局面变得棘手的时候，才试图把关于共同利益及责任的一套全然不同的观念偷

偷地夹带进来。劳动制度建立在我们所谴责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在道德上谴责罢工者，是肤浅而且愚蠢的。

当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跟我们说它在变化，但显然同样真实的是，它所宣扬的那些思想和行为模式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地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使用已经被简化为消费，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销售”伦理——销售就靠它来运转——遍布一切的扩展，依据这一伦理，卖一件东西，就是在验证其有用性；另一个我认为就是劳工运动在道德上的明显衰退。劳工运动的某些部分，在政治上和产业上都几乎完全走到了他们表面上仍在反对的那些思想方式一边。社会主义曾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但它几乎完全失去了当代的意义，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工党不过是另一个权力集团，工会运动就是一伙人在做投机买卖，其手法与他们所反对的雇主们没什么两样。任何一种这样的新想法都有着很大的危害性，因为一个社会若是没有其他的现实模式可供备选，那它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发展。我记得自己曾在《文化与社会》中说过，劳工运动的机构——工会、合作社以及工党——是工人阶级所取得的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成就，也是全盘组织未来良好社会的正确基础，这番话曾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然而现在我却指出了劳工运动的道德衰退，这是否意味着我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我的主张依赖于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新的社会模式。我承认，建立这些机构的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必须被看作是利弊参半的。局部的自保以及局部的自身利益毫无疑问都会起作用。但也要看到人们在不断地提供和发现那些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集体性的民主制度为基础，用合作代替竞争作为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社会就能被更合理地组织起来。然而在实际的历史中，却始终存在着一股稳定的压力——它来自于现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要把这些机构转变成不再发起这种挑战的目标或模式。合作社就应该只是买卖交易的组织，工会就是不掺杂其他利益在内的工业组织，每个工会都各守其界，而工党则

328

329

只是现有体系内可供选择的一种统治形式——国家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对立面。倘若不是这些目标早已成为这些机构原动力的一部分(在这些机构的模式中,有些因素得到了助长,有些则在不断的对抗中被削弱了),这种压力也就不会这般得逞了。当然,每次接受要对目标加以限制的提议,都有可能在实际效率上获得重大的短期收益,而这些机构里面的人在接受这种限制后,往往会变得更加短视。然而,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时刻已经来临,这时候所有这些机构都发现,如果同意对自身的目标加以限制,那么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们就只能接受一种根本上是依附性的地位:广泛的挑战已经流失,剩下的东西只能被一些现有的条规所吞并。出于许多原因,这些机构已经大伤元气,但幸运的是,这也引发了它们内部的危机和辩论。目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有条件地接受一个依附性的角色,要么是重新发起一种表面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挑战。前者会带来实际的利益,而后者的缺失却会造成精神激励的彻底丧失,我们必须权衡其间的利弊得失。在看清这些机构目前所存在的种种局限的同时,我又始终指望它们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的其他选择模式,这似乎有点奇怪,但我只能重申,它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来走,但那样的话,它们的危机就还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330 凭借这些机构所施加的压力,以及现有模式内部萌发的改革因素,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变化,这使得形势变得很复杂。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的扩大,无疑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不该被那些只知死守祖宗基业的人低估。但同样真实的是,社会服务部门不仅被限制在了私有制社会的空隙地带,而且在其实际运作中仍然要受到一些假设和规章的制约,这些假设和规章不属于新的社会,而是属于旧的社会(布莱恩·阿贝尔-史密斯在《信念》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①)。另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即某些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国有化,是更内在的妥协

^① 布莱恩·阿贝尔-史密斯(Brian Abel-Smith, 1926—1996),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政策分析家。《信念》(Conviction)是诺曼·麦肯齐(Norman Mackenzie)编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1958),作者包括雷蒙德·威廉斯、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等多人。——译者注

的结果。正是在这个领域，那个古老而宝贵的原则，即为实用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已经战斗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被收归国有的实际上都是一些从赢利的角度看已不再诱人的旧系统(煤矿、铁路)，或是需要大量初期投资的新系统(航空)，以及以前建成的市政或公用系统(煤气、电力)。在这些系统中，有些经营得很成功，超出了通常允许的程度，但下述两点也是事实：首先，这些系统不仅没能改变“利润优先于实用”这一原则在一般经济活动中的强势地位，反而是不断地回退到了这一旧准则；其次，它们在管理和工作关系方面，复制了(有时精确到可怕的程度)有些工业部门的用人模式，而那些部门却是建立在大不相同的社会原则基础上的。此类财产的倍增的确不受欢迎，而把这些机构轻易地等同于所设想的新社会的机构类型，更是加剧了普遍的思想混乱。这些收归国有的系统在被拽回到旧体制轨道的同时，又被当作了新体制的见证，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在经济方面可供选择的其他原则，以至于英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全都被耗尽了。有人提议工党应该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全盘承诺，接受这种空洞的形式，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务实地承认现有的形势，等到将来，人们也许会想起，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抑制并最终消灭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的一切实际挑战。

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方式的主要收获，人们很容易被它们制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可以标榜自己成功地扩大了消费，扩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信用系统，用它的话来说，这一扩张创造了一种繁荣。由于人们头脑中只有消费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参照点，所以要挑战这种观念并不容易。此外，资本主义也采纳了限制所有权的观点，试图通过推行更广泛的股权共享来扩大所有权。这一回应很有代表性，这样就能避开批判的要点，从被批判的系统的角度出发来提议改革。所谓反对，只不过是要求部分地限制个人所有权(它无论如何都得保留)，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拒绝社会所有权。股权共享扩大到了每十五个成年人中有一人可以分享股权的程度，这使得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把这笔钱看作是那个满足我们一般需要的系统的副产品(事实上这笔钱是另外十四个

人工作挣来的)，然而这并不能保证这些需要是一般的，也不能保证能量和资源的分配能实现通常意义上的公正。为了对这种分配实行有限度的控制，最新的做法是开源挖渠，将公款引入到私有系统当中，但这不过是再次证明了想从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的愿望到头来却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变成它用以巩固自身的工具。最后，资本主义（以及它的那些持前社会主义论的辩护士们）还强调股东们的控制力度减弱了（这当然是对扩大股权共享的一个具有讽刺性的评论，这哪是什么新的所有权形式，根本只是股票投机生意的扩张而已），管理者和技术专家的重要性则上升了。事实上，控制经济的既不是普通股东，也不是管理者和技术专家，而是那些势力强大、互相勾结的私有机构，它们实际上把持着某些工党政客至今仍然艳羡不已的“经济制高点”。即使发生了管理革命（真正的革命是权力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自筹资金的公司转移），原来的挑战也仍然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共同经济生活的方向可能已被简化为一系列技术决定，充其量只能为经济所能支持的社会类型提供一种市场参考。在这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领域里，最关键的是有组织的市场和消费者这些概念，它们决定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与之相伴随的是，我们社会的其余领域有很大一部分，以及针对它们而发起的挑战，都被有效地搅乱了，以至于有原则的对手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以及要求提高工资和罢工之类的悲苦斗争。很难相信我们还会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它不断地使我们彼此敌对，并且迅速地推广了经济犬儒主义的粗鄙模式，而对这种经济犬儒主义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看得清、行得通的其他道路。要真正实现看似显而易见的未来，就必须迎接挑战，去创造新的意义，并用事实去证明它们。

2

英国的民主发展虽深受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

素。控制经济生活大方向的迫切愿望是促进民主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我们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很遥远。在这个愿望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渴望，但在目前，同样很遥远而且纠结。在我们生活中，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不能参与对我们有着直接影响的决策，那就很难让我们觉得真正实现了自治。在保证参与权方面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程序上的困难，由于我们供职的机构纷繁多样，所以不可能有单一的答案。但若是有了动力，就能找到一些办法，而且可以依据经验来不断改善。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困难也能帮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鉴于这种经验，我知道有些困难同时也是一笔真正的财富。单从实际经验来说，我赞同柏克的说法：

我从未见过有什么计划不曾被一些人的意见所修改，尽管那些人在智力上远不如事业上的领导人。

即使是最小的人群也会产生领导人，尽管不会总是由相同的领导人来负责所有计划。困难在于如何解释这种领导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模式，尤其是工作模式，提供了一种解释，它不仅安排领导人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还鼓励他们相信，独自作出决定并坚决贯彻执行，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毕竟，一条狗不会因为看守一个人就自以为是头儿了。

我们社会中仍然有许多天生的独裁者，他们造成的麻烦简直不可估量。也许更危险的是那些对军队里所说的“打理人脉”（man-management）很精通的人，他们因为不容易被辨认出来，所以就更危险。根据我的记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领导，你当然要发号施令，但既然一个领导人有手下跟着，那就必须细心注意他们的思想状况：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跟他们谈谈他们的问题（顺便说一下，不是谈他自己的问题），从而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在收集了这些信息并真正摸清了手下人的感受之后，他才能指出前进的方向。

我不知道，在当代英国，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观察如何管理人更有趣了，因为干这种活的人实在是到处可见。尽管他们总是自以为干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却是一塌糊涂。冷眼打量（眼睛眯成一条缝，再睁大些，看上去就可疑了），和蔼的沉默，引人入胜的选拔程序……尽管这套把戏我看得实在是太多了，但还是发现它们比大多数戏剧都精彩。这些人就是我们公共生活中的英雄，为众人仰重。在被误认为是政治评论的言论中，如今有很大一块是在公开讨论政党领袖的这种领导技巧：首相或反对党领袖将如何“处理”这件事或那些“破坏分子”；他将如何选择干预的时机；如果他说这，又怎么才能避开说那？这类评论真正滑稽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公开的，被成千上万地印刷、分发，包括“破坏分子”在内的几乎每个人都读到了。精妙的领导艺术已经成为公开的神话，针对它的挑战极为罕见。这显然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民主的领导。

334 当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善于狡辩的独裁者所采用的策略（人不必生而为独裁者才能获此习性）。民主决策的真正过程是，在所有事实都能获得的情况下，公开地讨论问题并达成决议，或是通过简单多数的投票，或是通过一系列自愿的改变，来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的确特别需要拥有善于倾听和阐明问题的技巧，但这与那种领导人的姿态有着根本的不同，领导人只听那种为他找到为所欲为的借口的讨论。为了保证能够完整地记录下事实，保证全民捐款的自由，保证决策能真正做到公开并且有机会对执行决策的方式展开批评，各种民主组织发展出了很多复杂的手段，它们确实非常宝贵（当我提到委员会这种程序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时，有些人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但倘若他们对民主抱有严肃的态度，那么可笑的恰恰是他们，因为这些都是民主得以运行的手段）。而正因为这些手段很复杂，所以很容易被那些长袖善舞的人所滥用，我们甚至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吹嘘，说这个或那个委员会是怎么被“操纵”的。我只能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种操纵除了引起纠纷外，还能带来些什么，尽管据说它是被当作“避免纠纷”的一种办法来实行

的。这是因为人们一旦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就终究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如果这些利益不能被真正地包含在决策中（不是那种集体的、将大家的利益“牢记在心”的决策），那么现状就会维持不变，而且常常会带来令人痛苦的后果，暴露出那些擅长搞关系的人实际上会坏到什么地步。现在最麻烦的是，我们虽然有很多民主形式，但它们却不断地遭到扰乱，被某些人的诡计弄得一团糟，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民主，而是从心底里害怕公开达成的共同决策，不幸的是，他们削弱民主（只有它才能支撑起各种机构）感觉模式的企图部分地得逞了。

要彻底理解这种状况，我们还必须在当前讨论的音调上增加一个音符。凡是上过大学的人，大都知道一些将讨论变成公开的过程的常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养成试探性陈述的习惯，这种陈述以一些特有的措辞开头，比如“我本来以为”或“我不知道但似乎觉得”。这种陈述有时候会显得很肤浅，就像是牛津大学讲师的开场白，他们通常一上来会说自己对所讲题目实际上一无所知，而且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讲稿丢在一边（我曾经目睹过三位讲师轮番在台上面对着底下来自国外的研究生这么讲，但那些听众却不仅没有着迷，反倒认为那几位讲师并不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般出色。——这一判断未必“完全不准确”吧，那种谦逊的姿态，实际上却显得有点无礼）。这些缺陷很明显，但在其他地方，对于某些类型的讨论来说，那些规则仍然有其优势。只要把它拿来跟那些挣工资的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工会官员往往不包括在内，他们有时候会使用非常曲折繁复的表述方式，其熟练程度甚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常用的辩论方式做比较，就能很容易地看到这些优势。首先，在用“我本来以为”这一串话开场之后，声明和主张的棱角就会被磨掉一些。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讨论中，观点会很容易和发言人的个人声望纠缠在一起，针对观点的抨击很难和人身攻击截然分开，而对观点的修正也往往会被看成是一种屈服。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辩论，这些辩论让我感到绝望，它们最后总是很容易被弄到延期再议，人们在院子里吵个没完，表现身体性侵犯和挑衅的所有信号都比问

题本身更明朗——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明天还必须继续进行讨论。进行试探性陈述的规则，其价值就在于意见可以合乎理性地与发言人的个人声望分开，若要达成共同的意见，这是最终必须采用的方式。总的来说，劳工运动的坦率直言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迫使问题公开化，摆脱那些擅长搞关系的人以及隐藏着的独裁者的控制。但是，那种好斗的不容反驳的辩论习惯（在很多时候人格化为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咆哮的老人）也会严重地破坏民主的运行，这种辩论习惯显然应该被看作是前民主的：这样的语言表达是不平等的，是在为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而呼喊，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变成了一系列的个人表演，共同的改良也就无法实现了。

总的来说，我们在实行民主方面显然还没有经历足够多的实践，即使是在那些存在着民主形式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被指望成为领导人，在学校里或是在其他地方，灌输给我们的主要是纪律和忠诚等价值，而这些价值只有在相关决策中为我们所共享的情况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被寄予希望成为领导人的那些人，主要是按照我谈到的那些领导模式来训练的，其核心是全面提高信心，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提到、也很少有人教导这个道理，即一个领导人应该拥有充分的自信，经得起激烈的质疑。共同作出决策并加以贯彻执行，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反复进行实践，然而这方面的实践却基本上被随意地放弃了，其结果也可以想见，常常是忽好忽坏。这样一来，能够实现民主的信心也就必然会遭到削弱，我们宁愿哀叹“普遍的无纪律”状况（工会领导人不能约束其成员，政党领袖不够强硬；全都是草率马虎的讨论，没完没了的商谈，而人们的行为也不够理智），也不愿去养育和深化那个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必须依托的过程。

与此相对立的看法，是想依靠政府——民主制度在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历史强化了这一看法——但政府本身却严厉地限制着活跃的民主。组织严密的政党体系和议会似乎已经把全民选举转变成了内阁选举。作为个人，我们每隔几年要就一系列的方针和某些特定决策进行全国性

的投票，而对于这些方针和决策，实际上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态度。通过这个必定是粗疏的程序，产生了内阁班子（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是选举出来的），^[2]但对我们来说，恐怕谁都很难觉得自己是直接参与了自身事务的管理，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直接参与。通过政党组织的途径来做这些事情，要更可行些，其优势在于至少有不同的内阁班子可供选择，但实际情况却通常是：不仅在两大政党内部很难实行党内民主，而且两党领导人都日益声称拥有不受束缚、不作保证的权利。由于内阁班子终究要重新进行选举，所以公众意见的普遍影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当代政治的发展速度和范围，这个周期就显得有点长了。在 1955 年和 1959 年的选举之间，四年半的时间里爆发了几次完全未能预见的重大危机，公众意见实际上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然而面对这种局面，内阁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地恪守其前提：政府的职责就是治理，因为女王的统治必须得到延续。说这种论调听上去一点都不民主，大概是公平的，但对这些领导人我们也必须公平一点，承认他们至少是做到了一以贯之，他们显然认定直接的民众统治不是民主应有之义。任何一届政府都必须有相当一段时间来制定其方针政策，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和目前流行的“强政府”论调根本不是同一回事，那种论调不加批判地迷信“强政府”的重要意义，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就应该是强大的，但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可能是一个坏政府（很多人会赞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府，而我认为在那之后我们还有过一届或是两届这样的政府），这种既强且坏政府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公害。每隔两年重新进行选举，至少是对下议院的大部分进行重选，这对于维护民主的健康至关重要，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觉得是直接参与了民主过程，既然如此，这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近期目标呢？我看没有理由要拒绝。这一改变若是能伴随着目前在国会提交讨论的劳工改革，并推进政党内部的民主化进程，那么就能取得实实在在、合情合理的收获。另外一个办法是不仅要迅速扩大人事管理的范围（由于现代传播工具的普遍使用，这种扩张被放大到了令人震

338 惊的地步)，还要发展一些不讨人喜欢的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将阵地推进到内阁的接待室。另外一个必要的修改大概是要把各种周期性选举的日期固定下来，因为从心理上来说，把选择日期的权利拱手让给内阁是极为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受到各种限制，等待内阁来征求我们的同意，选举的权利不是他们的，而是属于我们的。〔3〕

这些改变本身只能带来有限的不同，但至少它们是朝着改变英国目前的民主氛围的方向前进了一步，目前的民主似乎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与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弱，人们相信可以周期性地选择领导人，诸如此类的信念也为民主增添了动力。下一个需要进行改革的领域显然是选举制度，当初设计这种制度，似乎就是为了使现存的种种解释永存不变。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夸大（有时候是严重夸大）意见之间的些微不同。战后的选举历史让人觉得，从很强势的工党政府到同样很强势的保守党政府，意见的起伏变动极为剧烈。但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意见变化实际上要小得多。对我来说，目前的政治评论最触目的一点，是它总是优先关注内阁这一级的政绩，而不是现实中人们记录在册的意见，不管喜欢生活在接待室里的人们会觉得这么做有多么自然，但它在精神上却与民主极不相符。认为保守党在1959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在那次选举中，把票投给保守党的人实际上不到参加选举人数的一半，在有选举资格的成年人中，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支持那个强势的政府，但结果却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人都要把自己托付给那个政府。之前工党的“压倒性”胜利当然也是如此，这样来描述让人觉得我们对实际的民众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种诚实的民主，那么我相信就必须把共同决策的程序不加歪曲地引入到政府的正规程序当中，虽然这种程序目前只在某些不定期选举中得到了不成熟的使用。政客们背着墨守成规的思想包袱，完全无视这一趋势，而这种墨守成规的思想，若是追溯其源头，同样可以看作是防御性的独裁统治的策略智慧，由于缺乏挑战或是挑战不力，它得以在一个自称是全然不同的社会里延续下来。

339

只要我们全面审视这个领域，便很难赞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告完成这种常见的观点。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民主在我们生活中更广大的其他领域里的缺席便显得尤为紧要了。这种状况能够维持不变，不仅是因为在国家的层面上民主被限制在内阁选举这一程序上，也因为我们其他的社会组织始终不能提供民主的决策模式。而机构却可以积极地将一些特殊的感受方式传授给人们，这就是它们的真实力量所在，然而立刻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教导民主的机构还远远不够。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尽管在“共同协商”方面做过一些有限的试验，但平常的决策过程仍然被限制在一个极其僵化而且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内部，我们大多数人都无从参与决策，所以对于那些冠冕堂皇的请愿或是反抗，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反应只能是漠然置之。如果我们根据一些迹象，把大量发生的罢工看作这种意义上的反抗，那么就更能看清我们已抵达的这个发展阶段。防御性的策略（还是人员管理）如今更加堂而皇之地被重新命名为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这算是从简单的独裁往前进了一步，但作为对工作中人际关系问题的一个回应，它只是再次暴露了还在起作用的民主推力有多么微弱。工业民主和所有权的问题是深刻相关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反对政治选举权的人总是认为新选民——即“群众”（masses）——与国家没有利害关系。于是，新的所有权形式的发展似乎就成了任何民主进步的一个必要部分，但实际上政治选举权最终还是先此一步推行开来。340

公有制的设想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但也有人认为用仍然具有极大专制性的国家垄断来取代一系列的私有垄断（在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的前提下，它也能带来一点好处）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很显然，在复杂的大规模经济中，需要作出许多中央指令，而它们的机构往往会很容易流于官僚主义，并避开公众的控制。在这个层面上，分散的民主化的工业管理肯定是无法实行的。真正的前进路线是把这些机构交给民选政府，由其直接负责，可能还需要通过各种中间

性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能够将工业或服务部门的代表与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结合在一起。有了这个框架，就比如在教育管理上所部分实行的那样，就可以尝试发展出直接参与的方式，介入某些企业的局部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困难重重，而且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一个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政府会启动一系列不同的试验方案，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推行，这些试验既包括一些常规性的手段，如改革公司法，促进实际的和契约性的会员制，以便企业成员拥有一定的投资额度和权利，也包括那些在已归公有的企业中可以采用的方法，在这种企业中，通过选举组成的委员会——它要么是从所有在册人员中选出，要么是按照议定的比例代表各自的利益——将拥有在公认的国家框架内作出决策的权力。这种试验通常会遭到反对，理由是现代工作是高度技术化的，不能受制于民主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领域里——尤其显著的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里——让成员参与自我管理的程序虽不免很复杂，但和那些虽然声称有“服务”标准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公认的工作领域相比，却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这并不是因为教育和医疗的技术要求低或是专业化程度低，而是因为它们的阶级结构不那么明显，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必须要有这么一条原则：所有工人——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实际工作都应该得到一些必要的条款的保障，包括安全和自由在内，这些保障方式与那些关乎企业发展大方向的一般决策，是能够完美匹配的。由股东们选出来的董事会现在暴露出来的倾向是：它们通常很少能够保障所有工人的安全和自由，因为这些人是不被代表的。在公有的工业企业和服务部门中，以及在经过改革的公司中，要在议定的国家框架内实行这一原则——即由工业企业或服务部门的成员选举组成委员会——想必不那么困难。当然，要建立并完善这一体系，仍将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而且也必定会出现许多严重的且多半是未曾预见的问题。争取民主的全部理由都植根于此：就其实质而言，这些问题无论如何都会存在，让大家参与决策过程能引出更合理、更可靠的解决方案，而那些老办法却只能让人在漠然、妥协和反

抗之间摇摆不定。

还有一个领域也尤其迫切地需要发展民主，那就是关于我们共同体发展的常规性的决策过程。这方面虽然已经获得进展，但仍然是一塌糊涂，令人遗憾的是，较之于内阁政府，人们对地方政府更为不满，随之而来的漠不关心也更为严重：我们的地方议会似乎广泛地复制了中央的专制模式，虽然地方议会有更多的程序是公开的且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关，但遗憾的是，它们平常的所作所为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民主会如何轻易地遭到歪曲。很多人都明白这里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支持反对歪曲民主的积极斗争。而更严重的是，在这场斗争背后，隐藏的是各种陈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的惰性。住房问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把住房和地产列为公共供应品，这在原则上显然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住房供应也不再只是为了救助特需人群。但为什么住房供应扩大了，或者说是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要挨冻呢？答案之一当然是这些住房和地产一般都是由据称是民主的当局来管理的。我曾经拜读过地方住房委员会的官员写给承租人的函件，那几乎让我怒发冲冠，在许多此类房产的管理上所暴露出来的专横和吝啬，真可谓臭名昭著。即便是在工党执政的时期，也没什么两样，这就很难让人觉得民主的精神真的已经广为接受、深入人心了。为什么一个平时和善可亲的政府官员常常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吏，从而给社会供应品的整体发展造成极大的阻挠呢？我猜想，部分原因在于他看到了太多的比他更高的小吏。而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我想是因为领导和的方式及作派仍然停留在前民主的阶段。商人在和顾客打交道的时候，学会了和颜悦色；所以，政府官员平常也应该做到这个程度。但有些官员却把租住公屋的那类人看作是天生贱人，说话行文都带有歧视的意味。纠正的办法当然不是去教导他们如何实行人性化管理，而是要努力在这些公共供应品领域发展出民主的形式。为什么不能将居住区的管理权交给一个由选举出来的官方代表和租民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呢？虽然财政总政策显然是由整个共同

342

体来决定的，但在房屋使用和维修的方式、住房设施配备、制定必要的章程等方面，还是有着宽广的决策余地，通过这些渠道，就可以更友善地通过协商作出决策，而且我认为这样也会更有效率。如果已在进行这种试验，那么我们应该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并可以考虑加以推广。如果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试验，那么这就是一个现成的领域，可以在此检验民主参与的运作状况。工党议员们尤其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持续的思考，因为如果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总是采取消极防御的姿态（就像我们所见的普通的承租人联合会那样），那么就会给民众运动带来极大的危险，而对工党来说，如果它听任民主萎缩为一系列防御性的协会和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行政部门的小机构，那么损失最大的正是工党自己。在以前，压力是落在了把民主定义为“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等方面，其感觉模式实际上就是在现存政权内部享有“国民的自由权利”那一种。而现在，在我们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压力应该朝向一种参与性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实践中，人们可以学习到更密切地参与自我管理过程的各种方式和手段，并将它们推广开来。

3

关于我们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任何一种描述，都隐藏着关于“阶级”的种种思考，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些思考似乎格外地含糊和混乱。这时候，最迫切的是我们必须从习以为常的各种意义回到自身经验上来。在《文化与社会》中，我曾经指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术语，是在工业革命取得成效的初期进入到日常英语中的。^[4]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形塑下，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含混不明的标记，同时指向了带有重要转变时期的特征的社会事实和经济事实。不幸的是，这种含混不明至今还留存着，我们还是拿不准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社会阶级身份，是我们的出身还是我们成

年后的工作？“工人阶级”传统上被用来描述雇佣劳动者这一庞大群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关联。在很多经济学理论中，这个阶级很自然地与有产阶级形成了鲜明对照，有产阶级拥有土地或是其他生产工具，并且雇佣拿工资的劳工。因此，工人阶级一方面可以和拥有土地的贵族相对比，另一方面更经常用来和资产阶级相对比。可是，既然资本家通常都不是贵族，那么在社会中谁是资本家呢？那些独立的小雇主、店主、小农和专业人士又属于哪个社会阶级呢？从这两个问题引出了一个答案：“居中的阶级”，后来被固定为“中产阶级”。但是从大雇主到小店主，从成功的专业人士到当地的自主工匠，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最后，中产阶级也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两部分，其中上层那部分变得愈加富裕，逐渐涉足并混杂到旧贵族阶级或“上流”阶级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之间的流动也相当常见，随着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及许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手工”活的雇佣工作的出现，实际上已很难在“工人”和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挣工资的人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今天我们仍然会碰到这些困难和复杂的情况，那些习惯于从职业或者业余的角度试图给社会分层的人，都会知道这一切有多么错综复杂。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它极少被提到）：给社会分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在社会中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是什么？有些人希望提高分层的准确性，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公式。其他人则大谈要对旧的阶级类别进行修正，以便使它们与“现代经验”相吻合。我自己的立场是：如果我们缜密地想一想哪些是将来要做的事情，那么也许可以摆脱这种分层的缠绕，从这种不必要的麻烦中脱身而出。

344

现在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或是“工人阶级”。但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选项。与“中产”相对的选项是“下等”和“上流”；与“劳工”相对的选项是“自主”或是“有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是一团糨糊，这主要是由术语的混淆引起的：其中一个主要与社会相关，而另一个则主要与经济相关。

当被问到他们是否属于工人阶级时，很多人都说是；而当被问到是否属于下等阶级时，很多人就不那么赞同了。然而“中产”的说法本来就暗示了工人阶级是“下等”的，如果“下等”或隐或现地成为有别于“中产阶级”的另一个类别，那么很多挣工资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也为这样的联想或是暗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就好像他们是不工作的。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愤怒，但如果他们也在其中推波助澜造成了这种混淆——即从经济的角度把挣工资的人说成是“工人阶级”，同时又从社会方面暗示这些人是“下等”阶级——那么只能说他们是咎由自取。我们不仅要问这种分层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还要问这种持续不断的混淆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事实上，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从基于出身的社会分层向基于金钱和实际地位的社会分层转变的阶段。推动社会向后一种类型转变的动力非常强，它不仅嵌入了我们的经济体系，而且不断地受到了经济体系的刺激。然而，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在英国就能发现那些陈旧的思路。“上流”阶级的首要功能就在于维持出身和家族世系的区别，除此之外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粗看上去，在英国，权力似乎与此无关，但英国毕竟仍然有君主，有上议院，以及一套头衔制度，它关乎家族名号和地位的变化。不能说这些制度仅仅是旧社会的遗留，恰恰相反，它们现在还在强有力地蔓延开来，其实际影响仍然相当大。而且由于它们远离了残酷而又激烈的公开的权力斗争，它们的社会声誉甚至反而提高了。可是在一个转变中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君主的大肆宣传（它狡猾地将华丽堂皇与平凡普通混为一体，虽然根本上不相容，却包容了一切有魔力的符号）似乎是有意采用的一步棋，以抗拒彻底的变革。强调女王的臣民们要团结、忠诚、亲如一家，这个愿望不容易与英国实际生活相调和，然而作为一种理想，它尽管有点愚蠢，却能抓住许多真实的欲望，并足以搞乱人们对于真实障碍的意识，从而成为一个顽固的堡垒，使那种有利于维持现状的感觉得以保存下来。

这片迷人的夕照又笼罩在附属的权力体系之上，这些权力体系在许多实际的决策领域里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人凭借着家族的地位而不是通过民主的程序被选出来，在这些权力体系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在上议院占据一席之地，就是在许多官方的或者虽非官方但很有影响的委员会中担任主席（这套程序还古怪地以自愿为公众效力的面目示人，若是那些占据了位置的人被发现有着平易近人的品质，那么其魔力就更大了）。

如果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能够保持独立，或是真的拥有自信，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早在 19 世纪的某个时期（尽管之前就已有迹象），英国中产阶级就已经在社会上失去了勇气，与那个实际上已被它打败的阶级彻底达成了妥协。通过把人引向家族地位的古老系统，它把一个界限明确的阶级体系当作社会理想接受下来，在它之上的顶端是模糊的，而在它之下的部分却是清晰的。把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区分开来，这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折中妥协：在课程方面，在引入不少新课程以培训中产阶级的同时，也保留了很多旧课程，继续培养老派绅士；而在社会性格方面，在大肆强调整个阶级的优越地位的同时，又狡猾地结合了在权威和服务等观念方面的严格训练，以便形成一种可以人为控制但又不会被扰乱的正规体系。在保留这一体系方面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在于，新兴的中产阶级虽然表面上讲和修好，但其力量却在不断壮大。只有极少数的文法学校被重新命名为公立学校，而不管文法学校如何刻意仿效这些学校，保持距离仍然是有必要的，在有些人的耳朵里，“文法学校”听起来就像是“施粥场”。^[5]近年来英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已经获得成功的中产阶级的固定性格（及其谨小慎微的言行方式）与那些后来者或是尚在为成功而奋斗的人之间的矛盾。如果家庭出身真的是一个社会标准，那么格外刺眼的是，最糟糕的势利鬼还是来自于寒微的家庭。然而那也是可以妥协的，因为它包含了对于敬重工作特别是靠工作挣钱这种方式的嘉许（这是贵族们不愿听的）。这样就能在不改变性格的情况下，使这种模式仍然保持着流动性。正如拉尔夫·萨缪

尔(Ralph Samuel)先生^①所指出的，工业巨头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角，而在英国，工业巨头们还给自己赢得了贵族的头衔和身份，用旧条例来表现其声望。由于这些荣誉并不难获得(就其可以被不断地炮制并扩大而言)，所以就能搞出一套制度来，有了它，个人努力的结果和功绩就能从世袭价值的角度来确认。这套制度有着非常细的等级，在公务员系统里被高度形式化了，只要在这架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梯上攀爬到一定的位置，就能变魔术般地转换为某个封建品级：首相与勋爵相当，常务大臣与骑士相当，等等。这种基本的等级体系——在它背后有崛起中的中产阶级在撑腰——要保持其社会意义，就需要有一个“下等”阶级存在。然而，那些被分派了这种下等角色的人又总是转过身来，同样地指斥比自己更低的人。这就是“中产阶级”在英国显得不真实的根本原因，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概念会如此含混不明。我记得在和一群小店主座谈的时候，他们试图向我解释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那帮人”(即店员)：言下之意，似乎是说——用最生动的话说——他们总是会顺手牵羊。当其中一个人把他们这个群体说成是“非常好的商人”并得到普遍赞同的时候，这场讨论在我看来就达到了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群人对中产阶级的成员身份和区别特征有着某种固定的臆想，如果这群人在中产阶级的阶梯上再往上爬一点，就马上会把以前的同侪踩在脚下，看不起他们，就像那些店员被他们踩在脚下遭到鄙视一样(他们可能会用“小姐”来称呼女侍者，这是18世纪的绅士们对年轻未婚女性的正式称呼，但现在显然是带有“低下”的意思在内)。既然一个群体可以找到另一个群体来转移目标，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些矛盾似乎也就不被注意了。在英国，所有阶级的区分都是向下的，笼罩在来自顶峰的迷人夕照中。这一切在将来是否会彻底破灭，似乎还难以预

^① 此处疑为拉菲夫·萨缪尔(Raphael Samuel, 1934—1996)，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称赞他是“其所在时代的最杰出、最有原创性的知识分子”。萨缪尔的主要著作有《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1981)等多种。——译者注

测，因为前面提到的社会描述和经济描述之间的混淆，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已经嵌入到这一体系之中。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的动力——它可能也创造了靠自我奋斗来获取声望的不同的理想范式——被巧妙地引入旧的体系，结果是造成了混淆，我们迄今都还为此付出代价。在这方面，我属于在战后被不断谈到的所谓“新兵蛋子”（awkward squad）。很多人跟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对阶级问题感兴趣，就因为我们沮丧地发现教育流动跟社会流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管我们走得有多远，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一套旧体系压在头上。这极其真实地揭示了出身远低于中产阶级但又接受了其思想的那群人的阶级感受。若是从自己所在阶级的角度来思考，很多中产阶级群体感到困扰的正是不同的流动状况所代表的那种意义。就我而言，我只能说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有过那种“社会等级上升”意义上的流动，当然我也从来不曾觉得为自己想要不断往上爬，所以就要憎恨那些挡我路的旧障碍：除了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还能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是，从一个工薪家庭出身进到一所古老的大学里，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人迅速穿越了上述的社会等级，这种社会等级及其造成的种种混乱似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残存着，因为就目前而言，要想顺着它的阶梯往上爬通常会受到很大限制，那些界限都还被小心翼翼地保留着。所以，英国阶级体系的愚蠢与其不公正相比，倒是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谁都喜欢得到别人的尊敬，但这种自然的愿望如今却主要是通过这么一种体系来实现的，它从轻视别人的角度来定义尊敬，而反过来也免不了要遭到别人的轻视。在我自己的穿越过程中，这种现象是见得太多了，一山更比一山高，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头。大概是我这个人的确有点古怪，我由此感到的是一种苦楚，充塞内心的是一股怜悯之情。如果有更多的人有这种体验，那自然更好，这样我们甚至可能会重获勇气。然而我们的分析还不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来看一看这种体系在我们这种社会的实际运行中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前所述，这部分地是为了获得尊敬，尽管区分不同等级的尊敬常

常会弄巧成拙。我们只要在国内走一圈，就能发现尊敬显然也是因人而异的，这足以引诱一些人接受这种等级差别，前提是只要他们能够提高自己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谁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现实的等级差别，那他只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他原本不属于的社会等级的位置上，改变平常交往所采用的一些表意方式，就能很快感受到差异所在。那种认为阶级区别已经消失的中产阶级人士，若能让他抽出一天时间，穿着平时穿的衣服，开着自己的汽车，带着自己的口音，前往那些他不熟悉但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正式接待的地方，他就很快会明白现实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可以让他穿上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服，却带着他的“标准”口音，来到一家商店、一间办公室或一家酒吧，去看看彼此抵触的表意方式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这种复杂的等级差别就存在于日常经验中，但我们必须跨越边界才能充分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对自己应得的尊敬——其等级由我们自身的市场价值所决定——早已熟焉不察。这种等级差别明摆着是伪善的，它有没有什么心腹大患呢？就个人而言，当然是没有，但如果能够形成这么一个共同体——在其中人们不可能彼此隔绝，他们不是作为真实的个人而得到评价，就是能得到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尊敬——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有很多迹象表明，金钱引人注目地占有了一系列能显示声望的对象物，它以这种方式在迅速地驱逐其他的阶级区分形式，正是这种变化使有些人认为阶级区分正在消亡。这是犯了头脑简单的错误，把不同的含义混在了一起，因为造成阶级体系的是那种因人而异的现实，而不是那些它借以运作的特定形式。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能挣多少钱（它使等级差别的体系得以运行）本身就受制于一种异常复杂的内嵌的等级差别体系。由于技术熟练和格外尽责而得到不同对待，这也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倘若以为这就是等级差别通常赖以运作的唯一根据，那么关于报酬问题的所有争论就会被搅得乱七八糟。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等级差别根本上是由劳动者所在的工业部门或服务部门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所强加的。教师和火车司

机所在的服务部门挣钱比较少，而广告文员和汽车装配工人所在的部门赚钱却比较容易，但他们在整个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却完全不同。如果人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日益变成直接用金钱来衡量，那说明这种状况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扭曲了。接下来一个根本的等级差别与阶级联系得更为紧密。我们大多数人都靠出卖劳动为生，但在有些情况下，报酬被称为薪水，而在别的情况下又被称为工资。实际上这不只是一种语词上的差异：我们从某一类人那里听到工资方面的种种要求，又从另一类人那里听到关于薪资评估的种种要求。公愤——这是报纸上常用的说法——总是固定地与“工资要求”联系在一起，而对领薪阶层更大幅度的薪水“调整”却从来都不置一词。当某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鼓动着要提高工资的时候，人们极少拿他们来跟所有拿工资和薪水的人作比较，而常常拿他们跟并不更富裕的其他工人作比较。在一些少数派的报纸上，人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关于工资增长水平的公开讨论，认为在某一特定年份里可以限制工资水平。而在同一年里，也会谈到与薪水相关的很不相同而且是大得多的增长率，但几乎不会采用相同的参照标准。除了称之为一种有效运作的阶级体系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说法来概括。

很多低薪工人实际上只得到了与挣工资的人相同的待遇，这样一来，在社会等级的这个点上就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但在某个层面上两者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不仅直接体现在金钱上，而且还体现在一些关键因素上，比如自动加薪的额度，福利协议——它赋予了众多重要权益，如带薪休病假、免遭开除等，还包括了从杯子到地毯的各种用品的发放。在这个系统内部几乎可以无限地划分等级，但阶级界线通常是非常清晰的，在这一界线下，所有这些好处就都享受不到了。

然而，若是把这种分析限制在对领薪水的人和挣工资的人进行比较上，那么这同样也带有误导性。许多领薪水的人认为他们跟其他经济部门的领薪职工或雇员相比，在诸如支出税款减免等方面，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所有这些群体中间，都存在着满腔怨愤，从而导致一

个愤世嫉俗的共同体得以延续数代之久。我支持有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会碰到巨大的困难，但仍然必须付出努力去确立一种关于公平的一般原则，而关于报酬的具体争论也可以与此相关联。目前到处弥漫的怨愤情绪，以及压制消除这种情绪的粗暴方式，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健康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

与此同时，为了给炫耀性支出的体系提供资金，还建立了一种特别的信贷网络，只需思考一下，便可发现这种信贷网络很能揭示我们真实的阶级状况及其变化方式。挣工资的人和领薪水的人在这方面的境况是相似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快陷入了一个高利贷系统，这种系统在不断扩张直至无往弗届的地步。有多少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真的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或是家具和汽车？他们大多数人跟传统的工人阶级一样，根本就是一无所有，如今他们也日益陷入了同样的高利贷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古老的盘剥方式，是有产者利用无产者的需要而实行的盘剥，普通中产阶级认为正是财产和自立使他们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这种说法正在日益沦为可怜的幻想。维系这种幻想的一个因素是，为普通购买者提供资金来源的那个资本有很多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口袋，这就使得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合理的社会资本积累过程。通常不被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也造就了一群人，他们靠着钻空子，利用其邻居们的社会公共需要而大发其财。领薪水的人通常会因为前面所说的他与挣工资的人之间的差别，而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却看不到这个高踞其上的真实存在的阶级，而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遭受这个阶级的剥削。他只从公开的差别这个有限的角度来看阶级区分，也就默认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而且他通常还认同于比自己更高的阶级（这是苦苦拼搏的中产阶级一直深陷其中的一个圈套），仿佛这就是他所认同的体系，也是其骄傲所在，然而这实际上却暴露了他的真实状况，即他不过是无产者阶层的一员。

随着我们进入到这个特征明确的当代世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所谓的无阶级状态：关于这一所谓新现象的臆想，根本就是一种意识上的

失败。公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是在公开的差别以及复杂的游戏这一层面上展开的，但即使这些差别最终消除了，在表面上变得更公正了，也仍然不会有真正的无阶级状态存在；除非社会资本能够为全社会所有，否则就不可能有无阶级状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必须始终坚持思考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一直都很难划清，现在因为某种共同的参与而在许多点上变得更模糊了，还保留着的一些区别不仅被掩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有意掩盖了。工人阶级是不是随着其状况的改善而在变成中产阶级呢？中产阶级大半以出卖劳动为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着无产者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中产阶级已经沦落为工人阶级，也是合乎情理的。一种真实的描述不仅应该看到传统的定义已经被打破，而且还必须认识到随之而来的混乱也会严重削弱（阶级）意识。新的工作类型，新的资本形式，以及新的所有制，需要有与其相关的新方法来描述各种人。真实的状况是，我们还没学会如何去控制那些复杂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而它们又都和我们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只是奴仆，接受了上流、中产、下等的常见等级划分，不管我们是坚决捍卫这些等级标记，还是对其憎恨不已，其实都和大多数奴仆一样，将整个这套制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始终都只是在其限定的范围内争吵不已。

353

这种状况清晰地反映在当代政治中。保守党基本上仍是有产阶层和控制集团的政党，它以一种陈腐而又自然的方式膜拜那迷人的夕照，在夕照中，这些（控制）程序就变得模糊莫辨了。但那些仍然急着称自己为“中产阶级”的人，大多数也会认为保守党就是自己的党，他们念兹在兹的从来就是：向上，认同于更高的阶级；向下，保住现有的位置，所幸的是，后者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精确的工资比例来表示。工党尽管还残存着对一种不同的体系的理想，却无力提供另一种感觉结构，而向上认同如今却风头正劲，能够一路向下蔓延。这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戏剧性转变，虽说某些选举的结果会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这种转

变。这是某种特定社会体系的逻辑的一部分，只要对这一体系本身及其作为还不能获得充分的意识并加以提高和扩大，那么它就将继续运转下去。

1959年，工党遭遇了第三次大选失败，但随后展开的平常讨论对培养这种意识没能起到帮助作用。最流行的一套说法是，大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党被等同于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正处于瓦解中。这种说法是极其可疑的。对于许多挣工资的人来说，获得现代的房屋、家具、电视机、洗衣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汽车，的确已日益成为可能。《经济学家》杂志称此过程为“去无产阶级化”，此说得到了E·M·德宾(Durbin)等人的追捧，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工党在1950年大选中得票数下降是证明了这种说法，那么也还存在着另一种事实，即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很低的时候，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萧条时期，也就是说在有更多的“无产阶级”的条件可以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投工党票的人实际上却反而比现在还要少得多，这又该如何解释呢？1959年工党虽然遭遇了第三次大选失败，但其获得的选票数却是最糟糕的贫穷和萧条时期的一倍半。1924年，工党获得的选票数是550万，1929年850万，1931年650万，1935年850万。在著名的1945年大选胜利中，工党的得票数上升到了1200万，而保守党选票的大幅下降使工党在议院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在这一巅峰之后，依照常见的规律，工党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因为它采取的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措施不得人心。但奇怪的是，1950年工党的得票数达到了13235610张，1951年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英国政党所获得的最高票数，13949105张。在大萧条期间的“无产阶级”境况最多带来了850万张选票，而在充分就业的1951年却获得了将近1400万张选票。假如说消费品和消费贷款的增加瓦解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那么此后的选举会怎样呢？1955年，工党的得票总数有所下降，为12405246张。1959年的得票总数也还是比1951年低得多，为12216166张。这两次选举中失去的选民数量很大。^[6]在1955年，这被归咎于投票日恶劣的天气状

况，内部的纷争(这种情况在 1951 年也很严重)，以及民众的“冷漠”。在 1959 年，天气非常好，内部纷争也要小得多，而且通过电视，选举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公众关注。然而得票数却再次下降，而且最明显的是，得票总数跟 1951 年相比，仍然低了 5% 左右。这种情况很难分析，但我们不必被那些关于“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化”的神话所羁绊。在到 1939 年为止的整个“无产阶级”时期，工党从来就没有获得过 38% 以上的选票，而在 1945 年以来的“去无产阶级”时期，它获得的选票却从来都没有低于 43%。这些事实证明那些常见的分析完全是一派胡言。

在传统的意义上，工人阶级的主体是靠挣工资为生的人及其家人，但实际上英国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工党的坚定选民，凡是在靠挣工资为生的家庭里长大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如果工党能够稳定地获得 70% 以上的靠挣工资为生的选民的支持，那它就能永远掌权。认为一个人因为出身于无产阶级就一定会投票支持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对政治的极大误解。工人阶级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壮大，是创造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除了平常在教育 and 宣传方面遇到的困难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它们企图阻止、搞乱这场运动，把它引入歧途。有时会毫无进展；有时会遭到真正的失败；但有时也会取得重大的进步。且来看这些负面的说法：

你向工人建议任何事关全局的好办法，他都会马上问自己，那我靠什么活呢？意思是说，那我有什么好处？他就死抠这一点。

以前兰开夏郡衣衫褴褛的工人有好几千，他们很多人都食不果腹。但不论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闪光的智慧。你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政治正义的伟大学说……或是在认真地争论社会主义学说。在今天的兰开夏郡，你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群

体了。但你会听到衣冠楚楚的工人们的谈话，他们手插在口袋里，边走边说起合作社……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股份，或者是说到建房互助协会。

要说服工人来听一听那些不能让人开心或是无利可图的事情，非常的困难，这点早已得到公认，而我认为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了。

人们全都忙个不停，有的忙到除了自己的工作啥都不想，有的只图眼前的快乐，对知识却全无兴趣。^[7]

这些说法在今天都还会存在，“我没事儿，老兄”^①这种把矛头对准工人的意识形态就是其最时髦的翻版。但它们出现的年代分别是1835、1870、1882和1900年，正好跨越了工人运动打基础的那些年。我们这个世纪的衣衫褴褛但还在探讨社会主义的人们，也许同样已被“谈论其股份的衣冠楚楚的工人”所取代，但这决不是什么新现象：实际的历史过程总是跌宕起伏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在我们衣冠楚楚的年代里，工党赢得的选民人数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里衣衫褴褛的群体。事实上决不会有单边上升的曲线图，因为这个过程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变化中的政治条件以及社会的总体变化状况都会对它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背景，任何一种严肃的当代分析都必须由此出发。

我个人对战后的政治波动的看法可以在此简要地说一下。工党在1945年获得的胜利醒目地表明了不再回到战前状态的决心，这获得了保守党人的广泛认同。在那一年，保守党只获得很少的选票（850万），这和工党选票的大幅增长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945至1951年间，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失去了很多领薪水的人的支持，而这些人1945年曾经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50年和1951年，工党获得的选票却增

^① 《我没事儿，老兄》是1959年拍摄的一部英国喜剧片，影片讽刺了工会、工人以及老板们的腐化堕落。“我没事儿，老兄”意思是说只关心自己的个人私利，别的一概不管。——译者注

多了，这只能说是越来越多的以挣工资为生的选民转向了积极支持的立场。尽管 1951 年仍然处于战后的艰苦与规划的时期，但工党巨大的得票数彰显了英国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他们决心拒绝战前社会状况的重演，实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在 1951 年前，保守党已经完成了意义重大的重组，不仅在技术上而且也在政策上做了调整。此时它不是支持要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而是支持从根本上接受福利国家的方案，放宽经济紧缩与控制。在 1951 年，保守党还不能在实际选举中击败工党，但靠着选举制度的诡异性（在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工党堆积了巨量的票数从而形成了浪费），保守党得以在国会重获权力。数百万领薪阶层的选民又重回怀抱，而且它在挣工资阶层里所能获得的传统选票至少也得到了保留。然后，在执政方面，它又明智地恪守了它的新身份。尽管附带着削减了社会福利，而且重新制定了有利于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但构成这一切的背景却是更显著的经济繁荣以及税收的全面缩减。对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恐惧被解除了，福利国家也没有被废止，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获得了加班费，以及参加工作的已婚妇女人数的增加，收入增加了，也就不愁没钱花了。如果保守党在救助贫困以及纠正基本的不平等现象方面尽量不作为，那么维持既定的最低限度方针——有一位保守党下院议员称之为“管家式的社会主义”——显然就是为了权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他们能够也愿意付出这一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新的选举都要允诺大幅提高民众的消费力，以此来鸣锣开道，这样一来，工党要创造一种新型社会意识的长期不变的任务就变得极其困难了。^[8]

撇开当前政治的这一细节不谈，我们从这种迹象中能获得哪些与社会的总体发展相关的消息呢？我们已经驳斥了所谓的“去无产阶级化”的平常解释：无产阶级确实可以被某种工业体系创造出来，但是在政治上它只能通过政治行动被创造出来，而在英国，这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就像在以前的选举中一样，有数百万挣工资的人和他们的妻子们仍然在给保守党投票。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究竟是哪些类型的人，

是否有什么新的固定的社会模式在塑造着他们。这些问题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但有一个事实是很显眼的。因性别而导致的选票的分流的确是同从阶级出发的常见分析相抵触的，它引入了一些无法在我们平常所见的政治范畴内得以协商的问题。因此，在1959年的选举中，当人们以为英国人民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保守主义一边的时候，所有男性选民的投票（根据民意调查分析所示）却使工党得以险胜。在男性选民中，工党和保守党的得票率是51%对49%；而在女性选民中，保守党却以55%的得票率超过了工党45%的得票率。大多数男性选民支持工党，这在战后已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支持率在20世纪50年代有所下降，而保守党在女性选民中的多数支持率也同时在下降。这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对此我们仍然只能依据推测，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如果不把因性别而产生的这种差额认真考虑在内，就无从分析挣工资阶层的选票的分布状况。比如说，在1955年，挣工资阶层的选票有55.5%投给了工党，有40.5%投给了保守党；全体男性选民的选票，有50%投给了工党，45.5%投给了保守党，而全体女性选民的选票，却有54%投给了保守党，42%投给了工党。很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挣工资阶层的家庭，除了那些全家都支持保守党的之外，还有很多是妻子支持保守党而丈夫却支持工党。鉴于实际存在的种种趋向，我们的确很难看到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全新的模式产生，如果我们把那个“无产阶级”神话——即在1939年前几乎所有挣工资的人以及他们的妻子都自然是投票支持工党——扔在脑后，就更是如此了。在洗衣机和电视机的年代，工党所获选票的百分比要高于高失业率的时期，其间的调整显然太复杂了，无法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来说清楚。^[9]

从新的共同体类型这个角度入手可以理出另一条分析线索。如果纵观这一个世纪来英国的政治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共同体类型与政治代表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这似乎是一条真实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变迁。工党的政治代表地图实际上就是一幅由煤矿和

大城市构成的地图，较显著的例外是某些“凯尔特人”地区，那些地方较少受英国社会模式的影响，工党甚至在分散的乡村选区也能获得胜利。在英格兰的几乎每一个郡，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在那里，由于宗教和分裂方面的种种问题，英国政治被搅成了一锅粥）的部分郡，以及英格兰的小城镇里，保守主义都有着很强的势力。这种多样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它被综合的统计数字以及现有选举制度的夸张表现给掩盖了。1960年，在“保守的英国”，工党在威尔士实力很强大，在苏格兰是第一次占据了上风，若是只选那些最突出的例子来说，那就有一个工党的伦敦，一个工党的伯明翰，一个工党的曼彻斯特，和一个工党的格拉斯哥。由此可见，在重工业地区以及大城市里，挣工资的阶层对工党仍然保持了高度的认同，尽管还达不到全体认同或接近于此的程度。同样，在很容易连成一体的其他共同体里，比如英格兰乡村各郡以及传统的“居住”胜地，跟以往一样，保守党有着很高的支持率。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着其他类型的共同体，正是这些共同体让社会分析遇到了困难。

我们想到的是新住宅区、新郊区和新城镇，它们有着新英国的特征，但从总体上看，恰恰是在这些地区，工党的希望屡遭破灭。^[10] 这是当代分析所要处理的另一个大众形象——即“半脱离的无产阶级”（semi-detached proletariat）——的生活空间。然而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异。举家搬迁打破了旧的共同体模式，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种变化还需要从别的角度来描述。从仍然主要为单一工作服务的住宅区，发展到出身不同的人完全混居并且已成为工作中心的新城镇，这里有着社会的变异。也有着历史的变异，从社会关系仍停留在邻里之间偶尔往来的水平上的第一代住宅区，发展到了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嫁娶于斯的第二代住宅区。我们注意到有些搬迁使得大家庭遭到了破坏，但这本身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所有第一代住宅区都会变成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住宅区，虽说它们未必会有同样的家庭模式。我们不能肯定将来会怎

样，但认定以前的模式全都一去不复返了，可能也失之轻率。老的工人阶级共同体正是从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的状况中发展起来的，在一个多世纪里不断壮大，这实际上可以拿来跟目前的阶段相比。如果我们考虑到了新的共同体有着暂时的、人为的性质，如果我们超越了那种认为是物（不管它们是房屋还是洗衣机）塑造了人的简单决定论，那我们就不会轻易地断言存在着全新的、永恒的模式，更不会觉得自己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只能适当地指出，这些共同体并非出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规划，而是出自另外一些人的规划，他们对人们需要什么以及对一个社会或一个共同体应该是什么样，有着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同样也存在着变异，在很多地方，某些思考模式如今已经矗立于大地之上——就像它们曾经化身为第一批工业城镇里的一排排棚屋一样——这些都代表着现今中产阶级对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廉价想象。于是房屋或是公寓套房周围就有了更大的空地——这当然不无好处，然而附属的公共建筑物却非常少，我认为这是一种缺失。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就这样和提供品质更好的住房嵌为一体，彼此不可分，接受这样的住房，就必须连带着接受先前规定的条件。与此同时，新的传播系统也在旧的社会模式基础上大规模地建立起来，这些即时可得系统包括了廉价的全国性报纸、妇女杂志、电视等。这些外部系统之新不是体现在其种类上——尽管就规模而言它们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是表现在它们的发展壮大是与社会全面转变的不确定因素彼此联结的，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很少是对抗性的。在那些各种工作交杂的新共同体里，从工作中获得的社会意识——这是支持工党的意识得以发展的根本核心——和在共同体中获得的社会意识之间的互动程度，成为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由于在这种互动中两方面的因素本身都还在发生变化，所以要就此作出断言尚为时太早，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工会意识（这是在工作中学到的最朴素的东西）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工党意识之间的某种分裂迹象，从一个混合的共同体和整体性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分裂是肯定存在的。但既然有一些社会群体是从自身

利益出发在助长这种分裂，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分裂的迹象看作是上帝旨意的显示（人们有时也称之为“美国式的未来”，但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所为）。然而，也存在着发生这种变化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已经被创造出来。在诸如此类的很多潮流的冲击下，新共同体的男男女女们在生活中是在明确地践行着那种关涉到整个社会的学习和反应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复杂的局面正是当代保守主义在一手引导的，所以它知道需要就此向最广大的民众作出解释，这并不让我感到有多么吃惊。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工党却显得毫无作为。它一直没有能力提供一种对共同体的不同展望，以及一种新型的意识。其妥协性的政策将两种毫不相干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其一是求助于旧的且在衰落中的习惯和记忆，其二是根据当前的社会混乱局面在文化上进行调整。工党内部的老左派和新右翼在作出恰切的分析并应对挑战方面，都采取了延宕的态度，在这点上，它们倒是无意中结成了联盟。一方面是乞灵于旧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注定要被人们改变或是拒斥，另一方面是拒绝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根本不同的人类社会秩序，这样就使得现有的统治理念和方向遇不到任何根本性的挑战了。意识的复杂且不平衡的发展——这在新共同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但其实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显示——也因此丧失了政治上获得表达的渠道。这种状况不可能一成不变。人们不会永久地守着现存的体系不放。新的学习和反应方式将会发挥作用，而且可能是以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各种形式（奥尔德玛斯顿进军^①，以及关注教育和公共问题的各种当地团体，都是早些时候的例子）。因为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新共同体中的男男女女作为遍布世界的新型社会的成员，他们是以人类的形象而不是以什么人给他们描述的形象来创造的。实际上不存在什么“通过电视而凝聚在一起的大众”，这是第二流的社会分析家们所虚构出来

361

^① 奥尔德玛斯顿进军(Aldermaston marches)是1958年掀起并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场反核运动。奥尔德玛斯顿是伯克郡的一个小村镇，是英国原子能武器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译者注

的一种糟糕说法。谁都说不准大众——无论是新的或是旧的——会怎么做。但现实中的男男女女，尽管他们总是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都会一边观察一边学习，而我并不认为他们终究会变成别人的盘中餐。

在这种新形势下，关于社会各阶级的既有描述已经变得极为费解。怎么才能知道某个住在新城镇或是新住宅区里的男人或女人究竟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工人”或是“中产”，它们所传达的传统含义不是经济方面的（正如我们所见，在这方面很难引出关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描述），而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对于贫穷、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风餐露宿的记忆，相反，“中产阶级”则意味着有钱可花、良好的居住条件以及一种更完备、更能控制的生活。由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对比就会很容易变成今昔对比：“工人阶级”代表着旧的生活方式，它正在被人们不断地抛弃，而“中产阶级”则代表着新的“当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容易指出这些概念如今已经丧失了恰切的意义，不足以描述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但是它们的情感力量却并未因此有所减弱。在那些比较老的共同体里以及在有些政治积极分子身上，也许还保留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存在着深层的困惑：一方面是觉得“工作是为自己谋生”（几乎每个人都如此），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觉得“工人”阶级就等于是劣等的、被剥夺的“下等”阶级，是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想回归的阶级。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当现在的社会主义者谈到工人阶级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被那种对优劣的等级观念的天然憎恶所吸引。就阶级的社会意义而言，大多数人只有当他们感到焦虑的时候，才会谈起阶级，而且常常是想摆脱那种人分五等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愿望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是社会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一个异常宝贵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却发展到了这么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觉得阶级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已过时的概念，这种日益扩大的看法正在被用来肯定现有的社会体系，但如果从其他的角度而不是从那些如今已明显崩溃的角度来

看，这种社会体系根本上仍然是建立在经济的阶级基础之上的。

只要社会等级意识存在一天，目前的这种困惑就永不可能消除。我们必须转而关注两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公开的等级差异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和控制。等级差异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区别提供了某种真实感，尽管它也带来了理解上的混乱。如果只是孤立地来谈论等级差异，那么社会就变得无从理解了。等级差异不过是某种特定类型社会的一种运作功能而已，它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竞争，并使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彼此不和，其结果是将社会意识导向了这么一些形式，它们维持着整个社会体系，使之永存不灭。我当然认为等级差异必须加以修正，但这必须具备一个唯一可行的基础，即拥有一种真实的共同体的感觉——真正认识到我们是在为大家工作而且是彼此依赖的，这在目前还只是一个理想，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拥有或是掌握生产工具和劳动成果，那种共同体的感觉就始终受到干扰，有时甚至会被消除。在工业经济中，社会产品要么为全社会所拥有或掌握，要么就是被一部分人拥有或掌握，其余的人则受其雇佣。在这两种方案之间作出抉择，也就是要在阶级问题上作出重大抉择，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消灭阶级体系，那么就必須扫清其他各种区别的残余，芟除枝节，廓清迷雾，直到我们能看到那个最终支撑它们的坚硬的经济内核。一旦那种根本性的不平等被剥离出来，我们就能停止那些关于阶级的无关痛痒的讨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已经厌倦这种讨论），并展开关于人类差异的更有趣的讨论，这些差异是真实的人们和真实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都拥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363

4

文化的扩张必须放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真实社会背景中来思考。我关于某些特定文化制度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展现了一种真实

的扩张(它当然还在继续中),但也展现了这种扩张受其他方面的社会现实影响和制约的限度。在1960年代,增长率似乎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而我们都忙着制定规划来维持并加速增长。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简单的上升曲线图轻而易举地掩盖了一种主要的矛盾,因为在严肃的艺术和观点为更多的人所享有的同时,那些五花八门的劣质艺术和观点也在以更快的速度流播开来。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这些不同的发展路线和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且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然而即使是那些已看清局面的人,对于能做什么也还是感到茫然无措。

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个特定的、局部的矛盾,它能够迅速把此类讨论搅成一团。如果有人提议要推广好的艺术和观点并削弱那些最恶劣的艺术和观点,那么通常就会有别的人跳出来说不应该自以为是,足球和象棋一样,归根到底是好的,爵士乐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形式,而园艺和家务活也很重要。很显然,对于提议者来说,真正的论辩对手其实不是他所回应的那些人,那么谁才是他的论辩对手呢?很不幸,他的论辩对手正是现存的大众以及一种人所熟知的感觉方式。的确,某些文化形式已被用来证明社会差别的存在,而对新的文化形式的全盘谴责也已经流变为一种论证方式,以证明那两个一贯遭到贬低的群体——大众和青年——是等而下之的。我们必须抵制这种思维习惯,但是那种煽惑大众的流行形式也同样是危险的,它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某些例子,完全避开了劣质文化的问题。在转而讨论更艰难的问题之前,我们能赞同足球的确是一项美妙的运动,爵士乐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形式,园艺和家务活的确很重要吗?然而,我们也得承认,恐怖电影、强奸小说、星期日漫画报(Sunday strip-paper)以及最新的通俗音乐(Tin-Pan droll)不是也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上吗?还有那些刊登于杂志上的讨人喜欢的爱情小说,男子气十足的冒险故事(直捣龙潭虎穴),以及那些精致、巧妙的电视广告,不是也都同时存在吗?对这些东西以及靠着散播这些东西而获得的巨大利润,自然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它却

经受不住那种相并行的观点的扰乱，即认为一种好的活文化是多样性的且不断在变化，对运动和娱乐的需要如同对艺术的需要一样，也是真实的，而公开展示“趣味”，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区别的形式，则完全是粗俗的。

在一个急剧变化并因而变得混乱不堪的社会里，文化形式总会发生变化，教育可以深化和提高我们对这种变化作出有意义回应的能力，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却鲜有作为，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各种行动形式的同时，也学会批评的方法。

我们必须同时作出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应尽可能鼓励那些认真致力于创造新形式或是在传统形式上做有意义工作的艺术家们，另一方面应稳定地提供这样的作品并加以讨论，包括真正的批评，这种批评至少必须跟那种蓄意的、中庸的操纵区别开来。说人们还没有在这两方面作出半点努力，这当然是不对的，艺术现在得到了一些扶助，尽管还很不够；一些认真负责的作品和讨论也得到了公开的资助。这些政策所抱持的仍然是那种进化的观念：坚定地促进有助于增长的一切因素。我支持这些政策，而且肯定希望看到它们能够进一步扩大，但同时我也发现很难说它们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们常常认识不到那些恶劣的破坏性因素实际上是在更加活跃地繁衍着。举例来说，为一款新肥皂做广告，要附印上响亮的词句，所花的钱比资助一个管弦乐队或是一家画廊还要多；又比如创办这样两份杂志——一份是想做一种严肃的新工作，另一份却只想在已有的流行市场上争夺一个份额——两者的投资比率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前者几乎得不到任何投资，而大把大把的钱却被投到了后者那里。文化要发展，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至少能够公平地获得各种不同的要素，而那些新的和不常见的事物，若要赢得被接受的适当机会，则必须得到较长时间的稳定资助。以我们目前的文化组织状况，能这般恪尽职责的政策似乎还不可能制定出来。对有价值的要素的支持只是限于采用消极的参股的方式（这当然要比什么都不做好），这几乎不可能带来普遍的变化。其余的地盘都留给了市

场，然而却不能说就实现了市场的自由运作，因为给我们的主要文化机构提供资金的资本总量使得只能有极少数的强势群体才能进入，生产和流通因而都被牢牢地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前面提到的那类严肃的新杂志，通常都是一群富有奉献精神的人自愿作出努力的结果，但是在书报亭里却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踪影，而它们本来是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读者的，在这个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它们是买不到的。相反，新的商业杂志却摆得到处都是，你想躲都躲不掉。这里显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些直接的结果当作证据来证明民众永远都是粗鄙庸俗的，这种做法就是愚蠢的，甚至可以说是用心险恶。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对“群众”的文化状况表示愤慨和绝望（现在甚至连那些被认为是群众之友的人也都日益持这种论调），而是必须突入这一核心事实，即我们的文化机构大多数都被投机商控制了，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的健康和发展，而是怎么剥削那些缺少经验的人并借此迅速牟利。在饱受攻击之下，这些投机商或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勉强同意一些不同的限制政策，他们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声誉”，也就是说，这样的“声誉”足以使他们在公众面前维持有限的体面，从而使他们可以继续为所欲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允许其文化机构落入到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手中。

我想现在有很多人都感到了这个问题带来的压力，但更大的压力却来自于难以找到别的可行方案。在某些显然是有限的领域里，稳定而特殊的鼓励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但是要想扭转整个局面，却遇到了天大的困难。因为要想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显然都只能来自公共资源，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反对的理由。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这些资源是否真的可以在所需要的规模上获得。这就要回到前面所谈到的那个困难：我们发现要使社会保险资金超过用于社会生产的资金，这几乎是无法设想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种会计制度可以使这种设想变得可行，或者哪怕是可见。事实当然是现有的投资都来自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用来做广告的钱（它等于

是当今社会的吗哪^①)最终还是得由作为工人和购买者的我们来支付,尽管中间要经过几道曲折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社会资本被控制在少数几个群体手中。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正是我们在通过某种经济组织为现有的文化体制付费,那么就无须被所需要的资源规模所吓倒,因为那种组织实际上是必定要被改变的。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把这些文化问题看作是资本主义组织化的一个结果,那么对这些问题就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而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资本主义必须终结了。对现存体系发起的最有活力的反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反抗,都打着文化的旗号,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反对的理由与此有着深刻的关联。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国家的控制。有很多善良的自由主义者和焦虑的社会主义者在谈到这是否就是未来的前景时,都退缩了。他们声称,哪怕是投机商,也还是比不可避免的庞大的官僚集团、行政实体以及极可能实行的审查制度好。

这个难题意义重大,很有代表性。它牵涉到的不仅是文化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了关于社会变迁的整个思想领域,它们全都缠绕在一块了。这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民主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深刻的困境:我们似乎把问题简化为了在投机商和官僚之间作选择,我们不喜欢投机商,当然也不会欢迎官僚。在这种情况下,能量被消耗了,希望也变得黯淡了,而目前存在的投机商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勾结自然也就不会遇到挑战了。

民主的政策是通过公开的讨论和投票而作出的。在较小的实体内,成员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会更紧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将某些决策的责任移交给选举出来的代表,而不是由全体成员来承担,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工作也必然要移交给行政官员来做。在一个民主的组织

^① 吗哪(manna),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穿越荒野的途中,得到了上帝赐予的食物,即吗哪。——译者注

中，行政官员的准则是相当清楚的：他在既定政策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其行为必须向全体成员负责。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有完备的宪法，而且成员之间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那么这仍然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好的、最负责的体制。

368 有人力争说应将文化交流的工具纳入国家体制，但即使是在民主国家里，也始终存在着这么一种危险，即过于庞大的体制会变得僵硬死板，从而构成某种障碍。任何一种适当的文化体制都必须是开放的，灵活的，可以容纳真正多样化的表达。有人认为管理各种文化机构的最佳人选，就是在其生产工作中利用到这些机构的人，因为让这些机构保持灵活和开放，关乎他们最根本的、最实际的利益，但这种说法似乎仍然是太简单了。同样明显的是，文化工作的实际生产者凭借其自身资源，除了最简单的工具之外，无法掌握任何其他工具的所有权。而在他们真的能够掌握所有权的地方，却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戏剧这些行业，这种简单的合作所有制显然是无法实行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昂贵工具的控制权就应该落到出价最高的人手里，当这个人实际工作完全没有兴趣而只关注能否靠它牟利时，就更不应该了。在当代英国，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最糟糕的方案正在变得常规化，赢利成为主导的方针，生产者则沦为雇员。新闻出版和电视行业的情形尤其如此，一些强势的利益集团还在力图将这套体制搬用于广播电台。现在迫切需要确定另一种原则，而我认为它只能是这么一种原则：当生产者不能自己拥有生产工具的时候，这些生产工具应归生产者所信托的共同体所有，并建立一个能够维护这种信托关系的管理机构。在这里显然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一切管理以及章程的制定实际上都是从所强调实现的目标出发的，而我相信，只要我们能赞同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那么没有哪个社会比我们的社会在经验方面更有资格来设计各种充分可行的方案了。

比如在戏剧方面，大多数剧院可以是公有的（最好是归当地政府所有，尽管此外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小型的全国性网络），然后授权给演员

369 社团。应该设立一些地区性的及全国性的开放的机构组织，演员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通过这些组织机构，演员社团就能够制定一个较长期的计划，以保证某个作品在拥有资金的时候可以在许多剧院巡演。通过永久性的或定期性的联络，也可以和广播电视机构达成类似的协议。固定的演员社团能够提供充分的职业保障，形成属于自己的戏剧传统，它毋庸置疑地拥有着巨大的优势：今天我们在剧院中所能看到的优秀作品几乎都出自于这种演员社团，尽管它们仍要竭尽全力地拼搏，希望最终能够受雇于那些把持着大型国立剧院的投机商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让艺术获得自由，那我们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将剧院交到真正的艺术家们手中。

电影院也可以实行一种相关的制度。目前的情况是，影片的作者几乎完全被捏在发行商的手里，这些发行商依据一些粗略的测验，便先决定了一部影片是否值得拍摄。这就是自由主义者自鸣得意地要捍卫的艺术家的自由。很明显的是，电影院的数量在将来无论如何都会减少。这给合理地重组电影院提供了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电影院应该成为公有并交给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来管理。至少应该有两到三个院线，其中包括一个专业院线，以确保做到兼容并包。影片的生产应该由固定独立的演员社团负责，和剧院的情形一样，演员社团应该以其专业技能达到公共机构所提出的要求，然后才能获得公款的资助，用以拍摄影片，这些影片将能保证在某一院线获得公映。演员社团越是 370 独立，就越好，对电影演员社团和前面提到的戏剧演员社团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应该多加鼓励。独立的管理机构可以由两方面的代表联合组成，即由国会任命并向国会负责的官员，以及由固定的演员社团选举出来的代表。

在图书方面，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独立出版社，尽管它们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才能坚持下去。一个快速的兼并过程（通常是独立出版社被吞并）已经拉开序幕，而那种对文学毫不关心的新型出版商也已经越来越多。随着成本上升，以及“平装书革命”所带来的广阔商机，图书业

似乎也到了一个与世纪之交的报纸相似的阶段。从这种体制中滋长出来的那种量化的思维方式对出版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头了，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对最近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探讨并思考如何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时候了。同时，对于那些勇于承担责任从而改变路线的出版人，应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如今一团糟的发行领域也许是最好的实验场所。有几百个城镇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这实在是太丢脸了。口碑不错的独立书商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服务，但除非是他在当地特别走运，否则便只能以破产告终。书籍和期刊要挤进现有的连锁商店，就必须通过销售量这一关，低于某个数字的话，连锁商店就会认为它们根本就不值得一卖。这算什么自由呢？哪里还有什么获取的自由？我认为可以设立了一个图书委员会，其成员既有出版商、书商、作者的代表，也有国会的代表，这个委员会的职责一方面是确保出版能继续维持其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使书刊杂志在本土和海外的发行渠道都能做到畅通无阻。现在有那么一股压力，试图把出版物降格为品种有限且易于大量售卖的标准物品，我们必须抵制这股压力，把它当作事关公共政策的大事来抓。这个图书委员会可以对现有的图书销售的计划部署进行评估，无论在哪里，一旦发现书刊杂志不能有效地覆盖（现在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就有权建立和担保一些独立的企业，以执行既定的政策。在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方面，我们已经采用了这一原则，但在为读者提供图书以便于他们购买和收藏方面，迄今为止却仍然做得很不够，这是很奇怪的。

至于报纸和杂志，我们所面临的是这么一种局面：控制权日趋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办报或是办刊的方针不是旨在提高质量，而是提高盈利率。盈利的标准被抬高到了荒谬的地步，举例来说，一份日报如果销量达不到一百万就可能被迫停办，所以，报刊杂志数量的稳定减少，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可以再一次质问：这难道就是自由？就是所谓的自由获取？规劝或是审查都不可能提高报纸的质量。所有其他领域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某个职业的标准由其从业人员控制时，其水准就

会提高。这种职业责任现在实际上已不可能成为固定不变的方针了，因为整个报刊体制(和电影院、剧院的体制一样)制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氛围，标准是由控制者在对有可能获取的利润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的，实际的生产者不觉得对其工作负有某种共同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鼓励在写稿方面彼此展开竞争。个人的标准永远都会有所不同，但一个建立了种种制度使得最寡廉鲜耻、最冷漠无情的人都能大获成功的社会，终究是一个可怜的社会。然而，改革这些制度的一切努力，却都遭遇了长久的毁谤和歪曲。我们显然不希望报刊全部收归国有，但我认为现在到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报刊委员会的时候了，它将由公众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代表组成，负责维护和发展真正独立的报刊。^[11]我们尤其要确保地方报纸能够存活下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些报纸应该归当地所有，也归当地管理，而现在的地方报纸，能做到这一点的却非常少。地方报纸的所有权归当地政府所有，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可行的，尽管如此，也存在着反对这种做法的严肃的理由。报纸是一种公共服务设施，应通过前面所说的包括新闻从业者代表在内的报刊委员会，保持其独立性，并获得必需的资金供应，这应该成为全国上下普遍接受的共识。公共服务的原则同样也应该运用于杂志，通过业内公认的编辑团体，确保其独立性。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这一原则可以推广适用于全国性的报纸。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或杂志的编辑团体就不能通过自己的民主决策，自由地申请成立这么一个报刊委员会，它将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组织，能够摆脱任何外部的私人资金的控制。一旦这种设想能够得到认可和支持，生产者就能自己来决定办报或办刊的方针。由公众代表和从业人员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有时也会不愿意批准下面提交的某项办报或办刊方针，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但即便如此，情形也不会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更糟糕；办报或办刊方针可以在市场上试验，所得到的资金也不会比现在少，因为任何一份报纸或杂志都不会被禁止出版。我认为，凭借着经验和声誉，大多数恪守职责的独立报纸都能够站住脚跟，即使是够不上大多数，也至少可以保证

372

没有哪一份报纸或是杂志会被一个只知赚钱、对报刊质量却漠不关心的金融组织所扼杀。在这样的领域里，改革即便是得到公众的支持，也只能从内部发起。在广播电视领域，我们看到 BBC 这个不够完善但总体上还算负责的政府机构遭到了各种新机构的强有力的挑战。很显然，随着这些政府机构的扩张，我们需要不断地扩大选择的范围，但如果我们把独立解释为拥有来自别处（如今主要是来自广告）的营运资本，那么我们能否在可靠的基础上扩大选择的范围，就很难说了。也可以有两个或是更多的政府机构拥有传播方面的技术工具，但应该遵循前面所说的原则：可以由政府机构制定总体方针，实际营运的准备金则必须由真正的生产者掌握。应该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网络，它们的广泛用途显然很有价值，但我们希望看到为这些网络提供服务的，是各种各样的独立团体，而且这些网络也拥有地方性的分支机构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方针。商业电视中现有的节目演艺公司，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它们基本上就是冲着商业利益而拼凑在一起的，雇佣了一些实际生产者。公共政策的要务之一是鼓励形成各种专业团队，政府机构可以为它们提供传播的技术工具。这类团体的核心人物是专业的广播电视制作人，他们将能发展出一些联系的手段，与戏剧、电影以及新闻出版界的其他专业团队相结合，与所在地区的管弦乐队以及类似的其他组织机构相结合，最好是能够与范围广泛的各种地方性组织（包括教育委员会和志愿者协会）相结合。这样就能避免中央垄断和只俯首听命于投机商的双重危险。

在提出这些纲领性建议的时候，我很清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和所有拥有相关经验的人进行讨论，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改进办法。我并不认为这些重组措施可以轻而易举地落实，但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可以设想这么一种文化体制，它可以极大地扩展文化生产者的自由，为此就必须合理地利用公共资源，切断它们对占据了支配地位、根本上却一无所用的财团的依赖，此外也可以采用各种合同制，在保障公款使用有度的同时，赋予生产者掌控实际工作的权力。这无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

前进道路，其实只要这些原则能获得实质性的赞同，相应的章程法规总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

374

现在的情形很危急，一方面是有些自由主义者还在以艺术自由的名义回避改革，或是主张文化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被管治的（精神是自在不受羁绊的）；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同性质的极其快速的重组，伴随而来的是在我们文化的每个部分，实际所有权和独立自主的区域都缩小了，而且看来肯定还将继续缩小。我必须坦率地问这些自由主义者他们到底在捍卫什么，因为他们所推崇的自由与现实中的自由似乎并不相同，——最近，一位电视台及连锁报业集团的老板把现实中的自由形容为“一张自己印钞票的许可证”。关键的时刻已经到了，自由和独立只有依靠公众的确信和保证，才能得到拯救，而我提出的那些办法似乎可以为此奠定一个有用的基础，但也需要谨慎推行，以避免或是减少官僚主义和国家控制可能带来的现实危险。

我们的文化生活质量是否可以借此获得改善呢？我觉得肯定可以，因为现实的能量将会得到释放，但我认为这并非一夕之间就能改变。我只是说各种渠道将会变得更开放，迅速赢利的压力将会被解除，人们也将能获得更大的选择余地。关于社会变化，我的全部论据就是各种因素之间的互相依赖，我把它描述为一种理论，并据此来构想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前沿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心落在了经济、日常工作关系、民主制度、教育等方面，在这种更加明确的领域里，它们全都与文化的变革相关。我想再次强调那个高于一切的教育问题：为目前遭到忽视的年龄在 15 至 21 岁之间的法定成年人^①提供各种新型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在社区的中心适当地提供成人教育的场所，增进其与更多的文化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等等。

^① 英国法定的成年年龄从 15 岁到 21 岁不等。如威尔士和英格兰规定为 18 岁，而苏格兰则规定为 16 岁。——译者注

375 有一件工作亟待去做，即提供现在可以买到的各种新产品的质量及使用方面的信息。我们每年花4亿英镑用于广告，而不是用来提供这种合理的服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暗示和魔术的世界中。现有的各种“消费者之友”协会当然应该得到支持，但很典型的是，和目前对于艺术的大多数支持一样，它们只为范围有限的民众服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立一个调查和信息方面的公共服务机构呢？它可以在每个城镇设立足够的办事处和陈列室，在这里普通购买者就能作出真实的选择。凭借现在用于广告的支出，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现在的广告系统已经过时，它就是一种前民主的形式，用以操控被视为“群众”的民众。这些新的工作全都可以同时开展，从而使这些新型社会服务之间的真实联系——购买并学习，使用并欣赏，共享并辨别——得以呈现出来，这些工作开展得越多，文化就越是有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12]

5

推动漫长的革命得以进行的人类力量源自于这么一种信念，即坚信通过破除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的各种压力和束缚，通过发现新的共同的制度，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必然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果回顾过去的这几个世纪，就会发现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我们应该牢记在心。我们还应该记住在各种建议被接受时伴之而来的不解、困惑和厌恶，而当年所争取的那些东西如今已成为现实中最平常的部分。然而也有着明显的失败：不仅有挑战的失败，正如新的、未能实现的复杂事物所昭示的；也有直接的失败，比如有些改变是被拽回到了旧的体制当中，又比如从以前的经验中习得的思维方式仍然顽固地盘踞着，限制了变革的潜能。我们往往会陶醉于成功，然后又被沉重的失败弄得灰头土脸。或者，当我们直面失败想看看是否可以做点什么

的时候，却又被欢呼成功的声音扰乱了心神。

376

美国的朋友们告诉我，这一革命事实上已经停止，而我的看法——它可能仍然有着不断创造的能量——是一种出于好心却带有误导性的愿望，因为他们在美国触摸到了未来，而我的那种愿望并没有成真——工业、民主和传播的扩张只是把人引向了一个所谓的群众化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立场，它不是那种革命的立场，而是一个异见分子的立场，他尽管不能逆转潮流，却使一种另类的幻想得以存续下来。在英国我也听到了这种说法，显然用的是同一种腔调，而且在很多最新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确也回荡着这种意味深长的声音：这个社会已是在劫难逃，怎么都没救了，但凭借着热情和讽刺，个人或一群人可以保留住一块人性的飞地。同时，苏联的朋友们告诉我，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地方都已经取得了革命斗争决定性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未来已经展现出来。我充满敬意地听他们这么说，但我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觉得革命已经结束，和觉得革命毫无用处一样，都是没有用的。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所有的道路都已经找到，人们因而只需简单地接纳某种体制就行；而要在西方社会中施展类似的巴结讨好的技巧，同样也很难：要么是大多数人都有那种僵化的自鸣得意，要么是少数人的（强硬的、冷酷的、现实主义般的）宣告：我们被历史判处了死刑。

在漫长的革命中，我们给自己定下了尺度，而在每一个已进入这场革命的社会里，与期望相关的问题似乎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够好了”是被不断重复的低语，当我们想辨认这个声音时，便会发现它不仅来自想要停止或是延缓改变步伐的有钱人和强势的统治集团，也来自于其他很多人，他们没有前进的方向也不愿意冒失去现实收益的风险。

“现在够好了，我们已经摆脱了赤贫，我们有了选举权，每个孩子都能受到教育。”全都是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在从前这些可都是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期望。为了形塑这些期望，很多人的生命被夺去；而为了实现

377

下并团结起来吧。”我们必须区分三种想法，正是由于它们，漫长的革命才不断地遭到限制和反对。第一种想法虽然常常不被注意，却最重要，它为形形色色的特权集团所有，它们始终顽固地抵制在财富、民主、教育或是文化方面的任何扩展，认为这会撼动他们优势地位。在早期阶段，这种想法常常表现得很露骨，但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策略，已经取得的进步发展被当作无需再做什么的理由，尤其是被用来最大限度地起到延宕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存在及其高超的反对技巧，这个过程仍然是一场革命，尽管其形态不同于那种将期望的目标与公开的暴力结合在一起的早期革命。最近关于非洲民主的争论和较量，和英国 19 世纪初的历史非常相似，而更重要的是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深层的联系，也就是说，反对在英国大规模地扩大教育的争论和较量，本身是相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彻底揭露并反对这个策略。

而特权集团则在所有阶段都会达成奇怪的联盟。通常采用的策略是将某个时期的领导人与该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捆绑在一起，并鼓励人们去认同现存的秩序，这一招很奏效。在劳工运动的历史中就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先前的领导人铁了心反对作进一步的变革，并花很大的力气和从他们自己的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新因素作斗争。这种事情仍然在发生，而且还是以旧的形式，尽管这些人所干的事情其真相通常要等到他们死后才会被普遍认识到。在我们这个世代里，也有一个相同类型的新阶级：青年男女，他们得益于公共教育的扩大，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认同于那个准许他们进入的世界，为了赢得他们的新同侪的夸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讲解和记录那些已被他们抛弃的人们的不可救药的粗俗：这种现象必定会使我们的信心遭到削弱，怀疑进一步扩大教育是否真的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如果他们有勇气去审视，那么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也会发现很多粗俗和褊狭，这就像被封为爵士的工会领导人，对由工人们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共产主义者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分子总是愤慨不已，但在他如今跻身进入的那个世界里，他也能发现很多专横

而愚昧的权力以及蓄意为之的阴谋诡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总是能看到这么一群人，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得益者，但其所作所为却是在阻挠和反对这场革命。

限制和反对这场革命的第三种想法最难理解。美国人所说的社会的“群众化”，只有在被称为“群众”的大多数人接受对他们的这种看法(这正是新精英们竭力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生。然而这也是一个事实，即长期以来，由于精英们掌握了足够的技巧来哄骗和扰乱人心，为了某些实际目的，这么一种大众也能孵化出来。我还记得在一家卖炸鱼和薯条的小店里所看到的情景，这家小店坐落在一条小巷子里，店主夫妇的处境显然不太好，带着明显的当地口音，他们在看一部电视剧，似乎很开心，剧中人物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顾客们很相像，也带着当地口音，被塑造成一群一文不值而且显然是愚昧无知的小丑。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对普通人的这种看法常常被广泛用来娱乐大众，而那些被娱乐的大众却正是这种看法所歪曲和侮辱的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证据，有些人接受了“群众化”的说法：群众会创造出自己，不管怎么贬低他们，他们都接受，这就是改变的希望之所以破灭的原因。我能意识到这种证据的分量，但我认为它通常遭到了误解。在这些说法当中都有着某种手段高明的迂曲：人总是要贬低别人，而他认同的实际上从来都不是自己。如果都不能正眼看别人，那么就很容易轻视别人了。但怎么看别人正是基于一种社会期望。普通民众就是群众这种说法，不只是由精英们蓄意炮制出来的(顺便说一下，他们干得很起劲)。它也是从一个需要有这样的群众存在的社会的各种形式内部的实际经验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把别人的不同期望也纳入到框架当中，为此就必须始终顶住现存的某种文化的压力，这种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不能兼容并包的模式，而且往往是深入人心。在这方面，“我没事，老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句话的流行正表明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社会感受。不管给这种自私的态度贴上什么道德标签，事实上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种看法，而且从我们这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也

379

需要人们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哪还要操心什么社会变革？然而，还是很少有人会接受这种态度，或是认为它恰当地描述了他们自己的感受。别人就是这么回事，而具有讽刺性的是，正是社会中的某些真实行为（它们也会遭到别的有原则的反对）给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提供了养料，并使这种看法所表现的唯求安稳的态度得到了证实和强化。

最核心的问题与期待相关。我不认为“我没事，老兄”这种态度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社会感受的准确写照；它更像是在巧妙地使已达成的种种期望得以维持稳定。面对现实的种种矛盾——它们无法通过论辩化解，而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解决，我们很多人专注于眼前的生活领域——在这里，欲望与成就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实在的，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你若是能接受你的位置并努力工作，就能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其他方面的努力都不会带来如此显著的进步，不仅如此，事实上为什么而努力这个问题也是一点都不清楚。在过去三十年里，社会批判的火力主要是集中在消除个人贫困方面，而现在却发展到了消除个人贫困的社会条件已经部分实现的地步，于是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个人能不能向上爬、脱离贫困，就看他自己努不努力了。关键不在于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一事实：若是没有社会的努力，个人的努力多半会付诸东流，这是已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怎么关注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永远都在于如何构想新的期望，也就是说不断地想象生活可以变成什么样。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定义社会贫困非常重要，医院和教室拥挤不堪，公路不够用而且充满危险，城市丑陋而肮脏，在据说是繁荣昌盛的英国，这些现象和已经被我们消灭的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样醒目。但所有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么一种典型现象：人们所习得的旧模式因其强大而阻碍了新模式的传播。那些反对社会变革的人，为了存续旧模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即使它们原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些模式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浸淫极深的思维方式、感

觉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它们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培育出一个对其有利的大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传播新模式的努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但如果那些想要传播它们的人陷入到过去的种种绝望之中，把承受着现实压力的其他人贬低为在有意延长其生活状态的愚昧自私的群众，那么这种努力就会遭到削弱乃至中断。

定义社会贫困和反贫困的斗争实际上都已经开始。而相对应的文化贫困和不充分的民主的定义也正在积极地形成。这些思考方式不仅需要新的社会分析，也需要有对各种关系的新看法，以及对人类期望有新的感觉。典型的情况是，这种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多半是否定性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各种新感觉本身不具有创造性，它们处在与旧的公式化构想(formulation)相背离的阶段，轻蔑、厌恶和愤怒是最主要的标记。这些感觉来源于一种冷淡的厌倦感，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大体上更合乎逻辑的一览表的奇怪对立面。把这种抗议孤立开来，把它当作少数怪人(他们摸不到社会的脾性，这个社会把能量聚集在一种已知的期望模式上)的表现而不当回事，这相对来说是容易做到的。然而在一个社会里，实际的传播模式总是处在变化当中，那些老脑筋的人突然发现，在他们身后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这代人同样是孤立的，他们发现那些已实现的模式看似令人满意，却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新的感觉虽说只是停留在怀疑、厌倦和轻蔑的阶段，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弥漫开来。人们一直在积极地迈向新的感觉领域和期望领域，即便只是在触碰裸露着的神经的意义上。随着这一切得以实现，那套老把戏就又被急急忙忙地祭出来了，企图稀释、抑制和引导新的感觉。“青年”成了一个问题，这种话重复得越多，年轻人就越是鄙夷不屑，觉得是被冒犯了：“难道他们看不出来他们也是一个问题吗？”研究文化变迁的历史学家们所熟悉的那种过程又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人们被旧的定义和期望束缚住了，像以往那样，认为新的感觉要么是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某种误解。“也许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现在能挣到不错的工资了，每个孩子都能受到教育，而且我们都

381

享有选举权。这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就不能表示一点尊敬呢？”“要是我们能更细心地培养他们就好了，也许应该明智地投入时间精力来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领导者，直到他们能够分享我们的价值。”很多监护人都有这种想法，但这种典型的反应实际上是不管用的。意识确实一直在变，新的经验总是要寻求新的解释，这是一个永恒的创造过程。如果现存的意义和价值能够为新的活力所用，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新一代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异议和不断增长的反叛，实际上都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什么对策都得落空。新一代人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在于他们对社会发起了挑战，将社会的理想与其实践相比较。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这种比较是新的学习过程的第一步。从对整个环境的认知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现实感，以及自己对于现实的态度。提供某些意义和价值，请大家思考是否有可能接受它们，这是一回事。但我们关注的自然不只是那些意义和价值，还有它们的现实背景。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做到彼此合作、认真责任、非暴力，那么在现实世界上，我们还会希望生活在哪儿呢？经济是彼此合作的吗？文化是认真负责的吗？政治是非暴力的吗？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诚实的回答，这类价值的传播就收不到半点成效。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回避这些问题，就会遭到什么样程度的轻蔑，而这种轻蔑虽有可能发展为抗议和新的建设，却也很容易蜕变为玩世不恭的冷漠。唯一有用的社会辩论是这么一种，它始终关注意义和价值，直到各种现实矛盾搅动或是拒绝它们。然后，随着现实状况得到承认，这个轻蔑地进行比较和发表异议的阶段也许就能转化为建设性的能量。就我而言，我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漫长的革命当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因为在短期内根本无法确定新的建设性阶段是否会及时来临。有很多表达了异议和厌倦的警报信号都正在被资本化，成为一种新的消遣方式。罪犯、骗子和局外人被当作我们社会的时代英雄来膜拜，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充分地抓住了一些真实的感觉，使英雄主义仿佛有了充实的内容，然而却把它们引向了对于革命的

滑稽模仿，在现代历史上，这种滑稽模仿通常是在黑帮乃至法西斯主义那里实现的。只有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处于一个革命时期的时候，这些破坏性的表现才会发生。所以现在还不是详细罗列实际成就的时候，而是要寻找新的创造性的定义。一个表面上安逸满足的社会和一股主要以非理性的、丑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不满的潜流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也是无法逃避的挑战。

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描画各种新的道路并试图付诸实践。他们当然是被很多人贬斥为乌托邦信徒或是极端主义者。但我们所回顾的那些人——他们“反对时代的公意”，“侮蔑与其同时代的人们”，“挑战普遍存在的自鸣得意”，却迄今仍与我们同在，甚至在今天看来似乎还很驯顺，“为其时代所限”——在当年不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吗？一个作家或思想家，他的工作是创造新事物，所以很容易认同这些人，——当然，这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并不是每一样新事物都会得到传播并存活下来。而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则宽容地给同时代的极端主义者贴上标签：他究竟是谁啊？因为他也认同这些昔日的人物，而且常常是从这些人那里，他学到了通情达理。那么，是谁被留在了“时代的公意”那个空旷的边缘？

我认为我们全都处于这一边缘：它正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然而在颠踬和试探中，我们感觉到了运动，意义和价值也在扩展。我已经试着去描画一些可行的前进道路，唯愿它们能引发思考并得到改进。而我主要提供的是对于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那个过程的感知。如果意义得到了传播，这就是在肯定运动的意义，肯定目标方向的必要意义。这个过程的性质表明了一种也许是不同寻常的革命活力：公开讨论，扩大联系，在实践中形成制度。但它也表明了一种必要的力量：反对一切专制势力，不管它是武力的还是金钱的；反对一切意在扰乱并削弱这一漫长而又艰苦的人类努力的行为，追随并拥护那些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推动这场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人民。^[13]

注释：

[1] 这种说法在今天听来似乎是平淡无奇、不言自明的，但这段话写于1959年选举后不久，而在当时，大多数言论——几乎来自所有的政治立场——说的却是另一套。1958至1959年间消费信贷的激增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高度完美的社会的表现。

[2] 1964年的工党政府在这样的规模上重复了这套程序，这真是令人感到羞耻。所幸的是，随后为此目的而控制递补选举的企图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3] 在1961到1964年间，我们再次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1964年选举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倒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削弱了内阁的心理安全感。我们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那种模式来解决，而只能通过积极扩大责任范围和选择范围来解决。如果在今后十年里我们将要更频繁地投票，那这对民主政治就是有益的，尽管这是那些操控政治的人所不乐意见到的。

[4] 从写作《文化与社会》以来，我已发现“阶级”这个词——在其现代意义上——的使用始于1743年。我还发现“文化”这个词在现代意义上的单独使用始于1721年。这些修正应该被记录下来，尽管这些例子似乎较为特殊，而且某个语词意义的实际社会历史向来都必须从它进入日常使用之日算起。

[5] 这种说法我是在1939年进剑桥大学的时候听到的，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当中曾经上过文法学校的人，视其为民主的公共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但现在我们却听到那些以前曾嘲讽文法学校的人，开始赞美起文法学校来（他们大抵都没有上过这些学校），把它说成是一种策略，所要反对的正是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那个原则和方针。这正是我试图加以分析的社会紧张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而“能理解”（comprehensive）如今则是“施粥场”所用的口号。

[6] 在1964年的选举中，工党的得票数再次超过了1200万。虽然获得了这么多选票，但政治形势却令人惊奇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7] 这些都引自多布斯（Dobbs）的《教育与社会运动》（*Edu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一书，其原始出处分别是：Place MSS. 27827；*Life of Thomas Cooper, by Himself*, 392；Toynbee, *Cooperative Congress*, 1882；Toynbee Hall Report, 1899—1900。

[8] 困难仍然存在，但是从1961到1964年间，由1950年代的保守党所创造和描绘的那种暂时的稳定状态明显地崩溃了，而且随之出现了对更彻底的解决方案的探索。工党在1964年很勉强地获得了胜利，但它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力量，而是保守党明显的衰弱。两党几乎同时拿出了唯一“彻底的”解决方案，即所谓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努力整顿经济使之更具效率，但对社会几乎不作任何根本性的改革。这一政策的空洞已经暴露无遗，而工党更重要的社会政策也已经简化到了“附加福利”（它既受制于也依赖于一种抽象的经济努力所具有的效率）的地步，就好像任何经济规划都不是特定的社会选择和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准确表现。意识上的这种匮乏将再次让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9] 在1964年，工党在男性选民中获得的票数又一次明显超过了保守党，领先了8.6个百分点。保守党在女性选民中获得的多数票数则再次缩水，降低到只领先4个百分点。自由党在男女选民中所得票数都有所上升，这促成了工党的胜利。选举的阶级模式仍然很明显：上流阶级和中上阶级中，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是75%对9%；中下阶级中，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是61%对25%；技术工人中，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是54%对34%；非技术工人、养老金领取人群和失业人口中，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是31%对59%。这种阶级隶属关系非常引人注目，当然，如前所述，它也受到了性别差异的影响，此外还有年龄：在1959年的选举中，工党扩大了它在最年轻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在25—44岁的年龄群中，一举扭转了保守党的领先地位，在45—64岁的年龄群中，几乎弥合了差距，但在65岁以上年龄群中，还是远远落后于保守党。

[10] 在1964年的选举中，工党在这些地区中的某些地方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很不稳定，还不能让人联想到什么清晰的模式。地区性的变数表现得非常明显。

[11] 报刊委员会现在已经有所改变，包括了一些非专业的代表，通过垄断调查委员会，现在也尝试着找到一些办法来调查和控制企业兼并。这些改进措施值得欢迎，但这儿提到的原则方针则仍然付诸阙如。

[12] 在《传播》一书以及《工党的文化政策》（*Views, Summer 1964*）一文中，我对这些建议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在我的那篇针对珍妮·李（Jennie Lee）的白皮书《艺术政

策》而发的文章(发表于《论坛报》1965 年 3 月 5 号)中,这一讨论得到了延续。

[13] 我写到的主要是英国的事情,但正如在导言中所指出的,我也意识到这场实际存在且在变化中的革命几乎是世界性的。已经清楚的是,这种联结和扩展是决定性的。我们试图在英国做的事情,在资源和关系方面,事实上显然受到了我们针对别的地方更活跃的革命而制定的各种政策的限制。这不只是体现在类似这样的现象上: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军事冒险得到了资助,而与此同时,学校建设的资金却遭到了削减。这还表现在,在我们目前的政治革命阶段,我们陷入了那种满足于现有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危险之中,而且不是在设法捍卫这一秩序,至少就是想要掌管和控制别人的变革。而在一个社会的内部,也有人想把这个过程稳固在对自己相对有利的某个点上,这种企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这一过程的基本价值的实际反对,即便其花言巧语能被记住。这个过程仍然难以把握,但匈牙利、古巴、亚丁、刚果、越南就是我们自身危机的名称,不管怎样,我们所做的或是未能去做的事情,显然都不是在拥护就是在反对这场漫长的革命。所以,拥护一种教育性质的、参与性的民主,认真对待其普遍的意义和手段,这在今天比以前更像是一种延伸的革命行动,在行动方式方面,我们都还在学习中,不过现在是有了一种新的坚持和联结。

索引

(页码为本书的边码)

- Abel-Smith 阿贝尔-史密斯, 330
Adam Bede 《亚当·比德》, 189
Addison 艾迪生, 243
Address to the Journeymen and Labourers
《告雇工与劳工书》, 186
Adult education 成人教育, 164, 374
Advertiser 《广告报》, 200, 203
Advertising 广告, 200, 204, 208, 213,
214, 220—230, 375
'Aesthetic Man' “审美人”, 54, 134
Agincour 《阿金库尔》, 71
Ainsworth 安斯沃思, 71
Alcuin 阿尔昆, 149, 177
Alfred 阿尔弗雷德, 150
Almanacs 历书, 182, 189, 198, 214
Alton Locke 《奥尔顿·洛克》, 77, 84
Amis 艾米斯, 310
Anne Countess of Strafford 斯特拉福德
的安妮女公爵, 246
Answers 《回音》, 195, 224—225, 229
Antigone 《安提戈涅》, 60
Anti-Jacobin Review 《反雅各宾党人评
论》, 208
Aristocracy 贵族阶级, 78—79, 343—346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9—23, 35, 150
Arnold, M. 马修·阿诺德, 72, 76, 87,
95, 152, 161, 190—191, 218
Arnold, T. 托马斯·阿诺德, 72, 76, 153
'Association' “联盟”, 95
Augustine 奥古斯丁, 148
Austen, Jane 简·奥斯丁, 71
'Authentic self' “本真的自我”, 103,
108
Auto da Fé 《迷惘》, 304
Barnes 巴恩斯, 209
Beaumont 博蒙特, 278
Beaverbrook 比弗布鲁克, 229
Bede 比德, 149, 150
Beggar's Opera, The 《乞丐的歌剧》,
288
Behn, Mrs 贝恩夫人, 246
Bell 贝尔, 73, 157, 189
Bell's Life in London 《贝尔伦敦生活
报》, 212
Bell's Penny Dispatch 《贝尔便士快讯
报》, 70, 214
Bell's Weekly Messenger 《贝尔信使周
报》, 208
Benedict, Ruth 露丝·本尼迪克特, 63,
98—99
Bennett 贝内特, 305
Black Book, The 《黑皮书》, 186
Black Dwarf, The 《黑矮星》, 209
Blackwood's Magazine 《布莱克伍德杂
志》, 212

- Blake 布莱克, 45, 260
- Blatchford 布拉奇福德, 210
- 'blotterature' "流水账", 179, 192
- Board of Education 教育委员会, 160
- Board of Military Education 军事教育委员会, 158
- Board schools 寄宿学校, 158—160, 196
- Bonjour Tristesse* 《你好, 忧愁》, 311
- Book Clubs 图书俱乐部, 184
- Books Council 图书委员会, 370
- Bookseller, The* 《书商周刊》, 72
- Boots' Library 布茨图书馆, 191
- Border Country* 《边境乡村》, 15
- Borthwick 博思威克, 218
- 'bourgeois tragedy' "布尔乔亚悲剧" 288, 292
- Bowen, Elizabeth 伊丽莎白·鲍温, 312
- Brain, R. 拉塞尔·布雷恩, 33
- Braine, J. 约翰·布莱恩, 311
- Brave New World* 《美丽新世界》, 307
- Brecht 布莱希特, 296
- 'Britain' "不列颠", 123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BBC), 372
- British Theatre* (Bell) 《英国戏剧》(贝尔), 185
- Broadcasting 广播, 372
- Brontë, Anne 安妮·勃朗特, 84
- Brontë, Charlotte 夏洛蒂·勃朗特, 71, 76, 84—85
- Brontë, Emily 艾米莉·勃朗特, 71, 75, 86
-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 112
- Browning 勃朗宁, 72, 76
- Bunyan 班扬, 258
- 'bureaucrat' "官僚", 367
- Burke 柏克, 332
- Burnham 伯纳姆, 219
- Burns 彭斯, 260
- Butler 巴特勒, 158
- Caleb Williams* 《凯莱布·威廉姆斯》, 268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327—332
- Careless Husband, The* 《粗心的丈夫》, 283
- Carleton 卡尔斯顿, 71
- Carlile 理查德·卡莱尔, 210
- Carlyle 托马斯·卡莱尔, 72, 76, 87—88, 161
- Cary 卡里, 310
- Castell of Perseverance, The* 《坚忍的城堡》, 273
- Castelvetto 卡斯特尔韦特罗, 22
- Catcher in the Rye, The* 《麦田里的守望者》, 311
- Catnach 卡特纳赫, 186, 189
- Cato* 《加图》, 288
- Caudwell 考德威尔, 36—37
- Cave 凯夫, 206
- Caxton 卡克斯顿, 178
- Chadwick 查德威克, 74
- Chain ownership 产权连锁制, 231—234
- Chambers' Weekly* 《钱伯斯周刊》, 212
- 'Champagne Charlies' "香槟查理", 291
- Chapman 查普曼, 248
- Charity schools 慈善学校, 155
- Charles II 查理二世, 279
- Chartism 宪章运动, 74—75, 77, 87, 210
- Chevalier 切瓦利尔, 291
- 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 75
- Cibber 西伯, 283
- Cinemas 电影院, 291, 369
- Circular Letter* (1816) 《通函》(1816), 209
- Circulating Libraries 流通图书馆, 184, 192
- 'Civics' "公民教育", 172
-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158

- Clarendon 克拉伦敦, 183
Clarke 克拉克, 147
‘Class’ “阶级”, 95, 343—363
Closing of theatres 关闭剧院, 277
Clough 克拉夫, 72
Cobbett 科贝特, 186, 209—210, 260
Coleridge 柯勒律治, 27, 37, 39, 87, 193
Colet 科利特, 179
Collier 科利尔, 282
Comics Cuts 《漫画剪辑》, 226
Commercial Television 商业电视台, 234, 372—374
‘Community’ “共同体”, 93—96
Congreve 康格里夫, 281
Coningsby 《科宁斯比》, 77, 84
Conrad 康拉德, 265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353—358
‘Consumer’ “消费者”, 322—325
‘Contemporary’ “当代”, 362
Conviction 《信念》, 330
Copeland 科普兰, 178
Corantos 科兰特, 202
Corn Law Repeal 废除谷物法, 74, 79
Countess of Pembroke 彭布罗克伯爵夫人, 277
Courant 《科兰特日报》, 203
Courier, Daily 《每日导报》, 228
Crabbe 克拉布, 156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307
‘Culture’ “文化”, 57—59, 343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化与社会》, 9—10, 14—15, 162, 328, 343

Dalziel 达尔齐尔, 80
D’Avenant 先锋派, 279
Day of Judgement, The 《最后审判日》, 272
Defoe 笛福, 179, 183, 189, 203
Democracy 民主, 10, 113, 117—119, 123, 141, 161—162, 200, 248, 332—343

‘Deproletarianization’ “去无产阶级化”, 353—354
Desiderius 德西德里乌斯, 148
Dickens 狄更斯, 71—72, 75, 84—85, 187, 188, 311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英国名人辞典》, 254
Differentials 等级差别, 349—351
Dispatch, Daily 《每日快讯报》, 229
Disraeli 迪斯累利, 71, 74, 75, 84
Dissenting academies 非国教中学, 154—155
Diurnalls 202 “每日纪事”, 202
Dombey and Son 《董贝父子》, 70
Donne 多恩, 25
Dostoy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112
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 《科学中的悬疑与确定性》, 32
Douglas 《道格拉斯》, 288
Dryden 德莱顿, 278
Durbin 德宾, 353

‘Economic Man’ “经济人”, 54, 134
Economist 《经济学家》, 353
Edinburgh Review 《爱丁堡评论》, 209
Education Act(1870) 教育法案(1870), 158, 161, 188, 196, 227
Education Act(1944) 教育法案(1944), 165, 170,
Eliot, George 乔治·艾略特, 86, 188, 305
Eliot, T.S. T·S·艾略特, 265, 294
Ellenborough 埃伦伯勒, 209
Emblems and Hieroglyphikes 《寓意画和象形文》, 181
Emigration 移民, 83
Engels 恩格斯, 302
‘England’ “英格兰”, 123
Ensor 恩索尔, 196
Etherege 埃瑟里奇, 280
Euphuism 修辞样式, 277

- Evening News* 《新闻晚报》，220, 226
Evening Papers 晚报，207, 220—235, 各处
Evening Standard 《标准晚报》，229
Everyman 《凡人》，273
Examiner 《审查者》，209
 ‘Exile’ “流亡”，107—111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103—107
Express, Daily 《每日快报》，199, 225, 228—236, 各处
Express, Sunday 《星期日快报》，229, 235—236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296, 298

Fahrenheit 451 《华氏451度》，307
Fall of Lucifer, The 《撒旦的沉沦》，272
 Farquhar 法夸尔，281
Faust 《浮士德》，290, 294
Female Tatler 《妇女杂志》，205
 Fielding 菲尔丁，183
 Fletcher 弗莱彻，278
Forgetmenot 《勿忘我》，226
Forsaken Merman 《被遗弃的人鱼》，87
 Forster, E. M. E·M·福斯特，308
 Forster, W. W·福斯特，162, 196
Four P's, The 《四个以P开头的人》，274
 ‘Free Theatres’ “自由剧院”，293
 Free Trade 自由贸易，74, 77
 Freud 弗洛伊德，30—31, 95—97
 Fromm 弗洛姆，63, 92, 96

Garden 《花园》，24
 Gardiner 加德纳，128
 Gaskell, Elizabeth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71, 75, 84—85
 Gay 盖伊，290
 General Strike 大罢工，75
Gentleman's Magazine 《绅士杂志》，182, 204

 Gissing 吉辛，196
 Godwin 戈德温，85, 268
 Golding 戈尔丁，307
 Goldsmith 哥德斯密，183, 284
 Gore, Mrs 戈尔夫人，71
 Gothicism 哥特式，87
 ‘Grammar’ “文法”，149
 Grammar schools 文法学校，148—173, 346
Grand Magazine of Magazines 《杂志大宝库》，204—205
 Grant 格兰特，71
 Grattan 格拉顿，71
 Greene 格林，308
 Gregory, Pope 格里高利教皇，148
 Grey, Mrs 格雷夫人，71
Guardian 《卫报》，235

 Hadow Report 哈多报告，171
 Hadrian 哈德里安，149
 Halfpenny papers 半便士报，220
 Haliburton 哈里伯顿，71
Hamlet 《哈姆雷特》，275
 Hardy 哈代，265, 268
Heat of the Day, The 《炎日》，312
 Hegel 黑格尔，95
Heiress of Bruges, The 《女继承人布鲁格斯》，71
Helen Fleetwood 《海伦·弗利特伍德》，81
Herald, Daily 《每日信使报》，230—235, 各处
 ‘Heroic drama’ “英雄剧”，279
 Hetherington 赫瑟林顿，210
 Hickeys 希克斯，182
 Hill, Jenny 珍妮·希尔，291
 Hobbes 霍布斯，94, 97, 257
 Hogarth 霍加特，288
 Holinshed 霍林思赫德，181
Home Chat 《家常话》，226
Horse's Mouth 《马嘴》，310

漫长的革命

- House of Lords 上议院, 345—346
Housing estates 住宅区, 359
Huckleberry Finn 《哈克贝利·芬》, 304, 311
Hulton 赫尔顿, 229
Huxley 赫胥黎, 163
- ‘I’m all right, Jack’ “我没事, 老兄”, 379
I. Q. 智商, 167—168
Ibsen 易卜生, 292
‘Ideinost’ 理想性, 302
Iliad (Pope) 《伊利亚特》(蒲伯), 183
‘Illegitimate Theatre’ “非法剧院”, 291
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 《星期日插图信使报》, 229
‘Imperial sentiment’ “帝国的情愫”, 227
Imperial Tobacco Company 帝国烟草公司, 224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0—11, 88, 141, 319
‘Individual’ “个人”, 90—94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12—114, 128
‘Indoctrination’ “灌输”, 146—147
Industrial schools 工业学校, 157
Inheritors, The 《继承人》, 307
In Memoriam 《悼念》, 188
Intelligencers 情报员, 202
Interludes 幕间剧, 273
Ion 《伊安篇》, 20
- James, G. P. R. G·P·R·詹姆斯, 71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斯, 265
Jaspers 雅斯贝尔斯, 103
John Bull 《约翰牛》, 212
Johnson 约翰逊, 183, 205, 233—234
Joint stock companies (press) 联合股份公司(报社), 205—206
Jonson 琼森, 181, 277
Joseph Andrews 《约瑟夫·安德鲁斯》, 183
Journal 《日志报》, 203
‘Journalese’ “新闻体”, 219
Joyce 乔伊斯, 265, 310
Jude the Obscure 《无名的裘德》, 268
Jung 容格, 30—31
Junius, Letters of 《朱尼厄斯来信》, 207
- Kafka 卡夫卡, 308
Keats 济慈, 87
Kierkegaard 克尔凯郭尔, 103
Kingsley 金斯利, 71, 75, 84
- Labouchère 拉布谢尔, 217—218
‘Labour market’ “劳动力市场”, 134, 327
Labour Party 工党, 328—329, 353—357
Lady of the Lake, The 《湖上夫人》, 188
Lancaster 兰开斯特, 157, 166
Lansbury 兰斯伯里, 210
Last Days of Pompeii, The 《庞培城的末日》, 71
Last Supper, The 《最后的晚餐》, 272
Lawrence 劳伦斯, 265, 268
Lays of Ancient Rome 《古罗马方位》, 188
Leach 利奇, 148, 151
‘Leadership’ “领导权”, 332—336
Lear 《李尔王》, 45
‘Leave’ “离开”, 125
Leavis, Q. D. Q. D. 利维斯, 194
‘Legitimate Theatre’ “特许剧院”, 290—291
‘Leisure’ “休闲”, 132—133
Leno 莱诺, 291
Lenox Sarah 萨拉·伦诺克斯, 246
L’Estrange 莱斯特兰奇, 203
Lever 利弗, 71

- Levy 利维, 218
- Libel Act(1792) 诽谤法案(1792), 207
- ‘Liberal’ “人文的”, “通识”, 134, 162
- ‘Liberal Arts’ “七艺”, 150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95
-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臣民的自由权利”, 122
- Licensing Act(1662) 许可法案(1662), 202—203
- Licensing Act(1737) 特许法案(1737), 288
- Lillo 利洛, 286
- Linton 林顿, 99
- Literacy 识字, 11, 148—151, 152—153, 157—158, 162, 178, 182, 187—189, 195—201
- Little Wife* 《小妇人》, 71
- Living in the Present* 《生活在当下》, 310
- Lloyd 劳埃德, 73, 189
- Lloyd, Marie 玛丽·劳埃德, 291
- Lloyd's Weekly* 《劳埃德周报》, 70, 213, 221
-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地方教育局, 160
- Locke 洛克, 94, 97
- London gazetteer* 《伦敦公报》, 206
- London Halfpenny Newspaper* 《伦敦半便士报》, 220
- London Journal* 《伦敦杂志》, 72
- London Magazine* 《伦敦杂志》, 204, 212
- London Merchant, The* 《伦敦商人》, 286—288
- Look Back in Anger* 《愤怒的回顾》, 269
- Lord of the Flies* 《蝇王》, 307
- Love and Honour* 《爱情与荣誉》, 279
- Love's Last Shift* 《爱情的最后转向》, 283
- ‘Lower class’ “下层阶级”, 344—345, 347, 362
- Lucky Jim* 《幸运的吉姆》, 269
- Lying Lover, The* 《撒谎的情人》, 283
- Lytton 利顿, 71
- Macaulay 麦考利, 72, 75—76
- ‘Magazine’ “杂志”, 204
- Magazine of Magazines* 《杂志大宝库》, 204
- Magic Mountain, The* 《魔山》, 304
- Mail, Daily* 《每日邮报》, 195—199, 219, 223—226, 各处
- Mallet 马利特, 25
- ‘Man management’ “打理人脉”, 333—334
- Manley, Mrs de la Riviere 曼莉, 里维埃夫人, 205
- Mansfield 曼斯菲尔德, 207
- Maria Marten* 《玛莉亚·马滕》, 186
- ‘Market’ “市场”, 124—130
- Marmion* 《玛米恩》, 185
- Marryat 马雷耶特, 71
- Marsh, Mrs 马什夫人, 71
- Marvell 马维尔, 24—25
- Mary Barton* 《玛丽·巴顿》, 77, 84—85
- ‘Masses’ “群众”, 114, 129—130, 162, 166, 200—201, 339, 361, 375, 378—379
- ‘Massification’ “群氓化”, 376—380
- Massinger 马辛吉, 278
- Maxwell 马克斯韦尔, 71
- McCullers, Carson 卡森·麦卡勒斯, 311
- Mead 米德, 100
- Mechanics’ Institutes 技工学校, 164—165
- ‘Member’ “成员”, 102—111
- Member of the Wedding* 《婚礼的成员》, 311
- Methodism 卫斯理公会, 184
-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78—80, 190—191, 201, 219, 243, 266, 281—283

漫长的革命

-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344—363
Middle Class Examinations 中级考试, 159—160
Middlemarch 《米德尔马契》, 304, 312
Middleton 米德尔顿, 278
Midshipman Easy 《海军候补生易随先生》, 71
Mill 密尔, 72, 76, 161
Miller 米勒, 292
Milton 弥尔顿, 153, 181
Miracle plays 奇迹剧, 272—274
Mirror, Daily 《每日镜报》, 191, 199—200, 228—236, 各处
'Miss' "小姐", 347
Mobility 流动, 268—269, 348
'Modified Regional' "修正的地方语", 249
'Modified Standard' "修正的标准语", 249
Morality plays 道德剧, 273—275
More 莫尔, 178
Morning Chronicle 《纪事晨报》, 207
Morning Herald 《信使早报》, 208
Morning Herald (1900) 《先驱晨报》(1900), 228
Morning Post 《邮政早报》, 207, 217—218
Morning Standard 《标准报》, 217, 228—229
Morning Star 《晨星报》, 217
Morris 莫里斯, 92
Morte d'Arthur 《亚瑟王之死》, 87
Mrs Dale's Diary 《戴尔太太的日记》, 191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 294
Museums 博物馆, 73
Music-Halls 音乐厅, 73, 79, 87, 290—291
Mysteries of the Court of London 《伦敦法庭秘事》, 72
Mysteries of the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秘事》, 72
'Narodnost' "人民性", 302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330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295, 298, 301
New Grub Street 《新格拉布街》, 196
'New journalism' "新式报纸", 218
Newnes 纽恩斯, 196, 225, 229
News 《新闻周刊》, 209
News Chronicle 《纪事报》, 235
News, Daily 《每日新闻》, 213, 301
News of the World 《世界新闻报》, 70, 189, 213—214, 235—236
Nietzsche 尼采, 103
Nineteen Eighty-Four 《1984》, 307
Norman French 诺曼底法语, 138, 239—240, 253
North Briton 《北不列颠人报》, 206
Northcliffe 诺斯克里夫, 195—196, 222—229
Norwood Report 诺伍德报告, 171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关于公民自由的评论》, 184
Observer, The 《观察者报》, 199, 208, 229, 233, 235—236
O'Casey 奥凯西, 265
O'Connor 奥康纳, 221
Old English 古英语, 138
Oracle, The 《神使报》, 208
'Order' "秩序", 95
'Orthography of the uneducated' "未受教育者拼音法", 245
Ovid 奥维德, 149
Oxford Gazette 《牛津公报》, 202
Oxford Magazine 《牛津杂志》, 204
Paine 潘恩, 184, 260
Pall Mall Gazette 《帕尔摩尔公报》, 221
Palsgrave 帕尔斯格雷夫, 241

- Paradise Lost* 《失乐园》，181, 189
- Parlour Library 文库, 72, 190
- 'Partiinost' “党性”, 302
- Passages 通道, 202
- Passage to India* 《印度之行》，308
- Past and Present* 《过去与现在》，77
- Patent printers 特许印刷商, 181
- Patent Theatres 特许剧院, 72, 279, 288—289
- 'Pauper press' “穷酸报刊”, 210
- Pearson 皮尔森, 225, 228, 229
- Pearson's Weekly* 《皮尔森周刊》，225
- Peer Gynt* 《培尔·金特》，290, 294
- Penny Magazine* 《便士杂志》，72, 187, 212
- 'Personnel management' “人事管理”，339
- Peterloo 彼得卢大屠杀, 211
- Pickwick Papers* 《匹克威克外传》，71, 187
- Pieta* 《圣母怜子图》，45
- Plain Dealer, The* 《光明磊落者》，280
- Plato 柏拉图, 19—23, 24, 27, 35
- Poets* (Bell) 《英国诗人》(贝尔), 185
- Political Register* 《政治纪事报》，209
- Poor Law 济贫法, 74, 77—79
- Pope 教皇, 183, 243
- Portrait of the Artist*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310
- Post* 《邮报》，203
-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前拉斐尔派兄弟会, 87
- Press Council 报刊委员会, 371—372
- Price 普莱斯, 184
-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71
- 'Production' “生产”，322—323
-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353—358
- Proprietary libraries 私立图书馆, 184
- Protestant thinking 新教思想, 91
- Proust 普鲁斯特, 309
- Provincial press 地方报纸, 198, 203, 220, 233—236
- Public Advertiser* 《公共广告报》，207
- Public Health Act (1848) 公共卫生法 (1848), 74
- Public Ledger* 《公簿报》，208
- Public libraries 公共图书馆, 73, 191—192
- Public parks 公园, 74
- 'Public schools' “公立学校”，159
- 'Public school English' “公立学校英语”，250—251
- Pugin 普金, 72, 76
- Puttenham 帕特纳姆, 241—242
- Quarles 夸尔斯, 181
- Quarterly Review* 《每季评论》，209
- Quem Quaeritis?* 《你们找谁?》，272
- Railway Library 文库, 72, 190
- Rainbow, The* 《虹》，304
- 'Rank' “等级”，95
- 'Rank-and-file' “列兵”，125
- 'Raw material' “原料”，134
- Read, H. 赫伯特·里德, 30
- Reade, C. 查尔斯·里德, 71
- 'Realism' “现实主义”，35—36, 300—304, 312—316
- 'Rebel' “反叛”，106—111
- 'Received Standard' “公认的标准语”，248—253
- 'Recruiting' “招募”，125
- Reform Bill 改革法案, 211—212, 227, 290
- Refugee in America* 《美洲难民》，71
- Reid, M. M. 里德, 71
- Republic* 《理想国》，20—21
- Revised Code 教育修正法案, 157
- Reynolds 雷诺兹, 72—73, 187—188
- Reynolds' Miscellany* 《雷诺兹杂录》，72
- Richardson 理查森, 85, 183
- 'Rights of Man' “人权”，123—127

- Rights of Man, The* 《论人权》, 184
Road to Calvary, The 《苦难的历程》, 302
Robert of Gloucester 格洛斯特特的罗伯特, 239, 253
Robinson Crusoe 《鲁滨孙漂流记》, 183
Robinson, Emma 爱玛·鲁滨逊, 71
Rob Roy 《罗布·罗伊》, 185
Roderick Random 《兰登传》, 183
Rody the Rover 《流浪汉罗迪》, 71
Romance of War 《战争罗曼司》, 71
Room at the Top 《向上爬》, 269, 311
Ross 罗斯, 291
Rossetti 罗塞蒂, 72
Rothermere 罗瑟米尔, 229
Rousseau 卢梭, 95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 皇家出版调查报告, 196—197
Royal Court Theatre 皇家宫廷剧院, 293
Ruskin 罗斯金, 72, 76, 161

St James's Gazette 《圣詹姆斯公报》, 229
Sagan, Françoise 弗朗索瓦·萨冈, 311
Salinger 塞林格, 311
'Sam Hall' “萨姆·霍尔”, 291
Samuel 萨缪尔, 347
Sartre 萨特, 103
Saturday Magazine 《星期六杂志》, 212
Scalp Hunters 《剥头皮的猎人》, 71
Scarlet and Black 《红与黑》, 268
Science, in education 科学教育, 163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 307
Scott 司各特, 185
Scriptoria 抄写工作室, 177
Secret Memoirs and Manners 《上流人性事秘录》, 205
Secunda Pagina Pastorum 《第二场牧羊人之剧》, 275
'Selective tradition' “选择性传统”, 67—76
'Self' “自我”, 100—101
'Self-exile' “自我流亡”, 108—109
'Selling' “出售”, 125, 328
'Semi-detached proletariat' “半脱离的无产阶级”, 359
Sentimental comedy 感伤喜剧, 283—287
'Servant' “仆役”, 103—111
'Service' “服务”, 169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28—29, 45, 181, 277—279
Shakespeare (Bell) 《莎士比亚》(贝尔), 185
Shaw 萧, 265, 292
Shelley 雪莱, 25—27, 29—30
Sholokhov 肖洛霍夫, 302
Short View (Collier) 《略论英国舞台之不道德与猥亵》(科利尔), 282
Sidney 锡德尼, 23—26
Siege of Rhodes, The 《围攻罗德岛》, 279
Sinclair, Miss 辛克莱尔小姐, 71
Sir Charles Grandison 《查尔斯·格兰狄森爵士的故事》, 183
Six Acts(1819) 六法案(1819), 209
Sketch, Daily 《每日速写报》, 229, 231, 235
Smith, W. H. W·H·史密斯, 71, 190
Smollett 斯摩莱特, 183
'Social character' “社会性格”, 63—88, 各处, 97—102, 146, 170
'Social documentary' (novel) “社会的文献”(小说), 306—308
'Social formula' (novel) “社会的公式”(小说), 306—308
'Social tragedy' “社会悲剧”, 292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27—129, 328—329
'Socialist realism'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302—303
'Society' “社会”, 93, 120, 138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60
Southwood 索思伍德, 60

- 'Special pleading' (in fiction) “诡辩”
(小说方面), 311—312
- Speculators 投机商, 366—373
- Spens Report 斯彭斯报告, 171
- Sporting Chronicle* 《体育纪事报》, 229
- Sprat 斯普拉特, 243
- Stamp Duties (press) 印花税(报纸),
203—217, 290
- 'Standard English' “标准英语”, 243
- Star* (1788) 《星报》(1788), 207
- Star* (1888) 《星报》(1888), 220, 224
- 'State' “国家”, 94
- Stead 斯特德, 221
- Steele 斯蒂尔, 203—205, 283
- Stendhal 司汤达, 268
- Stories from Waterloo* 《滑铁卢故事》, 71
- Strikes 罢工, 327
- Strindberg 斯特林堡, 301
- 'Structure of feeling' “感觉结构”,
64—88, 各处
- 'Subject' “课程”, 103—111, 122—123
- Sunday Chronicle* 《星期日纪事报》,
70, 213, 229
- Sunday Graphic* 《星期日图画报》, 229
- Sunday Monitor* 《星期日观察报》, 207
- Sunday Pictorial* 《星期日画报》, 229,
235—236
- Sunday papers 周日报纸, 186—189,
198—199, 209—236, 各处
- Sunday schools 主日学校, 157, 184
- Sunflower* 《向日葵》, 45
- Swift 斯威夫特, 243—244
- Sybil* 《西比尔》, 77, 84
- Take it from here* 《就此开始》, 191
- Tasso 塔索, 22, 26
- Tatler* 《泰特勒》, 203—205
- Taunton Commission 汤顿委员会, 159,
171
- Technical education 技术教育, 163
- Technical Instruction Act 技术指导法
案, 163
- Telegraph, Daily* 《每日电讯报》, 191,
198, 217—236, 各处
- Television 电视, 291, 360, 361—362
- Ten Hours Bill 十小时工作法案, 74, 79
- Tennyson 丁尼生, 72, 76, 88
- Thackeray 萨克雷, 71, 75
- That Uncertain Feeling* 《那种不安感
觉》, 310
- Theatre Workshop 戏剧工厂, 293
- Theodore 狄奥多尔, 149
- Thesaurus* (Hickes) 《词库》(希克斯),
183
- Thomas 托马斯, 265
- Tikhii Don* 《静静的顿河》, 302
- Times, The* 《泰晤士报》, 71, 197—
200, 207—236 各处
- Times, Sunday* 《星期日泰晤士报》,
199, 232—236
- 'Tipichnost' “典型性”, 302
-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112
- Tolstoy, A. 阿列克赛·托尔斯泰, 302
- Tolstoy, L. 列夫·托尔斯泰, 304—305
- Tom Brown's Schooldays* 《汤姆求学记》,
82
- Tom Jones* 《汤姆·琼斯》, 183
- Tonna, Mrs 唐娜夫人, 81
- Toryism 托利党人, 74, 208
-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71
- 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 《城乡杂
志》, 204
- Trade Unions 工会, 328—329, 360
- Tribune* 《论坛报》, 210
- Trollope, Mrs 特罗洛普夫人, 71
- Ulysses* (Joyce) 《尤利西斯》(乔伊斯), 310
- Ulysses* (Tennyson) 《尤利西斯》(丁尼
生), 87
- 'Unauthentic self' “非本真的自我”,
104—105
- Uncle Tom's Cabin* 《汤姆大叔的小

漫长的革命

- 屋》，188
Universal Chronicle 《环球纪事》，205
Universal Magazine 《环球杂志》，204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344—345
Usury 高利贷，351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94
'Utopian' “乌托邦”，176

'Vagrant' “流亡者”，107—111
Vanbrugh 凡勃伦，281
Vanity Fair 《名利场》，225
Vergil 维吉尔，149
Vernon 魏尔伦，167
Virgin Soil Upturned 《未开垦的处女地》，302
Voting 选举权，353—358

Wade 韦德，186
Wain 韦恩，310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304，307
Waves, The 《海浪》，306
Way of the World, The 《如此世道》，281
Weekly Dispatch 《每周快讯》，208，212，213
Weekly Review 《每周评论》，203

Weyden, van der 范德威登，45
Whigs 辉格党人，79
Wilde 王尔德，292
Wilkes 威尔克斯，206
Women's magazines 妇女杂志，73，360
Wooler 伍勒，209—210
Woolf, Virginia 弗吉尼亚·沃尔夫，306，309
'Work' “工作”，131—133
Worker, Daily 《工人日报》，210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79—80，88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343—362
World, The 《世界报》，208，217
Wycherley 威彻利，280
Wyld 怀尔德，248，250

Yeast 《酵母》，77
Yeats 叶芝，265
Yellowbacks 黄皮书，190
'Young England' “青年英格兰派”，74，77，79
Young, J. Z. J·Z·扬格，32—33，37—38，44，46—48

Zola 左拉，301

译后记

《漫长的革命》出版于 1961 年，是雷蒙德·威廉斯继《文化与社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文化与社会》一出版便广获好评不同，《漫长的革命》面世后却遭到了媒体的敌意对待，不仅有来自右派的猛烈攻击，而且连同一阵营的左派内部也传出不少批评的声音。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批评威廉斯过于强调了文化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却抛弃了斗争、权利、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等重要观念，从而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还把威廉斯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修改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左派内部存在的这种理论分歧其实没有当年所想象的那么大。时隔 16 年之后，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的系列访谈时辩解道，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否认阶级冲突的存在，冲突是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性的前提，不包含冲突的文化定义必定是错误的。但他又强调冲突未必始终以阶级之间的强对抗形式而存在，在某些时候冲突也可能以其他形式得到斡旋，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就是这么一个时期，阶级斗争明显减弱而阶级冲突则仍然存在着。^[1]

尽管当年曾横遭批评，《漫长的革命》仍然被公认为是一部不可替代的经典著作。斯图亚特·霍尔称此书的出版是“英国战后知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将整个辩论的基础从文化定义的文学—道德层面转移到了人类学的层面。但现在它将后者定义为‘整体性过程’，通

过这个过程，各种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中被建构起来并在历史中得以改变，而文学和艺术只是社会传播的方式之一，尽管享有某种特殊的权利”。^[2]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次决定性的转移，它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以后大规模引入来自欧洲大陆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分析方法扫清了道路。

与大多数学术著作不同，《漫长的革命》没有一个单一的论述主题，全书由三个貌似没有紧密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组理论性极强的论文。威廉斯先从梳理关于创造性心灵的观念史入手，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即艺术是社会交流与传播的一种形式，接着又阐述了他关于文化分析的理论架构，强调“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根据这一定义，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价值”。这种分析不仅包括了历史批评，还将对生活方式中那些以往不被看作是文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以及人们赖以互相沟通的各种特有的形式。威廉斯着重强调的就是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特征，文化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因此对任何文化文本进行分析，都必须分析产生这些文本的制度和结构。正由于此，他说：“我乐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对文化进行分析，是试图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的综合体的组织的性质。”在“个人与社会”这部分里，威廉斯同样先梳理了“个人”概念的观念史演变，他反对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指出现代个人主义的错误就在于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与社会相区分的独立性，而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个人同时也是社会的成员。人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存活下来，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决定了个人必须参与到社会当中，而这个社会又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共同体，在其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而存在的。威廉斯接着探讨了“社会的形象”，他认为以前所建构的关于社会的种种形象都是抽象的，或是过分简略的，只关注政治和经济

这两个系统。他强调要真正认识一个社会的真相，就必须考察政治(决策系统)、经济(维持系统)、文化(传播与学习系统)和家庭(生育和养育系统)这四个实际上无法分开的系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其中存在的本质联系及其历史变化。整个第一部分的理论探讨，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是要解释文化过程的意义，这是文化生产的首要问题，也是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借着论述别人的思想而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3]

此书第二部分也许是最特别的，看上去像是一组关于文化史的社会学论文，其论题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教育体制的演变以及读者大众、大众报刊和标准英语的发展历史，还包括经典作家的社会史研究、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当代小说分析，所有这些议题都是威廉斯在剑桥大学成人教育班上教过或是打算教的一些内容。威廉斯对教育、传媒、语言等文化制度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性的，依据大量的实证材料来建立自己的历史叙述和分析，但这些研究又明显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它们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仅仅进行描述性的建构，而是在描述过程中加入了自己鲜明的政治判断，其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梳理包括教育、传媒、语言、文学等各种文化制度的演进历史，探索其中蕴涵着的开拓新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潜在力量及可能性。因此，这组论文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被社会学腐蚀了”，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尽管并没有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们都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的，并且与第一部分形成了呼应，使那些高度抽象的理论性阐述有了更坚实的经验基础。

在第三部分里，威廉斯试图直接应对英国当下面临的各种危机，并探寻拓展民主政治实践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他认为英国劳工运动在道德上明显衰退了，几乎背弃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曾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如今其意义却丧失殆尽，劳工运动的一些机构制度——如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也日渐堕落成投机性的组织，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新发展出来的“有组织的市场和消费者”等观念有直接关系。关于“消费者”的一套观念将每个人简化为市场中孤立的个

人，期待着去消费，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往那种真实而具体的共同体的连带感消失了。在威廉斯看来，这是一种全面的屈服，不仅在思想方式上受到资本主义关于“有组织的市场和消费者”等观念的支配，而且在社会现实上也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等级结构。与这种全面屈服相应的是民主实践的大幅萎缩，在很多领域，民主的缺席已成为触目事实。在国家政治的层面，民主被限制在了内阁选举这一程序上；在公有企业和服务部门中，推行使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公开决策的民主制度和程序，也是举步维艰。更严重的是，由于能用来显示社会声望的一系列物品如今都能用钱买到，所以以往那些阶级区别的形式似乎在日趋模糊，这种变化使很多人误以为阶级区别正在消失。威廉斯指出，那种认为阶级已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时概念的看法，正在被用来肯定现有的社会体系，而这种社会体系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经济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威廉斯敏锐地把握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所出现的新动向，即在经济上接受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大力干预，建构所谓的“有组织的市场”，与此同时又打造出一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配套的思想统治工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社会体系就一定稳如磐石、无从抵抗了呢？当然不是。威廉斯指出，目前这种状况只是漫长的革命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够感受到社会本身在运动，感受到各种意义和价值在不断地扩展。在对现有社会体系发起的各种反抗当中，最有活力的反抗来自于文化领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反抗，都打着文化的旗号，这表明文化已经成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最前沿的阵地。在文化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存在着积极推进各种制度实践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够发展出一系列民主的、大众参与性的文化形式，那么就能打破既有社会体系及其固化的意义和价值所造成的束缚，从而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

很显然，第三部分关于英国社会现状及其危机的分析是全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威廉斯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社会统治模式已发

生了某种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必要在传统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之外，进一步加强文化的斗争，积极参与到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和扩展当中。在这方面，文化革命以往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部分的经验性研究正是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第一部分的论文则将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探讨，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较为精密的文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今后的文化斗争提供思想上的和方法论上的指导。由此可见，全书的三个部分貌似结构松散，其实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互相支持、彼此依赖的。

《漫长的革命》在文化理论上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文化的定义。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95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文化是日常的》又强调文化是日常的，其性质“总是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最精微的个人意义。我们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词：既指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是一些共同的意义，也指艺术和学习——是发现和努力创造的特殊过程”。^[4]他强调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是联结在一起的，这便意味着文化的问题既关乎我们的普遍的、共同的目标，也关乎深层的个人意义。在《漫长的革命》里，威廉斯指出文化的定义大致有三类，即“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而第三类定义上的文化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从“整体的生活方式”到“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修正表明威廉斯对文化的思考更深入、更复杂了，“整体的”强调的是文化的共同性，而“特殊的”更多地考虑到了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体现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如阶级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同时也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将文化定义为“特殊的生活方式”显然能更好地揭示文化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富有活力的积极存在及转变。当然，“特殊的”并不构成对“整体的”的彻底否定，差异性只是共同性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强调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要否认一个社会在特定的时期其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事实上，威

廉斯非常强调文化分析需要去把握一个社会的文化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稳定的结构性存在，他用“感觉结构”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稳定而明确的结构性存在。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也许是《漫长的革命》中最具有启发性的一个理论创获。在《电影序言》中，威廉斯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

一般来说，似乎可以明确的是，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戏剧成规都与那一时期的感觉结构有着根本的联系。我使用感觉结构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觉得在此语境中它似乎比观念(Ideas)或是一般生活(general life)更准确。……在研究某个时期时，我们也许能够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精确地重建物质生活和一般社会组织，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建那些支配性的观念。……我们在研究过去某个时期时，可能会将我们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分开来处理，就好像它们是自足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只是一种可以用来研究它们的方式，而不是人们曾经体验它们的方式。我们把每个因素当作一种沉淀物来检验，可在活生生的时代经验中每个因素都是溶解的，是某个复杂总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正是从这种总体性中，艺术家们汲取了艺术的性质；也正是主要在艺术中，这种总体性的作用，也即支配性的感觉结构，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将一部艺术作品与所观察到的总体性的任何一个部分联系起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是有用的；然而这也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即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会认识到，在根据那些可分的部分来衡量作品之后，仍然存在着某种因素是无法找到其外在对应物的。我相信，这种因素就是我所说的一个时期的感觉结构，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本身的经验，它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到。^[5]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在《漫长的革命》中获得了更加精密的理论

表述。威廉斯指出：“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这种感觉方式无法用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或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来表述，因为这两个概念都太抽象了。他认为要感觉到那些活的经验，我们还需要发现某种“无法轻易处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需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正是通过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才能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这种“无法轻易处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就是“感觉结构”。既然用“结构”一词来描述，那就暗示了它是“稳固而明确”的，然而它又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这种独特性有可能得到表现——通常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基于这一事实：在艺术……这里，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

威廉斯强调在所有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中，感觉结构都是被广泛而深入地拥有的，它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针对“感觉结构”这个有点神秘微妙的概念，威廉斯的左翼同道们提出了不少质疑。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坚持认为感觉结构所指的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尽管威廉斯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一书中

巧妙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并且也可以看出他试图在超越经验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但他仍然缺少一套可以用来详细说明这种结构的接合方式（articulations）的理论术语。于是感觉结构就只能简化为一种“模式”了。也正因于此，在《漫长的革命》最后那部分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就变成了对言语习惯的印象式评论，而没有哪怕是最基本的方法。^[6]威廉斯当然不会同意将感觉结构等同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和“文化模式”一样，都太抽象了，而“感觉结构”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经验性，是对活的经验的微妙的感受。所以，他强调感觉结构“截然不同于一个时代的官方思想或是被普遍接受的思想，后者总是在它之后出现”。^[7]换言之，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是先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在《政治与写作生涯》中，《新左派评论》的访谈者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感觉结构”这个概念怎么能用来表述阶级的多重性呢？举例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拥有土地的贵族、工业资本家和城市无产阶级，更不用说还有农业劳工、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以及各种类型的小资产者。既然感觉结构是一代人所共有的，那么是否意味着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阶级所共同拥有的呢？威廉斯承认自己在《漫长的革命》中没有充分强调阶级的差异性，而现在自己会更有区别性地在不同阶级之间使用这个概念。但他又同时强调感觉结构的多样性本身在历史上也是多变的，比如在17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两个同时存在的特征鲜明的感觉结构却存在于同一个社会阶级当中，而在19世纪40年代，一种感觉结构却似乎被不同的阶级普遍接受了。这也就是说，尽管感觉结构包含有阶级因素，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它仍然可能跨越阶级的界限，被整个社会所普遍接受。^[8]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作出的理论创造所具有的某种特点，它们也许缺乏理论上的精密性和系统性，不无瑕疵，但他始终有意识地避免将理论抽象

化，而试图把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打成一片。对经验的这种重视显然来自于利维斯主义的深刻影响。威廉斯指出，利维斯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再现和解释“作品中的活的内容”^[9]。也许我们同样可以说，威廉斯的力量就在于他能够在理论分析中再现和解释活的经验。

本书是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出版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中的一本。承蒙薛毅兄厚爱，嘱我担纲此书译事。但始料未及的是，此书的翻译也成了一场“漫长的革命”，若非薛毅兄殷勤催促，恐怕这场“漫长的革命”还将迁延有时。

不断推延自然有多种原因。一是此书涉及英国历史上众多的事件和典故，一一探究溯源，颇费时日；二是书中多有古英语引文，翻检各种字典，揣摩原意，亦属不易；三是本人有追求完美之癖，虽校译三遍，仍觉尚有改进之余地。

虽然译事漫长，译文亦未必达到理想标准，但差可心安的是，我确已尽己所能。当然，误译之处想必难免，凡此尚祈海内外高人不吝指教。

本书责任编辑吴书勇先生为译文的完善也贡献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12年11月

注释：

[1]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2] Hall, 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19.

[3] 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33.

[4] 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In *Resource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Edited by R. Gabel), London: Verso, 1989, p.4.

[5] Williams, R.,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 In J. Higgins (ed.),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p.33.

漫长的革命

[6] Eagleton, T. ,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6, pp.33—34.

[7]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3 页。

[8] Williams, R. ,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58.

[9] Williams, R. ,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64.